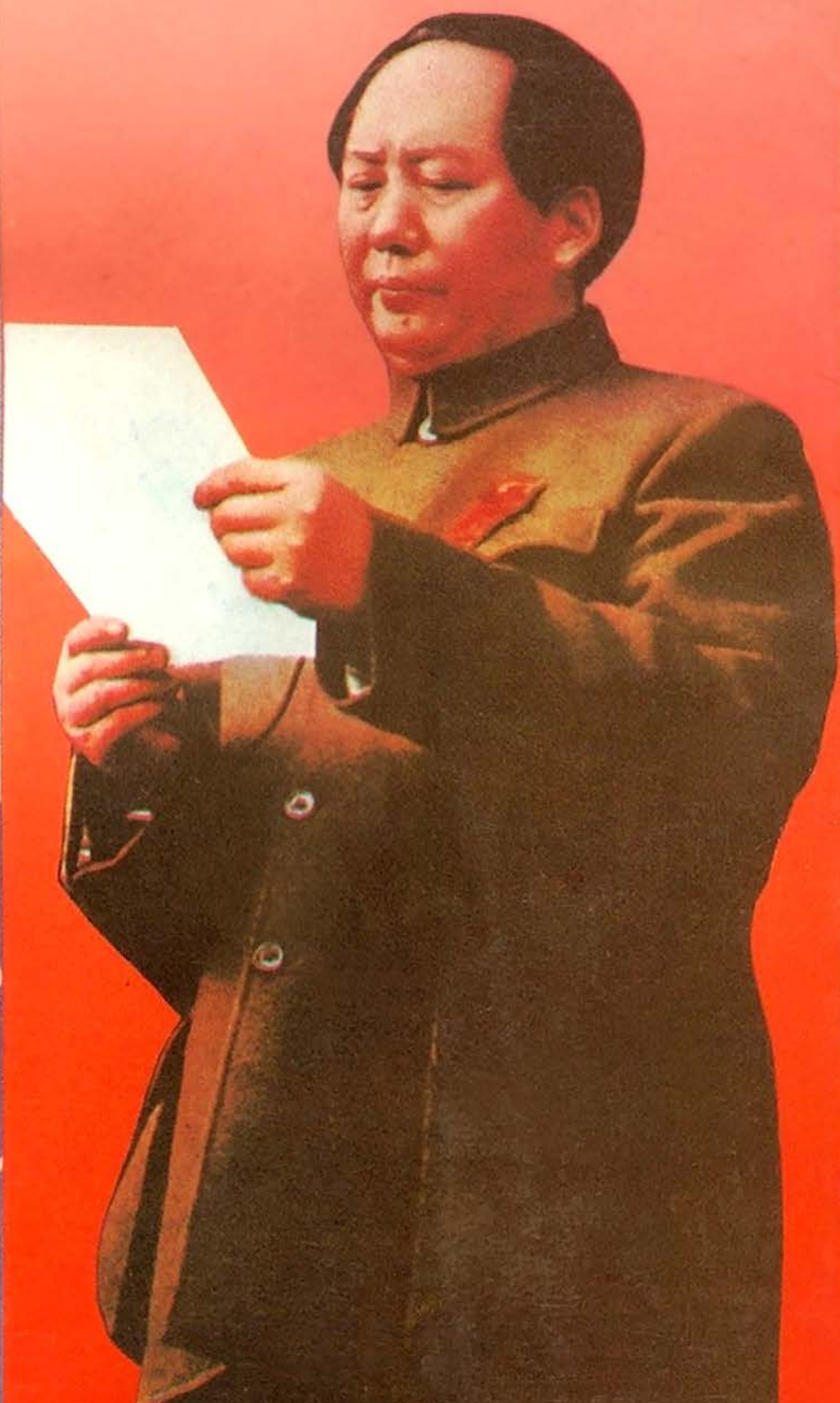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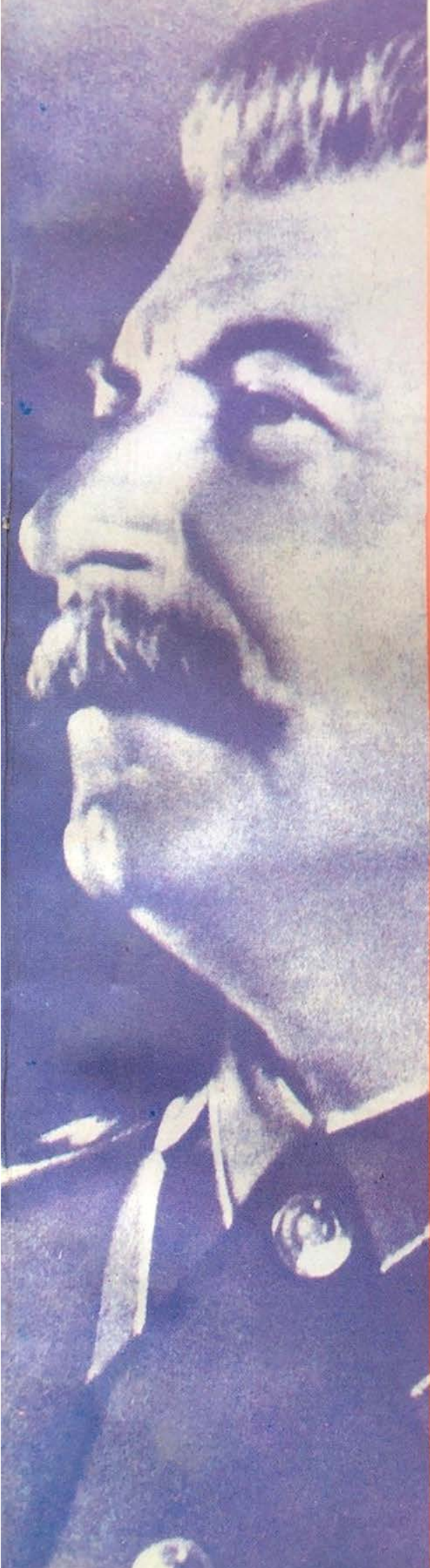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斯大林

与

刘杰诚 著



毛泽东与斯大林

刘杰诚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序 言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的确，人不读书，头脑闭塞，愚昧无知；读书，读好书，读有益的书，会使人踩着知识的阶梯，沿着正确的道路，攀向科学的高峰，为人类做出有益的事；也会使人摆脱低级趣味，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这里，我怀着认真、喜悦的心情，向年轻朋友们，向广大读者，推荐刘杰诚同志编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

这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好书，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教科书。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众所周知的两位伟大人物，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我与毛泽东和斯大林都见过面，谈过话，有过接触，并在他们指导下做过一些工作。后来，党组织分配我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七年。1948年，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华，和毛泽东会谈，我任翻译。1949年，毛泽东派刘少奇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我仍任翻译。1949年12月至1950年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和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会谈，我仍然任翻译。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与斯大林》这部书编得基本上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写历史、写人物，就要真实、全面、公正，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人物的本质，绝不应片面地只抓一点，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与斯大林》既写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伟大业绩，又写了他们的个人活动，同志情谊；既写了他们的优点、长处，高尚品德，也写了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甚至严重错误，因而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面貌。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科学性。毛泽东和斯大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政治家、实践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他们在革命生涯中，写出了许多伟大的著作，阐发过重要的理论，分析过许多复杂而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博得了亿万群众的称赞和拥护。当然，历史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本书不仅采用了常见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写史手法，客观地介绍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各个重要方面及重大事件上的理论、观点、著作、意见、而且还采用了当代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比较法”，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同一时期、同一问题上的观点、意见、贡献加以比较，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分析探讨。这不仅使人清楚明晰，一目了然，而且加深了作品的逻辑性、条理性、深刻性和说服力。

第三个特点是它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因而也有相当的可读性。写领袖人物的作品，往往概念叙述多，缺乏性格刻画，缺少情节和细节，有的甚至连来龙去脉也不交待清楚，因而干瘪枯燥，可读性较差。《毛泽东与斯大林》则不同，它不仅以中国革命为出发点为主线，描写了在黑暗中上下求索，博览群书、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探讨真理而又敢于坚持真理的毛泽东的伟大气质和形象，而且以此为中心描写了他和他的对手蒋介石、王明等人的长期、复杂而曲折的斗争，描写了他和斯大林之间的伟大友谊。性格差异、矛盾冲突、复杂斗争；最后又写到了赫鲁晓夫反。对和全盘否定斯大林，而毛泽东则坚持“三七开”，严肃、认真地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书中既有毛泽东带领党和革命人民，群威虎胆，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胜利道路的生动情景；又有

毛泽东顶着斯大林的压力，坚持打人民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场面；还有毛泽东废寝忘食、艰苦创作、忘我奋斗、坚持锻炼等生动的细节描写，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读来饶有趣味。

“学无止境”。这部书对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理论发展，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只是划了一道红线，勾出一个轮廓，其中更丰富的内容，更具体的经验，还有待于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师哲

九一年三月七日

1 两伟人亲切会面 留下了层层悬念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大国，人杰地灵，英雄辈出。

黄河、长江，滚滚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夏禹、孔丘、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大帝……一个个都成了历史的过客。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又造就了一位超夏禹、孔丘，越秦皇、汉武，胜唐宗、宋祖的伟大人物。

他，一个农民的儿子，从湖南那穷乡僻壤里走出来，读无字的书，学马列主义，探改造社会的“本源”，究宇宙万物之真理，领导工人斗争，发动农民运动，创建革命军队，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历尽千难万险，打出了一片红彤彤的江山。

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封建糟粕，揭露了资本“自由”的吃人本质，摈弃了苏联的教条模式，实事求是，锐意革新，将农村作为革命的基点，把农民作为夺取政权的主力，使那些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惊讶不已。

他，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身经百战，深谙战略，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全局，但从不干涉下属的战术部署。他善于集中兵力，出奇制胜，用“小米加步枪”。一个又一个地战胜那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他，不仅是哲学家，理论家，而且是诗人和艺术家。他深入浅出，好大众化，能把宇宙万物变化的奥秘讲得风趣而明白，勇于实践。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意味无穷；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妙趣横生。他的艺术造诣和语言艺术使他的领导思想、军事思想、文艺理论都熠熠生辉，魅力无穷。

他，是圣人，也是凡人，他绝对不是神。他遭过挫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有过苦恼，但现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当他走到位于古都北京城中央的天安门城楼上时，聚集在这儿的百万群众，翘首仰望，凝神注视，都想看一看这位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人——毛泽东。

毛泽东神采奕奕，热情地摘下帽子向欢呼的人群招手。他，身材魁梧，面容慈祥，宽阔的前额，长长的黑发，使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丰满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圆圆的下巴上，有一颗显眼的黑痣。正如一位缅甸人说的，“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但是显得慈祥宽厚。”今天，为了开国大典，他没有穿他那宽松的裤子和朴实的上衣，而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条鲜红的绸带，上面印着八个黄色大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3时整，毛泽东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低声对身边的周恩来打了个招呼，然后手持讲话稿，对着中央话筒，用他那乡音浓厚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毛泽东亲手按动了面前的升旗电钮，他那有力的大手，伸出一个指头，稳稳地按在那白色的按钮上，久久地没有松开。

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地升向天空，迎风飘扬。

54 门大炮齐鸣 28 响，每一响都惊天动地，这 28 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烈们前仆后继牺牲奋斗的二十八个年头。

广场上空，响彻了激越高昂的国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现在，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中国人民终于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终于站立起来，第一次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然而，欧风美雨，咄咄逼人。复杂的世界，是否承认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政权呢？

毛泽东的心里并不十分乐观。

新中国诞生十天后，毛泽东就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

毛泽东深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革命伟业。它不仅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扫除近百年来民族屈辱、陈规陋习；而且打破了世界的格局，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些一直想鲸吞蚕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不但不会承认它，而且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推翻它；那些受侵略受压迫的弱小国家，虽抱着同情，有心支持，但无能为力；而苏联的斯大林对自己又有怀疑……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

仅仅过了两个多小时，就从苏联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师哲把这份热情的贺电译出来，亲自送给了毛泽东。

紧接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红色电波把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时候，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冷眼旁观，蒋介石更试图依靠美国来孤立新中国。苏联的首先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声援。打破了美国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孤立图谋，使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他回到住处，已是晚上 11 时许。尽管他劳累了一天，但仍精神饱满，毫不疲倦。他顺手取来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打开封面，便看到斯大林那庄重而神秘的半身照片，端详起来。

斯大林的形象，是那样庄严而深沉，嘴边的胡子好像掩盖着无数的秘密。淡淡的的笑容，似乎又表示出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没有见过斯大林，他只是在书本上、电文中和别人的传言中，听到过斯大林的心声；而现在，在新中国正式诞生亟须得到国际承认的关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先伸出了友谊之手；同志之手，使他倍感温暖，倍感亲切，也倍受鼓舞，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自豪感和自信力。

他记得很清楚，在三个月之前，在决定新中国前途、命运的时刻，1949 年 6 月 30 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作出过明确的判断：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¹

毛泽东知道，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友谊的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他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而且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写道：“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刻拿起电话耳机，打电话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请到自己的住处，商谈着手准备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问题。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轻轻地点了点头：“是啊，今年是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贺。记得他 60 寿辰的时候，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一篇祝贺的文章吗？”毛泽东感慨他说：“是啊，一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今年 12 月 21 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毛泽东笑着说：“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周恩来知道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过分劳累，体力不支，需要休息，就说：“主席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好好休息，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叮咛周恩来组织人作访苏的准备工作，并要和苏联方面及时联系。

新中国成立，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破天荒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奴役，使帝国主义者气急败坏，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内外串连，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要孤立新中国。封锁新中国，不择手段地要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垮。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但准备自己于年底访苏，与斯大林会晤，

¹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1 页。

而且在 10 月 20 日，又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接洽两党事务。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联系渠道完全打通，可以不失时机地开展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严重斗争。

秘密的电波，把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性格多疑的斯大林，看着毛泽东那热情友好的电文，禁不住内心愧疚，左右为难。他轻轻地把电文放在桌面上，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装烟、点火，抽起烟来。

一团团的白烟，从斯大林的嘴里出来，袅袅上升，变化出各种形态。

斯大林望着那变化无穷的烟气，已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他觉得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简直似个神秘难测、变化无常的奇特世界；中国革命，又像个勇猛豪强、力大无比的雄狮，令人难以驾驭！为了中国革命，他不惜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花费过多少心血啊！然而，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有几次，甚至是事与愿违，妨碍了中国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斯大林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为蒋介石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而且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斯大林记得很清楚，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他还看不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他对美国代表霍普金斯说过，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向美国总统作出过保证。这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极其机密的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的说明》中记载着：“一，斯大林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挥起屠刀、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抵抗的时候，他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过电报，要他们不要抗争，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坚强勇敢的毛泽东，顶着国内国外的巨大压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较量。现在，中国形势的发展，和斯大林当初预计的相反，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打垮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以新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要到苏联来，要和斯大林会晤，这必然会使斯大林感到尴尬、难堪。所幸的是，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他见蒋介石和美国打得火热，把大量的美军引入中国；而毛泽东则领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很快地在东北打开了局面。于是，斯大林下决心调整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斯大林的沉思。马林科夫进来，询问如何给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拿起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看了又看，觉得无论措辞和语言，都是正确而得体的，便吩咐马林科夫给毛泽东复电：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1949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又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

于是，对于毛泽东赴苏会晤斯大林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抓得更紧了。

梁敬：《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蒋总统秘录》第 1 册第 41—42 页。

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洁白的雪花，把京城打扮得玉砌银装，分外妖娆，阳光一照，大地生辉。北京车站，红旗飞舞，人流涌动。一列专车，整装待发。

毛泽东来了。他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从小车上下来，神采奕奕地走向欢送的人群，微笑着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非同一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全都前往车站送行。毛泽东同周恩来握手时，风趣地对这位外交能手说：“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

周恩来轻轻地摇动着毛泽东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请主席放心！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随即出发！”

告别了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了专列，站在车门口向大家挥手致意。

列车长鸣一声，徐徐驶出站台，奔向遥远的北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访苏的决定是：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后，就在苏联休息和参观；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随后去办。因此，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并不多、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欧阳钦和师哲等几个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方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此外，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列车朝东北方向飞快地奔驰。毛泽东在车厢里读书看报。不料，专列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后果难料。专列上顿时紧张起来，罗瑞卿忙检查保卫措施，并亲自下车去调查处理这桩事件。

坐在车上的毛泽东却见险不惊，泰然自若地继续读书。听了手榴弹事件的报告后，他只淡淡地一笑，就去向随行人员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了。谈到开心处，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主席的镇定自若，深深地感染了车上的人。专列上的紧张气氛，很快地缓和下来了。

夜幕像一张无际的黑纱，悄悄地罩住了大地。毛泽东的专列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束，撕开了夜幕，飞速向前。车厢里，毛泽东手持书卷，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

12月9日专列到达满洲里，毛泽东一行换乘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那车厢内设有浴室，还有大夫专为毛泽东配食。到边境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在那里有仪仗队隆重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穿好大衣，大步走下车来。这时，站前广场上，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穿着新军装的苏联仪仗队，威武雄壮，整队肃立。当毛泽东走来时，“唰——”地一下，仪仗队持枪行礼，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他又与前来欢迎的当地领导人握手问候，稍事停留，又登上了专列启程。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著名的，对新来的中国客人也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挂起了一根根晶莹的冰柱。毛泽东似乎对这出奇的寒冷毫不介意，他有时观观窗外的冬景，有时埋头读书，有时查阅资料。当专列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已把电话打到了车站上，询问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如何，途中是否顺利等等。

毛泽东闻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列车呼叫着，顶着凛冽的寒风，向前疾驰，把一片片森林，一道道山川甩在了后边。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毛泽东的身体不大舒服，脸色也有些不正常。

工作人员急切地问：“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不用，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空气就好了。”

果然，列车停稳后，毛泽东下车走了走，活动了一阵身体，又恢复了常态。

列车到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来迎接毛主席的王稼祥到了。当时他是中国驻苏大使。一上专列，他就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啊！可把你盼来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也拉着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来，可少不了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说着，两个人坐下来，亲切地交谈。毛泽东同王稼祥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早在1935年春，中国革命处在最困难的关头，毛泽东心急如焚，有劲使不上。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和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过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坚定地站在被排挤压制的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地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和王稼祥当时也成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大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又是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指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现在，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再次相会，抚今忆昔，感慨万端。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香烟，自己又划着火柴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说：“时间真快呀！记得斯大林60岁生日时，我们还在钻山沟，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我们的心愿。没想到他70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王稼祥回忆说：“从1920年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革命，到新中国成立，29年间，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不少。”

“是的，是不少。”毛泽东点点头说：“这种帮助和支持，我们过去需要，现在，我们同样需要。”

王稼祥又说：“记得主席在延安发表的庆祝斯大林60诞辰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习斯大林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一个是事业方面，把理论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的确，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行了，社会主义快完蛋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张伯伦的口被封住了，希特勒完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更强大了，新中国又诞生了。”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今后的路程更长！”毛泽东说着，放眼窗外。

列车长鸣一声，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前面是金色阳光照耀下的银白色

原野，苍莽的森林，起伏的山峦，令人心旷神怡。

斯大林望着毛泽东，说：“伟大！真伟大……”毛泽东却摇摇头说：“不，我是个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1949年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雪压枝头。大街小巷白雪覆盖，冰清玉洁，到处都显得庄重、高雅、肃穆。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雪街玉树上，金光银色相辉映，好似为这座古城披上了一件绚丽的新装。

快到中午时分，气温渐渐升高，莫斯科人纷纷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车站上，红旗飘扬，彩带飞舞，一队队男女青年，手持鲜花彩带，边歌边舞，热烈地欢迎贵宾。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的大钟敲响了。“——”第十二下洪亮的钟声刚刚响过，“呜——”一列专列进站了。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呼啸着开进了莫斯科北站。钟声、车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是苏联方面精心安排的。

到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等。

在车站上，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并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由于天气寒冷，毛泽东在途中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便乘车前往下榻处——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住所休息。

莫洛托夫陪同毛泽东去到下榻处，招呼毛泽东休息，并说下午六时斯大林约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下榻的孔策沃别墅，环境优美、内部舒适、设备齐全。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了一阵，便叫工作人员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他自己则点燃了一支烟，走到窗前，望着那白雪覆盖着的田野、大脑进入了冷静的沉思。他知道，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生性主观而多疑，直至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还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他 also 知道，他根据中国特点选择的和苏联不大相同的革命道路、方针、政策，斯大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太赞成。

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0年新年号。

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0年新年号。

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知道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更懂得顾全世界革命的大局。毛泽东本人早就说过：“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

此时的毛泽东决心去打消斯大林的忧疑和顾虑，搞好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他又看了看莫斯科郊外的自然风光，然后转回身来，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师哲，随警卫人员走出客厅，登上了小轿车。

汽车穿过繁华的莫斯科街道，进入克里姆林宫。这座古老的皇宫里，路面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车队沿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驶过，从斯帕斯大门开进去，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来到一个美丽的大理石游廊。

毛泽东坐在车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游廊的顶部。原来，在那游廊的顶部，镌刻着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这些画像，形神各异，颇有魅力。毛泽东虽是坐车观画，一扫而过，但他似乎在通过这些画像，领悟着这块土地上历史轨迹的演变，那么专注而又神态自若。

开车的苏联司机，不时回过头来打量这位传奇式的中国领袖，他为毛泽东那胸有成竹、毫不慌乱的自若神态而惊讶！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威严而神圣，即使是外国高级领导人去见斯大林时往往也都有几分紧张。

毛泽东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这客厅的气派很大。金碧辉煌，高雅大方，大理石的墙壁光彩照人，地上满铺着鲜红的地毯。整个客厅显得隆重华贵、严肃静谧，只有壁炉架上端那一口老式的俄国古挂钟，发出“嘀——一嗒，嘀——嗒”的声音。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很讲究遵守时间，言而有信。现在，自己提前三分钟到达，说明中国人也不含糊，说到准时到，他坦然地笑了。

斯大林的秘书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请毛泽东先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然后他就去通报斯大林。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平日里，斯大林召开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里进去的，而且必须准时，不能迟到；必须衣帽整齐，不能稀稀拉拉，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到了，怎么没有动静？

“——”挂钟敲了六下，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打了个手势，说：

“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迈着潇洒的步伐，沿甬道走了进去，师哲紧跟在后。

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华灯放彩，金碧辉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列成了一排欢迎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正是斯大林。他，穿着威武的元帅服，容光焕发，头发、胡子梳得很整齐。在他身后，依次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

毛泽东一跨进大门，斯大林首先迎上前来，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也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斯大林的手。霎那间，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两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您好！”斯大林首先热情他说。“您好！”毛泽东接着热情地问候。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谢谢斯大林同志！”四只大手紧紧地握了又握，摇了再摇。

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魁伟的身材、红润的面容，高兴地赞叹道：“好，好啊！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

斯大林点头致谢，并回过头来，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莫洛托夫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逐个握手问候；然后又向斯大林介绍了中方的随行人员。于是，大家在客厅里站成一圈，互相问候，气氛融洽而热烈。

斯大林以手示意，亲切地请毛泽东就座。毛泽东和师哲在会谈桌的一边坐了下来。斯大林和苏方的人员坐在另一边，斯大林见毛泽东潇洒自如、机智稳重而又谦逊随和，非常高兴。落座之后，他又望着毛泽东，赞叹他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于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过疑虑和意见，但是没料到，会晤刚开始，斯大林就这样地赞扬他。他没有因斯大林的赞扬而眉飞色舞，也没有趁饥对斯大林进行恭维，却摇摇头说：“不，我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种热烈友好、人人激动、庄严神圣的场合中，毛泽东只用了半句话——并且是低沉而缓慢的半句话，就使那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凝结了；就使斯大林精心布置的那庄严、神圣、歌功颂德的浓郁空气，一下子冻住了。

客厅里，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注视着这位朴实无华、沉着机敏、注重实事求是而不肯向任何人投机取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斯大林惊讶地望着毛泽东，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话好。多少年来，他和多少国家的领导人会见、谈判，都是人们围绕他转。他很少称赞别人，安慰别人，附和别人；然而今天，面对这位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尽管他用了那么多的称赞、祝福，毛泽东却还显得委屈、不快，情绪不安。这是什么原因呢？斯大林像遇到了个丈二高的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毛泽东继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

斯大林知道毛泽东指的是王明一伙用共产国际压中国党的事。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些事，数月前，刘少奇率代表团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同刘少奇他们谈过了，斯大林不仅谴责了王明，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现在，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开门见山，直陈要害，闹得他不好回答。但斯大林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知道这些事不好解释，在这种场合又不可能细谈，所以毛泽东言犹未尽，他就把话接了过去，说：“不不不！既往不咎嘛！”他用他那捏着烟斗的右手，习惯地挥了一下，又接着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巧妙的回答，掩盖了实际而复杂的内容，却使客厅里的气氛又热烈而活跃起来。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是胜利了。斯大林承认这个胜利，并指出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这是对的。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都笑了起来，有的

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望着斯大林，诚恳地点头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语言幽默，举止大方，言谈举止中带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和学者风度。他温文尔雅、分寸得当，旁征博引，

令人神往。这种风度，很快地打破了斯大林造成的那种过分严肃的气氛，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情不自禁的微笑着，用欣赏的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困惑不解。

会谈的气氛友好而热烈。

斯大林取下了叼在嘴上的烟斗，笑问毛泽东：“毛泽东先生，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这是两个正常而简单的问题，一般的访问者也不难作出明确的回答。然而，毛泽东向四面看看，答出的话令人捉摸不定。他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中苏两党、两国首脑商谈的事情，应该搞出个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实在令人费解，苏方翻译为难了，觉得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会明白，急得脸都红了。见此情景，师哲忙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苏联人听得目瞪口呆，仍然不能理解毛泽东说的是什么。贝利亚竟然笑出了声来。

斯大林没有笑。他深思片刻，又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说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弄不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毛泽东没有再作回答。

会谈中的这个小插曲，是历史和性格形成的。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和协定，都应由两国的领袖来签署。由他代表两亿人民的苏联和由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署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一向居高临下、直言不讳的斯大林，这次也不愿意先提出来，以避免再有“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面对不卑不亢、雍容自如、谈笑风生的毛泽东，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礼贤下士。然而，毛泽东却不了解斯大林的愿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由自己出面谈判、亲自签约，他准备把这些事情交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去办。所以，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却机智地兜着圈子，不愿做更明确的回答。

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首次会面，留下了重大的悬念，但是，会见的气氛是友好的，平等的，所以，双方都感到愉快和满意。

就这样，毛泽东在莫斯科度过了第一天。他觉得这是个紧张、愉快而有意义的日子，特别是斯大林那热情、好客、谦虚、谨慎、尊重中国人、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脸上，不时露出愉快的微笑。

然而，在苏联生活工作过十多年、精通俄语和汉语的翻译家师哲，心里却很不平静。他的脑海里老翻腾这样一个问题：在会晤中，斯大林为什么多次称毛泽东为“先生”呢？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同志”，而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为“先生”呢？师哲知道：按照苏联共产党人的惯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相互交往中都互称同志，表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才尊称为“先生”。斯大林一向措辞考究，这是一时口误吗？不，师哲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一直称刘少奇为“同志”，从未称过“先生”。更何况苏联在为毛泽东安排座位时和发表的公报上，也都称毛泽东为“先生”。这是何故？师哲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在适当的场合，问一问斯大林。

2 毛泽东苦探索发现真理斯 大林怀疑毛“主义”不真

斯大林对心腹们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是个性格坚强而又自信自负的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特别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也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以致骄傲起来，听信人们搞个人崇拜。在他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中，常常是人们围着他转，看他的眼色行事，很少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他斯大林也不敢冷眼旁观，随便沉脸！然而，才成立的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竟然敢在稠人广众面前，无视他斯大林的友好祝愿，把脸一沉，说他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这不是当众给我斯大林难堪吗？！……当然，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有错误，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斯大林那带有三分火气的思路，渐渐地转入理论的质疑。

服务员轻轻地进来，请斯大林进晚餐。斯大林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进为他设置的小餐厅，见马林科夫等几个心腹人物都站在那里，等着陪他进餐，便招呼他们都坐下。

丰盛的晚餐已摆好了。斯大林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他常常是下午七八点钟，才结束午睡，到克里姆林宫电影院里，去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领导人一起看看电影，然后。到小餐厅去吃晚餐。说是晚餐，其实，这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这时候，斯大林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边吃边谈。有时一顿晚餐能吃两三个小时，他们往往在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或者谈论一些重要问题。厨师的手艺很好，做的菜很好吃。斯大林疑心重，总怕有人给他暗地下毒，所以在他想要吃某种东西之前，往往先要赫鲁晓夫他们品尝。他并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尼基塔，你瞧，这是鸡杂，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知道斯大林自己想吃一些鸡杂，又怕里边不干净，于是，就晃动着他那光溜溜的脑袋，显出忠实的样子，说：“喔，我倒忘了！”说着，自己先尝一点，再请斯大林品尝。

斯大林喜欢吃青鱼，而且喜欢不加盐。赫鲁晓夫自己爱吃加盐的，觉得特为斯大林而作的无盐青鱼不对口味，但他仍做出十分诚挚的神态说：“哈，香极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请您品尝吧！”

斯大林吃了青鱼，也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更加宠信这位心口不一的老部下，造成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当然，这是后话，是斯大林所不知道的。

这一天，斯大林喝了两杯红白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的特制酒之后，便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都耸耸双肩，答不上来。

斯大林又说：“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小餐厅里的所谓“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张口结舌，谁也不知该如何接这个话题。

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由于当时在苏联，又都住在斯大林的战时别墅里，闲谈时，师哲就请毛泽东谈谈他自己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来，吸了一口，侃侃而谈。师哲听着，记着，颇受教益；后来又把这个过程和他的感受告诉了本书作者。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其过程有五个特点。

毛泽东，号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农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纵观他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起点不高，步子不快，长期探索，坚持不懈。的确，毛泽东不是留苏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都是普通农民。毛泽东少年时代，和中国农村一般的孩子一样，边劳动，边学习，读一些《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也迷信。

1909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害病许了愿，求南岳圣帝保佑；但是病情日笃，不见好转。十五岁的毛泽东，见母亲整日操劳，辛苦备尝，却把节约下的钱周济穷苦人，自己累病了，却不太在意，十分感动。他热爱母亲，孝敬母亲；希望母亲健康。但是，母亲被病魔缠身，久治不愈。毛泽东急了，听人说南岳庙神仙很灵，能治百病，就拿着小板凳，到南岳庙去“朝山进香”，每走十来步，便向南岳庙方向作一个揖，磕一个头，还要边走边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保佑我妈，早日康复……”就这样，边走边跪拜，一直走了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南岳庙，求了神，进了香，然而，母亲并没有恢复健康。1919年10月，母亲病逝了。毛泽东写了两幅挽母对联，表达了爱母之情：

(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笑容何处寻。

(二)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1471页。

《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5页。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母亲文氏勤劳、善良、谦和、公正，常周济受苦人，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美德：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遐尔亲疏，一皆复载；
愷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病时携手，酸心结肠，
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生活的现实和科学的知识，使毛泽东渐渐地放弃了对神佛的迷信。但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黑暗中探索。他调查社会，体察民情，博览群书，阅读报纸，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0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步行五十多里，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述了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图存呼声。这篇文章写得立论有据，气势磅礴，被老师们誉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

在小学堂里，毛泽东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感到十分新奇。特别是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觉得气势逼人，有说服力，便不知不觉地拥护他们的主张，对康有为、梁启超崇拜起来。有一次，毛泽东看完《新民丛报》后，曾在报纸上批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之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说明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说明了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崇拜孔孟的儒家“秀才”变成了一个崇拜康、梁的变法图强者。

一天，毛泽东从同学肖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真阅读。他联系到祖国的内忧外患和自己救国救民的志愿，反复阅读，在书上画了许多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得邻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为了表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久后，毛泽东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

1911年春，毛泽东到了湖南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留心观察社会。很快地，他被革命党人的宣传所吸引，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对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十分喜欢，经常订阅。有一天，他从《民立报》上看到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热烈拥护，便奋笔写了一篇阐述自己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文章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力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一石击破水中天！毛泽东的文章在学校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它也说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正由一个崇拜康、梁，主张“君主立宪”的年轻人，迅速地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

后来，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建议大家立即将头上的辫子剪掉。他说干就干，和另一位同学当场就剪了辫子，但有的同学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动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改变人的观点！”毛泽东感慨地说。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震动全国。毛泽东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十月底，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准备为革命而战。但是不久，“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毛泽东回忆说。

二、探索面宽，道路曲折。在追求康、梁搞维新、追求孙文闹革命失败之后，1912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读了半年之后，他感到课程太浅、太旧，不便于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到了暑假，就退了学，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名著，像中国的经、史、子、集，英、法、美、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他都找来读。其中主要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輿大地图》，毛泽东每天经过这里，总是站在地图前细看沉思。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深感到必须革命，感到青年人责任重大。后来，他回忆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

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这些认识和决心，是十九岁的毛泽东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探索得来的，也是他这半年里最大的收获。

1913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有意义的学习生活，被师生们称为“怪杰”、“伟器”、“奇才”和“特殊的学生”。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时，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修为主，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他还花钱订阅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经常阅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局势。班里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就这样，毛泽东从探索维新变法到探索辛亥革命，从研究欧美各国的社会学说到直接研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三、面向社会，注重实践，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读书人信书本，种田人看收成”。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之后，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常说，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重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潮失。”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进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农村进行访问，调查。1916年暑假，他又邀挚友蔡和森一道游历了湖南的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返回，历时一个多月。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不带路费，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幅对联送去，于是，人家就给他们饭吃，或打发几个钱，或留他们住宿。他们利用这“游学”方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学会了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毛泽东还把沿途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第二年暑假，毛泽东又邀老同学肖子升一道，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历时一月多，行程九百多里。1917年冬，毛泽东又到浏阳县文家市一带考察访问。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道理。

毛泽东在学校里读书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从1915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一直担任学友会的文牍、总务等工作，倡导学术研究和体育活动，并且以满腔热忱，主办了工人夜校。

1917年10月底，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召集学友会讨论决定，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办工人夜校。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办工人夜校的四条理由的第一条，就是“依据国家现状，社会的中间力量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四条是“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通过办夜校，增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经过精心筹备，1917年11月9日晚，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校工作人员，热情地到门口欢迎工友，把他们领进教室，给他们讲学习的目的、意义、课程，解释“上课说明书”，开始上课。

有趣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的前两天，即公历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指挥着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广大工人起义胜利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是个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斯大林当时是具体指挥起义的党总部的负责人，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指挥起义的第三天，在中国江南的长沙城里，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当时虽是学生，但他已在探索中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做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了。斯大林更没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顶住了他那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那时候，毛泽东就在认真地探索革命真理，开始做产业工人的工作了。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15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在5月9日就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到处抗议。同年夏，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便在封面上批了四句话：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救国为己任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指使他的爪牙在各地成立“筹安会”，进行“劝进”活动。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谈话，反对袁世凯称帝。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的文章编印成册，到处散发，揭发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局发现小册子后，出动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搜查。由于毛泽东警惕性高，早有防备，未查出“乱党”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对他个人发现真理，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经过他提倡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目标明确，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在实践检验中择优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吃过迷信的亏，但他后来不迷信，不盲从。他说我们读书、看报，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教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要反复思考，分析批判，实事求是，不能盲从。所以他读过的书，往往圈圈点点，批注很多污有的批了又批，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特别画出记号，写上“此论颇精”、“甚合吾意”等语；凡是道理不通或文字不佳的地方，他又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批语。

对一种主张，一种道理，他决不盲从，而定要究其源，问其本，判明是非才决定弃取。例如救国该从何处入手？学习该学什么？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很久、很久。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种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种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者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振奋人心。立足于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那么，他说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之真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的“大本大源”，但他正在奋力去找，而且已经认识到它是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等一切“枝节”的“本源”。同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怀中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份，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的这种批判分析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待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上，

也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澄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虽然信过神佛之说，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当他把这些学说、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实践中检验之后，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天平上检验之后，立刻就发现了真伪，试出了优劣，于是他便无情地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取优，清除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前进中探索新的真理。这种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坚持、发展和宣传，不断推广，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五、发现真理，抓住不丢，结合实际，深入探索，终于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后，1918年8月间，毛泽东同罗学瓚、肖子升、李维汉等25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了北京。毛泽东日夜奔忙，组织预备班，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前往法国。

然而毛泽东自己并不想去法国学习。他要留在中国，研究中国。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分配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能看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触到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加伦、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除在北大旁听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讨论各种哲学和时事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遍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毛泽东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1918年冬和1919年春，两次去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六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5月27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

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月7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作出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富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他说：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000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1200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

《湘江评论》第2号。

《湘江评论》第2号。

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1920年6月间逃离长沙。

1919年12月中旬至1920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他东奔西走，搜集了当时可能找到的一切马克思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结合实际，深入钻研，领会了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的精神，掌握了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正如毛泽东自己所回忆的：“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20年2、3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五六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个月，7月7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 and 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地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

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笑着说：“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怀疑，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有怀疑，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刚正不阿，自尊自强，敢想敢干的革命领袖。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真理，选定了的道路，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他都敢带领人民去干，去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坚持真理、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不敢怠慢。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类似人们说的“畏友”。现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更不敢怠慢，会晤后不久，斯大林就打电话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有什么打算？什么要求？还准备办些什么事情？很显然，他急于要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

毛泽东却不着急。他拿起电话筒，态度很友好，热情地感谢斯大林的关怀和照顾，但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要求。

斯大林再三询问。

毛泽东笑着说：“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耳机，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明白：作为中国党政首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首先来到苏联首都和他会晤，必然有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和他斯大林会谈，必然要热烈、迫切地有求于他；可是，这位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有求于人的样子，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神态，反而显得潇洒自如，怡然自乐，不卑不亢，神情泰然。乃至他斯大林几次询问，礼贤下士，又打电话专门询问，毛泽东还是这么不肯直言，这是为什么？斯大林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多是因为自己太主观，没有真正了解清楚中国的实际，就硬要人家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帮助中国革命，反而妨碍了中国革命。现在，毛泽东讳莫如深，不肯直言，自己也只好等一等看，不能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了！

毛泽东心里很明白：他这次到苏联来，主要是祝寿、休息，和斯大林建立良好的同志关系；至于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所有谈判、签约等事，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要由擅长外交的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来办。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更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去和斯大林搞什么具体事务或条约的谈判。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他也知道在这方面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争执。会造成两党两国关系的隔阂。所以，尽管斯大林几次热切地询问他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他都巧妙地作了回避。

斯大林急了，就郑重而恳切地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委婉地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

周恩来来莫斯科来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有经验的，如果诚恳地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我们又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斯大林还是不明白，但他又不好再问。因为他曾经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的心里更增加了疑云。

3 斯大林祝贺毛泽东虽尊重但称毛“先生”

斯大林举杯祝贺毛泽东：“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但他称毛泽东“先生”。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谈，气氛热烈，态度友好，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可以说是自由的，平等的，发言和谈论的问题，似乎是即兴的，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外来的约束，也没有谁对谁的乞求。

长长的会谈桌上，摆着各种鲜美的菜肴和食品，格鲁吉亚葡萄酒、白兰地酒和各种名贵的优待加酒点缀其间。每个座位后都贴有姓名，每个座位前都备有各类餐具和酒杯，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毛泽东的座位后写着“毛泽东先生”。

会谈桌的一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苏联人坐了一长串。另一边坐着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首先举杯向毛泽东祝贺。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大家干过杯，很自然地进入会谈。会谈几乎只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言，只作陪客。两位领袖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群众工作，但涉猎最多的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富有魅力。斯大林喜欢理论，逻辑性强，语言考究，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两个人都关心的中国革命，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碰过钉子，所以很喜欢探讨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或插句话。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最伟大的胜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怀疑，所以他时不时巧妙地提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不是看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能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斯大林抽着烟听着，有时轻轻地点头，有时又眯缝起他那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毛泽东，似乎是在审视：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坚持的道路真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他既不争辩，也不解释。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尊重事实的。因此，他心底坦然，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的疑惧。

毛泽东侃侃而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三十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实际，进行讨论，这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肖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1921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回家探亲时教育弟妹。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在这里，应该特别介绍一下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1901年，她出生在长沙东乡板仓冲下杨家屋场。其父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印象最深的老师”。“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他从小教育杨开慧努力学习，要保持俭朴的作风，同情劳动人民。毛泽东到“板仓杨寓”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杨开慧常坐在旁边静听默记，时间长了，她就爱上了毛泽东。后来，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带杨开慧在北京学习，毛泽东两次到北京，和杨开慧一起游北海，看故宫，读进步书刊，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关于他们的恋爱经过，杨开慧在1929年6月20日写的《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说：“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上了他”。经过“差不多二年的恋爱生活”，他们于1920年冬天结婚。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到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负责整理文稿，机要交通、生活安排等，并协助丈夫开展发展党团组织的工作、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且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

1923年，毛泽东要离开杨开慧到远处去工作，写了一首《贺新郎》词，

载《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人民日报》1978年9月9日第1版。

体现了这对青年夫妻之间的真挚爱情：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
和云翥。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更纯、更深、更执着。她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曾写道：“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毛泽东）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留在家乡一带搞地下工作。她日夜怀念“远行人”，1928年10月，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杨开慧知道凶恶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毒手，便着手安排后事。1929年3月，她在《给一弟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七年中陆续生了三个小孩，即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托

付你们。”“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1930年10月的一天，杨开慧在长沙“板仓杨寓”被捕。她带着大儿子毛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铁骨铮铮，严刑不屈。11月14日她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壮烈牺牲评价很高，说她“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1957年5月11日，在复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的信时，毛泽东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表达了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改造国家和社会，决不是一件能在短期内轻易完成的事，更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能办到的事；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这个目的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组织了一批“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有理想、有朝气的朋友，结成了新民学会，开展多种革命活动。到1920年夏，新民学会的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陈昌、张昆弟、罗学瓚、向警予等，他们大都是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后来，许多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骨干，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1920年夏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已经成立并领导革命斗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负隅顽抗。中国国内也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7月5日至10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肖子升、罗学瓚、李维汉、张昆弟、蔡畅、向警予等十余人，在法国的蒙达尼开会，讨论新民学会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但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一方针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要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方式，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肖子升等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

——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当时，李维汉也赞同肖子升的主张，认为“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它，或竟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不久，李维汉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这个观点，转向赞成蔡和森的观点。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信写得很长，观点明确，措辞有力，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蔡和森在信中，首先强调了建党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工团（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所以，现在的中国，要先组织共产党。蔡和森写道：“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缓宜急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在信中，蔡和森一再强调：“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步骤和方法。他强调说：“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部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信中，还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非常重视，认真研究。1920年12月1日，他给肖子升、蔡和森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长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学会方针”问题，毛泽东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肖子升和李和笙（李维汉）的主张，而“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在信上写道：“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接着，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罗素的主张事实上行不通的三条理由，实际上也是指出了肖子升主张的错误之处，然后写道：“因以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由于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

东的第二封信，直到年底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所以 1921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编者注）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从这封信来看，毛泽东这时不仅已经认识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性，而且已在积极创建“吾党”的工作了。

1921 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 19 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词。

会议上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了。

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去学生装，赤脚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不仅深

转引自《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98 页。

入湖南的工矿访贫问苦，而且多次去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年5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的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工人个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个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十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都比较纯洁、巩固。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

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斯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十二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根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

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__列宁首倡国共合作。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支持《孙越宣言》，帮助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斗争经验，理论上也在探索。当时，列宁、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作用显著。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费莱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和泛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任秘书。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他以“孙铎”为笔名，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交换意见，建议召开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后又到上海与李汉俊等商讨筹备中共一大的工作。马林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1年12月间，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到达桂林，在孙中山先生的桂林总部度过了两周时间。马林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军官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告，曾三次同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

可能性问题”。经过长谈，马林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当时表示：“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若英知我联俄，必怀忌恨，力图竭我，以助直系。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

马林将此情报告了列宁和共产国际。

列宁对此十分重视，首先提出了国共合作。

1922年1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东方各国代表有131名，中国代表就有30多名。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俞秀松、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林育南、肖劲光等共产党员和张秋白等国民党代表都出席了大会。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讨论了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讨论了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号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列宁因为有病，当时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始终关心大会情况和中国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王烬美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邓培。谈话中，列宁对国共合作表示十分关心，指出这是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并且先后问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张国焘和张秋白表示同意列宁的意见，并说一定要把列宁的指示带回国内。

列宁听了，握着张国焘和张秋白的手，哈哈大笑，十分高兴。

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阐述了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接受了马林的建议，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种革命势力在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很快地作出决定，通过各种方式，真诚地帮助孙中山，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从这些对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枪击负伤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1921年底，因体力不支，列宁不得不经常间断工作，把领导俄共（布）和国家的重任交给斯大林。1922年4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斯大林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

《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第18页。

《国父年谱》增订本第855页，1969年台北出版。

《陕西日报》1990年5月1日，《列宁最先提出国共合作》。

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8月14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彷徨。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为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8月12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8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27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孚、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孚。苏联《消息报》1922年7月6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孚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只好以诚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8页。

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第116页。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载《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份。”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月16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年1月17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月26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个《宣言》是在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署的，是苏俄对华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来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将红白葡萄酒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坚持不让问。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问翻译：

“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

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何都不这样做？”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一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

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火气的目光，费德林已经有点慌乱，又见到贝利亚那

笑里藏刀的脸上，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大礼貌。”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问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便怕自己贸然提问，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等等吧！下次再说！”

4 斯大林想了解毛泽东的 立场湖南的工运史廓清疑云

有人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

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不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不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送走毛泽东，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无法入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入睡；但是，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不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词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袖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影响，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的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他思想深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

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作一些历史的回顾，因为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

毛泽东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搞工人运动，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师哲告诉作者：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里，毛泽东曾对他讲过当年学十月革命经验、搞工人运动的情景。据此作者翻阅资料，调查研究，发现毛泽东当年搞工人运动，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列主义作先导，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的头脑。毛泽东认为：要发展工人运动，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使运动健康有力。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掩护党的活动，为工人运动制造舆论，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四百银元的经费，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自修大学的性质和宗旨，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在《入学通知》中他写道：我们求学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有十多个专业，重点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俄国革命经验，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学等课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以教师指导。

毛泽东是自修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任教务长，后任校长，又是一名积极苦学的学员。他和夏明翰、陈佑魁等同学一起，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同学们讨论研究。后来，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报名者达百二十余人。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要求同学们用马列主义分析湖南实际。有一篇《告中国农民》的国文教材，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明确指出：湖南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等四个阶级，号召贫苦农民起来，进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222 页。

“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音注。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59 页。

行反封建的斗争。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都把《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课外必读的书刊，引导学生学习马列，研究社会，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二百多进步青年，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许多人入党、入团，成了湖南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毛泽东还领导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它的发刊词写道：“只因痛感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同人）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内各种势力的动向、分化和组合，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分析形势之后，毛泽东指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的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坚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1922年5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党组织决定，以“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的名义发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礼堂。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到会者达千余人。毛泽东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在大会上先“讲演共产主义”，受到热烈欢迎；接着，又讲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使听众受到了很大鼓舞。

第二，深入工厂、矿山，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在斗争中建党。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多次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改造自己。他不嫌脏，不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

1922年5月13日上海《国民日报》。

1922年5月13日上海《国民日报》。

刘少奇、朱少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年出版。

《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劲气来了，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说行，现在，先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跟随毛泽东一起到安源的李立三，帮助工人学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团体。后来，毛泽东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到安源去办工人补习学校，办工人俱乐部。他对李立三等人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由于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等人的宣传组织，1922年1月，安源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六人，但却团结工友，很能战斗，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动，多方联络，团结了一大批工人骨干。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又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经验，部署工作。针对有些工人党员的急躁情绪，不注意斗争策略和要把党的旗子打出去“大干”的倾向，毛泽东告诫说：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斗争才开始，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否则，基础不稳，房子会塌，闹不好还会砸伤人。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地暴露党组织。毛泽东的帮助和教导，使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健康发展，到大罢工前，党员已发展到三十多名，党组织成了工人俱乐部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三，“旧瓶装新酒”，改造劳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还早，还广泛。湖南劳工会就是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的团体之一。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七千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铨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铨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铨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1963年8月4日《北京日报》。

黄爱：《1920年10月27日致陈独秀的信》，《湖南工会史选编》第1册第7—8页。

《西行漫记》第134页。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

毛泽东的态度诚恳，意见中肯，措施具体，受到了黄爱、庞人铨的热烈欢迎。他们说，毛先生是咱们工人的知心人，按他说的办。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将过去的八部改组为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毛泽东又建议他们实行“小组织大联合”，他们即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土木、印刷、机械等十多个专业工会，互相协作，会员也交会费了，劳工会更活跃了。1921年冬，中共中央局通知，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给湖南劳工会分配了一个代表名额。

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晤孙中山。路过长沙，毛泽东接待了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向马林介绍了湖南劳工会的情况，并介绍马林和黄爱、庞人铨及部分工人晤谈。他们谈了一个晚上，谈得很热烈。马林给黄、庞等人“讲阶级斗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铨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年1月16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铨逮捕入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和赵恒惕斗争的措施。他还主持召开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行了纪念待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

杀。”

第四，倡议劳动立法，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多种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常常打着“合法”“民主”的旗号，欺骗、愚弄人民。湖南军阀赵恒惕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又雇用了一批文痞政客喝彩叫好，强奸民意，欺世盗名。湖南《大公报》上，又开了个《省宪草案讨论》专栏。

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毛泽东，很快写了一篇《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在《大公报》4月25日至27日的专栏上连载。毛泽东指出：宪法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写道：“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他认为求得正常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了生存权。”所以，他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主张对省宪法草案要作根本性的修改；否则，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对《草案》提了许多修改意见，特别强调地提出了劳动立法问题。他建议省宪法至少要在“行政”章的“实业”款里，“明白加入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性别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同业公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这些批评和建议，从根本上戳穿了赵恒惕玩弄假民主欺骗人民的伎俩，教育工人群众争取劳动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1922年元旦，赵恒惕不顾民意颁布了具有浓厚军阀割据色彩的（湖南省宪法）。3月，又改选省议会，表演了“民选省长”的丑剧。

毛泽东因势利导，发动攻势，利用赵恒惕玩弄假民主之机。再一次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讥讽他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

讥讽嘲笑之后，转入正论。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毛泽东解释说：所谓生存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把工作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劳动全收权，即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这些解释和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撕破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画皮，使人们看到了资本剥削劳工的本质。接着，毛泽东大声质问：“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有多少人失业？”这是湖南大多数人面临的现实问题。”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到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

接着，毛泽东简要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明确指出：“‘殷鉴不远’，

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已经是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视和推广。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曹锟、吴佩孚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之机，向北京参众两院提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和《劳动法草案大纲》。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了联合署名。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在长沙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会上，协商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和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尽快通过《劳动法草案大纲》，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预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等四项基本权利。电文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劳动法草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

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否决了《劳动法大纲》，暴露了他们反劳工，反人民的本质。但是，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唤起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为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而英勇斗争，很快地掀起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到1923年下半年，湖南的产业、行业工会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七万多人。这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的迅猛觉醒，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多谋善断，讲究策略；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之后，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毛泽东便集中精力、全心全意地领导工人运动。由于他和湖南党的组织先后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劳动立法上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的工人阶级也掀起了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各地大小罢工斗争十多次，参加罢工人数达数万人，斗得统治者心惊胆颤，赵恒惕张口结舌，步步败退。这些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水口山铅锌矿等三处罢工的影响更大。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将、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何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年10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埏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了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不理，9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为

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日晚，王世培唆使部分工人开车，并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捕。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阳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膺，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二十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十一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

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完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队伍，到1922年9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七百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月14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十六项政治、经济要求。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消息传开，大大地推动了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及时地帮助安源工人总结经验，指示安源党组织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安源的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红旗。

1922年10月，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11月25日至12月12日，毛泽东又领

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

刘少奇、朱少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导长沙铅印工人的罢工斗争，先后坚持 17 天，最后获得了胜利。

12 月 5 日，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派蒋先云、谢怀德等领导了水口山铅锌矿三千多工人举行罢工，经过 21 天的激烈斗争。最后获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

1922 年 5 月到次年 4 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高潮迭起，捷报频传，全省已经有数十个单位或行业正式成立了工会，并先后组织工人进行了十次罢工斗争，九次取得了胜利。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11 月 1 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总干事。

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赵恒惕政府惶恐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工人运动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说政府要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同时又派警察摘下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威胁工运骨干和群众。

为了争取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毛泽东领导湖南工团联合会各工团代表 20 多人，于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同赵恒惕军阀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了三天尖锐复杂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毛泽东等代表拿出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质问赵恒惕，说“省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有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赵恒惕等被问得左右为难，忐忑不安，只好当众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要“守法”，不要有意侵犯“刑事法典”。

毛泽东等代表又当众驳斥道：“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疑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凡事不可不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不干涉了”。

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政务厅长吴景鸿接上来答：“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罪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

毛泽东等代表立刻反驳道：“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出英法等国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须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问得吴景鸿也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赵恒惕急转话题，用伪善的态度收买人心，说：“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

毛泽东等代表当即予以驳斥，并以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的事实，质问赵恒惕。赵恒惕强行辩解，说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还狡猾他说，“此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等代表当场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实不是事实”。并严正声明：“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要的活动。”“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

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益也。”

当时，赵恒惕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畏惧，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为何物却茫然无知。毛泽东等针对此情，对症下药，既当众宣市工人希望社会主义，目前求民治；又公开驳斥了官厅诬蔑，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听得赵恒惕等频频点头、“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在这三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中，毛泽东率领工人代表，公开揭露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民主”伪装，又运用“省宪法”的条文，进行合法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了一些合法权益。逼使赵恒惕及其政府承认了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承认了工会有代表工人向政府交涉的权利，并就势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劳资纠纷问题，大大地鼓舞了工人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3年5月，参加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已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已达五万多人。所以，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十六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路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

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

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壮烈牺牲。

工人们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先后被杀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或称“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发表宣言，决心与京汉铁路工人共同战斗到底！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了“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派讲演团到各地介绍京汉路工人斗争的英雄事迹，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各工团募捐，救济烈士家属和受伤工人；并在长沙举行两万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先后发出四次通电，指出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是“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强烈表示省工团联合会“当率潇湘数万劳动之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势必复此万世之仇讎，肃此人种之公敌”。电文还呼吁全国各工团和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众志成城”，“伸张民权，打倒军阀”！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静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5 莫洛托夫奉命探察底细 毛泽东谈历史借史论今

莫洛托夫说，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斯大林表示愿意出面出力。毛泽东没有提任何要求，却谈起了中国革命史……

那是个多雪的冬天。

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铺天盖地。皑皑的白雪，罩住了大地，覆盖着屋顶，压弯了树枝。

毛泽东喜欢赏雪。饭后，他常要走出暖融融的屋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孔策沃别墅的林子里散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他不抖也不擦，舒心地微笑着。有时他抬起头来，举目远眺，欣赏那寥廓壮美的北国风光；有时又低头凝思，触景生情，审视那雪压冰坠的条条嫩枝……

几辆卧车来到了别墅的厅前。

莫洛托夫来了。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又是斯大林十分器重的苏联著名外交家，受斯大林的委托前来看望毛主席。

毛泽东迎上前去，热情地和莫洛托夫握手问好。莫洛托夫说，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专程前来拜访毛主席，看望毛主席的。他说莫斯科气候寒冷，希望毛主席多多保重，注意休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陪同莫洛托夫进入客厅，亲切交谈。

寒暄之后，莫洛托夫委婉地表示：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加深了苏中两党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斯大林和他本人都十分感激。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请提出来，不仅他本人愿意尽心尽力，斯大林同志也表示愿意出面出力，加深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毛泽东笑着表示，这里招待周到，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困难。要办的事情，那天和斯大林同志当面谈过了，最好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办。至于什么事情？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方面有经验，既然想帮助中国，就应该主动提出，以示友好；如果不提，没有诚意，我们提也无济于事，反而落个乞求的口实。他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接着，谈起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等等。

莫洛托夫只是点头聆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这也难怪。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忙于外交方面的具体事务，很少研究中国革命，更缺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考，因而对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任务是探听毛泽东的底细。听着听着，他突然问：“你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毛泽东坦然地答：“没有。”莫洛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后来，莫洛托夫在他的《忆旧》中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请我喝过茶，谈到要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更方便。斯大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斯大林对我说：‘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同毛泽东谈完后对斯大林说，此人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毛泽东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莫洛托夫的《忆旧》，证实了斯大林当时的怀疑

和冷淡态度。

毛泽东对莫洛托夫强调：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说自己在湖南搞过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他们 1923 年曾经发动“二七”大罢工，震惊中外。那次大罢工，虽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血腥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确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革命性特别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觉悟程度较高；人数虽不大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所以，一举震惊中外。二七大罢工，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革命品质。

事实上，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壮怀激烈，心情沉重。他在组织慰勉烈士家属的同时，也看清了中国严酷的现实，记取了血的教训：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是讲暴力不讲道理的；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武装的反动派。

1923 年 5 月初，毛泽东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起，绕道上海，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由沪赴粤，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

6 月 12 日至 20 日，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会代表有毛泽东、李大钊、陈潭秋、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翟秋白、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 30 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 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时，热情地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详见本书第三章的叙述）。8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张国焘传达了列宁的指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尊重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多数人只同意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却疑虑很大，不太赞成。

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大会在讨论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原则时，意见一致，都表赞成；但在具体合作的政策上，发生了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观点，认为既然以民主革命作为党的现阶段工作，就应该集中全力于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心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得不到别的什么，所以只能消极帮助，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只有等到资产阶级共和国

成立，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后，无产阶级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大会发言中，陈独秀以二七罢工的失败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大薄弱，甚至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认为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强烈表示“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运用自己在湖南领导工人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观点。

大会讨论二七大罢工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悲观论点，指出：二七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总工会成为指挥成千上万工人行动的司令部，工会的决议。命令成为工人自己的法律，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斗争中牺牲的许多烈士，像林祥谦、施洋等人面对屠刀，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怎么能以此来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呢？毛泽东建议党要尽快组织营救被捕工人，救济失业工人和烈士家属。

多数代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劳工运动决议案》，决定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工人救济委员会，设法迫使军阀吴佩孚释放被捕工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报告，说明了工农结合的重要性。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取得胜利的经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一些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发展革命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月12日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这个“秘书”职务，根据三大制定的《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纪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毛泽东按照《组织法》规定，协助委员长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大会后，陈独秀、毛泽东联合签署了《中国共产党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及经费开支情况。毛泽东常抽空儿到孙中山元帅府建设部长谭延闿的住所去联系。当时，谭延闿已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省长。毛泽东通过谭加强和国民党的联系，同时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联谭倒赵的决策做准备工作。

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不久又回湖南长沙，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的湖南地方党组织，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名义，指导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1924年4月，组织了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并且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的合作。上述是共产党方面的情况，现在，再来谈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情况。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以民主主义政纲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虽英勇奋斗，但屡遭失败。正如他在《国民党的旨趣》中说的：“大抵我们革命，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领导的斗争接二连三地夭折，1922年8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出广州、避居上海，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似乎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重新振奋起来。正如毛泽东说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派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交朋友，帮助他克服困难，出谋划策。苏联代表越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积极地帮助孙中山。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成立了专门机构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及党章。次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纲领。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了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二三月间，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也应孙中山的邀请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当时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也有共产党员参加并任中央委员，聘请鲍罗廷为顾问。11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4月，他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主体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

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在这时，在国共合作的大半年前，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高瞻远瞩，顶见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必然合作的根源和动向。

1923年12月初，毛泽东再次到达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1924年1月20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有些发言是很重要的。如1月20日下午，大会讨论组织国民政府的必要性时，毛泽东作说明。他说：“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

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大会围绕国共合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2日上午，毛泽东等19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说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规定写进章程。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起来，叫嚷反对国共合作。顿时气氛紧张，李大钊在大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了方瑞麟的观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也发言反驳方的主张。

坐在39号席位上的毛泽东，审时度势，看见当时赞成国共合作的呼声高涨，方瑞麟一时孤立，立刻抓住时机，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从而保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这样，就便于把改组前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内部非常复杂、组织不够统一的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改造成有核心领导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公开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议案破产后，一些实力派人物又企图通过“比例选举制”的办法，孤立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比例选举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之一，比利时、德国、法国都曾用过。这种制度根据各政党在选区所得选票、按其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的议员席位名额，有叫它为“比例代表制”的，也有称它为“哈尔投票法”的。在国民党“一大”选举前，有人提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并在大会上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知识渊博、多谋善断的毛泽东听完发言，当即反驳，说：“现时比例选

1923年4月10日《新时代》创刊号。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赞成比例制的实力派人物说，比例制通行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野时，都曾赞成这个制度。

毛泽东接着辩论，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这样，由于毛泽东等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博得了许多代表的尊重。1月25日上午，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毛泽东受代表们的委托，就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并“请主席以审查结果全文付表决”。“众谓无异议。”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其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在组织上克服国民党过去组织松散、没有中央组织的状态；规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个人领导制度改为基本上的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机构。毛泽东等代表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比例选举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著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批评了国内反动的、改良的各个政派（包括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等）的错误主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规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且把它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样，就使三民主义有了崭新的内容，革命的灵魂和革命的方法。

大会开会期间，收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大会决定（1）电唁苏联志哀；（2）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3）休会三日，以示哀悼。

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个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孙中山亲手书列的人名之一，会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工人部的领导。

这样，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组织形式、革命活动，和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是大体吻合的，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中。讲到了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

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见1924年1月22日、29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

斯大林还特别指出：“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部分不完全符合实际，后边另谈），因而被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渐接受，从而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莫洛托夫对历史问题不感兴趣。毛泽东笑着说：“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必然会感兴趣的。”

毛泽东谈历史比较全面，既注意中国的特点，又看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的帮助。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力促国共合作。1922年4月3日，俄共（布）党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以后，斯大林一直热情地关心，帮助中国革命，力促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1922年8月，马林肩负着共产国际的重大使命再次来华，苏俄政府的新任驻华代表越飞，也同马林一起到达北京。马林在北京停了几天，就到上海做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中共派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已经归来，传达了大会的精神。这次会议向中共指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先要把革命的性质弄清。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仔细分析了中国的各种力量，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只有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革命迅速成功。因此，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马林根据这些情况和共产国际的方针，同孙中山谈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并转交了苏俄代表越飞给孙中山的信件。当时，孙中山因受陈炯明叛乱的沉重打击和军事失败，正陷入窘迫和危难之中，欢迎与中共合作，但不同意实行党与党之间的合作形式，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条件和方式。

八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经过两天激烈的辩论，虽然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只同意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而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所以会后，只有很少的几个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

马林带着中共中央的决定，再次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说。他现在极其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4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需要同苏俄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劝告孙先生不要用单纯的军事方法去夺回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争取群众，并说共产国际已决定要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合作。经过国际代表的多次晤谈，孙中山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并马上决定吸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这样，国共合作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苏俄特使越飞在此期间，也同孙中山多次接触，并与廖仲恺等国民党的高级代表进行会谈，商讨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事宜。1923年1月16日，越飞亲到上海与孙中山直接谈判，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俄关系。（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1月27日，孙中山又派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对中俄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会谈。双方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问题，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达成了共识，使（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更加具体化。《宣言》的发表与具体化，表明列宁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极大支持，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

孙越宣言发表后，国民党的声威大震。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1日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设立大元帅府。不久，马林也到广州，同孙中山就苏俄和国民党结盟、改组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商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党务与政治军事组织”。孙中山介绍蒋介石与马林具体商谈后，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沈定一、王登云、张大雷为团员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从9月到11月，代表团对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受到了苏俄党、政、军各界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代表团还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和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希望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蒋介石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革命得到工人、农民和苏俄各族人民的拥护。特别是参观了陆海军训练机关之后，蒋介石对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编制、训练、作战指挥、官兵一致等等深为赞许，并提出要以苏俄红军为榜样，在中国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后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确指出：“代表团在苏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组织和共产党的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非帮助总理不可。”

1923年6月，斯大林派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信任鲍罗廷，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都由鲍罗廷参加起草，孙中山审定。不久，又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

1924年春，苏联帮助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并派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泼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良克和切列潘诺夫等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组到黄埔军校工作，苏联政府还先后给军校运送枪枝 8000 支，拨款 10 万卢布，作为军校的经费、军械。总政治顾问鲍罗廷和总军事顾问加伦，都曾到军校讲课，参加演习。

苏联还在莫斯科设立了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任课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抽调的有声望的老党员教授，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常到校作重要报告。1927 年 5 月 13 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作了《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的报告，三个小时，回答了十个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1924 年冬，加伦奉命到广州，接替前不久遇难的巴甫洛夫，任广州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孙中山决心“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北伐”。后来，加伦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名义，帮助拟就《军事委员会组织纲要》和《军事委员会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审查批准。此外，在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都设有苏联顾问，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负责进行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

在军火和装备方面，苏联政府对国民革命军也给了不少援助。1926 年为了北伐，苏联运往广州的武器有枪 18000 支，子弹 700 万发，机枪 90 挺，大炮 24 门，还有其它的各种军火弹药。

五卅惨案后，苏联政府致电中国政府：“悼慰上海被惨杀华人”。莫斯科 50 万人游行示威，并进行了群众性的募捐援助活动。

苏联的援助，在北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 年 10 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激战之际，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把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根据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建议，国民军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李大钊亲自疏通国际关系，介绍鲍罗廷、加拉罕同冯玉祥认识和谈判后，这些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不久，苏联派来了顾问团，还给了大批武器装备的援助。1925 年冬至次年春，冯玉祥受挫下野，出访苏联。回国后，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五原誓师，重振旗鼓，带领国民联军，解围西安，策应北伐。

斯大林特别注意国共合作，强调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要注意策略，搞好团结。

孙中山十分重视“联俄、联共”。在他重病缠身，生命垂危、临近逝世的前一天，还专门给苏联写了一份遗书，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遗书》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

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回可免帝国主义加诸

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

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_1925年3月13日 .斯大林听到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当即提笔写出了俄共（布）中央为哀悼孙中山逝世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唁电。唁电在次日《真理报》第60号上发表。斯大林写道：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你们一起哀悼国民党的领袖的逝世，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的逝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怀疑，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国民党一定会光荣地举着这面旗帜，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孙中山逝世了——孙中山的事业万岁！孙中山的遗训永垂不朽！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 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毛泽东谈得很精彩，谈的时间也很长。本书上边叙述的，只是他讲话的一部分。但从这里已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远隔万里，互不认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们不约而同，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毛泽东力促国共合作，斯大林帮助中国革命，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莫洛托夫对这些表示淡漠，不感兴趣，听完了毛泽东谈中国革命之后，他未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表示，他将很快向斯大林汇报。

毛泽东对此并不生气，也不失望。他知道斯大林统观全局，重视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十分关心。他今天谈的这些问题，只要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及时转告，斯大林是会感兴趣的。至于斯大林现在不同意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来、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也许是他心有猜疑，缺乏诚意；也许是一时疏忽，没有意识到搞那样一个东西的重要意义。不过，他相信斯大林是会意识到的。他记得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不仅几次请他谈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他谈到中国革命时，斯大林都凝神静听，全神贯注，从来不打断毛泽东的话。

的确，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十分关心的。有一次当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军队，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处境十分危险，指挥员号召战士们“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时候，苏方翻译费德林觉得很难翻，就请毛泽东写下了这八个字，仔细体会，准备解释。斯大林不懂汉语，见自己的翻译和毛泽东说说写写，心生疑忌，立刻用命令的口吻对费德林说：“怎么？您打算长时间地在

这儿搞秘密活动吗？”

费德林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语无伦次了：“不……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困难。”

“可您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用他那老鹰似的锐利目光，直射费德林，语气又冷冰冰的，令人发凉，使费德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停了停，斯大林才命令道：“请按字面意思翻译吧！”

费德林再次请毛泽东把这句宋代岳飞常用的成语讲明白，他向斯大林讲了成语的出处和含义，斯大林的语气才缓和下来，点了点头。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这真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雄才大略！”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诗人。斯大林是语言学家，在交谈过程中，往往谈论到思维和语言的问题。

斯大林喝了一口那红白葡萄酒合成的酒汁，停了一刹那，详细地向毛泽东阐述了他那本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华，然后，又反复地比划着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您认为对吗？毛泽东先生。”

“是的，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毛泽东说着，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慢慢地抖着烟灰，不紧不慢他说：“各民族的文化 and 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太容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地提高，就可以掌握它，这也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毛泽东那联系实际的论述，使费德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禁不住停住了笔，抬起头来，凝视着和蔼可亲的毛泽东。

斯大林不满地盯着自己的译员，突然叫了一声：“费德林同志！”

费德林突然一怔，忙转过身来，只见斯大林眼露凶光，直盯着他，用冰冷的语调命令说：“请拿着你的盘子到我这儿来！”费德林莫名其妙，但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拿起自己面前那只盘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斯大林跟前，听候发落。

斯大林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也不看费德林，不屑一顾他说道：“请把这儿的这一道菜拿去吧！”

费德林不知斯大林要干什么，呆呆地站着，没有动手。

斯大林这才傲慢他说：“这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肴，你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

费德林哭笑不得，手足无措。

“请拿去！”斯大林的口气虽然是平静的，但却是命令式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常言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斯大林的话，特别是“最后一次”的话，使费德林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他知道，这位大元帅掌握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最后一次”，往往预示着极大的灾难。他记得刚才上菜时，女服务员曾经轻轻地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然后，她没有把这盘菜放在斯大林面前，而是放在了他的旁边。现在，斯大林要他费德林当众品尝这盘菜，是何用意？是何居心？他猜不着。但是，在中国客人面前，他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硬着头皮把这盘菜吃了下去。

毛泽东看着这个场面，一句话不说，只是抽自己的烟。

费德林吃完了那道菜。

斯大林这才转过脸来,问道：“怎么样？费德林同志,你喜欢这道菜吗？”

费德林满脸通红,却又强装欢笑,结结巴巴他说：“不错……不错！斯大林同志,这道菜嘛……哈哈,味道……好极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毛泽东跟着笑了。

中苏两国的同志也都跟着笑了。

费德林也跟着笑了,但眼眶里却噙着晶莹的泪花。

6 斯大林庆祝七十大寿 毛泽东赞“导师和朋友”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人们鼓掌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庆祝活动期间，人们以多种方式，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寿诞那天，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大剧院，被装饰得雄伟壮观，灯火通明，充满了喜庆的色彩。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有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有各方面的英雄模范，还有来自世界各国党的代表团。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很高的荣誉，因此，苏联国内的代表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兄弟党的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

容光焕发的斯大林，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大家。

毛泽东热情地向众人招手致意。

人们都注视着毛泽东。当他们发现站在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领袖，竟然如此高大魁梧，英姿勃发、气度不凡，禁不住发出了一阵阵的议论声和赞叹声。

就座后，毛泽东挨着斯大林，师哲则在毛泽东身边翻译。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祝词。祝词是由费德林代读的。热憎洋溢，十分精彩，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紧紧地抓住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当费德林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的时候，全场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舞起帽子和手中，场面十分热烈，十分壮观。

斯大林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感谢地点点头，深情地一笑，也和大家一起轻轻地鼓起拿来。

费德林等会场上平静下来，接着读道：“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这时，全场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宣读过程中，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斯大林十分重视与毛泽东的友谊。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多次转过身来，同毛泽东亲切交谈，说说笑笑，非常亲热。

大会以后，宴请宾客并观看文艺演出。斯大林特地请毛泽东和他坐在一

起，依依不舍。看文艺演出时，他也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边看演出边交谈，显得亲密友好。他们坐的包厢是旧时代沙皇专用的包厢，豪华而舒适。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剧场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金壁辉煌，四处雪亮，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望着中间包厢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热烈鼓掌，并有节奏地欢呼：

“斯大林！毛泽东！”

“毛泽东！斯大林！”

看到这个场面，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站立起来，挥手向观众致意，并高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这时候，全场的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了一片，经久不息，震荡得大厅轰鸣：更加烘托出热烈的气氛。当时，人们的确都情绪热烈，感情真挚，没有任何勉强的痕迹。

斯大林为什么能博得亿万人民如此的厚爱与敬重呢？

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评价这么高呢？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太阳虽有时被乌云遮挡，但它终究要大放光芒。

“斯大林”的意思是钢铁的人。——他的性格特点、人生真谛、胜利轨迹是什么？

历史对巨人的评价，往往带有时代的特点。

斯大林逝世至今已近 40 年了。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褒有贬，说法不一。然而，正如著名的美国作家斯特朗写的：“我们至少知道，他从 1928 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斯特朗也分析过斯大林的错误及其根源。她指出：“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 5 次被放逐，并且一定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沿着斯大林的人生足迹，作一次有益的探寻。

斯大林，这个响亮的名字，并非他本人起的，也不是他的父母取的，而是同志们根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给他送的绰号。

“斯大林”是俄文译音，其意思是钢铁的人。

“斯大林”——钢铁的人，这既表现了他革命意志坚强，性格倔犟，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有为共产主义英勇奋斗的决心，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魄力，又有克敌制胜、办事成功的谋略；但另一方面，这个词中是否又有冷若钢铁，缺乏人情，少点温柔的含义呢？以前多年的解

释，只说前者；近几年的指责，多在后者。其实，钢铁的人，坚与冷，钢与冰，敢斗与缺情，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性格的不同表现，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足为奇。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格鲁吉亚西哥里城一户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个皮鞋匠。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是个农奴的女儿。夫妇俩都是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因家贫失学，目不识丁。叶卡捷琳娜生了三个孩子，都不幸夭亡。1879年12月21日生下的第4个孩子就是斯大林。父母给这个小生命起的名字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后来参加革命，坚持斗争，根据同伴们起的雅号改名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的母亲想让儿子长大当神父，父亲要让儿子长大当鞋匠。1888年秋，斯大林进了哥里镇的小学读书，母亲就在这所学校里当清洁工，供养儿子上学。但爱酗酒的父亲，硬要儿子到制鞋厂去学手艺，夫妻俩因此常闹纠纷。直到1890年父亲在一次酗酒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后，斯大林才又按母亲的意愿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给斯大林那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痛苦记忆。

贫穷和灾难，磨砺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他回小学后，按母亲的嘱咐，刻苦读书，争强好胜，加上他天赋聪颖，记忆力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894年6月他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被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是座古城，气候炎热，风沙弥漫。当时人口约15万，主要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人们操着各种民族语言，熙熙攘攘，忙于生计。沙皇派来的总督和外高加索政府就驻在第比利斯。年仅14岁的斯大林在神学院里学习了不久，因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神学院改为正教中学。院长和学监为了得到俄国当局的提拔，对学生管制很严、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学生一有过失就被关进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引起了斯大林和许多学生的愤恨和反抗。

为了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斯大林刻苦地读书。他不仅读格鲁吉亚诗歌，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也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译本。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方面的书籍，达尔文的《人类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徒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书，对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使他渐渐地由一名虔诚的神学院学生，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谈到上帝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根本没有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当时，俄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列宁已在彼得堡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894年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著，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作了深刻的分析，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斯大林读后，深受鼓舞。1931年他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

1896年至1898年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他向同学们讲解达尔文的学说，还根据手抄本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一些著作。1898年8月他参加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麦撒墨达西社”，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斯大林回忆道：“我记得，在1898年，那时我第一次指导了一个铁路工厂的工人小组。……当时，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革命战斗的洗礼。”

由于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899年5月29日，神学院把斯大林开除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以革命为职业，更勇敢地去摧毁沙皇政权。

1900年12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了。斯大林对《火星报》特别感兴趣，对列宁特别尊重。斯大林说：

“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路线建党并领导工人运动。1901年9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创刊了。列宁的《火星报》热烈祝贺，并指出该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人革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斗争报》坚持列宁的思想，报上的主要文章多是斯大林撰写的。他指出：“在俄国和一切地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牢牢掌握领导权的思想。他写道：“为了这种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必须把革命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里，引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走向胜利。在斯大林的积极推动下，第比利斯成立了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广泛地开展活动，建立了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

1901年11月，斯大林奉党组织之命，去到黑海之滨的重工业城市巴士姆，组织工人斗争。他通过联系先进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0个大企业中建立了11个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办起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和散发传单，领导工人斗争。12月31日，举行了巴士姆社会民主党各小组的代表会议，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士姆委员会。委员会领导巴士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和政治示威，沉重地打击了当局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统治。警察当局逮捕了32名罢工工人。1902年3月8日，斯大林组织了工人大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局残酷镇压，又逮捕300多名工人，关进监狱。次日，斯大林领导社会民主党巴士姆委员会，组织了有6000多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示威，到监狱前游行。沙皇军队开枪射击，打死15人，打伤54人。斯大林不屈不挠，率领示威队伍，坚持斗争。他写传单，作讲演，鼓舞斗志。3月12日，又主持为被杀烈士举行了盛大隆

重的安葬仪式，声讨沙皇政府，对高加索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沙皇政府下令逮捕斯大林。1902年4月5日，斯大林在巴士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囚禁于巴士姆监狱。在狱中，他继续斗争，通过写信与党组织联系，写传单、写作品指导工人运动。1903年3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被缺席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1903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3年。12月间，在流放地他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后来，斯大林回忆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讯。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他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1904年1月5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为执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为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而斗争。当时，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列宁认为，解决党内危机的办法便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在巡视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期间，他为巩固原有党组织，创立新的党组织，同孟什维克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6月间，斯大林奉命来到巴库，解散了孟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石油城的工人举行了有名的“十二月大罢工”。这次罢工由12月13日一直坚持到31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工人与石油业主签订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是俄国大革命风暴前夜的春雷。

以斯大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带领南高加索的工人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并很快地将此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购置军火武器，训练红色部队，组织农民革命委员会，废除苛捐杂税，夺取地主的土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斗争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南高加索代表团的报告之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特别决议，向高加索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致敬，并号召各地党委采取最积极的办法，广泛传播高加索的革命经验，支援他们的斗争。

在领导南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同时，斯大林还从事艰巨的理论工作，他发动和组织了大批的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自己也发表了《论党内意见分歧》、《答〈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光辉论著，批判了反布尔什维克派别的虚伪思想和叛卖立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基础。他维护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思想，维护并发展了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以及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斯大林的论著得到了列宁很高的评价。

斯大林坚决维护列宁关于武装起义是推翻专制制度和成立共和国的手段的理论。他在《告公民书》中写道：“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近年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盘事件在历史上必然走向的那种必然结局。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现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急待解决的伟大任务！”

沙皇政府迫于人民起义的压力，于 1905 年 10 月 18 日，颁布了所谓给予人民“自由宣言”。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公开揭露了高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口号的孟什维克的叛卖策略。斯大林说：“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件事，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 月上半月，在第比利斯、齐亚士雷、克里维尔、萨姆特烈加等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南俄大地出现了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就在这一月，斯大林会见了列宁。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斯大林回忆说：“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 1905 年 12 月在芬兰塔默尔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而且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伟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在塔默尔福斯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做了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报告，并且发表了维护列宁的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即议会）策略的演说。他被选人负责编审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与列宁一起工作。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这两位工人阶级的领袖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合作。

会后，斯大林回到高加索领导革命。“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列宁不得不侨居国外，在那里继续领导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斯大林则在俄国坚持奋斗，常常被逮捕和流放。从 1902 年至 1913 年的 11 年间，斯大林先后被捕 7 次，被流放 6 次，从流放地逃走过 5 次。

1906 年至 1907 年间，斯大林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卓越的论文，总标题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这些论文里，斯大林维护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以及新式的无产

阶级政党领导的绝对必要性。斯大林依据这些理论，成功地领导了巴库工人的斗争。后来，列宁写道：“1908年内，在有大量罢工者的省份里，居于首位的是巴库省，参加罢工的有4.7万名。他们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代表！”

1912年2月间，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流放地，得到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消息。在这次代表会上，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发展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个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它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为建立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所著《做什么？》一书，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列宁著《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是党在政治上的准备。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则是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1912年1月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中央局。尽管当时斯大林未到会，并被流放着。

1912年2月29日，斯大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再次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他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而斗争。他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在南高加索，他冒着被沙皇走狗逮捕的危险，击败了孟什维克的破坏，取得了维护党性、反对取消派的胜利。

1912年5月，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具体组织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他领导制订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亲自编辑创刊号，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第一任总编辑。在两年半内，《真理报》曾被沙皇政府封闭过8次，但它以新的名称继续出版，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后在纪念《真理报》10周年时，斯大林写道：“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胜利的基础。”

斯大林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年春发表。它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战前国际舞台上对民族问题发表的重要论著，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宣言”。

1913年2月23日，斯大林在为《真理报》募捐时被捕。列宁闻讯，立刻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我们的被捕情况是很严重的。柯巴被抓走了……柯巴幸而写完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章。很好！要为真理而战，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被监禁五个月之后，于1913年7月2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的图鲁汉斯克地区，期限4年，受尽了罕见的磨难。但是坚强如钢的斯大林，不屈不挠，巧妙地与列宁和党取得了联系，坚持斗争，顽强工作，并写了许多重要文章。

在斯大林流放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俄国40%的男子被征当兵，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工厂停工，人民饥寒交迫。俄军在战争中又屡遭失败。德军占领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的大片地区。广大群众对沙皇政府日益不满。

此时，斯大林根据同志们送的雅号，自称“柯巴·斯大林”。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首先起来斗争。1914年后半年，发生过70次罢工，参加人约3.5万；1915年，罢工超过千次，参加者达50万；1916年罢工达1500起，参加者超100万。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士兵们也展开了反战斗争。1916年10月，当法庭审判反战水兵时，在彼得格勒党委会的领导下，13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迫使政府不敢判处水兵死刑。

列宁的革命理论，动员了千百万人民群众。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纷纷响应。到24日，罢工工人已达20万，他们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们积极响应，士兵也转向起义，到27日晚，已有6万多士兵转到起义方面来。起义工人和士兵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并在当晚举行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推翻沙皇统治。胜利消息，不翼而飞。其他城市和前线士兵相继起义。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革命推翻。史称“二月革命”。

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同国家杜马（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等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也加入了临时政府。列宁在国外揭露了这个临时政府的性质。他说：“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局面。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党中央委托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为了指导革命斗争，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决议和理论。在第一篇文章《论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斯大林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巩固苏维埃并普遍成立苏维埃，以作为人民革命政权机关的工兵代表中央苏维埃为首，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进行统一的斗争。斯大林在《论战争》一文中，拥护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劳动人民“撕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使现在这次战争不可能再打下去”。

1917年4月3日，列宁经长期流放生活后回到了彼得堡。斯大林率工人代表团热烈欢迎。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了战争和革命的报告，阐明了《四月提纲》。这是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计划。斯大林在解释、宣传列宁《四月提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表了《论临时政府》、《土地归还农民》等许多文章。

1917年4月24日至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了第7次（4月）全俄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并且定出了党对时局、战争、临时政府、苏维埃、土地、民族等等问题的路线、方针。列宁在报告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会后，斯大林协助列宁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6月18日，组织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大示威。斯大林以中央的名义，写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真实而深刻地表明了工人和士兵的意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50万人举行大示威，要求苏维埃掌管政权，要求苏维

埃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临时政府调来哥萨克队伍和士官生队伍镇压革命群众，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斯大林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保护列宁，使列宁安全地离开了彼得堡，并且写了《把队伍团结起来》、《反革命的胜利》等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提出了具体的斗争计划，鼓起了广大劳动者和士兵争取胜利的信心。

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列宁因受临时政府通缉而未出席大会。会议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主持。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对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穷苦农民等问题，号召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了斯大林提出的决议草案，强调了列宁认定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保证的原理。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对俄国能不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主张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斯大林对此作了坚决的反击。他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与会代表热烈支持斯大林的发言，支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来到彼得格勒。斯大林向列宁报告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在10月10日至16日的俄共党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武装起义的计划，批驳了季诺维巴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建议。会议决定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为了加强对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列宁、斯大林决定派伏罗希洛夫、基洛夫、卡岗诺维奇、日丹诺夫等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分赴各地组织起义。10月24日早晨，克伦斯基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临时政府对革命展开了攻势。斯大林闻讯，毫不畏缩，指示赤卫队员与革命士兵针锋相对，英勇反击，很快地击退了反革命军队，并在编辑部和印刷所周围加岗防卫。到上午11时，《工人之路报》又出版了，上面刊有斯大林写的号召推翻临时政府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斯大林写道：“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

号角吹响了，起义开始了。起义总指挥斯大林和领导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指挥起义。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布置部队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接着，分派部队把守桥梁，加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各区的联系。10月24日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指挥部队冲向首都中心，包围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各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和国家银行。预备国会被解散了。喀琅施塔得海军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2页。

基地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堡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道了10月25日是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这天夜里，革命工人、士兵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起义胜利了。当夜10时，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宣告起义胜利，“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次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大会发表的《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大地上诞生了。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要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扼死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拥护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3月间，俄共中央在面临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1918年5月至1920年8月，斯大林先后指挥南方战线，保卫察里津，指挥东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作战，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1922年4月斯大林就任党中央总书记。7月间，他派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来华，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政府重申放弃在华特权，“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对于正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鼓舞甚大。正如毛泽东祝词中说的：“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这种友谊不仅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鼓舞了中国国民党人，并且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世界上真有伟大的友谊，无私的援助，真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任俄共中央总书记，入住克里姆林宫。他决心克服于难万险，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当时，俄国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工业品不多，粮食也缺乏。1920年和1921年两个饥荒的年头，百万人死亡，加上7年战争，俄国有上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摆脱战前沙皇统治时的那种贫困状况。而党内外、国内外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随时有武装侵犯的威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不敢设想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4年8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鼓舞人们把革命的热情发挥在爱国建国的事业上，用在实际行动中。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阻力是很大的。但坚强如

钢的斯大林决心去探索、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并运用他的谋略，在后几年的实践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决策中，一个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派都斥责斯大林“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运用种种手法，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取得了胜利。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微笑着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示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把他赶出了俄国。

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十分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他认为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社会。他的理论和号召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响应，激起了一股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热情。人们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火热的运动，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设想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这个计划被当时西方世界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苦干巧干，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5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对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也提前完成了。

关于工业化方法，斯大林排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积累资本，然后把积累的资本转到重工业上，这需要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斯大林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情况，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绝不能走这一条路。斯大林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假如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排除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

后来的历史证明：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此期间，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重要著作，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

1941年5月开始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先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帮助。虽然由于情况了解不够等历史的局限，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也有过不少缺点、错误，但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错误毕竟是次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7 斯大林听谗言态度改变

毛泽东顶逆风破浪向前

斯大林看了科瓦廖夫的报告后态度改变。毛泽东发脾气说：“我什么事也没有，一天就是三件事……”

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毛泽东则按他原订的计划，继续留在莫斯科访问、参观、休息、游览。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对于考察、了解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趣更浓。早在1920年的2、3月间，他就曾和李大钊等商量，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到俄国这个“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访问、参观，并写信告诉同学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三十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使毛泽东不是以一个“游俄队”的成员，而是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怎能不抓紧考察参观呢！因此，当他和斯大林初次会晤，斯大林问他有何愿望和要求时，毛泽东就直率地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部想看一看。

现在，祝寿结束了。毛泽东便抓紧考察、访问，了解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了热烈欢迎。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找了几十部苏联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给毛泽东放映。其中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等等。

斯大林闻讯后十分赞赏。他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12月22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

这时候，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泽东赴苏的柯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候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并且“里通外国”，企图依靠苏联的支持篡党夺权。这份报告，对中共中央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共中央、中苏关系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坏的作用。

柯瓦廖夫是一位铁路专家、技术人员，斯大林说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1949年春米高扬访华走后，柯瓦廖夫成了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3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柯瓦廖夫从东北来到北平，也住在香山附

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载《人物》杂志1988年第5期第14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0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0页。

近的一个小山沟里。他曾使用阿洛夫使用过的苏联军部的电台，陆续向苏联报告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几天后，柯瓦廖夫又把苏联领事齐赫文带到香山，要求拜会毛泽东。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针对斯大林害怕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引起美军大批入侵、美苏交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顾虑，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不用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没有意外的变化，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有人担心美军直接参战，至今为止，尚看不出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虚张声势，叫得很凶，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地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真正要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阻挡我军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人民解放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可以断言，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交谈中，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而柯瓦廖夫总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释。为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还多次和他见面、谈话、介绍、解释当时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重大政策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如此不厌其烦，其用意虽没明说，实际上，是希望柯瓦廖夫能向斯大林及苏共领导正确地反映情况，如实地介绍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在中角海特意约见柯瓦廖夫、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特别向他谈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及前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任务；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得彻底胜利，决不收兵。他强调指出：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我们的革命也要分阶段进行，但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走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得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这是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么两条。

毛泽东还关心地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回国，虽辛苦些，但可以同家人团聚，这也是一次好机会。谁料，这一次，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访苏，却无端造谣，上交给斯大林一份挑拨离间的书面报告。当时，斯大林“一连几天都不去看”毛泽东，“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因此，毛泽东闭门不出，不大高兴。

有一次，柯瓦廖夫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毛泽东，询问毛泽东身体怎样？生活习惯否？还有什么要办的事？

毛泽东正在火头上，当即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柯瓦廖夫十分紧张，站得笔直，低着头，头也不敢抬！只是嗫嚅地说：

“斯大林同志要我来看看你，看你有什么事要办……”

不等柯瓦廖夫把话说完，毛泽东又接过话茬，说：“我有什么事？我一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

柯瓦廖夫等战战兢兢地走了。

毛泽东对师哲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教训一番！这样，他才会向斯大林去反映情况，去汇报！”

师哲解释说：“柯瓦廖夫只是个副部长，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也不敢去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

毛泽东淡淡一笑，未置可否。

西方的资产阶级乘机造谣，挑拨离间。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本来疑惧。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会见，更使他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见这一段时间，报刊上对毛泽东的行止报道较少，他们便大造谣言，挑拨离间。

英国的一家报纸竟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消息不胫而走，谣言到处流传。

苏联的领导人都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理解这是他们为了发表消息，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泽东当即表示，愿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并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对此表示惊讶，问：为什么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听了不大高兴，认为斯大林对他不够诚恳。

由于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找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希望他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意见和要求。

王稼祥过去曾和斯大林接触过几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见此情景，安慰了斯大林几句，又去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时候，毛泽东的脾气发过了，火气也消了。他心平气和地说，把我弄来就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

王稼祥心中有了底，就以新中国驻苏大使的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毛主席到莫斯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苏联方面反应很快，次日即作出答复，同意签个文件。斯大林并主动地约请毛泽东再次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后来，他对师哲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上了人家的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多次上过国民党的当。先上了蒋介石的当，吃了大亏；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吃了大亏；再后来又上蒋介石的当。看起来，阶级分析不能忘啊！

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关注着并决意帮助中国革命。然而，在本世纪上半叶，要帮助中国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两个性质不同，成分各异、长期斗争、互相联系、既有合作、又相排斥的两个大政党。对他们的认识如果有偏差，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论东方民族大学政治任务》的演说。在演说中，斯大林把殖民地东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发达，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斯大林的分析 and 论述，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其实，即就改组后的国民党来看，无论是在纲领上还是在实际上，它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根本不是什么“工农党”或“人民政党”，它是由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团组成的。

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因为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23日至31日，斯大林领导俄共（布）召开了第13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中央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得到了大会的批准；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1922年，斯大林就任俄共（布）总书记职务时，他只是俄共（布）制定政策的5个人之一。这5个人是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不久，斯大林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的声望更高了。尽管列宁认为“斯大林粗暴”“不可容忍”，曾写信“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但是，1923年4月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而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件是，斯大林在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时，说明党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获得控制地位。共产党员在地方工会干部中的比例已从27%增加到57%，在军官中的比例已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于党的控制和绝对领导之下。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回答。他说：“党不是辩论会。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大会上，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斯大林都取得了胜利。大会后，持不同政见者聚众闹事，遭到了政治警察的逮捕。每当“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斯大林总是强调国家安全，强调将国家安全列于“民主自由”之先。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持葬礼，发表演说显示出他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在以后的几年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决策中，斯大林一个又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

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斯大林“专制”，然而每一次斯大林都设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并且利用多种手法，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随着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政见的失败，他们的政治权利不断地受到削弱和排斥，斯大林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威信则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加强。到 1925 年 5 月，斯大林第一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指导性的演说时，俄共（布）原 5 个决策人之一的斯大林，因列宁逝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政治上多次受挫，斯大林已成了公认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人士。因而，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斯大林才能以世界革命领袖和权威人士的口吻，把中国、印度、埃及和摩洛哥这样的各不相同的国家，归纳为“殖民地东方”的国家，并分为三种类型，然后提出了分类指导性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这篇演说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特点之一。

有趣的是，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论述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作国民党的工作。他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实际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5 年 10 月初，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就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10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

1925 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为《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把这两位伟人的演说、文章中的思想观点加以比较，对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乃至对于了解苏共和中共对待国民党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比较要有基础，要有同一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演说，是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表的，是认识主体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都发表在 1925 年，是时间上的同一性。两人在演说中部论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是认识对象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中，都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的问题。斯大林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毛泽东则说：“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观点中有同一性，看法大部分是相同的。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位伟人在这两篇演说中表述的观点，也有差异、不同甚至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主要是：

第一，关于国民党是不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的问题。

斯大林在演说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

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显然，在这里，斯大林把中国国民党看成了“工农政党”、“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1905年8月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本部设在日本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外建立有9个支部。同年10月创办《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会员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该会一方面以《民报》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清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党部移至上海，后再移至南京旋被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篡权，革命遭到失败。1912年8月，宋教仁在北京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孙中山等人为了继续革命，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代袁世凯；失败后，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另组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时的国民党尽管成分复杂，矛盾重重，但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成、发展和现状，力促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4月，在《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毛泽东就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1925年冬，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改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广东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高涨，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正确地审察环境的结果。在观察客观环境中，以孙中山最有远见。文章说：“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时，毛泽东写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

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显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对国民党的看法差距很大：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而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并明确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的状况，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中间派的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但是，斯大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

毛泽东作了大量研究分析后，明确写道：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

国民党成分复杂，派系林立。只有孙中山德高望重，能驾驭全局。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和新右派，勾结军阀、官僚、政客，公开进行反革命的分裂活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广东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1925年10月27日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着重讲了“中间派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遇到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人迷惑难解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仅重点讲解，而且第一次使用了“中间派”的概念。这里所说的“中间派”，指的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两面派。戴季陶是其理论上的代表，蒋介石则是行动上的首脑。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的强大威力，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显示的威力，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十分害怕。他们既想反帝反军阀，又极力限制和削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便登台表演，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而戴季陶主义正为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戴季陶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谬论，反对国共合作。六七月间，又接连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几本小册子，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虚伪的“仁爱”作为“宗旨”，反对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说什么“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只能以“仁爱”之心，“诱发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而不能搞阶级斗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团体不固，不能生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赶出统一战线。戴季陶还公开叫嚣共产主

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诬蔑中共“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

因此，毛泽东突出他讲“中间派”问题。他说自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运动后，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汀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断言：“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

接着，毛泽东讲了中间派不能存在的三点理由：1．第一阶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

2．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颇强大的中间派。如辛亥革命以后，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派为争夺国会里的席位，结成了不同的政党，有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有袁世凯操纵的统一党，还有立于中间，实际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后来共和党又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最后演变为研究系。这几个自命为中派的头目有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章炳麟等人。还有一批退化了的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学系也自命为中间派，如张群、黄郛等。这些中间派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

3．从现实的广东情况看，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以香港英国帝国主义为领袖”，革命势力“以左派国民党为领袖”，“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任何中间派或者要被反革命派拉拢，倒向反革命；或者接受革命派的影响而倒向革命。“因之现在的广东是完全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斗的紧要关头，“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

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考右派的思想基础，也是蒋介石右派集团进行反动阴谋活动的理论武器。在这种反动理论出笼之初，在蒋介石集团为后来的中山舰阴谋事件制造舆论之前，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

第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即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会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问题。

斯大林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说：“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

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却与斯大林完全相反。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像戴季陶那种“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的实质是“要做修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

1925年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5年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3—124页。

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

毛泽东的观点，鲜明、准确。他认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一定要站在反革命那边，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即使现在无诚心那样干，将来也一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这和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论断，不是完全相反吗？

毛泽东的这种论断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作出的。过了不到40天，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资产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世界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后，强调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必定很快地分化，“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各衷一是，究竟孰是孰非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社会实践，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反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直至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都说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说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长期的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一直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支持不力，有时甚至作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然而，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甚至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同志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他也没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斗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谈话、公开发表文章，都十分尊重斯大林，尽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然而他们的分歧和

1925年10月28日广州《国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激化。

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失败已成走局，在和中共代表团刘少奇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妨害了中国革命。他问刘少奇道：“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诚挚的。他还说：“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对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将革命引向了胜利。”

另外，据南共书记铁托的主要助手卡德尔的回忆说，1948 年 2 月 10 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陈独秀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中介人”。斯大林的错误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根源。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

毛泽东当时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形势和作用看得清，分得明，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此前后，他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集中精力筹备并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的成绩；同时指出那种对国民党右派“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的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等决议案，批判了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等错误，强调要以国民党“一大”政纲为标准区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强调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这是一次由毛泽东着力准备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会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由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签发。在这些《通告》、《通知》中，强调要通过“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不但要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反对江浙军阀战争，指出“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

1924 年 7 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 15 号，是专讲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通告》中，毛泽东第一次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因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地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 年 6 月 1 日，孙科等人提出了《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 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等人又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毛泽东起草的这份《通告》，

针对上述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起草的15号《通告》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通告》还强调：“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的主张为重要标准。

毛泽东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不到一年，但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反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京等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经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通过发布。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事宜，选派出147名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

毛泽东还组织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并且常到各地讲课、讲演。例如，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指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举行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演：《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工农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

关于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毛泽东概括了四点：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1. 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导，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2. 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

当时，国民党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将执政掌权。不少“革命者”为了升官发财，投机钻营，把革命抛于脑后。共产党里也不乏其人。然而进入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毛泽东，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矢志革命，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坚持在国共合作中的无产阶级

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98页。

1925年12月13日广州《国民新闻》。

1925年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2期。

1926年3月31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2期。

领导权，和一切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丝毫没有“忽视工人阶级”，没有放弃工人阶级立场，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斯大林的理论、思想、主张、措施却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共产国际，陆续地传入中国，对中国革命，对国共合作，不时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自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履行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本人有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而斯大林在1925年5月所说的国民党是“工农党”，1926年12月所说的要“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党”等过高估计国民党革命性的论断，必然对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1月12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这就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变成了中共必须执行的东西。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奋发图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他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杂志。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毛泽东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奋斗。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和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联系筹建党的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他写信与李大钊商讨，确定叫共产党。因而，毛泽东曾称赞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27年4月党“五大”，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事件的处理都和陈独秀关系密切；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进退、成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因而陈独秀的成败兴衰，和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陈独秀、毛泽东和斯大林有联系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陈独秀有其独立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陈独秀和毛泽东当时都是中共的创始人和领导成员，两人都倾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方针、路线，而两人的见

解、主张、意见、方案却往往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毛泽东曾多次劝导、帮助过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孤做自负，固执己见，反而利用手中的权，独断专行，步步威逼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十分苦恼，身患重病，回家“养疴”。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后来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病逝。终年63岁。

陈独秀曾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中介人”，是毛泽东“政治革命之先驱”。他那坎坷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伟大、来之不易。

8 斯大林拜会毛泽东 基本观点一比自明

斯大林拜会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送了一份“密件”。

斯大林识大体、顾大局，努力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立刻引起了她高度的警惕。他知道阶级、政党、领袖的原理，明白他和毛泽东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利害，而且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衰。事关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斗争的大局，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斯大林进行了冷静的深思后觉得在中国革命这个事关世界格局的重大问题上，自己由于了解情况不够，偏听偏信，强加于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毛泽东虽然未曾到过苏联，但他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力挽狂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壮举，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对柯瓦廖夫写的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的报告。看过之后，斯大林认为这是适应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离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谰文。斯大林决定，要把这份绝密的内部《报告》，当面送给毛泽东，以使用行动表明：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是诚挚的，信任的，是不容许挑拨离间的。

为了密切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加强团结，斯大林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这对固执、倔犟的斯大林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多年少有的。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周恩来来到莫斯科来谈判。

1950年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孔策沃别墅来，询问毛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见斯大林态度改变，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自己也就采取灵活的办法，不是讲一种方式，而是提三种方案，请苏联同志选择。他讲的三种方案是：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当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答：“是的。”但他又对周恩来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

疑。

毛泽东笑了。他点起一支烟来，边抽烟，边搬着指头算了一下说：“我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为毛泽东周密安排所折服。接着，他们和毛泽东具体商定了毛主席晋谒列宁墓，赴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游览、参观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认为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应该进一步消除误会，加深友谊。一天夜晚，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同中国领袖毛泽东举行了一次会谈。

夜幕，悄悄地罩住了大地。飞舞的雪花，又织成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白纱，轻轻地罩住了山川，罩住了别墅，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再次会晤商谈，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斯大林喜欢深夜长谈。毛泽东更有个特殊的生活习惯，喜欢夜间工作。每当更深夜静，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俩人的头脑却格外清醒。因此，他们约定这次夜间长谈。

客厅里，一排长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苏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坐在一侧；毛泽东坐在靠近斯大林的位子上，翻译坐在中间，中国同志自然坐在自己的领袖一边。桌面上摆着各种菜肴和食品。白兰地、矿泉水，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色伏特加酒如花似地点缀其间。整个桌上，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这是苏联方面特意布置的。

莫洛托夫首先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大家祝酒。

干过杯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进入会谈。斯大林首先问毛泽东身体怎么样。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能不能过得惯。表示希望毛主席注意休息，多多保重，他说：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互相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害；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有古老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特别是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还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帮助、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并提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建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可以搞一些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现在，签订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好，并具体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周恩来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很有才干，请他来一起商谈更好。苏方的领导成员都同意请周恩来总理来进行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40页。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的经过》。

具体谈判。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十分不安。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破坏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者破坏阴谋。

斯大林说，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遵照列宁主义、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和武装侵略，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当然要破坏。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大了，帝国主义的末日快到了。阶级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必然更加疯狂地顽抗、破坏。在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正是敌对势力常用的手段。

说着，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顺手递给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柯瓦廖夫是个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个门外汉。可是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你看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也没看，顺手递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师哲同志，接着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运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表示赞赏。他希望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接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饶有兴趣地谈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探讨革命的成功经验，一直谈到深夜。谈得非常融洽。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并请周恩来、李富春等尽快赶到莫斯科。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文件，笑着说：总的来说，斯大林对我们还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他还谈到革命转折关头的复杂斗争。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重视斯大林的论著和意见。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意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年的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问题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有了明确的论断。当时，斯大林之所以特别重视中国革命，是因为革命发展迅速，并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

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名，中派65名，右派45名。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作为国民党湖南省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在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大会上作了《宣传报告》。在报告的结语中，毛泽东说：“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强调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当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

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通过决议继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给西山会议派中的几个最反动分子以纪律制裁（有的开除，有的警告）。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的决议案。

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很大优势。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剑、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七人，候补执行委员24名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毛泽东是宣传部代理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但是，由于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对右派妥协退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曾主张坚决反对右派，并利用这次大会的有利条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却要以让步、妥协保持联合战线，并把已被革命势力驱逐出广州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找回广州参加大会，让他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使其后来利用职位进行反革命活动。更严重的错误，是把假左派、新右派蒋介石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其阴谋篡

1926年4月10日《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1926年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向革命进攻。在北方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南方发生了三二一事件。3月12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的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为奉军军舰开路。驻守大沽炮台的国民军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守军发空炮警告，日舰炮击国民军，打死打伤十余人。国民军忍无可忍，以炮还击，将日舰击退。国民军就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向日使提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赔礼道歉，竟然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北京群众义愤填膺。3月17日，北京25万群众召开了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人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至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段祺瑞竟令守卫开枪，打死打伤群众200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介石唆使其盟弟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调兵舰公函备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伪装“惊异”，说李之龙不服调遣，图谋不轨。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断绝交通；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枪械；包围了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很显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第一个阴谋政变，是他们叛变革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一个试探性的前哨战。他们要以此来试探共产党的虚实。

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政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宣部代理部长的身份列席，并提出一项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的提案。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的支持下成立的反动组织。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毛泽东历数孙文主义学会的恶迹，主张严加取缔。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毛泽东的部分提案，决定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这对于靠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阴谋政变活动的蒋介石，也是一次打击。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右派进攻的试探，主张坚决反击。他分析形势后指出：就广州一市的情况看，蒋介石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蒋介石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们党坚持原则，坚决反击，就能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他和陈延年一起，去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和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

军的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第一军的政治骨干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毛泽东不服，请示陈独秀；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压制，未能实现。

陈独秀等人被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可能压倒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不仅有他的武装力量，而且得到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使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共产党必须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协助”、“等待”，而不能“包办代替”。当前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他们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想包办国民党而逼出来的，因而主张以后只应“办而不包”；一定要向右派的进攻退让，但不要退出国民党，故名曰“退而不出”。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称赞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表白说共产党是完全支持蒋介石的。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蒋介石阴谋得逞，变本加厉地向革命进攻。蒋下令撤消了第一军中许多共产党员的职务，并把他们和许多革命青年清除出了第一军；又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分化国民党左派，逼迫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假左派分子汪精卫出了国，迫使原是左派的动摇分子甘乃光、陈公博等向他投降；又把戴季陶、邵元冲、孙科等右派分子召回广州，委以重任，支持其四出活动，制造事端，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造谣惑众，诬蔑共产党，扩大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

不久，蒋介石又把新老右派分子组织起来，和他在黄埔军校中培植的一批军事法西斯帮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结合，成了一个新的帮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前，在广州到处散布“共产”谣言，唆使罢市，造成广州中央银行发生挤兑，广州市内满城风雨，用多种方式威胁分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他的《整理党务案》制造舆论和借口。

毛泽东虽受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压制，不能力挽狂澜，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22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联合杨匏安等人提出了“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当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条文。

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按照他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妥协方针，要大家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是讨论中意见不一，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讨论七天，毫无结果。张国焘再三强调他和陈独秀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拒绝签字。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坚持不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投降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使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很快代替共产党人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也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不久，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

1926年5月，中共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北伐战争。北伐军共八个军，约10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分三路向北进攻。而它面临的敌人，数量庞大，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暂时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当时主要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总兵力约20万，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控制着京汉路；一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总兵力约30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及北京、天津反津浦路北段；一支是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总兵力约20万人、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这些军阀的兵力虽有七八十万，但各自为政，内部矛盾很多，军无斗志。而北伐军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持；由于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英勇战斗，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到1926年底，北伐军就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使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形势急剧变动的重要关头，1926年11月30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不久，又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在此前后，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虽然相距万里，但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基本一致或大体相似。

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比较。

为了便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特按斯大林提出的几个根本问题，将他们二人的观点，作些比较性的简述：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30日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两大革命运动巨流的结合；“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斯大林特别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必然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他说：“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毛泽东发表这种见解的时间，比斯大林早三年半。1923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湖南《新时代》月刊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观点，并且更加具体地指出：“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

“反动派的范围最少，包括宜奉皖三派。”

宜奉皖三派，都是和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封建军阀，是当时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也是三年后国共两党联合北伐的主要对象。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阐述得更加具体、深刻、全面。该文是1925年12月1日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的，比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发表的时间早1年零10天。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是许多人都感到困惑难决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连苏联的军事顾问代表团也搞不清。所以，毛泽东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首次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发表时，毛泽东把这个意思讲得更具体些。其中还有一段话：“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直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把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接着指出，由于这五种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以对革命采取的态度也不同。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两种，明确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占全国四万万人的四分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特别深入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指出它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及附属于他们的高等知识分子”，共计四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新时代》第1卷第1号1923年4月10日版。

《新时代》第1卷第1号1923年4月10日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在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结论道，“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化，国民党右派活动也更加猖狂。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的右派中央委员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邵元冲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公开树起了反共反革命的旗帜，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机关，专门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大肆鼓吹戴季陶主义，篡夺革命领导权，为反苏反共作舆论准备。

二、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领导者和前途问题。

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底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反对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第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音，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

这三条主要特点，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前途，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将是“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与斯大林相同，又比斯大林早发表近一年。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他还强调指出：中产阶级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即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武装斗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2—323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

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这就是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有了人民的军队，有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才会有人民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加强革命军队的工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军队进行改造和监督，使军队成为革命思想的模范体现者；努力学好军事，研究军事，在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不符合中国实际、不甚恰当的地方。例如，他只是一般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而没有根据中国社会“有枪则有权”的情况，具体地提出创建和发展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和警惕蒋介石等军事将领叛变革命等问题。

这些问题，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很快提出，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中国社会“有枪则有权”的实际，毛泽东明确地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根据中国地域辽阔、军阀割据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上山”、“武装割据”、“星火燎原”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斯大林固执己见，不允许从中国实际出发，怀疑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纠葛、事件来。

毛泽东多次肯定了斯大林的正确论断，多次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引用了斯大林“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话，并写道：“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

四、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本书将在下一章专门叙述，这里不再详谈。

五、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因此，“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同时，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这都是对的，正确的。但是，他又说：“在罢工时期，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

在这里，强调党要帮助工人改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是正确的，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十分重要。但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就断定“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3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2页。

甚至进而断定：“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残酷、人民的民主权利极少，工人阶级受的压迫、剥削特别深重。帝国主义走狗鞭答、拷打，甚至打死工人的事情、时有所闻。这只能说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残酷，而不能成为“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依据。

斯大林有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暂时的；而是他长期坚持的；并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失误的观点。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他“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因为这里并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阶级”。他只是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南方后，“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因而他主张“把我们的全力去发展国民党”，说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采纳了马林的看法，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因此，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发生一系列错误的重要根源，也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毛泽东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正因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不仅工人子女，而且不少工人都曾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答和拷打”，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对同一事物，观点不同，结论必然不同。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写得不多，但言简意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在列举了四年来罢工运动中工业无产阶级表现的力量和在革命中的作用后，毛泽东指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观点不全一致，但毛泽东的分析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富有辩证法，更深刻具体。他没有因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受着“极残酷的待遇”，就断言他们“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而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青苹之末，可以预见风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微小差异——在此时，在早期，差异微小。构不成分歧；但随着岁月的增加，矛盾的发展，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共和斯大林

《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第11页。

《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第8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的面前，就日益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何看待蒋介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9 斯大林知错能改毛泽东内外有别

西方造谣说：“毛主席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毛泽东答记者问。

毛泽东是统筹全局、处理各种矛盾的能手。他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那种把事物看成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符合事物运动规律的。他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然而，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认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千千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践家，不懂得这种方法，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共同愿望。所以，毛泽东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热烈欢迎。两位领袖的亲切会晤，成了苏联及世界的重要新闻。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会晤的消息。一时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晤面、会谈，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也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

然而，斯大林的多疑，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使两党两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中间有中苏两党之间认识上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有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革命道路的怀疑，亦即斯大林和他关系的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甚至还牵联到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大国沙文主义和新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么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该怎么处理呢？毛泽东毫不慌乱。他安然地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里，只是当着表面谦恭，背后告状的柯瓦廖夫毫不客气地发了一阵脾气，问了一句“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斯大林闻讯反躬自问，主动拜会毛泽东，送上了柯瓦廖夫的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意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由于毛泽东抓住了他和斯大林关系的这个“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所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样处理，是出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的缺点、错误，只要“顶一顶”，他还是知错能改的。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毛泽东说的那种“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正在逐步地形成。

为了戳穿西方资产阶级的造谣诬蔑。说明中苏关系形成的实际情况，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回答了塔斯社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你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

毛泽东的谈话使西方资产阶级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在此期间，有人曾建议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样不好。人家的问题让人家自己去讲，我们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更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是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过错误，可是，人家承认了，不仅这次有过“内疚”的表示，上次和刘少奇会谈时，也曾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话是对我们的道歉。我们不能揪住不放，更不能以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

毛泽东强调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毛泽东的话使听众心悦诚服。

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观点的比较。

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曾发生过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上，有一段时间，两个人意见分歧，奋不相让，相持不下，报纸上长时间没有关于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西方通讯社趁机造谣，挑拨离间，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不少同志曾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担忧。

但是，毛泽东并不紧张。后来，曾有人问毛泽东：当时，你要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去，斯大林不同意，说一不二，决不退让，你怎么知道他会同意呢？

毛泽东说：斯大林虽然固执，但还是讲理的。他的错误，顶一顶，还是

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3年第341—343页。

知错能改的。这个问题，只要了解一下中国农民运动史和斯大林的言行，就会明白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了历史再看看现实，就知道他将怎么办。

的确，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们虽远隔万里，不通通讯，但他们的观点理论、意见，却往往一致或相似。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就以农民问题来说吧。1925年春天，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3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使他们两人相通的“灵犀”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中说的：当时的中国革命急需找到广大的同盟军，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作出了“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而且早已行动，在1924年12月底，就从上海回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去了。

这是毛泽东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在长沙，他和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详细地讨论了农民运动，然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过春节。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和毛泽民、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杨开慧等共产党员一起到了韶山。他们利用春节人闲时走亲串友、访贫问苦等多种方式，了解情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据《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韶山于1925年“二三月间即组织起乡秘密农协”，不久就发展到20多个。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的韶山的第一批党员，6月中旬，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此后，党组织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他们诬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并且串通反动当局派兵捕拿。幸得县议员郭麓宾通风报信，在党组织和农民的掩护下，毛泽东才摆脱敌人追捕，“问道入粤”。

1925年上半年韶山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深入农村研究农民问题、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坚持工农联盟、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成功尝试；也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史料，为他后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提供了具体经验。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业部提请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毛泽东、陈公博、萧楚女、林祖涵等九人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61页。

1926年12月11日《湖南圭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会刊》第11期。

农业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命毛泽东为农讲所所长。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周密筹备，二十个省的 327 名学员陆续抵粤。农讲所于 5 月 15 日正式开课。25 门功课，总课时 252 小时，其中毛泽东讲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 23 个小时。毛还兼讲《农村教育）、《地理》等课。讲习所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 31 种，多是毛泽东和萧楚女搜集的。

毛泽东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曾多次组织学生到韶关、海丰等地调查、实习，研究有关农民的各种问题。他把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参考。到 1926 年 11 月。《丛刊》已出版 17 种。

9 月下旬，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式上，毛泽东总结了农讲所的工作，指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并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

农讲所成了“革向的摇篮”。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 1926 年 9 月 1 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¹这一系列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得出来的。他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实现压迫与榨取，全靠封建地主阶级。所以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文章强调指出：农民一起来便碰着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地主政权，如不能推翻这个压榨农民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农民运动最大的特点。文章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确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提炼和概括，是他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 1926 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关头，和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同一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分析这两篇文章，有助于了解这两位革命家的思想。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于 1926 年 9 月 1 日发表的。斯大林的

亢维格的回忆（1965 年 6 月 20 日）。

周恩来：《关于 1924 年至 1926 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年11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比斯大林的演说早发表三个月。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重要观点多是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这一事实起码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不是继承的发展，而是独特的创造。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的材料来自实践。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说：“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材料来源都是间接的，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缺乏第一手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是质量不高的材料。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而且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之前，先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亲自试点搞了半年多农民运动，有了实践经验。他的材料不仅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而且经过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第三个特点是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则强调要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焦点是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坚强同盟者。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毛泽东亲身参加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五卅运动。他深深感到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而要农民参加革命，就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因为国民党害怕农民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后，农民运动在南方的一些省开展起来，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惊慌。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大员咒骂农会是“痞子会”、“过激党”，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要求镇压。因此。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农民运动不可能继续发展。而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听到一些咒骂农民运动的叫嚷，就发电报要中共“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后来，虽然否定了电报的内容，仍然要求中国的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要通过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去进行，要“通过这个政权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要自上而下地由国民党政府去实行农民革命。国民党早就要求镇压农民革命，怎么会去领导这种革命呢？斯大林的这种指导，只能使农民运动成为国民党将军们手中的玩物。而对共产党，斯大林又作了限制，说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推动政府实行土地纲领。很明显，由于过分地信任国民党，过多地限制了共产党，使斯大林提的一些办法，都是要共产党人推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不是要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际上，他把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任完全地或者主要地交给了国民党左派。而他所说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蒋介石、汪精卫等这些善于伪装的假左派、真右派，因此，他说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只能成为国民党将军的玩物，只能半途而废。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种差异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1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0—331页。

和分歧，由于关系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所以避也避不开，剪又剪不断，“剪不断，理还乱”，时隐时现，一直纠葛了20多年，直至1949年冬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农民立场”。

第四个特点是毛泽东的论述有真知的见，因而更准确、更鲜明、更形象、更具体、更可行，更富有中国的气魄和特色。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执委之下应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次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1号通告，指出：中国农民已陷入水深火热穷困不堪的境地，不得不暴动起来，客观的事实已推动我们去组织农民；现各地为应付此项运动已专设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去参加国民革命战线”；有九个省的农民运动近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毛泽东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6年5月1日至15日，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农委建议，这次大会吸收全国各省农协代表列席，代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使命，所以特别隆重。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体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思想。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等，并转发到其他各省。这时候，全国已有省农协4个，县农协37个，区农协294个，乡农协5023个，农协会员已达981442人。

1926年10月，北伐战争的军费问题十分迫切。在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军费来源，有人提出按照军阀统治的老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

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自己决定而自己不能实行是很大的冲突。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的人较为可行。”他建议“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的建议和“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都得到大会通过。

10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即离开广州，偕杨开慧、毛岸英乘船赴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党的领导。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述略》中回忆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AB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名单。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1926年11月，当斯大林根据谭平山等人的报告正在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时，毛泽东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草拟《目前农运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农运发展应

《全国农协统计表》，《中国农民》1926年6月3日。

1926年10月27日、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1926年10月27日、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取集中的原则”，并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他去到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在武昌合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1月初，在全省的75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达55个县，全省有区农民协会462个，乡农民协会6800多个，会员达136万余人。组织起来的农民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农村至高无上的机关，使十月前和十月后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应邀回湘指导工作。12月20日，毛泽东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8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大会宣言指出：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是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大会促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急剧发展，波澜壮阔。

在此前后，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农民协会成了农村大革命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工人纠察队在城市也行使着一部分政权的职能。工农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各阶层人的面前。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北伐军军官叫嚷工农运动“过火了”，“动摇了北伐军心”，“破坏了统一战线”，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叫嚷声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斯大林曾主张：“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毛泽东调查研究，坚持斗争。斯大林改正了错误。

问题怎么解决呢？叫嚷怎么回答呢？

从斯大林前后的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也被那种反革命的叫嚷迷糊住了。1926年10月，斯大林让共产国际给上海的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

据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讲，这个电报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联合，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

192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特别会议，集中地反映了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0页。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思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根据这一报告所作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会议决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因此，会议提出的中心口号是：“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其主要办法是：限制工农运动，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国民党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使他们“在中央、在地方都育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

决议根据斯大林“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的指示，对土地革命作了严厉的批判，强调指出：“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并明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共产党）因包办而孤立”。

这样错误的决议，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导下作出的，这就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右倾投降观点。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陈独秀说：“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开展下去”。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支持下，使会议作出了决议。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但当时处于少数，无能为力，便打算到湖南去实地考察工农运动，“用事实说话”。恰逢当时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专电特邀他回湘指导。于是，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就在陈独秀积极贯彻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月电报指示的时候，在莫斯科，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十月电报提出了批评。斯大林承认：“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并且在11月30日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就对那种“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他说：“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行动中所表现的对农民的冷淡和‘中

《政治报告决议案》（1926年12月）。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

《关于湘鄂三省农民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

李维汉的回忆（1977年11月）。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0页。

立’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积极的，工作是负责的。但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因而提出的措施还不是要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农民运动，还只是限于促使广东政权来满足农民的切身要求，并企图把中国的农民运动引导到根本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也不可能为广大农民接受的“土地国有化”上去。

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后，就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视察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历时32天。

毛泽东下乡考察，深入细致。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地听取当地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协、妇女会、青年团、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做农运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还亲自去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平民、衙门职员、开明士绅等交谈。他不摆架子，事先准备好调查提纲，访问时口问手记，虚心求教，遇有重大问题，也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因而调查得深入、具体、详细。

在考察中，毛泽东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农运中的问题。一次，在湘潭县银田寺的调查会上，听到高露乡的农民说他们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

毛泽东立即插问：“什么‘二民主义’？”

农民回答道：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争取平崇米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监狱，这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只剩下二民主义了吗？

毛泽东连连点头，认真他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成，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农民们见毛委员解决实际问题，情绪顿时高涨。

毛泽东又对坐在旁边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要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

戴述人是国民党省党部的监察委员，当场表示：一定按毛委员吩咐的认真去办。

农民们情绪更高。接着，银田寺乡农协的负责人汇报了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化子开张的大冤案。他说汤峻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先后杀过五十多个人；眼下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运，农民们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法办！

农民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枪毙汤峻岩。

毛泽东表示赞同大家的意见，又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震动全县，对于肃清封建余孽，打击反革命气焰，极有效力；汤

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

毛泽东说到做到，迅速联系有关当局，支持农民斗争。不久，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高露乡争取平糶米的斗争和银田寺农民镇压汤峻岩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考察到湘中地区时，见这里的农民和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农民一起来，土豪劣绅就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反动组织，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煽动团防局残杀农民，并且到处造谣，诬蔑农运。湘乡县有一个劣绅逃到长沙，说“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还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醴陵县三星里乡的“乡里王”易萃轩很狡猾，农会起来后，他见农会干部就作揖，把儿子送到何键部，还给乡农会送了个“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后教育干部，一定要记住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权力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是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所以，农民要坐稳江山，必须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湘乡县农协提出建立武装没军事人才的困难，毛泽东答应请省里派人来培养。不久，省农协就派了一位黄埔军校学生来，帮助湘乡培训了一批农民自卫军骨干。

毛泽东的实地考察和指导，使中共湖南省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广大农运干部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增加了斗志，从而把湖南的农民运动推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政权、自动分地的新阶段。正如中共湖南省委 1927 年 2 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的：“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然之打击上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建立之政治。”

2 月 12 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3 月 5 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 35、36 期首次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 月份，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写了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 1927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12 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里该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当时又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应该并且可能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从斯大林在此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真接受和重视毛泽东的观点，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

见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269—270 页。

见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269—270 页。

《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载《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第 5 集第 60 页。

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导致他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了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膨胀，一错再错，导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斯大林曾经让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过“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土地运动。《报告》热烈地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和指责农民革命的谬误，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党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特别指出：只要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政策，那末，“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人封的，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而对于广大农民革命的态度如何，是区别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农民运动起来了，真假革命者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就好区分了。他写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的前面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在这里，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农民。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农民这一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不致于落空，中国革命也才能取得胜利。

斯大林接受了批评，虽然不大痛快，但还是遮遮掩掩地接受了批评。上述错误的电报发出去一个月之后，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就纠正了错误，提出了新的观点，决议中说：“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

斯大林确实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论述的重要之处，亲自加上了着重号。但是，将斯大林的论述和毛泽东的《报告》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的《报告》更富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战斗性、彻底性、可行性。斯大林要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它同农民的联盟之间“选择”，要求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受农民运动的检验而“决定取舍”。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18页。

像大浪冲沙、沙里淘金，优胜劣汰，真假自明。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并不矛盾，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也并不全是对立的，只要能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就能战胜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就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当时并没有被陈独秀等人接受，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这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

10 毛泽东坚持搞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会谈

斯大林让步了，同意签个文件。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毛泽东按照他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准备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他有个习惯，参观一个地方之前，总是要先找点材料看看，要对那个地方作个概括的了解。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符合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参观、访问，时间较短，不可能全面地、深入地去接触那些事物，因而，先看点材料，了解个概况，借助于别人的认识进行参观、访问，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950年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具体商谈了周恩来的来苏日期及签订条约的时间。莫洛托夫问，新中国才成立，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很快来吗？毛泽东笑着说，这没有问题，会如期到的。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愿与毛泽东会谈并签订条约。毛泽东却坚持要周恩来赴苏出面与苏方谈判、签约。毛泽东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合适，更在行，周恩来是卓越的外交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有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月遵义会议后，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周和毛一起参加重庆谈判。1946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多次对人夸赞过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把强将高手用在新中国首次大型外交活动的第一线，是毛泽东再三坚持要周恩来出面对苏谈判的首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

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于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现在，他不但出好了主意，而且和斯大林已口头约定了原则，下边，“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不能自己包办，应放手让周恩来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

其次，毛泽东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赞成一下子顶到头，搞“最高级”谈判。他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怀疑，有看法，而斯大林有时又比较“粗暴”，“武断”，自己直接出面和斯大林作具体条约的谈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或谈崩，别人就不好收拾，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让周恩来和苏方的政府领导人谈判，即使发生某些分歧或争议，他和斯大林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斡旋，妥善处理。

第三，“要对口”，要合法，“要好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好进行高度的概括，往往把十分复杂的事物，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具体形象，一目了然。这次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就属于这种高度概括、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难怪斯大林始终理解不了。其实，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拟、签订之后，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哈，这不就是那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吗？“既好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使新中国在世界上健康成长不受侵犯的作用；“又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同盟，互助友好，反对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为此，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都应该是对口的，合乎国际法律和惯例的。所以，当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签订个文件，并且建议说就由他和毛泽东签字时，毛泽东还不答应。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曾是沙皇俄国的首都。1917年10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官，宣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时过32年，中国革命又宣告胜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里又夺得了政权。1950年1月15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资格，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毛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神采飞扬，游兴正浓，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参观。

当地领导十分尊重毛泽东，按照毛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

天寒地冻，一片白银世界。大海和陆地都被白雪厚冰连在一起，白茫茫的，分不出水陆的界限了。

毛泽东喜欢宽阔的海洋，更喜爱银白的雪原。他乘坐汽车在那一望无垠的海面冰层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毫无倦意，不时地向当地的陪同人员询问各种景观。当远远地看见那雄伟的喀琅施达特要塞的时候，他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眺望，激情满怀他说：“革命使江山更雄伟！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喀琅施达特要塞，是苏联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和士兵们发起暴动的要地，

在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业绩！苏联同志介绍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约1米至1米5。”

毛泽东望着那广袤无垠的冰原，高兴他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的中苏两国人员，都为毛泽东的豪情诗意和宽广胸怀所感动，禁不住欢呼、鼓掌！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藏书室等。苏联同志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但因内部整修，不能参观。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侵华很反感，一听此话，即对身边的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毛泽东特地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赞赏那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革命壮举。参观了苏德战争中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晚上，又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出相当精彩。结束后，毛泽东派王稼祥、陈伯达等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此时，台上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列别杰娃谢幕达五六次，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这是观众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慕，于是，她改变一般的敬礼谢幕为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好几次，得到了观众的欢呼！

后来，毛泽东感慨地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俄人民，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过了3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可是，斯大林对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

的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阅读了《斯大林全集》，查阅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发现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评论蒋介石，是在1927年4月19日至20日，斯大林写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中。这个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后，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0号上。当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本质已经暴露；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攻击，不久，斯大林又陆续发表了《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其中都论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不仅正在与蒋介石集团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也发表了一些论及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

那么，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论述、观点、意见加以比较，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经验和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

首先，应该肯定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只过了9天，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的长篇文章。斯大林写道：“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

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表明了他对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义愤，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也表明了他那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观点。其反应之迅速，爱憎之分明，文风之简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篇文章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几篇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中，都表明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1927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蒋介石挥屠刀残杀工农，毛译东斯大林对策不同。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向蒋介石以及党内的右倾投降倾向作斗争的呢？1927年初，陈独秀虽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的右倾投降倾向越来越受到一些共产党人的抵制和怀疑。而毛泽东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1927年2月，毛泽东曾将该文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予发表。3月5日起，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陆续发表了该文。3月12日，《向导》发表了该文的一部分，陈独秀看到后不让再发；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但被陈独秀等人拒绝。瞿秋白不服，4月间，亲自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其写了序言，要求“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实际上是对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各种攻击农运的谰言是有力的批判，对各地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又是极大的鼓舞。为了加强领导，1927年3月30日，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一起，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13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的工作。

毛泽东领导全国农协很快地制定出了《今后农运规划》，发往各地，对于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都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全会提交了《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1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等人的议案，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强调：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宣言》明确指出：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08页注释177条。

民将下会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宣言》还强调指出：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同时，应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器，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确实保障。

《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的宣言》的原则说明和具体实施纲要。在讨论《农民问题案》时、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要求党和政府对农民运动“加以改善”。共产党人夏曦发言批驳，说农村的骚动不安，是农民革命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能横加指责，更不能由党和政府去进行所谓的“改善”。毛泽东支持夏曦的观点，认为“夏同志理论甚确，应写到提案中去”，并特别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进了《宣言》，并且在《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省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同时指出：“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遏制农民运动之发达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国民党一定要竭力保护农民，铲除敌人。“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采纳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农民革命的宣言和决议，对于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到1927年4月底，湖南省的农会会员由1月份的200万激增到518万。农民武装迅速扩大，各地农会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建立农民自卫军。为了解决工农运动的武装干部问题，省农民协会和省工会在长沙创办了工农自卫军训练队，培训工人农民自卫军干部。在建立工农武装的同时，各县农民又开始自己动手，采取平均佃权、清丈田亩、插标占田、民主分田等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湖北的农会会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两个月内，由80万猛增到24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进攻，夺取了地主民团和团防局的枪支，壮大了农民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部分县区也开始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烧毁地主的契券，进行分地分粮了。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土地革命的步步深入，需要国民党政府尽快地拿出有关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方面的具体政策来。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这个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5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4月12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下纳租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1927年国民党中央印发。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1927年国民党中央印发。

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4月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意义。他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概括为六点，即：解放农民；增强农业生产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六点。

斯大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毛泽东则始终坚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不赞成搞土地国有化。其原因，毛泽东在4月19日阐述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不仅可以解放农民，而且可以“保护革命”。他说：“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获得生力军，“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为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的迫切心理，因此而长期对毛泽东猜疑、不满，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客观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农民运动迅速地遍及17个省区：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陕、热、察、绥的山川平原，有组织的农民达到800多万。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同时；工人运动也很快地出现了高潮。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高涨的重要标志。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于3月22日解放了上海。接着，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伺机反扑。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结合，勾结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者，准备反革命政变。4月3日至5日，汪精卫来到上海。蒋介石、张静江等十余人同汪精卫连续举行秘密会议，达成了一些反动协议。4月6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反革命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市政府职权，从而篡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政府的权力。

当时，上海工人运动高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带领80万有组织的工人，万众拥护，实力雄厚。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蒋介石叛变的阴谋熟视无睹，一再退让，麻痹工人斗志，涣散工人组织，并为蒋介石的阴谋辩护。蒋介石也利用这一点，在政变前夕，还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他亲笔题词“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表示他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4月12日晨1时，由蒋介石指使的青红帮流氓打手为先锋。冒充工人，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蒋介石事先布置的反动军队，

《土地委员会第一、二次扩大会议记录》。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0页。

乘机出动，收缴了工人武装，打死、打伤 300 多工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

蒋介石的反叛罪行，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无比愤怒。4 月 12 日，上海总工会发出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开罢大会后，前赴后继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开了 50 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前往尤华北伐军总指挥部请愿。4 月 13 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宝山路天主教堂周凤岐 26 军 2 师司令部请愿，该师按照蒋介石屠杀的密令，用机关枪向徒手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打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

蒋介石的大屠杀，从 4 月 12 日至 15 日，连续 4 天。工人被屠杀者 300 余人，被捕者 500 余人，逃亡失踪者 5000 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表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退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当时，他正在武汉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刚刚组成，就听到了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的枪声。毛泽东立刻联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敦促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强烈的反对和声讨。4 月 17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的第一集团军全部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当时，武汉政府管辖下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这些省区的群众运动还在蓬勃发展，并且还有十几万正规军队和许多工农武装。革命虽然危急，但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群众。他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这时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 1000 多万，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形成声讨蒋介石叛变，巩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当时扭转时局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和董必武、林伯渠、挥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一起，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40 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然而，蒋介石是要两面派手段的能手。他常常以他那伪善、“进步”、“革命”的假面具，欺骗那些好心的或者不大了解情况的人。斯大林由于相距遥远、脱离实际，多是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派人了解的情况中分析问题，所以一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估计过高。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在阶级分析上，采用公式化、定型化的方法，把人定死了，忘记了人是会变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

1927 年 4 月 22 日汉口《民国日报》。

1927 年 4 月 22 日汉口《民国日报》。

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1926年‘三二一’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迁就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造成了重大损失。1927年3月，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挥起屠刀，接连制造了暗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等等事件，引起了社会不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连续发了《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赣州各工会代表团请愿书》和《南北妥协》等报道，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苏联《真理报》却于3月15日发表了《蒋介石宣言》，副标题是《拥护党对军队的领导》，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打掩护。

《真理报》又发表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公开驳斥有关蒋介石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报道；吹捧“蒋介石是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党的领导的”。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真理报》的吹捧而转向革命。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3月26日，蒋介石到了上海，立刻与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勾结，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在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他强调说：“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且“断绝蒋介石的政治生命”。

但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在3月30日发表的《上海工人的胜利》一文中，却说：“现在说国民党分裂和上海无产阶级同革命军对立是绝对地不正确的”；“蒋介石本人已经宣布他们服从党的决定。像蒋介石这样的革命者不会像帝国主义所说的同反革命分子张作霖结成联盟去反对解放运动”。

蒋介石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隐藏或埋藏所有的武器，以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布哈林解释说：“隐藏起武器不更好吗？”右倾错误的指导，解除了革命的武装。这是第一。

第二，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过分地强调外因，没有剖析清楚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两面伎俩。直到1927年7月27日（早在7月15日，汪精卫已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斯大林还认为武汉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他写道：“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166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4、125、127页。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

这两条都是强调外因，强调工人运动规模过大使资产阶级恐惧，强调帝国主义在上海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作用，而忽略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毛泽东则不这样看。他认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他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他写道：“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1927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研究国共两党的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它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他写道：“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群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蒋介石在1927年前后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毛泽东的分析，从阶级基础、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高度上，揭示了蒋介石国民党变化的本质。因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做到了准确、有力，击中要害。而斯大林由于长期不能抓住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所以往往存在幻想，他的这些错误认识给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在实际斗争中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未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却把团结依靠的对象很快地从蒋介石转向了汪精卫及其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但斯大林不是要中共提高警惕，与武汉政府的反动倾向作斗争，反而批评中共对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他不加分析地把武汉政府称为“革命中心”，要通过武汉政府去实现土地革命。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电告国际：“国民党领导决定反对土地革命，不偕为此而同共产国际决裂”。斯大林复电说：需要“克制”，现在进行斗争，意味着真正的失败。而克制就能赢得时间，有增强力量的可能，为晚些时候进行斗争创造胜利的条件。斯大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支持汪精卫和武汉政府。5月24日，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的当天，武汉政府就发布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命令。斯大林的克制，没有使革命力量增强，倒使汪精卫勾结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宁汉合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惨败。

第三，在如何估计形势，如何对待蒋介石叛变的问题上，斯大林脱离了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316页。

实际。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来说,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 1917 年 7 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斯大林写道:“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下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那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毛泽东不是这种看法。他善于分析矛盾,处理矛盾,知道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但他认为变化要有条件,要有个过程,不可主观急躁,揠苗助长。毛泽东写道:“1927 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已被蒋介石“打击”得“很小了”。要“壮大起来”,一要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二要“逐步地”来。他还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写道:“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年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27 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

斯大林那种不合实际的形势估计和理论分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1927 年 11 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

斯大林的影响是巨大的。4 月 27 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80 人,代表党员 57967 人。大会开了半个月,主要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前和大会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等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斗争。但是,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领导,压制正确的批评,致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重视,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斗争没有充分进行。在小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正确方针,但却为陈独秀所拒绝,根本没有交大会讨论。毛泽东还被陈独秀等人排除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这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由于党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面对蒋介石大屠杀的血雨腥风,眼看党的五大仍然不能改弦更张,力挽狂澜,预感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将要遭到失败的危险,毛泽东“心情苍凉,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32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3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06 页。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个人慢步到长江岸边。登上黄鹤楼，远眺华夏大地，俯视滚滚长江，吟诗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1 斯大林再次拜会毛泽东 当场同意改称同志勿称“先生”

斯大林对毛泽东歉然一笑，点头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都改称同志。”并率先垂范……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和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优点缺点，恰当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过限，机智地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自强而不自大，自尊而不自专，自爱而不自私，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沉着而不寡断，机警而不多疑是很不易的。

毛泽东在早期、中期，颇有自知之明，多次批评、拒绝别人企图把他看成“全才”、“天才”、“超人”、“神人”的尝试，反对为他“祝寿”、“颂功”，并不许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自己的名义外出活动。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莫斯科了，他也返回莫斯科。次日，周恩来从辛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

这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开展工作。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的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宇不凡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这是十年后周恩来的再次赴苏。上一次是在1939年6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从延安到苏联来治病，在莫斯科住了八个多月。现在，他是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的。同车到达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等。周恩来一到就来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事。过了一天，周恩来从较远处的别墅搬来，住在毛泽东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样，便于及时与毛泽东商量问题。

周恩来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一到莫斯科，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到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指导李富春率领的那一批人进行工作，还要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这时候，斯大林又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谈的意见。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

生性多疑的斯大林，这时更加谨慎小心。他派人把师哲叫到他的办公室，要师哲同志把他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打算和愿望。

毛泽东笑着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

师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哈哈大笑。是的，他对这位中国领袖的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赞赏；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会谈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周恩来祝酒，向大家祝酒。

之后，斯大林又破例地举起酒杯，再一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中苏友谊而努力，为中苏友谊而于杯！

斯大林喝了两杯他的特制酒，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他说他和毛泽东先生过去没有见过面，这次一见如故，谈得很好。又说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不仅值得庆贺，而且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学习。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多谈谈。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侃侃而谈。他认为斯大林说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说他过去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形象的概括，是指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曾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苏联的模式，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了绝境。所以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赞赏。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提到毛泽东时，又一次在毛泽东的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

师哲忍不住了。翻译完斯大林的话之后，他紧接着提了个问题。他的态度虽很谦和，很诚恳，但却开门见山：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泰然自若地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笑着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的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斯大林一下子怔住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而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这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当场提出来的，沉着老练的斯大林，一时也显得有点窘迫。

在场的人都有点紧张：几十年了，谁敢向斯大林这样“将军”呀！

苏联领导人都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泰然自若，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

聪明、机敏的斯大林，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师哲，立刻笑了。这次会见后的多次交谈，使双方都增进了了解，自己怎么能继续无端地怀疑同志呢？！只见他眼睛一亮，很快扫去一刹那间那紧张的窘态，对毛泽东歉然一笑，认真地点点头说：“对，是同志，是同志！”

接着，斯大林转过身来，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马上改称同志。”

说着，斯大林又转过身来，率先垂范，对毛泽东笑着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继续谈吧……”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了，更融洽了。

会谈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不仅证明了斯大林的“怀疑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斯大林还是讲理的”，而且也证明了斯大林确实怀疑过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害怕工人”，是不是真正的“同志”。同时说明斯大林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毛泽东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

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毛泽东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的确，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人为此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毛泽东和斯大林围绕这个问题也曾进行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

斯大林热情地帮助中国革命，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远隔万里，关山重重，对于复杂多变的中国情况不可能深入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充分掌握，因而，他的主意、办法和意见，不仅往往脱离实际，而且由于他的固执和粗暴，曾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就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二个阶段，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导致了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一系列政策、策略上的“左”倾。

发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斯大林把蒋介石和汪精卫看错了。他把蒋介石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蒋介石、汪精卫陆续叛变革命以后，他就不能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不能正确地指明革命应该依靠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因而，接连发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错误。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时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代表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另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印度人罗易。鲍罗廷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

他与陈独秀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从而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罗易则反对这种意见，主张共产党应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5月4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等高级官员专程莅会听讲。罗易说：“共产党正式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

这番话，就等于告诉汪精卫等一伙人说：“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接管你们的政府。”狡猾的汪精卫听了罗易的话，装得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不久，他就公开叛变了。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系统地谈了他对当时事变的认识。斯诺写道：“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大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点名批评斯大林，但他知道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不切合中国实际，知道鲍罗廷和罗易都是按斯大林的理论、意图来办事的，也知道斯大林领导着第三国际。因而他说：“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无权不接受。”实际上，说明了斯大林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21—122页。

《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43页。

《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43页。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人，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由工农大众作主人的道理。他幽默而形象地说：关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上，有人主张由湘南工农武装，编军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表示反对。他明确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他进一步阐述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

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上山”的主张。”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到处是白色恐怖，反动派到处残杀革命者。到1927年6月底，湖南的共产党员、工会农协干部及国民党左派被杀害者达500人以上。毛泽东曾在6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湘潭、衡山等地的农村奔走，了解工农武装情况，恢复党、团、工会、农协等革命组织，并领导湖南省委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明确地提出了“推翻唐生智统治”的目标。这样，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各地通过“上山”和隐藏，保存了大量的工农武装，约有2000多支枪，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受到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重视。早在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耐。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星夜直奔长沙。他先后到长沙清泰乡进行土地问题调查，安排杨开慧母子坚持地下斗争。18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对秋收起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会者发言踊跃，各行己见，争论也很激烈。毛泽东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既反对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意见，也反对没收全部土地，特别是把土地收为国有的要求，提出并且论证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的主张。这个主张，集中了省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比他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更全面、更具体，比他前两天在清泰乡调查、草拟的土地纲领更周详、更可行。

会议讨论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活。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议最后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很快地深入到株洲、安源、萍乡、浏阳等地，组织工农力量，准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备举行暴动。

一天，毛泽东一行三人，走到创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突然，树林里一声大喊：“不许动！”

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两边的山林里，跳出了七八个团防兵，一支支黑乌乌的枪口，瞄准了他们三个人。毛泽东感到像当头挨了一棒，眼前发黑，几乎跌倒。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同志、战友被枪杀了。自己肩负着党的委托，工农的期望，奔赴乡村。组织秋收起义，如今起义未起，自己却倒在敌人枪口之下，今后革命怎么办呢？！

一个手提短枪的队长大声命令：“抓起来！”

团防军一拥而上，把毛泽东他们逮捕起来。毛泽东向那位队长说好话，说他们是过路的客商，希望放了他们。

民团队长很凶，眼睛一瞪，命令把他们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这不是威胁，毛泽东知道。在湖南，已经有好几百人被这样押去处死了。

路上，毛泽东悄悄地从一个同志手中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员把他们释放。他知道民团的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当兵吃粮为了生活，给他些钱，会放人的。

走了一段路，拉开了距离，队长落在了后边。毛泽东趁机把钱送给了身边的两个士兵，低声劝他们放自己逃走。并说，“我遭到枪决，于你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还是放我走吧！”

两个士兵都同意放走毛泽东。

可是走在后边的民团队长一见毛泽东和两个士兵咕咕哝哝，心生猜疑，追了上来，命令士兵严加看管，决不允许一个人逃跑。

刚升腾起的希望，刹那间又破灭了。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抵达铜鼓后，毛泽东住在准备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驻地——铜鼓县城萧家祠。他不顾疲劳，没有歇息，就召开了三团干部会，并且在会上讲了秋收起义的意义、领导机构和行动计划，接着，他又和团部的几位负责人研究决定了进军的具体路线。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铁路工人破坏了长岳和长株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要道。第一团、第二团和第四团分别自修水、安源起义，向预定的目标进军。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于11日从铜鼓出发，先后攻取白沙、浏阳东门市等地，14日转战到上坪。当晚，毛泽东在上坪主持召开三团干部会议，忽接一团通讯员报告：第一团和第四团行军到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

起义伊始，连续受挫。毛泽东根据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的攻

取长沙的计划，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速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同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省城暴动。

9月19日，毛泽东率三团转战到浏阳县文家市，与一团、二团的余部胜利会师。当晚，毛泽东主持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研究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师长余洒度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坚持要攻取长沙。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对湘赣边界大山上的控制更弱。我们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有利于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向萍乡方向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的主张。

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斗志昂扬，沿着湘赣两省的边界南下。望着那猎猎红旗舞东风，毛泽东壮志满怀，心潮激动，赋诗一首：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接着又进行了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对部队进行了民主改革。后来又实行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只红薯”和“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10月27日，部队进驻井冈山中心——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十分艰苦的斗争中创建的。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根据地食盐、布匹、药品等十分缺乏，红军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红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经常吃的是粗米饭和没有油盐的南瓜汤，有时甚至靠野菜充饥。冬天缺少棉衣棉被，只好盖着稻草睡觉。毛泽东带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靠上山采药，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熬硝制盐，力、起了硝盐场；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土布，开办红色圩场，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使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和扩大。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8000多人，在宁冈耒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月4日，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人数约一万多。又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边界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创建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

大创举，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从韶山到井冈山，毛泽东上下求索，经历了无数风险，终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同时总结了其它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尤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古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达到边界的全盛时期。

6月的一天，红军第三次攻下水新后，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永新西乡塘边村，住在一位贫农老婆婆的家里。当时，这家的另一间屋子里，还住着永新县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县委副书记贺子珍。她正带领工作队在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呢。这位1909年中秋节出生的小女孩，经过十八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出脱得美丽动人。她，苗条的身材，白嫩的皮肤，瓜子型的脸盘上，眉清目秀。特别是那一对大大的眼睛，乌黑而明亮，扑闪扑闪的，像是会说话一样，加上那爽朗的性格，她被人称作“永新一枝花”。她从小爱读书，特别是爱看武侠小说，钦佩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早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参加了学生革命运动，并加入了青年团，由于她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在大革命高潮中转为共产党员。北伐军到永新后，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担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贺子珍被调到吉安任妇女部长。永新县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成立办事处，联络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破县城，救出了监狱里的贺敏学等人。在暴动前后的战斗中，贺子珍机智勇敢，带领赤卫队击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支枪，成为农民自卫军中有名的巾帼英雄。现在，她带领工作队在这一带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也就近向毛泽东请教一些政策、策略问题。毛泽东那言简意赅的谈吐，深入浅出的分析，广博精深的学问，使贺子珍暗暗钦佩。

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堂屋里研究调查材料，突然，村外枪声大作，战马嘶鸣，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了。有人大声狂叫：“活捉毛泽东，蒋总司令有重赏！”“冲啊！捉活的，有重赏！”

当时，塘边村的情势十分危急！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庄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留在村子里的一些老弱群众，武器很少，难抗强敌。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贺子珍心急如焚，前后乱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相反，毛泽东却非常冷静，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吸一口烟，望着从自己口里吐出来的烟圈，渐渐扩大，散开。就像根本没听见那枪声、喊声、杂声。贺子珍提枪在手，大声地问：“怎么办？”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别急！敌人来得突然，我们缺乏准备，不能冒险硬拼！现在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毛泽东带领组织起来的群众，很快撤离了。

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又不知底细，在村子里抢掠了一阵子走了。对于久经沙场的毛泽东来说，这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这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那生死关头，她亲眼看见了毛泽东那临危不惧举重若轻的伟大气魄，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魅力！年轻姑娘的心热了，热得滚烫；脸红了，红得发烧，胸口怦怦直跳，同志的感情之树，悄悄地开出了爱情之花。此后她往往身不由己地去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有时见到毛泽东又禁不住脸红起来。

有一次贺子珍去帮毛泽东收拾房间、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着姑娘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脚尖上，羞怯地抚摸着自已的衣扣。

毛泽东也爱上了这位聪明活泼、勇敢机智的姑娘，也意识到了姑娘的心意，忙招呼她坐下，给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他说，我同家人已经好久不通讯了，远隔千山，杳无音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抓去了，有的说她被杀害了，真假难辨。那天，他俩谈了很久，很投机，志同道合，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共同的斗争，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不久，两人就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贺子珍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为人豪爽，个性很强，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调来当秘书不大习惯，但她尽量搜集各种报纸、资料，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看报、看材料很仔细、在有价值的地方，画有圈圈、点点、杠杠，有的还有眉批、旁批。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阅。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案写作到深夜，到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着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或提供情况。

井冈山生活艰苦，吃蔬菜少。贺子珍见毛泽东累得身体消瘦，颧骨突出，就和警卫员、通讯员们商量，自己动手，采野果，摸田鸡，抓鱼虾，改善毛泽东的生活。

这年秋天，虽然敌人调遣重兵，反复围攻井冈山根据地。但毛泽东、朱德带领革命军民，森严壁垒，众志成城，连连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胜利。眼望那山下的旌旗，耳听那山头的鼓角，毛泽东诗情洋溢，挥笔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词：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就这样，毛泽东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然而，斯大林不了解他，也不承认他，而是继续按照苏联模式，按照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的路子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接连出现了下面三章所叙述的复杂而曲折的斗争。

12 “三阶段论”处处碰壁 “红色政权”蓬勃发展

斯大林写道：“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是个意志坚强，性格倔犟，坚持真理的革命英雄。同志们给他起的名字“斯大林——钢铁的人，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性格。他赞美坚强、勇敢、进取、奋斗，赞美革命，英雄、奉献，十分憎恨软弱、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他常用这些灰色的词句来解释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并毫不留情地奚落他们。1929年4月，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风趣地说：“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同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的确，凭着那勇敢坚走、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1924年8月，斯大林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后来，他带领俄共（布）和革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他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英雄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崭新的社会。他的呼吁在革命人民中，特别是在党员中激起了一种热情，激起了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人们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斯大林解释了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迫切需要。1931年2月，他在全苏社会主义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它所以挨打，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斯大林的演说具有强烈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得到了亿万人民的热烈响应，就这样，在斯大林的发动下，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了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为十年后打败德国法西

斯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时，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却发生了不少失误。“三阶段论”便是其中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脱离实际，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就要实现苏维埃，这就导致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的发生。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通过共产国际，特别是通过罗米那兹等国际代表很快地传达到中共党内。罗米那兹（1898—1935）苏联人，1917年3月参加俄共（布），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在共青团、俄共（布）少共国际，共产国际工作。他支持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展开斗争，深得斯大林信任。1926年4月，他作为少共国际代表晋升到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5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会后奉命来华，参加了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后来，他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

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呢？周恩来写道：“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下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和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一样，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出联合阵线之外，甚至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开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发展起来了。

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曾名阿双，号雄魄，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向导》的编辑或主编。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起草了党纲草案。10月起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参加草拟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中共第四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以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及党内的右倾错误，积极支持党领导的群众运动。1927年8月7日，在革命危急关头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但是，“八七”会议后，党内的“左”倾错误继续高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来进行的。11

月9日至10日，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月制订了《中央工作计划》，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当工具”，说“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说当时的“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过左的计划和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了湖南、湖北和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英勇地占领了广州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反对把起义部队撤退到农村去，结果也招致失败。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又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打击了一些干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在他们主持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却指责中共湖南省委对这次起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他们不但给中共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而且解除了毛泽东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同时，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并给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广州起义前后，一直表现出“左”的情绪。起义前，1927年9月底，苏联《真理报》宣传说，在中国，“苏维埃”已经从一个宣传口号变为一个行动口号了。起义中，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全世界发布的《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说：“在广州，在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有世界意义的行动”。起义后，正在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广州起义。决议写道：“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春，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现在，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旗帜下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全民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够而且必定不断得到发展。”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思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处处碰壁；他想通过广州起义的胜利来说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还是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也应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左”倾错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写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大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地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汇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汇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

的干部。”_蒋介石背叛革命并实行大屠杀，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不久又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7年8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公开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了责难。“加米涅夫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维克主义的错误，并回答说，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尽管斯大林引经据典，驳斥责难，继续坚持他的“三阶段论”，并且断言：“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雄辩改变不了失败的事实。

1927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以罗米那兹为一方，以布哈林、米夫为一方，展开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接连的挫折和失败，使斯大林对他们的争论保持慎重态度。当罗米那兹、瞿秋白的“武装暴动”造成危害时，斯大林才明确表态：同意布哈林的主张。两个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代表向忠发、车震瀛出席了会议。斯大林征求了向忠发、李震流的意见，总结了前一段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由联共和中共代表团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会议通过了由联共（布）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共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这个《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了社会主义的革向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同时指出：“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这个决议案是斯大林认真分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结论，成了中共六大的基本依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928年4月30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44号，表示接受这个决议案，承认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错误。至此，瞿秋白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基本结束了，但是，这个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对农村革向根据地和红军游击战争的意义认识不足、批评正在兴起的农村游击战争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并断言其“必致失败”。这对于正在坚持土地革命、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毛泽东，必然造成一定的压力。

师哲回忆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告诉他，六大前后他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而斯大林领衔起草的，作为共产国际决议案下达的文件却批评那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甚至说是“游击主义”，闹得思想混乱，工作很不好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开的，因为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没有去，但他十分关心六大的决议，注意斯大林的态度。

《六大以前》第931页。

《六大以前》第931—935页。

为了系统地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发展中国革命，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了这次大会。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等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布哈林在《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报告中，关于中共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周恩来指出：“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在讲到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时，布哈林指出：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只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

中共六大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正确地肯定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三、确定了党的各项政策，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四、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他实际上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后又叛变革命。但总的来看，六大的路线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斯大林对中共六大十分重视。早在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就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并和中国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一起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中共六大制定路线、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六大前夕，斯大林又约见中共几个负责人谈话，更具体地解决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这两个重大问题。当时，中共成立才八年，革命经验不足，理论根底下深，干部比较年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到莫斯科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他们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谈话，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又要求见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忙，但觉得中国革命事关重大，便在6月17日以前，会见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在中共六大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本来，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问题，曾经发表过意见，这在本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联的托洛茨基等人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散布了一套错误的理论。否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认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企图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

《六大以前》第932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8—169页。

主义的错误，又进一步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走向取消主义的泥沼。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必须重新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革命路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革向实践的需要。斯大林花了十四个小时。耐心地听取了中国同志的介绍，然后，循循善诱、分析情况、阐述观点，主要谈了当时争论较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个是革命的形势问题。

当时，许多人对什么是革命的性质？革命性质由什么来决定等问题搞不清楚，认为革命性质是由革命动力决定的，而不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斯大林指出：动力不能决定任务，不能把动力和任务混同起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以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作比较，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才听懂了。

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是当时大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今后革命策略的重要问题。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人提出还是高潮，并论证说，中国各地都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还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用红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处画了几点浪花，并解释说：即使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也给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很大的启发。

毛泽东顶着压力，深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使“红色政权”蓬勃发展。

周恩来写道：“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没认识，仍然搬用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把“争取群众的任务”。当成“就是武装起义的任务”，把“实行武装起义”看成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曾告诉师哲说，听了六大决议的传达，他当时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六大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定准了，优的是大会对于党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对于需要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一关键问题认识不足，看不到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艰苦的红军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在农村长期地积聚革命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大，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听了六大精神传达之后，他就开始了尽力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正确地解决六大未曾解决或未曾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的的工作。

首先是大力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

见《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8卷第6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7—308页。

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连续粉碎了湘赣军阀的三次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5月4日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人数约1万。12月，湘鄂赣边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合，声威大振。江西和湖南的军阀，互相勾结，集中重兵，在井冈山周围修筑了许多据点，进行封锁和围攻。毛泽东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决定由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进军赣南，在大柏地利用地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溃了尾追之敌两个团，俘敌8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接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很快打开了赣南地区的局面。随后又挥师入闽，开辟新的地区。这年元旦，毛泽东还带领红军，高举红旗，跋山涉水、奋勇前进。富有革命激情的毛泽东，看见那革命红旗迎风招展，红军战士意气风发，当即写了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进入福建省后，在长汀附近消灭了土著军阀郭凤鸣旅，占领长汀，威震闽西，大大地鼓舞了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的斗争情绪，然后又回师入赣，直奔广昌。路上，风雪迷漫，红旗漫卷，虽强敌尾追，军情急迫，但战士们斗志昂扬，歌声朗朗。毛泽东触景生情，又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后来，红四军三次入闽，先后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旅、卢新铭旅，占领了长汀、上杭、武平、尤岩和永定等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台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8月，红一军团又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组成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后来，又与方志敏领导创建的红十军及赣东北合并，组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大力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大力阐发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强敌残酷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则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把苏俄的城市武装暴动绝对化，也怀疑农村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当时全党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的：“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圆满的答复，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创造性地、全面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28年到1930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阐明了当革命力量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击败以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依靠党的正确领导，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逐步发展和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有五个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反革命营垒里充满着矛盾，因而使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发生、坚持和波浪式地扩大。“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还指出：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有回旋余地，便于农村根据地的存在。

第二，大革命影响的存在。毛泽东指出：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的许多地方，曾经有工会、农会组织的地方，革命群众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所以红色政权可能发生并长期存在。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了，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新旧矛盾的扩大和加深；另一方面，革命的基础仍然是深厚的，是能向前发展的，这样，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斗争，就像干柴一样布满了全国，它将不可避免地会燃成熊熊的烈火。因此，红色政权能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长期存在和发展。

第四，有支持红色政权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毛泽东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领导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泽东结合实际，深刻分析，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很显然，毛泽东批评坚持斯大林路线的同志犯了革命急性病。大革命刚刚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就要求“在最近时期（下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要求把“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是不是太性急了？是不是脱离实际？值得研究。

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当中国革命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击败，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时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承认革命在城市的暂时失败，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组织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然后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然而革命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胜利的道路。欲速则不达。

这条道路如何走？红色政权怎样发展？

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从武装斗争来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正如毛泽东说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的武装，土地革命便不能有效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放弃了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土地革命遭到了反革命武装的镇压。同样，没有武装，或武装不够，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存在。革命根据地是要用武装来开辟、创造和巩固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十分重要，要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必须依靠武装，放手发展红军战争。

第二，从土地革命来说：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红军士兵没有来源，红军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武装斗争就会失败，革命根据地也会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巩固。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进行武装斗争，要建立农村根据地，要“有很好的群众”，就不能离开土地革命。

第三，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来看：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靠，“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就不能巩固，不能坚持，武装也会没有根底，就会变成流寇式的武装，没有后方，缺乏给养，不容易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不要根据地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

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必须紧密结合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

思想，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采取一块块地打碎和一块块地建立的办法，用枪杆子和农民运动结合创造了一个个区域性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然后又把分散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包围城市。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训练干部，建立政权，为全国革命的胜利积累经验，创造了夺取和领导全国政权的条件。毛泽东的这种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革命的理论，先进的思想要掌握群众，变成广大群众革命的运动，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宣传、发动、组织、教育等工作。当时，在党的干部和红军队伍里反映出大量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建设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为大会写了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总结了工农红军建军两年多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对于后来整个党和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他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它们产生的来源，指出其危害，提出了纠正之法，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同时，他又强调必须进行党的组织建设，“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增强党的观念，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党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

毛泽东认为：人民军队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必须为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毛泽东写的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偏向。他规定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后来改为生产）的三项任务。毛泽东写道：“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制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和建军路线，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即使处于农村环境，在工人成份不多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性，从而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建军学说。

正确的思想一旦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展很快。从 1928 年到 1930 年，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地区，已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甘肃以及四川、江苏等省的 300 多个县份，先后创建了大小不等的 15 个革命根据地，总人数约达 10 万。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赣东北）等区，遍及江西全省和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等省之一部分地区，威震华夏，形成了一支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坐卧不安的革命力量。

13 斯大林笑谈蒋介石毛泽东怒斥陈伯达

斯大林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得意忘形，喧宾夺主。毛泽东严厉斥责。

存在决定意识。

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领袖人物也是如此。

毛泽东和斯大林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往往存在差异。斯大林总想用“苏联模式”、“切身经验”来套中国革命。他不明白：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彼得格勒、巴库等中心城市，通过工人罢工、武装起义等革命取得胜利的，而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干？他更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毛泽东为什么非坚持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可？！这难道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些问题、怀疑、忧虑，不便直言。因此，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拐弯抹角地提了许多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两个人正谈到兴头上，斯大林突然问：“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在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时，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夺取上海呢？”

被问了几次后，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系统地向斯大林说明：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党有各党的实际。在中国，有人照搬过苏联的模式，大搞“城市中心”论，“大干”工人暴动，结果，因为脱离中国实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只有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理顺了思路，准备从和蒋介石的斗争谈起，阐明这个道理，以便进一步和斯大林统一认识。

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也参加会谈。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边听边记，态度谦恭。可是，当毛泽东谈到蒋介石时，斯大林忽然眼睛一亮，朝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一直坐在一旁静听的陈伯达，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受宠若惊，非常高兴，马上活跃起来。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因而，未等师哲把斯大林的话译成汉语，他先高兴得大笑起来，并向斯大林连连点头。

真是喧宾夺主！

斯大林立刻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他笑着说：“你的书里头所讲的宋美龄和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很有趣！”

其实，那不是陈伯达自己的创作，而是他引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一段回忆：“我……代父亲出席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他们的别墅离我们的住所约一二里远。当我走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丘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她谈话；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风趣地、热心地谈着……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力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的记忆力特别强。由于他对小罗斯福的这段故事感兴趣，读过很久之后，在和毛泽东会谈中，居然能对大家重述一遍。

然而，这么一来，作为政治秘书的陈伯达，一时间竟成了谈论的中心——把主席毛泽东撂在了一边。

毛泽东不悦地瞪了陈伯达一眼。

斯大林谈兴正浓，眉飞色舞，越说越高兴，居然拿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陈伯达面前，举杯祝酒：“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受宠若惊，得意忘形，高兴得连他平日说话的那种结巴劲儿也没有了，急忙举起酒杯，向斯大林点点头，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陈伯达为人乖巧，善于伪装，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装得十分谦恭、老实、不争名利，连他给毛泽东起草的文稿，也是用后销毁，从不保存，并且遇人问及，都说那些思想、文章，全是毛泽东的，以此邀宠。然而今天，在斯大林面前，他受宠若惊，忘乎所以，根本把坐在身边的毛泽东忘了，自己和斯大林谈史论哲，举杯对饮起来。

面对会谈中的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心急如焚，怒火中烧，但在斯大林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坐在一边，不动声色，看着自己的秘书陈伯达在这关系重大的最高级会谈中大出风头，喧宾夺主。

深夜，会谈结束了。毛泽东设想的会谈计划，由于陈伯达的干扰、耽误，没有全部完成。毛泽东对此感到惋惜和愤怒。

大出风头的陈伯达，回到卧室，仍然兴高采烈，取来了酒，自斟自饮，回味着和斯大林祝酒时的幸福。然而，随着敲门声，进来个人，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通知：“下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

陈伯达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当时头昏眼花，跌倒在了床上。

过了几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叫陈伯达，却不见人。

机要秘书叶子龙报告毛泽东，说：“他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搬到大使馆去了。”“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毛泽东余怒未息，问了两句，又克制住感情，平静地说：“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毛泽东说罢，停了停，又叮咛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无可奈何，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毛泽东仍不买账，继续追问：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

面对毛泽东那愠怒的表情，耳听毛泽东那严厉的批评，陈伯达知道事态严重，再不回头，后果不堪设想，慌忙低头认错，当场向毛泽东赔不是，作检查，表示永不再犯。

参阅叶永烈：《陈伯达其人》，载《南方周末》1991年4月5日第2版。

参阅叶永烈：《陈伯达其人》，载《南方周末》1991年4月5日第2版。

毛泽东有个特点：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无论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他就要设法“给出路”，给机会。现在，他见陈伯达认真地作了检查，就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谁知过了不久，又发生了《红罂粟》风波。

据苏方翻译费德林写的《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介绍，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苏联的文化主管部门热情地为中国友人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演出，其中的首场演出，就是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傲——舞剧《红罂粟》。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该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的。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演出。

尽管大家都希望毛泽东能来观看演出，但他没能到大剧院来。前来观看演出的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坐在贵宾席上。演出开始前，陈伯达对演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演出中，不断向费德林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随着剧情的进展，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漠，最后，竟然不欢而散。费德林对此作了具体的叙述，他写道：演出中间，陈伯达突然发问：“请问，这个怪物是干什么的？”他所问的剧中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了解释，但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提出想离开大剧院。

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菜。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局面。富丽堂皇的家具——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乐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令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的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舞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

作为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和费德林的叙述大体相同。陈伯达说，他去看芭蕾舞剧《红罂粟》，是经毛泽东同意后才去的。他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足尖，以为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觉不快。看起来，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一些船员领导，而发展，而胜利。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

过的。因此，在剧场中，他一直纳闷，没有鼓掌。剧场指挥者在剧终后询问意见，他坦率地说，以一个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来看，他觉得剧情不真实。

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

陈伯达说，实际上，那回要他去看这个剧，不过是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是请毛泽东去看戏之前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泽东去看《红罂粟》。

毛泽东听了陈伯达、师哲的汇报，知道了剧情，同意他们的态度，就没去看戏。

“《红罂粟》事件”，当时曾在莫斯科掀起了一阵风波，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猜测。但毛泽东不管这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严格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蒋介石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个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人物。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可能不多次谈到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国的大独裁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的国民政府，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主席等职，控制党政军大权，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造成内战连绵，外敌入侵，政治黑暗，经济萎缩，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在一系列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相抗衡，才能够打败蒋介石，制止蒋介石卖国害民的罪恶勾当，才能够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必然要向人民进攻，镇压和屠杀人民。我们必须唤起人民，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

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经验。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没有这个调查研究，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看见蒋介石手里拿的刀，要杀人民。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这就有办法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1127页。

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蒋介石再来屠杀人民，人民就拿起刀枪和他斗，结果，气势汹汹的蒋介石，连续纠集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大围剿”，都被人民打败了。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实事求是，令人深思。

的确，只要人民拿起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就无可奈何。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搞白色恐怖，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毛泽东武装起工农，带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带领红四军，南征北战，不断发展。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8月，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组成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创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有毛泽东正确路线和典型示范的指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到这时红色武装起义的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以及四川、江苏等省的300多个县份，创建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13个军的正式红军，人数已接近10万。

蒋介石国民党对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的发展十分恐慌。1930年12月，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他们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分成八个纵队，由南向北，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把红军歼灭在东固地区。

当时，红军不到两万人，强敌压境，形势十分危急。许多人惊慌失措，不知该则何应敌，有些人甚至消极悲观，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临危不惧，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张把敌人的主力诱至地形和群众基础对我们有利的地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它。这一方针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

1930年11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反第一次“围剿”大会。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主席台的两边，阐述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对联写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红军指战员们看了，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神出鬼没，处处主动，先在龙冈伏击张辉瓒部，歼敌9千余，活捉了张辉瓒；接着又星夜追击，消灭谭道源师大半，其余敌人闻风溃逃。

就这样，毛泽东用不到两万人的兵力，前后不过15天，就打败了蒋介石

苦心经营大半年，集中 10 万精兵的大“围剿”，歼敌一个半师，缴枪 13000 余支，活捉了敌人的前敌总指挥，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当时写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次反“围剿”的情景。词曰：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蒋介石气急败坏，卷土重来，1931 年 4 月，纠集 20 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指挥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 700 里战线的敌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

当时，红军不足 3 万人，武器装备都很差。但是，毛泽东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选择不善于山地作战，不熟悉地形的王金钰部为首战对象，出其不意，连续分歼敌人。在半个月内，红军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横扫 700 里，歼敌 3 万余人，缴枪两万多支，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在节节胜利的喜悦中，毛泽东诗兴大发，又写了一首反映当时作战情况的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他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和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的大搏斗中，蒋介石虽然兵多将广，装备精良，然而一败再败，屡战屡输。他像个输红了眼的大赌徒，纠集了 30 万兵力，于 1931 年 7 月，亲自担任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等国的军事顾问，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

面对比自己强大十倍的敌人，毛泽东毫不胆怯，率领远在闽西的红军主力，日夜兼程，回师赣南，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从8月至9月，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盘营和方石岭等地歼敌43000多人，缴枪两万多支，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战争是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继续。蒋介石国民党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围剿”，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共产党及革命人民的大搏斗，也是蒋介石率领的反动军队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大搏斗。在这三次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尽管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还是打胜了，而且是再一、再二、再三地打胜了。毛泽东以弱胜强，连破顽敌，名震华夏。

但是，正当毛泽东大败蒋介石、扩大红军、发展革命势力的时候，王明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此前后，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使革命损失惨重，令毛泽东雄才难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把这叫做“解剖麻雀”。

毛泽东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把这叫做“解剖麻雀”。

他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只要认真地解剖一个或几个，就能知道底细，摸清规律，提出切合实际的办法；否则，“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难免不犯错误。

为了正确地领导土地革命，1930年5月，毛泽东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又在寻邬召集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社会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社会调查。

然而，就在这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李立三指责毛泽东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援引斯大林“土地国有化”的理论，主张搞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毛泽东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月中旬，毛泽东在南阳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既批判了“社会主义共同生产”，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左”倾错误主张，也批判了拖延土地分配的右倾错误观点，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分配土地的原则。7月，毛泽东领导红一军团到赣南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9月发布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明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正确原则。10月，毛泽东在峡江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行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再次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超越民主革命阶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农场，指责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的错误，指出了土地革命对于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1930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历年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但给地主以生活出路。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切实可行的。但是，它却遭到了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蛮横指责和干扰。严重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不仅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居高临下；而且，它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来头很大：因而，一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说明这场斗争，首先必须把李立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介绍一下。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同年冬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次年回国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1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6月率领人数最多的广东省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还参加了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出席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有关决议。大会前后，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曾三次见到斯大林，详谈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14个小时。

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的意义。大会所选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有21人，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实际上起不了总书记的作用；选举瞿秋白、张国焘为政治局委员，但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回国参加工作。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后来又兼任党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较低，过去曾是李立三领导下的一个地方工会的负责人，对李立三十分钦佩，认为他有能力，有魄力，在工人中有巨大威信。于是逐渐扶植李立三在党中央起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把一百多万军队集中于河南信阳、商丘一带火并、死伤兵员达三四十万。军阀混战，红色区域周围反革命力量空虚，给红军和红色区域造成了发展的有利时机。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并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死搬硬套，强令执行，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低估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把革命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城市工人的斗争，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罢工的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认为只要勇敢地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长时期内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竟然错误地认为：“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

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政府“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并因此规定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

根据这些错误的认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其具体部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七军、红八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以红四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的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一军、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十军进攻九江。同时，计划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香港、旅大等中心城市，首先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在组织上，他们将党组织、青年团、工会等机构都合并起来，组成为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使各个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左”倾盲动计划，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这个计划的主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主要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特别是“第三时期”理论和苏联中心论，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以及一再强调反右倾、保卫苏联等等，对立三错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形成立三“左”倾错误的重要因素和直接来源。

李立三等制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计划，强令全党执行。以毛泽东、何孟雄为代表的一批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反复劝阻，李立三主持的中央便以反右倾斗争强制推行。逆我者右，反右倾成为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

蒋介石叛变后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一时低落，确是事实。然而斯大林却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

“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不承认低落，不允许退却，不考虑迂回曲折的前进，在共产国际六大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强烈气氛下，事实上否定了中共六大对于“左”倾盲动的批判，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

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毛泽东对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主持的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实际上也包括斯大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持久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思想理论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而当时盛行的把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著作、决议，指示神圣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深入地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地工作的“本本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了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教育干部和党员，提倡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防止一切“左”的和有的错误的发生，为了使古田会议决议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

这篇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批判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调查研究对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绝对必要性。毛泽东写道：“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

本本主义者不了解革命的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有所改变，需要随时作实际调查，分析研究，“解剖麻雀”，不懂得“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针对当时盛行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的这篇著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是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有力武器。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多次批判了李立三的“社会主义共同生产”和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左”倾错误主张，也批判了拖延土地分配的右的错误。尽管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指责这是“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毛泽东仍锲而不舍，不犹豫、不动摇，继续坚持正确路线，带领红军开创新的局面。

第三，在实际行动上。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一方面军不仅纠正了军队中的“左”倾错误，而且利用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领导机关时，毛泽东领

导的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休整，扩编为红一军团，辖四军、三军、十二军 3 个军。7 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到赣南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这时，立三中央强令红一军团去攻打力难攻克的中心城市南昌。7 月 11 日，毛泽东在兴国召开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万人誓师大会，号召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发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7 月 24 日，胜利地占领了樟树。樟树镇离南昌只有百十公里，南昌的敌人闻风警戒。毛泽东不盲目决战，在樟树召集各军负责干部开会，分析形势，作出了西渡赣江的决定。他们决定不去攻打形势对我不利的大城市南昌，渡江后只以一部分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并于 8 月 1 日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而以主要兵力向西推进。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从报纸上知道红三军团于 7 月 27 日打进长沙，震动中外，敌军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大举反攻，红三军团激战 9 天退了出来。当时，敌何健部正尾追红三军团。为了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西进路上，8 月 20 日，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了文家市的敌一个旅，为红三军团解了围。当天，毛泽东率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红三军团即赶来集中。红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红三军团又围长沙，久攻不克。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回到江西宜春。不久，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来到宜春，企图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再打长沙。毛泽东分析形势，陈述利弊，用几天时间进行说服工作，使原来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周以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转过来帮助毛泽东说服红三军团转而攻打吉安。随后，毛泽东率领红军一举攻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这时，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 21 个县城、250 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坚持正确路线，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发展了革命的力量。

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如党中央正式部署的南京兵暴和武汉暴动，不仅迅速失败，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1930 年 6 月到 10 月，南京市委机关两度被搜查，市委书记和市委委员 6 人被捕，3 个区委的干部遭受损失，全市被杀害的党员近百名，被捕者 100 多人，15 个支部全被破坏。当时武汉仅有党员 200 多人，赤色工会会员 150 多人，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的党员达 60 人，被杀害者 37 人，被判刑者 12 人，自首者 8 人，党组织被破坏了，损失十分惨重。

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受到了中共党内毛泽东、恽代英、何孟雄、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许多同志的抵制和批评。1930 年 8 月 8 日，李立三主持写的、由向忠发签发的《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给斯大林的信》，再次呈报暴动计划，请斯大林批准。12 日和 13 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说李立三执行“冒险方针”，说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只有 200 人，赤色工会会员只有 150 人，却硬叫搞暴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接到报告后，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

后来，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我 1930 年 3 月动身去共产国际。7 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 6 个决议。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6 月 11 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9 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

14 “钦差大臣”篡权妄为革命领袖屡遭诬陷

斯大林过分地信任王明，使毛泽东屡遭诬陷，雄才难展。斯大林过分地信任、支持王明，怀疑毛泽东，使中国革命损失惨重。

王明，这个长期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是斯大林信任的由苏联直接培养的留苏学生。而且长期驻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他长期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革命，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和斯大林在中国的“钦差大臣”。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王明的活动，常常使毛泽东处境艰难，进退维谷，这对决心“剿共”的蒋介石却帮助极大。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4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爱写诗文，在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斗争中积极、活跃，被推选担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925年9月加入共青团，10月，由许凌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苏联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进步青年入校学习。许凌青给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写信，保送王明到中山大学去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很激烈。由于在中山大学“校长人选”和“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王明站在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巴威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一边，很快得到了米夫的赏识。米夫在俄共党内的斗争中，站在斯大林一边，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重用，很快由一个研究员提拔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维经斯基、鲍罗廷、马林，罗易、罗米那兹等人都先后因中国问题受到批评或废黜，所以米夫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的中国部部长。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明，见米夫青云直上，不仅对米夫唯命是从，而且阿谀奉承，和米夫搞起了宗派活动。1927年2月至7月，由米夫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中国考察，王明担任米夫的翻译，极力讨好米夫。

1928年米夫接替拉狄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同年3月，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了这次大会。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等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米夫有意安排王明当翻译，不久，又提王明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1929年4月，王明奉命回国，先后在党的机关报《红旗》报工作，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在讨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等人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向忠发、李立三指责他们是反党路线和宗派活动，决定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3人严重警告处分。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11月间，共产国际又派米夫为代表到达上海。11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不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而且通过决议，撤销了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人的处分。王明等人在米夫

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加紧宗派活动，煽动党员“根本改造党的领导”，迫使中央接受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

在米夫等人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米夫等人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实现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等人上台的目标。会议选举时，许多同志反对选举王明。1931年1月13日，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把反对王明当选的一部分同志召到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开会，进行动员。他极力美化王明，说王明是中共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并威胁说，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米夫还当场宣布：谁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就要受到处分。就这样，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在米夫这个国际“保姆”的扶持下，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选举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工作由王明负责，实权掌在王明等人手里。

四中全会后，又改组了团中央领导机关。秦邦宪（博古）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又被提拔担任团中央书记。从此以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和团中央都占了统治地位。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被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代理总书记工作艰苦，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盘算再三，要求辞去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去到苏联，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米夫和王明打得火热，帮王明上下周旋，任命王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王明去到莫斯科，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书记。王明路线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说：“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在四中全会刚完以后，为保证实现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起见，采取了几个组织办法（改组政治局，因为罗章龙及其两个信徒发表反党小册子和进行分裂活动而将他们开除党籍），国际主席团完全批准这些办法，认为这些办法是必要的”。

王明到苏联后，很快地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与决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形成了斯大林、王明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决议和指示，秦邦宪（博古）在国内照令办事的局面。

斯大林要各国党“忠实地捍卫苏联”。王明把斯大林的话当圣经佛咒，死搬硬套，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什么选中王明并把他扶上高位呢？因为王明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而又完全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不考虑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对斯大林和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在联共党内的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斯大林、米夫一边，成为斯大林、米夫的忠实信徒。1929年夏，共产国际将王明等人陆续派回中国，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他们在党的《红旗》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 30 多篇文章，把斯大林和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言论奉若神明，大加称颂、宣扬和发挥，逐步形成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完备、更带“理论”色彩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不仅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和总纲领，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左”倾观点的翻版。

例如，“保卫苏联”，是 1927 年 8 月 1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同志们！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末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1928 年 7 月 13 日，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论述共产国际的问题时，分析世界的各种矛盾中，有三种基本矛盾：一个是在资本家阵营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第二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因此，斯大林提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教条主义者王明，把斯大林的语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圣经，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管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死搬硬套，强制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全党达四年之久，危害极大。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46—47 页。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47—48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72—175 页。

第一，“武装保卫苏联”、打击爱国的中间势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及时地向人民提出“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民主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兴起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却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严重步骤，而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是要把中国“变为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国际指示传达到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坚决执行。他们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党的“中心任务”，大声疾呼要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他们置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于不顾，却隔靴搔痒，组织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1932年8月1日—8月7日）。

这些宣传和作法把中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与“保卫苏联”的斗争对立起来，看不到日本侵略中国、妄图灭亡中国的特定条件，看不到中国人民革命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引起了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当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已于八月间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也将陈调元所属的反动军队打得片甲不留；全国人民的抗日声势浩大，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中间派都活动起来，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上海《大公报》、《申报》公开要求“改弦更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2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广东派孙科等上台，声言要和共产党红军妥协。1932年1月底，南京政府因上海发生抗战而迁都洛阳，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粤军）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有的中立动摇，并且有人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的问题。这些情况说明：“九·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开始降为次要地位。但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强调中日民族矛盾，没有采取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人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提议，反而把中间派别的抗日民主要求看作是欺骗，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对当时正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部和在上海抗日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都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拒绝“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仍旧强调国内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革命的任务是争取在湘鄂赣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要红军进攻这几个省的中心城市，不承认有全国性的抗日形势。这样就不自觉地把组织全国性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放过去了。1月间，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汪精卫改组派复辟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受到镇压和破坏。6月，蒋介石又组织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又暂时低落下去。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率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王明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们仍

不信任。身居莫斯科的王明谈到蔡廷锴时说，“只有在我可以向他的脸上吐唾沫时，我才跟他握手。”他们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纲领上、政策上、口号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样反革命的，说“它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被敌人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也中断了。

第二，集中火力反右倾，排斥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当时，“左”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是，王明一伙却强调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他们把反右倾、反调和作为一很大棒，到处打人，以实现其所谓“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只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他们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们根本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强调全国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高潮日益增长”，“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他们提出了一条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王明一伙在“左”倾是主要危险的时候，用“反右倾”、“反调和”的大棒打人整人，排除异己的作法，也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于：当苏联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1925年，斯大林高瞻远瞩，及时地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性的任务，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强调“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复杂的情况和经验，采取了与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史无前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33年1月斯大林向联共中央报告说，苏联已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1100万增加到2200万人，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至1933年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而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却降到1929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德国工业降到66%，法国工业降到77%。由于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有2400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痛苦。当时，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伟大的成绩和多方的颂扬，使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他越来越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而且作风粗暴，往往把反对他的意见的人打成“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反革命”，开除出领导机关，对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直至处死。布哈林、李可夫等人都是由于和斯大林意见不同而遭“无情打击”的。1932年1月18日夜，斯大林的妻子娜佳因对他的粗暴行为不满，也用一支左轮手枪自杀了。

斯大林的思想、言论，往往以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现。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第11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主要是讨论了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某些国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的前提不断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全会把“联共（布）党彻底打垮右派分子”、“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粉碎了右派集团和调和派集团”，誉为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以来“最重要的成绩”。全会继续强调反右。

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要求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无理指责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开始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其实，王明早在他的“左”倾纲领《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中，就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他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说“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分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对于在革命斗争中创建起来的红军，王明认为差不多“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党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发展的”，而不是“真正的红军”。对于土地问题，它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

1931年4月中旬，王明掌权的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他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决定对于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土地，只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耕种。这是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在中央苏区贯彻的开始。会议虽然传达了王明“左”倾主义，但由于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王明那一套未能全面贯彻。

王明掌权的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于8月30日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严厉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根据这个信的精神，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抹煞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不顾敌强我弱、红军作战战线不能固定的实际情况，指责红军是“游击主义”。把毛泽东在长期反“围剿”斗争中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说成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的产物，提出“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会议还错误地提出把红军中出身于地主、富农、商人家庭的人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肃清，提出了“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这样，既打击了那些有实战经验、有指挥才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军骨干，又在唯成分论的思想指导下，提拔了一些没文化、水平低、力不胜任的工人到领导岗位。会议还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

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议强调，“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上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这次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使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贯彻。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再次攻击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是右倾“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会后，调毛泽东去做政府工作，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来，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

1933年1月，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往苏区。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推行“左”倾政策，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把罗明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张，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3月，他们又批判了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打击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人”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三，肃反扩大化，伤了党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中共党内开展的肃反运动同苏联的肃反一脉相承。苏联的肃反工作从20年代末就开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30年代初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和“民族主义倾向派”内，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苏联掀起了一个大规模地“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王明、康生一伙，照搬苏联肃反经验，在中共党内大搞“左”的肃反运动，并利用肃反排斥异己，陷害无辜，让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领导，以“叛徒”、“特务”、“托派”、“AB团”、“改组派”之名，大搞逼供信，诬陷和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和重要干部，结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伤了党和红军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红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25000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有力地帮助了蒋介石。

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说：“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此时，毛泽东虽然被排斥出中央红军的领导，但周恩来、朱德等仍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在黄陂、东陂等地，歼敌三个师，俘敌师

长李明、陈时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方法，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博古、李德拒绝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的方法，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这时，福建事变爆发，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不得不抽出兵力去镇压十九路军。

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突破敌人堡垒线，到外线进入江浙地区，将防御转入进攻敌人的后方重地，迫使蒋介石军队回援江浙，红军既可粉碎“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不这样做。正如毛泽东说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打垮十九路军后，又调回部队加紧围攻红军。毛泽东认为应把红军主力调出，向湖南中部挺进，跳到外线，调虎离山，把江西敌人调到湖南消灭之。博古、李德不用此计，采取全线防御，和敌人拼消耗的战法。毛泽东说：“此计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大转移，进行长征，但是政治上没动员，行动上无计划，突围时又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带着大量辎重，行动迟缓，使大量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无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尽管红军英勇顽强，接连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但损失十分惨重。出发时红军8万多人，到遵义时只剩下3万多人了。

当时，红军在军事上的主要指挥官是李德。博古（秦邦宪）虽是党的总书记，但他不太懂军事，在军事上主要听李德的。正如周恩来说的：“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这是清楚的，毋庸赘述。但是，李德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怎么篡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师哲再三叮咛：要作者在这里多写几笔，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

师哲说：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1932年到中国，1939年随周恩来来到莫斯科的经过我都了解。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就和我住在一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我都了解。作者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上有关李德的注释给师哲看，并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中国革命史简明词典》上有关李德的条目给师哲看。师哲看了两遍，认真地说：“这两本书上的注释和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据我了解，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互有勾结。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很残酷，见到可疑的人就杀，但因德国和日本是协约国，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注释203条。

派李德到东北去。可是，李德在东北呆不住，到上海去玩。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回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同学们就把李德介绍给博古。博古当时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听李德说他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便请为顾问，大加吹捧，逐渐地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并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师哲说：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和我一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幢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教育，才加入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来华的真实情况，作者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的《王明评传》，查阅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决定派李德到中国作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李德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

看到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红军将士不断伤亡，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日夜操劳，想要力挽狂澜，使革命少受损失。然而王明当权，李德横行，条条妙计均被拒绝，他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心急火燎，病累交加，几天卧床不起。他勉力支持，跟队长征，然而身体虚弱，步行艰难。组织上决定要他坐着担架赶路。那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有弹性，又轻便，两个人抬着，走起路来上下晃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党的有些高级领导人体弱有病，无法行路，就坐在担架上长征。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就是在长征中，在担架上，在篝火旁，交换意见，讨论政治问题，研究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和王稼祥等的探讨，对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初期，他体弱多病，步行困难，坐着担架，和毛泽东一起赶路，形影不离。晚上宿营，他和毛泽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共同分析江西所发生的事情，讨论长征途中的大事，研究如何才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

通过交谈，王稼祥感到毛泽东不仅了解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感到毛泽东出的一些主意是非常好的，可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纳呢？他几次找李德交换意见。也坦率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做法。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且引用马列主义词句，夸夸其谈，反而对毛泽东还提出很多意见。

怎么办？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危机，目睹红军指战员在转移前后的惨重牺牲，耳听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想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个强烈的信念在王稼祥的心里逐渐成熟：下决心撤换李德等

人的军事领导职务。

王稼祥把自己的看法、设想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沉思地说：“形势是很严峻！可你这么设想，能行吗？”

“行！能行！”王稼祥爽朗地回答。这位平常多思少言、有谋善断的人，一旦拿出了主意，便显得干脆、利索。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哇！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

王稼祥知道毛泽东被王明、李德等人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处境很难，看见许多决策错误，却没有发言权。于是，王稼祥找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研究措施。

红军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还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研究解决了红军的组成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从此以后，毛泽东成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由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必须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成熟。尽管王明攻击说：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这样看。1935年8月20日，陈云和陈潭秋、杨之华等7人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等情况。共产国际称赞中国党灵活地正确地领导了国内战争，成长出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这样一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的领袖。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更加支持毛泽东了。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扶持王明上台误党祸国的国际“保姆”米夫到哪儿去了呢？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黎明与晚霞》一书中说，1937年秋在莫斯科，王明曾对王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得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王明得意忘形，开始挖苦嘲笑他的上司，岂不知历史的审判官正在注视着他的表演。

15 中苏谈判同盟条约毛泽东忆逼蒋抗日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去管它……”

1950年春签订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点，是毛泽东说的“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的枝节体现，也是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关注的大事。

斯大林起先没有想到要签订一个条约，经过和毛泽东的几次会谈，他不但同意签订条约，而且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签字”。毛泽东不肯自己出面，坚持要周恩来赴苏谈判，苏方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后，很快就同苏方举行了实质性会谈。第一次会谈中苏条约那天，克里姆林宫内气氛融洽，双方领导人平等友好地商谈了条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会谈中，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应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给东方，给亚洲，特别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东方的安全。所以，条约的内容，应是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抽着烟，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刚讲完，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具体地谈了友好同盟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大连，贸易及贸易协定，借款，民航合作等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种办法，同意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大连是中国内政，“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中方缺乏管理经验，事先又无改变中苏共同经营的意思，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中方略多一点，即51：49和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然主张资本各占一半，即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谈到这里，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这是因为，二战后，美苏均注视中国，斯大林对美国人进入中国东北特别敏感。在1945年，斯大林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谈判时，就曾提出过不许一个美国人进入东北，并将此作为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条件。现在，在中苏商谈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又将此事提了出来。但是，中共从未“亲美”过，也从未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所以问题显得唐突，毛泽东有点反感，场面顿时冷落。

足智多谋的周恩来当即反问道：“第三国公民的涵义是什么？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被问得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忙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点火抽烟，以掩饰短暂的尴尬，可是，一根火柴连划了三次也没有划着……

坐在一边的毛泽东笑了，他取出火柴，划燃了火，递给斯大林，才幽默

地说：“斯大林同志，新中国和旧中国根本不同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北，早被我们打跑了！那些靠侵略中国吃饭的所谓‘公民’，不用说，早溜走了，不存在什么居留问题。”

斯大林接过毛泽东递来的火，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解除了一时的尴尬，笑着说：“我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希望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现在，中国的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好了。”接着，双方谈起聘请苏联专家问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开展各项建设，需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给予苏联专家高待遇，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

当然，斯大林的这些主张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沿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援助的惯例，不仅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正如列宁在批评斯大林时说的，那些“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

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使俄罗斯人看到他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但是，适得其反，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苏联人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人还要强烈。斯大林的这种错误倾向，还表现在《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所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4年第一次访华时，就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公司。

在会谈中，还谈到了苏联在我国新疆边境贮存的大量武器移交中国的问题，在东北设苏联领事馆，在海参崴、赤塔、伯力等地设中国领事馆问题，及苏联侨民问题，十月革命后，许多白俄逃到中国东北，在那里办了许多企业，这时苏联决定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并统归秋林公司。会谈中，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原则性的讨论，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方工作人员同苏联方面具体研究拟订各项协定。关于新疆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调赛福鼎随后去莫斯科，就是为了签订这些协定。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毛泽东则在关键的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使会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性。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列强的干涉，使得袁世凯签了字的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又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撤去了民族的界限，勾结帝国主义，说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因而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把东北军从抗日前线调到西北“剿共”，派兵镇压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斯大林特别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毛泽东观点明确，毫不含糊，边叙边论，有理有据，语言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斯大林听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144页。

着，禁不住微笑点头，低声称赞。然而。当毛泽东讲到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卖国求荣，残酷镇压人民抗日运动的时候，斯大林的脸色一沉，似乎不悦。

毛泽东可不是那种看别人脸色说话的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镇静自若，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谈得更生动、更具体、更服人了。

斯大林听着，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装上烟丝，点着火，抽了几口。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又被毛泽东的谈吐吸引住了，征服了，忽然，他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更亲切了。

这次会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问题很快地达成了协议。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米高扬谈判。会后，一位苏方人士感慨他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在这次谈判中态度的微妙变化感到迷惘，不知为什么谈到蒋介石卖国求荣时，斯大林显得不悦？后来，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才了解了其中的奥秘。赫鲁晓夫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蒋介石有过一些接触。尽管他和中国共产党有冲突，但他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因此，斯大林——因而也是苏联政府——认为蒋是进步力量。日本是我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蒋符合苏联利益。”

在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战后，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共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是，在对待蒋介石的看法上并不一致，如上所述，斯大林和苏共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蒋介石一直是抗日的，是“进步力量”。而毛泽东和中共则认为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困地的。”

事实是怎样的呢？

历史是公正的评判员。

毛泽东说的那“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是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一场空前未有过的十分特殊的战争。

那天晚上，一队驻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把烈性炸药埋在了沈阳郊区柳条沟附近的铁路下边，引信爆破，把一段铁路炸毁。然后，他们又贼喊捉贼，诬蔑那是中国人于的，是中国人破坏“中日亲善”，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忍无可忍，想要抵抗。蒋介石却命令张学良，东北军要“避免冲突”，“绝对不抵抗”。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侵占了辽宁省会沈阳。

少帅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恶气难咽，摩拳擦掌……

蒋介石为了“避免冲突”，怕惹恼日本侵略军，严令张学良带领数十万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很快分兵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到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军又向热河进逼。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这个国耻事变的中方导演就是蒋介石。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曾对东北军下令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训诫士兵们“不

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辽宁、吉林两省失陷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就这样，总共不过三个月，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国联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呢？把持国联的英、美、法等国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唆使日本去进攻苏联，并企图牺牲苏联来摆脱它们面临的危机。因此，他们不但默许日本侵占东北，而且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英国在国联会议上人为，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美国是九·一八事变的帮凶。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和日本驻美大使进行秘密谈判，在“希望日本不要推进得大远”的条件下，同意日本的侵略行动。当日本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军事侵略时，美国国务院声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11月14日，美国驻国联特派代表竟公开宣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可奈何的。”并且主张日本侵略军长期占领东北，说“国联对日本自东北撤兵作了期限的规定，这是十分不明智的事”。

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给予中国人民以正义的支持和帮助。九·一八事变伊始，苏联政府就指出，日本占据东北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举动，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反对这种无耻的掠夺中国的行为，同时，又揭穿了国际联盟出卖中国的阴谋，郑重表示：“苏联劳动人民对于中国的斗争极为重视，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同情。”“苏联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弱国的暴行。”

当时，由于苏联远东红军在边境上的防卫，牵制了日本在东北北部和中东铁路沿线相当大的兵力，使日军不能南侵中国更多的领土。同时，苏联人民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也给予了帮助，义勇军的伤病员和失败后退入苏联境内的兵员、苏联人民都给予热情的医治和收容。

斯大林不了解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毛泽东说：“蒋介石抗日，就像陕北的毛驴上山——不逼不行。”

斯大林不了解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把蒋介石看成了唯一的能够统率中国人民抵制日本侵略的政治领袖；看成了能够联合抗日抵御日本人侵苏联的首领，形象地说，斯大林把蒋介石当成了能够抗日救国的东方巨龙，结果，使他在政治、军事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当然蒋介石也是可变的，后来，确实也表示愿意抗日救国。但是这个变化，正如毛泽东说的，蒋介石的抗战像陕北的毛驴上山，是有条件的：前边要有人牵，后边要有人推，不走时还得在屁股上打两下，“逼蒋抗日”，就是这方面的口号。

提出这个口号并促其实现的正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逼蒋抗日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反蒋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义愤填膺，当即组织人

苏联《真理报》1931年9月25日社论。

苏联《真理报》1931年9月28日社论。

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他明确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所干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卖国求荣，勾结洋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因此必须反蒋抗日。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布了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宪法大纲》宣布：“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这一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时发表了对外宣言，声明工农民主政府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侵略，而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

毛泽东主持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谈判和密约。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中共领导的广大人民支持下，打死打伤日军一万多，使日军四度换司令，无法取胜。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不许十九路军抵抗，不给十九路军援助，后来，竟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使淞沪抗战失败。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毛泽东怒火中烧，心急如焚。1932年4月26日，签发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日宣战通电，严正指出：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伎，接连地将东北及淞沪各地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对于全国人民的反日革向运动，则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于强迫自动对日作战的中国士兵撤退，以表示其对帝国主义的忠诚。通电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它不能指挥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特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这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日本的正式宣战！尽管当时的红军只有30万，苏区大约只有900万人，占中国军队和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新生的力量是迅速发展的，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的英明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远见卓识和伟大力量！

宣战之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随即发出了《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总政治部、各红色区域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应对全体红色战士进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同时指示各红色区域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立即对广大群众进行对日宣战的扩大宣传和动员，积极地扩大红军力量，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又向热河进犯。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

政府自动放弃热河，到3月4日，日本侵略军100多人不费一枪一弹，仅用七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日军又继续发动了向长城各口的攻击，企图一举拿下华北。这时，驻守长城线的士兵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自动奋起抵抗。

蒋介石仍然采取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下令禁止超过敌人兵力十倍的驻防长城各口和平津一带的军队起来抵抗，公开宣称：“要以专心一志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机取巧。”3月6日，蒋介石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并布置其嫡系部队监视和牵制长城各口的抗战部队，派其党羽解散关外义勇军，大量屠杀北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使长城各口作战部队孤立无援，终于在4月间失败，5月12日，日军占领通州，包围北平。天津，华北告急。5月31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丧权辱国，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承认冀东为日本侵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华北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

《塘沽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6月1日发布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宣言》反对《塘沽协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的猖狂进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出卖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工农红军”“障碍抗日战争”、“中国没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的无耻谎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再度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不分政治信仰，不分职业、性别，联合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并提出了有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5月间，经由宋庆龄、何香凝等3000多人共同签名发表，名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又在华北制造事端，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这就是蒋介石主持的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盲目地听信王明这个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谗言，过分地相信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性”，特别是听任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经验，打击、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到1935年初，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二、北上抗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万般危急中保存下来，向新的目标长征。会后，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行动口号：“北上抗日”。当时，毛泽东认为，为了北上抗日，红军必须集中力量打好几个关键性的战役；没有获胜的把握时，应避免与敌人发生冲突；战略撤退并没有错，它使红军能自己选择机会进行反击；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待叛徒应采取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秘密处罚，应当让每位战士都知道下一个行动的目的和危险。

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抗日”，其中也有“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的因素。但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道路已经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他的军事、

政治的韬略，以及对党和军队的组织方法，都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抵制。他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遵义休整后，毛泽东穿上了一身大小合体、干净利落的灰军装，显得整洁潇洒，精神抖擞。他有一匹马，但他不常骑，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上去。有两次他染了病，浑身无力，甚至连马也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个战士抬着行军。

当时，贺子珍是中央批准的30名随队长征的女同志之一。她虽已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但为了照顾毛泽东，她总是默默地去她所能做的一切工作。队伍一宿营，她就抽空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没有桌子，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在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空袭。为了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头部、背部14处受伤。长征路上无法动手术，医生只能把比较表面的弹片夹出，洗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可是，伤口仍然不断流血，连里没法，准备把贺子珍留在一家老乡家里养伤，并将消息和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

那时正是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身系全军安危，一刻也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也无分身法去看望贺子珍。他马上回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自己的医生傅连璋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来，帮助抬贺子珍。

第三天，毛泽东安排好工作，抽暇飞马来到了休养连探望贺子珍。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见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绷带，脸色苍白。毛泽东心里难受，拉着贺子珍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了，还要让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冶好的。我们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养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

当时，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他不知疲倦，有时骑在马上赶路他还触景生情，吟诗赋词。1935年2月，红军在娄山关战役中，取得了对该省军阀省长王家烈的重大胜利。当地雄伟的风光，新获得的权力和肩头的重任，使毛泽东写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1931 至 1935 年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策马上山，翻山越岭，触景生情，陆续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
刺破青山锷未残。
天欲堕，

敕以柱其间。毛泽东带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向大西北转移。

1935 年 8 月 1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全力围剿红军。危难中，毛泽东对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年事高的老同志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了。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预作考虑。”

红军闯过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镇宿营。有位干部买东西，见那包裹的纸是一张六月调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走投无路的红军干部看到这条消息，欣喜若狂，立刻把那张旧报纸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十分高兴。他过去只知道刘志丹、谢子长在西北闹革命，但是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他估计阎锡山为了对付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不想离开山西，去当架空的行政院长，可能有意把刘

志丹率领的红军力量夸大了。但是，陕北有革命根据地，有红军却是事实。去到陕北，疲惫不堪的长征红军，就可以有个歇脚的地方了。

红军过了哈达铺，继续前进。谢觉哉就是否离队去做白区工作的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笑着，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了谢觉哉，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你是否离队去做地下工作，等到了陕北再说吧！”

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召集红一军团、红三军回和中央军委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获得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毛泽东喜出望外。看青身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而又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他接连写了两首诗词，那是在1935年的10月。一首词是《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另一首词，是《念奴娇·昆仑》。既描写了莽莽昆仑的“横空出世”、“飞起玉龙三百万”的壮丽、雄伟，又抒发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思想和博大胸怀。堪称词苑奇葩。

当时陕北刘志丹的红军，情况如何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谢子长、刘志丹等坚持武装斗争，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耀县起义”，组织、发展红军游击队。成立了红26军、红27军，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把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王明的“左”倾路线传到陕北，诬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为“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并把他们和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准备活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后，了解了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撤销执行错误路线的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的西北办事处；并派王首道等三人去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毛泽东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接着，率领中央红军南下，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在直罗镇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高兴他说：“中央红军与红十

五军团真不错！”“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郿县东村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拉着刘志丹的手，一起坐在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毛泽东说，看起来，你受了不少折磨，不过，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也笑着说，前些年我已经坐了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周恩来看了看刘志丹脚脖子上因戴镣而磨破的伤痕，沉重他说：“看看，还是吃了点亏！‘左’字号的牢狱也厉害得很呐！”

毛泽东告诉刘志丹，他到陕北一看，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此地虽穷，穷则思变，要革命。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儿闹起来的。真的，这里的群众条件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可是个好地方哟！你们在这里，三几年就发展起来了，搞得很不错嘛！

毛泽东、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搞肃反的戴季英等人得了“疯狂病”。戴季英不服，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戴季英的职务，并作出了纠正错误“肃反”的决定。给受冤的同志平了反。

在此前后，斯大林在苏联正搞错误的“肃反”。他运用革命的政权，打击、迫害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把他们作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加以逮捕或枪杀。据赫鲁晓夫揭露：1934年2月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而被捕者达1108名。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和枪决者达98人，占70%。苏联党政军的著名活动家，如埃赫、布哈林、李可夫、卢祖塔克、杜哈切夫斯基等，也先后因“反革命”罪而死在错误的“肃反”之中。

坚持执行教条主义的王明，照搬苏联的经验，也在中国大抓“托洛茨基分子”。“AB团”、“反革命”，闹得革命队伍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相残杀，起到了武装的敌人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成功地解决了中央苏区“AB团”和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顶住了从斯大林那里刮来的歪风邪气，团结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保留了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找到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这时候，毛泽东对于抗日和反蒋的关系，还是认为二者并重，“势无偏废”。关于这种关系，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致杨虎城信》中，讲得很明确：“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好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

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同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并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上，张浩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强调“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的人民阵线”，强调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纠正了长期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会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充分说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工农革命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从理论上阐述了“人民共和国”从今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

此后，在中共的推动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也不得不改用“谈判”的方法“收编”红军，以期“溶共”。

三、逼蒋抗日。1936年7月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保安。根据形势，毛泽东明确调整策略口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建议重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各派代表谈判，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并且正式提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表示：为了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不阻拦红军抗日的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信中要求张学良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发出《致蒋介石书》，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但是，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呼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于10月下旬，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张、杨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听，乘飞机到太原。济南、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将260个团约30多万兵力调集到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一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率领重兵，威逼张、杨。

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的关键。毛泽东和斯大林虽都主张和平解决，但分歧有四……

12月4日，蒋介石又杀气腾腾地飞抵西安，向张杨摊牌：要东北军和十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8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六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不成功便成仁”；否则，便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

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拍案顿足，大发脾气，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善说”“哭谏”，均告失败。为了国家民族，张、杨决心“兵谏”，活捉蒋介石，逼迫他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队活捉了蒋介石和他调来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押在了西安，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十分震惊，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分裂政策，并可能危及到苏联的安全。

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中国民族领袖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可能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才可能实现抗日，才可能防止日本侵略者入侵苏联。因此，西安事变一爆发，苏联报刊就指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阴谋。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中国事变》中写道：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搞的，“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12月15日，《消息报》社论指出：这次事变“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是一个对于全中国都极为明显的危险”。

1936年12月13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心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其实，西安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在收到西安刘鼎发来的密电和张学良的来电后，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朱德、博古和张国焘出席。毛泽东首先对西安事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同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始的。但是，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和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

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这是日、德、意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争取第二种前途，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问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是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三是应张杨的请求，派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肯定张、杨之举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是蹶然揭出正义之旗的爱国行为；责斥亲日派对张杨的武力讨伐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愚举。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做了大量艰苦细微的工作，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条件为基础的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逐步实现。这六项协议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红（联合红军）及抗战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到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就这样，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主张释放蒋介石，但他俩的看法有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一、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实现全面抗战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则与此相反。这一点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时说得很清楚：“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革命的、进步的重大行动，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救国壮举，是“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而不能是非混淆，

赵振军、温瑞茂：《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3页。

《周恩来选集》下第第311页。

功过颠倒，不能说他们的行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他们时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错误政策。蒋介石回南京后，置“六项诺言”、“领袖人格”于不顾，扣留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1937年杨虎城在美、英、法考察时，曾派人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三、毛泽东认为：蒋介石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顽固坚持的“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只有在西安事变“兵谏”的威逼之下，经过尖锐的斗争才可能改变，才可能“获得深刻的教训”，才可能“结束”。他认为对蒋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只有逼蒋，才可能实现全面抗日。

四、斯大林的联蒋抗日主要是从苏联的东方安全考虑的。毛泽东的逼蒋抗日主要是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考虑的。两人的考虑都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不得不主要考虑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经过西安事变的“兵谏”威逼，蒋介石立下了联共抗日的六项诺言。但是，蒋介石说话是不算数的。正如杨虎城说的，“蒋介石出身流氓，阴险狠毒，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放蒋后必遭残酷的打击报复”。果然不出所料。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刚一飞离西安就背信弃义，飞抵洛阳后，胁迫张学良立即释放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被扣飞机。26日软禁了张学良，并公开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由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词》，欺世盗名，一派胡言。

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公诸于世，敦促其全部兑现。毛泽东指出：

“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日，亲日派何应钦下令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妄图挑起内战。周恩来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协商后，由杨虎城领衔于1月5日通电南京政府，严肃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冀豆相煎之争”，否则，若再打内战，“则虎城等欲求国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态度十分强硬。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揭露亲日派以“拥蒋”为名挑动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调动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与张杨部队结成联军，准备迎头痛击亲日派的进攻。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见硬的不行，才同意谈判和解。总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使他看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联共抗日的要求，结束了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镇压的错误政策。国内逐渐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斯大林那种过高的估计蒋介石的革命性，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姑息迁就，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做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

《杨虎城于学忠通电抗议扣押张学良挑动内战》1937年1月6日西安《解放日报》。

法，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体现。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迅速开展全民族抗战。《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力代表去到庐山，就抗战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对抗日问题仍然犹豫不决。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是毫不犹豫、变本加厉的。8月13日，“上海事变”爆发。15日，中共中央又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尽快灭亡中国的威胁下，由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政策的感召，由于全国人民抗日舆论的推动，8月22日，蒋介石才不得不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蒋介石关于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谈话。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完全形成。

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经过整整六年的艰苦斗争，才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面抗战。

16 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 毛泽东斯大林对策不同

斯大林的“联蒋抗日”和毛泽东的“逼蒋抗日”之比较。

1929年，爆发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它从美国开始，发展到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历时最长的一次危机。它一直持续到1933年，席卷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互相交织，彼此影响，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混乱。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倒退到1908—1909年的生产水平。许多银行宣告破产，企业成批倒闭，农业生产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商品市场变得更加狭小，国际贸易大幅度下降，从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空前恶化，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因而，产生了时髦的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观察力很强。每当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虽处青萍之末，他往往能看出风的趋向、风的性质，甚至预测出风云变幻的后果，提出相应的措施。

这一次，当世界法西斯势力正在形成的时候，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在经济方面，这几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从前在某些地方还有人争论有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争论了，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破坏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

“在政治方面，这几年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的年份。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东北，使远东的关系尖锐化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复仇思想占了上风，使欧洲的关系尖锐化了；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更加推动了军备的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法西斯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又一次证明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最重要的事实……”

“在这种经济震荡和军事政治灾祸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经济危机仍然闹得很凶，而在苏联，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继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正在疯狂地准备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苏联却继续进行反对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一贯而坚决的斗争……”

在报告中，斯大林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后，强调指出：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向华北推进使形势更加尖锐化。”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复仇的魔影使欧洲形势更加尖锐化……”

“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

“无怪乎法西斯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品。我指的不仅是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而首先是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

上述事实，使斯大林看到了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看到了苏联面临着德

日法西斯联合进攻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国际共运面临着被法西斯摧残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全人类被法西斯奴役的严重威胁：从而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任务。但是，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把法西斯在西班牙遭到的失败，看作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的“证明”；只说苏联“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而没有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从斯大林提出反法西斯斗争任务开始，到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抛弃了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的“左”倾政策，开始转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

斯大林报告之后，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传递了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信息。这封信批评了以前在反蒋斗争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对宋庆龄等三千人签名的抗日共同纲领也表示了兴趣。信中还谈到共产国际已把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大会的报告和另外三篇文章汇集成册，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世界65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中国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张浩）、周和森、眯代远、孔原等。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根本纠正了共产国际以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号召全世界进步人们为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形成的决议，清晰地勾画出共产国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轮廓：在欧洲，联合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集中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在中国，联合一切抗日的民族力量，建立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希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能遏制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解除法西斯对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并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康生、秦邦宪为候补委员。

在大会进行期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战略方针，经过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由吴玉章、林育英等参加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写成后，译成俄文，送交当时正坐在“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等人审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季米特洛夫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作过明确的表态。他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中国伟大民族的生存，已到了于钧一发的地步。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与中国领土上的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这种提议。

《八一宣言》在形成的过程中，曾得到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

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要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对于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都是赞成的。所以，1936年1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湛小岑谈判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相提并列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1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领导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创造了落脚点和出发点。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军委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反蒋。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林育英于11月下旬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决议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规定了党的若干政策，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却有着许多分歧，其中主要者有三：

一、毛泽东与中共的“抗日反蒋”和斯大林的“联蒋抗日”。本来，经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意的《八一宣言》中，就有“抗日反蒋”的表述；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共产国际七大后，王明在《救国时报》上也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说蒋介石是现代“中国的秦桧、张邦昌、曾国藩”，他“杀同胞以媚外，出卖

《王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词》载1939年12月30日《新中华报》。

《王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词》载1939年12月30日《新中华报》。

祖国而求荣”。”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民和红军的主要敌人。”

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数百万军队，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陈果夫去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苏联也表示友好。陈果夫回国后，就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正式公布。这时候，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因此，共产国际1936年7月召开的执委会议，主张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统率全国军队，结成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反日联盟。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关系的改善，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并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改“反蒋”为“联蒋”方针。

这时候，毛泽东还主张“反蒋抗日”，不仅在1935年11月28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反蒋抗日”，而且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又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并提，继续主张“反蒋抗日”。因为，《八一宣言》发表时，中共正率领红军在长征路上苦斗，蒋介石调集几百万军队前堵后追，企图歼灭这支人民的武装。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仍然集中数十万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了“围剿”。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怎么能“联蒋”呢？那时如果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蒋介石搞统一，就是向国民党缴械投降，就可能犯第一次大革命时右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反蒋抗日”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的“联蒋抗日”，则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安全考虑的，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无条件的“联蒋抗日”。从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到西安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口号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当时的形势有三个显著变化：一个是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表面化了。在“华北事变”后，英美为了自己在华北华南等地的利益，对日本采取了公开谴责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中说：“在这个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联着，相当多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

1936年6月5日《救国时报》。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5页。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5页。

情。”二，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尖锐化了。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和对华东、华南的经济掠夺，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矛盾迅速激化，加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三，以前一段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看，“反蒋抗日”不如“逼蒋抗日”更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势力。蒋介石是国民党首领，反蒋会使国民党内部很多想抗日的人为难，如张学良只同意抗日，不同意反蒋，他提出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放弃了“反蒋”口号，并于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宣布了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毛泽东和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以中共领导的广大人民为主，团结各种抗日救国力量逼着蒋介石集团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就是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无条件的“联蒋抗日”，则是把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当作联合的主体，只要他答应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就维护其统治，以阻止日本侵略苏联的野心。斯大林的希望主要是：“蒋介石应当使他的军队全力以赴地进行对日战争，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军队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阻止蒋介石打内战，使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反击侵略者。”“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从斯大林和崔可夫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共产党毛泽东，他主张以蒋介石为主体的“联蒋抗日”，而不主张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逼蒋抗日”。实际上，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不逼不斗不“兵谏”，“联蒋抗日”是很难办到的。

1936年6月间，两广军阀陈济堂、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抗日反蒋口号，组织“抗日救国军”，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峙。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此举抱赞赏支持的态度。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说：“两广事件的发动是进步的，革命的”，此举为“中国人民武装北上抗日讨逆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开始”。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7）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414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75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76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76页。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123页。

义”。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此却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并批评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含蓄地批评中共，说“中国共产党人很有勇气，但不能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事变打起抗日的旗号，仅仅是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假面具。”“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掩盖对华北的新进攻。”《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说：“不管发生事变的将军们的个人倾向如何，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他们的头脑，并且已经阻碍了中国的中部发展起来的抗日运动。”这些都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三、在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主张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但在如何处理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存在与发展问题上有分歧。1935年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中，都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并指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与抗日联军的关系是：“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个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党中央又强调指出：这个国防政府应该是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它政权力量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它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很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蒋介石国民党的“集中与统一”作为联合的基础，是十分高明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它反映了全国人民普遍要求联合抗日的愿望，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地避开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统治权、领导权的无理要求，反过来又给蒋介石一种压力。这的确是一种既坚定又灵活的反守为攻的高超策略。

但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团结各种力量抗日的政治领袖。共产国际则批评中共扩大苏区和红军的活动是“不现实地扩大苏维埃运动的计划”。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由于认识上的分歧，1937年8月，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也没有直接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仅仅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123页。

1936年6月10日《消息报》。

1936年6月10日《消息报》。

1936年6月24日《真理报》。

《六大以来》（上）第781页。

是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而斗争的时期》，接受了王明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建立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此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纸《救国时报》同时刊登王明的文章，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1936年8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要争取抗战胜利，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积极帮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抗战的领导权不应该归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应该归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因此，1937年8月21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政府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及设备的贷款，中国用输出农产品的方式偿还。1938年7月1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派来数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有米哈伊尔、切列潘夫、奇诺夫、伊里亚绍夫、特霍尔、石洛夫、卡里亚金、鲁斯基赫、康斯坦丁诺夫、别洛夫、布尔科夫等人。1940年12月，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带领十五名军事顾问到达重庆。同时，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一百五十架战斗机，一百架快速轰炸机，将近三百门火炮、五百辆汽车的援助。1938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提出了援华抗日的六项措施，特别强调，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崔可夫承认，在国民党的“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苏联顾问李德把苏联的这种援助说得更生动具体。他说：“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稿和著作”，“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他写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记述了他出发前，斯大林给他的叮咛。斯

转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3》第 303、304 页。

转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3》第 303、304 页。

大林说，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斯大林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斯大林强调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里的资本……”从这些言论和行动中，不难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了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主张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拖住日本的后腿，从而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1940年底，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他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就中国共产党事问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中国哪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毛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对驻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又过于信任，把他当成了自己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言听计从，使斯大林很快地陷入了偏听偏信、“偏听则暗”的境地。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康生、王稼祥、邓发、季米特洛夫。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在1968年5月写的《我的履历》中说：

“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王明、康生回国前，还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稼祥谈到了这次会见情况。王稼祥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转引自《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3》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第304页。

《革命史资料》第7集第29页。

《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29日回到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曾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然而，王明毫无自知之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结党的工作，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反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批评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过分地强调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批评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谁领导谁的问题十分不满，认为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共同领导”，从撇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当时缺乏实践，许多人还在等着看。中国的抗战才开始，人们缺乏实践经验。王明又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迷惑了許多人，自己若出面反驳，岂不是自己孤立自己，自讨没趣吗？王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袖，虽说“左”得出奇，败得很惨，使中国革命的势力几乎完蛋，可如今他在苏联镀了金，成了“钦差大臣”，带着“尚方宝剑”，这次又使出右的花招，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自己怎么去劝阻呢？！

想来想去，毛泽东走出杨家岭来到延河边。延河，此时的延河，早已冰封雪盖，白茫茫的一片。凛冽的西北风，顺川刮来，如刀似剑，穿透了毛泽东那单薄的破棉衣，直刺肌肤。毛泽东并不觉得冷，他踏着冰雪，信步过河，在延河滩里转了转，又不知不觉地上了坡，走到了北夫。

街道上，一群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大喊大叫。毛泽东也凑过去看，只见人群中间，一位赤露着膀子的中年汉子，把胸部拍得叭叭响，叫卖自己的“大力丸”。他说他的“大力丸”，能抵风，能防冻，健身强骨，包治百病。

《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师哲：《我们党的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第368页。

好几个人掏出钱来，准备买药。忽然，一位老大娘哭叫着扑了过来，双手拉住卖药人，要他给她的儿子抵命，说她的儿子吃了他的大力丸，不仅病没好，昨天晚上却死了，人命关天。卖药人听说死了人，不再吹牛皮、卖假药，慌忙收拾摊子逃跑。周围准备买药的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也恍然大悟，喃喃地说：

“是啊！要治牛皮大王，只有拿出事实！”

暗暗跟来的警卫员，以为毛泽东要拿什么东西，忙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不，这种东西，现在还很少，只好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看吧！”

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到斗争中去实践，让他带了些人去武汉。

王明有点像红楼梦中描写的“中山狼，得势便猖狂”。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不仅到处夸夸其谈，而且有意和毛泽东的主张、路线闹对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王明到了武汉后，急欲求成，擅自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含有大量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抹煞土地革命战争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性质，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由于国共两党分裂，造成十年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把中国共产党以争取民主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一种恶劣的倾向；鼓吹由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要求各方面的军队在一个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作战；提出为了保卫武汉，应集中军队及一切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进行庞大的运动战等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妨害了长江局等地的工作。

毛泽东耐心地批评教育，王明不服气，并秘密地在党内搞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中央委员支持他的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洛甫、王明、周恩来、康生、任弼时、凯丰等八人参加。会上，王明又跳了出来，借题发挥，继续鼓吹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王明认为在军事上，应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迅速增长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属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希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为了使蒋介石国民党指挥所有军队，王明还提出八路军及各种兵种力量应在“五统一”的基础上。“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这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蒋介石。

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他们重申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要忘记，但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保持独立自主。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主要是采取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创造新的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

《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116 页。

《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117 页。

队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晋察冀便是好的例子；要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

争论多时，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会议决定，王明、凯丰去武汉，一个月后王明回中央，凯丰留在长江局工作。

野心勃勃的王明，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不仅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的活动，而且会议之后，便公开地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盗用中央名义，把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黑货，冒充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传，其错误严重影响到抗日的方向。

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片领土。亲日派汪精卫等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援助不到、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特点及敌我力量的当前对比和发展趋势，集中全党智慧，精心写作，对持久抗战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写作是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精神高度集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一写就是六七个小时。有一次，他写得情绪激动，文如泉涌，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眼睛都熬红了。

警卫员把饭端来，请毛泽东吃。

“就来，就来！”毛泽东说罢。伏案写作，全神贯注，精神又深入到文章中去了……

警卫员等了一阵，见毛泽东正在挥毫如飞地写作，把吃饭的事早已丢到了脑后；又见饭菜早已冰凉，便悄悄地把饭菜端去灶房烧热，然后端进毛泽东的窑里，说：

“主席，饭菜热了，请快吃吧！”

“好，你放下！”毛泽东挥笔疾书，头也没回，继续写作。警卫员急了，大声说：“主席，快吃吧，不能让饭再凉了！”

毛泽东礼貌地答应说：“好，好，等这一句写完了，马上就吃！”

话是这么说，可他的好句子太多了。这句没写完，那句又涌出，急得那疾飞的毛笔，龙飞凤舞，停不住脚。毛泽东又随着那飞舞的笔墨，神采飞扬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将吃饭又忘记了……就这样，警卫员一连热了三次，毛泽东才吃了一餐饭。

延安的早春，气候尚冷。一到深夜，寒气袭人。警卫员见毛泽东写作时常冷得跺脚，给他生了一盆木炭火，放在脚下取暖。

脚不冷了，毛泽东更加聚精会神地写作。写着，写着，感到脚下烧乎乎的，他心想写完一段再看。谁料，一段未写完，脚烧疼起来，他低头一看，糟糕，棉鞋着了……

就这样，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写了十多天，《论持久战》完成了。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

《论持久战》写了一百二十个问题，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

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春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看作考察中日战争的唯一依据。“速胜论”者夸大了其它矛盾，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矛盾。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军事科学。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战术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曾两次致电长江局，要求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文献，但王明等人借词推拖，不予刊登。1938年夏，王明还写过一首《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的诗，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
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遁牌。

第三句下还注明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及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污蔑，而且透露出他的“亡国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无力持久的。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继续散布上述错误观点，承认他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要在延安开会。王明却要会议到武汉去开，并且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摆出共产国际执委的架势，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他所领导的长江局所在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

毛泽东看了电报，十分气愤，厉声责问：“党中央在延安，还是在武汉？”“我们党中央的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开？！”并且明确表示：“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行，又生一计，想通过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探听共产国际指示的内容，他给王稼祥发了一封电报，要他速去武汉与自己单独会谈。

王稼祥一眼就看穿了王明的诡计，立刻骑马到毛泽东的住处，把王明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动声色，边看电文，边问王稼祥的看法。王稼祥说：“我看王明这样搞是不对的。我当然不会去。我想回个电报，催他立即来延安！”

“对！”毛泽东点点头，“这样做很对！”

王稼祥在电报中，对王明措辞强硬：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

己负责。

王明又设法拉拢中央委员。大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毛泽东。于是，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1938年9月的一天，延安风和日暖，秋高气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走到讲台前，宣布“现在开会，先由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屏息静听。当王稼祥读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最后一段：“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王明听着，脸色灰白，满头虚汗。原来，他以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是非法的；他自己才是得到共产国际“加冕”的“合法领袖”。谁知，在这当口，共产国际翻脸不认人。他难受得低下了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决定撤消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

就这样，王明又一次失败了。王明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自称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工作的，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然，王明能否代表斯大林？不一定。但是，斯大林确实指导过王明、而且、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斯大林和王明的看法几乎一致。这也难怪。因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来指导；而在复杂多变的中国，要使革命的航船绕过暗礁险滩，取得一个个胜利，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这一点，只有毛泽东才有能力、有魄力去实现。

当时，王明不懂得也不承认这一点，还有许多怨言。师哲就此问毛泽东。毛泽东说王明这人夸夸其谈，背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解决问题，离中国实际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不碰壁呢？

一次，在庆贺吴玉章六十寿辰的小会上，办公厅安排由王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地问：

“这是谁安排的？不能让他到处胡吹！”

但是，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康生一伙要以“叛徒”、“特务”的罪名整王明，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胡整。

17 艾奇逊造谣言挑拨离间

毛泽东当面拒请斯大林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讲，大造谣言：“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斯大林毛泽东共议驳斥。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谈，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严重不安。特别是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中苏正在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更使一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他们知道，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蓬勃发展，日趋强大；如今又和五亿人口的新中国携手结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不仅使一向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不能随心所欲，推行强权政治，而且会使亚、非、拉美等各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迅速觉醒，群起抗争，这将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美国的亚洲政策》中，造了一连串谣言。他企图以谣言作武器，在中苏正在商谈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关键时刻，挑拨离间，破坏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

艾奇逊的讲演很长，谎言很多。为了骗人，他首先用谎言掩盖历史，用谎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民、中国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朋友”，然后，大造谣言，挑拨离间。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的挑拨离间，首先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和警惕。他派莫洛托夫等人于毛泽东商议对策。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到孔策沃别墅来看望毛泽东，谈起了新中国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说，我们这个国家，过去被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打扫一番，加以整顿。等屋里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作点清理工作，像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别的客人还得等等。我们知道，有些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想进来抓几把，甚至想把水搅浑，浑水摸鱼。我们就得警惕，不忙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他说，这样，帝国主义就不敢轻视中国，对新中国就不得不刮目相看。说罢，他取出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材料，交给毛泽东，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份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毛泽东看了看艾奇逊的演说稿，表示义愤，当场同意了莫洛托夫的建议。送走客人之后，他就考虑如何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撰写文章。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明扼要，犀利泼辣，有理有据，直劈要害，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和离间阴谋。为了在约定的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叫有关部门按时发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常以某一方面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评论员发表文章的形式对某一事件表示态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冒充为中国的保护人，关于苏联及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说了许多荒谬的言论，他显然忘记了还有完全驳倒他的事实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的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谣言，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谈话》，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声明》，再加上中国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的《声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漫画：《互打嘴巴》，犹如一排排炮弹，一把把利剑，飞向华盛顿，驳得艾奇逊原形毕露，谎言揭穿，狼狈不堪。世界各国的许多报纸、电台，都纷纷发表电讯、评论，斥责艾奇逊大白天说梦话，无端造谣。有的还转载、摘发了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说它“尖锐、泼辣”，“用事实驳斥谎言，入木三分”。

斯大林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毛泽东被激怒了……宴会，舞会，不欢而散。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件事。过了几天，斯大林邀集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特别说明：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

毛泽东不知什么事，届时应邀前往。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见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态度友好，但却没有往日那种热烈的气氛。

斯大林请客人入座之后，首先说：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当即回答：

《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第856页。

《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第856页。

“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接着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听着莫洛托夫那虽然态度谦和却语气越来越重的谈话、心中不快。他的表情，由微笑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到后来，几乎显得有些愠怒了。

斯大林又接着说：

“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说到这里，斯大林抬起头来，见毛泽东脸上露出愠怒的表情，正在气呼呼地抽烟，大口大口地抽烟，也怕惹恼了这位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笑了笑，用更亲切、更友好的态度说：

“毛泽东同志，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言不发。他的态度严肃而矜持。尽管斯大林在笑着，谈着，劝说，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但毛泽东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情面也不给，一个字也不吐。

周恩来作了一些解释，说中国这样做，是由于历史形成的。过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对于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我党都用过类似的方式进行评论、批驳，效果也是很好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毛泽东同志写的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也只用了“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为什么批驳艾奇逊的谣言，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呢？！

斯大林听着摇了摇头。

周恩来见解释无效，又见毛泽东态度依旧，毫不退让；他也表现得严肃认真，十分矜持。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6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6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6 页。

毛泽东坐在一边，不反驳，也不解释。抽完了一支烟，又取出一支来，划火点燃，吸着沉思。他知道，莫洛托夫的发言，肯定是斯大林授意的，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得讲出来，要中国党从此就范，当面认错，一切按斯大林的意思办事，“不再超越雷池一步”，这怎么能行呢？！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有权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斗争方式。我们采纳苏联的建议。答应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我们不是已经按时发表了吗？并且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发表了声明。至于是用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还是用别的什么名义，难道都得按你苏联的模式来办不能有任何变通吗？联系到1946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应该自主的；可是，斯大林和苏共乃至苏联政府，往往以“老子党”、“老大哥”自居，不虚心地听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意见，唯我独尊，唯我独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怎么能行呢？

毛泽东深知：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反共的，艾奇逊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们抓住了苏共、苏联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或夫误，大作文章，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对此，作为苏共、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应该一方面组织力量，批驳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分清敌我；一方面检查、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继续前进。可是，现在不但不是这样，在我们积极协同苏共批驳艾奇逊的无耻谰言之后，你们不但没有认真克服自己的老大小国自居、大国自居、甚至有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缺点、错误，反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就这样无理指责，无端责难，这是平等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吗？这是尊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主权吗？！毛泽东越想越深入，越想越生气。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因而，不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怎么说，他都硬着头皮顶着，毫不退让。

斯大林见谈话得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只好宣布谈话结束，并请毛泽东一行到他的别墅去赴宴。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不欢而散。

聪明过人的斯大林，察觉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惹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特地离开克里姆林宫，陪毛主席前往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

毛泽东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面色严峻，一言不发。

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专车上，让他们坐在平时只有斯大林才能落座的后排主位上，而斯大林和中方翻译师哲则坐在加座上。斯大林的屈尊俯就，殷勤招呼，试图使中国客人高兴。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车上，尽管大家身挨身、肩靠肩，离得很近，但是，谁也不说话，只有汽车马达的声音，轻轻地传了进来。车里的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凝重。

为了打破那沉闷的局面，师哲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斯大林当即回答：

“我是说过这话，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师哲的话，也不是随便问的。因为毛泽东曾经表示要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来作客、赴宴，并且让有关人员准备好了厨师、用具、佐料，甚至连具有中国风味的烤鸭、火锅、茅台酒等等，都准备好了。在这一时僵持、双方

沉默、气氛紧张的行车途中，师哲把这个可能缓和气氛，从而导致关系融洽的话题提出来，希望从此打开僵局。

机智者练的政治家斯大林，立刻抓住良机，表示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说他不但说过这个话，而且，现在也有这样做的愿望。就是说，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我斯大林并不介意，还愿意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作客赴宴。

然而，火气未消的毛泽东仍不买帐！

斯大林的话还没有说完，聪明过人的毛泽东，虽不大懂得俄文，但他从斯大林和师哲对话的神态、语气中，已经猜出了意思。于是，他绷着脸，立刻问师哲：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再到我们那里去作客。”

师哲当即承认：他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斯大林还想到我们的代表团住处去作客。

毛泽东断然地说：

“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不懂中文的斯大林，好像也听懂了毛泽东和师哲谈话的意思，急问师哲：

“他说什么？”

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师哲，当时不好回答。他如果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必然会加深矛盾，引起冲突；不说吧，两个人都在当面，耳濡目染，不好掩饰。急中生智，师哲告诉斯大林：

“是我们私人之间的话，没有什么。”

斯大林不知底里，不便再问。

沉默，沉默，还是沉默。

无声的沉默，有时比争吵还强烈。

沉默的汽车在前进。

沉默的车里，气氛沉重，马达轰鸣，沉重得像灌上了铅。

一分钟，两分钟……汽车奔驰了30分钟，似乎长过了3小时。

汽车离别墅只有几里路了。斯大林亲自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打开大门，迎接客人。

斯大林的专车跑得很快。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进入别墅客厅时，后边的服务人员还未来。斯大林微笑着，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招呼毛泽东、周恩来就座。过了半个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维辛斯基、罗申等人赶来了。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聚餐、联欢、助兴的，个个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并不知道前边那一幕不大愉快的事。

晚宴开始了。餐桌上酒菜丰盛，杯盏交替，主人十分热情。

毛泽东余怒未息，情绪不悦。他坐在餐桌旁，仍然沉默，一言不发。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的情绪，很快地感染了宴会上的人们。晚宴上笼罩着冷清、无聊的气氛。尽管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设法使气氛欢快，然而，均未成功。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去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和毛泽东不悦的原因，只是跟着斯大林张罗。

为了打破沉闷的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然后，又动员大家跳舞。

音乐是优美动听的。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全都响应斯大林的号召，离座起舞，并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跳交谊舞。但毛泽

东和周恩来及中国客人，都只坐在一旁观看，不肯起舞。后来，热情的主人硬把周恩来和师哲拖进舞场。

毛泽东还是沉默地坐在一边。尽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三四个人轮番地拉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都摇摇头，不肯跳舞。这期间，为了礼貌待人，他的脸上虽然有时也露出一丝谦和的微笑，但整个来说，神态严肃，不苟言笑。毛泽东的不悦情绪，和宴会、舞会的气氛格格不入，并且不断扩大，渐渐地感染了人们，使宴会和舞会笼罩上不快之感，最后竟不欢而散。

周恩来不愧为机智、灵活、颇有气魄的外交大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意见不合、一时僵持的宴会上，周恩来虽然有说有笑，也吃也喝，甚至当主人邀请他唱歌跳舞时，他也歌也舞，但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绪；并且总是和毛泽东的行动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形成合力。

在那气氛紧张的宴会上，周恩来表现出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他见一时气氛紧张，就想方设法调节气氛，引开话题，转移视线，使人们在自然的谈笑中，造成一种比较宽松、活泼的环境，比较融洽、和谐的氛围。他的言行自然而得体，理智而高雅，既尊重自己的领袖、维护民族的尊严，又表现出个人的立场、意志、见解、风格，显得高雅大方，机智多谋，令人信服。他的举止，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又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容易使争执的双方接受。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性格倔犟，意志坚强，从不轻易妥协的人。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的矛盾纠葛、性格冲突中，调节、缓和是不容易的。周恩来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也不如人愿，收效不大。苏联的有些领导人曾说：“周恩来真是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处事有方，机智灵活，把最复杂难办的事情，往往举重若轻，在谈笑中轻而易举地办成了。”

毛泽东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但他不肯亦步亦趋，决心“走自己的路”。

夜深了。毛泽东一行才回到住地。

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躺在床上，闭上双眼，怎么也不能入睡。斯大林的神态，莫洛托夫的声音。时不时映入他的眼帘，响在他的耳边，引起他的深思。是我们错了吗？1949年，美国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我们仅仅以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加以驳斥，效果不是很好吗？那不但引起了国内人民的重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快要签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吃不开了，日子混不下去了，派出艾奇逊这个“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出来发表什么演讲，进行无耻造谣，挑拨离间，我们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严厉的驳斥，这有什么错误呢？何况，我们不仅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驳斥，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代表新疆530万人民发表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进行严厉驳斥。这是我们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力吗？不，不是，决不是。可他们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借题发挥，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大做文章呢？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就范，听从苏联的指挥、摆布呢？不、决不、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决不允许的。

毛泽东心似平原奔马，任意驰骋。他从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想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声明，又想到蒙古外长拉姆苏伦的声明，考虑《谈话》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又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前，拿起那几份《声明》、《谈话》细看，深思其中的内涵和问题。

这几份《谈话》和《声明》，都是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各有各的特点。就胡乔木的《谈话》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得深，批得透。《谈话》一开始就说，艾奇逊在长篇演讲中“造了一连串谣言”，“这件事表示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谈话》引用艾奇逊的一些话后指出：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背的’”。

第二，用事实驳斥谎言，一针见血。对于艾奇逊造谣说“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的谎言，《谈话》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谈话》指出：“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1948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1949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1950年1月12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谈话》接着入木三分地挖苦说：“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办法了。”

在现实方面，《谈话》只举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艾奇逊低能演说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辛辣而幽默地指出：“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人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官员。”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无官样文章的空话、套话、“外交辞令”，又无脱离实际的阿谀奉承，无端吹捧。《谈话》没有专门谈中苏关系，没有称颂“无私的友人苏联”，没有批驳艾奇逊下述论断：“俄国人在中国北部以及其他那些地区的利益，远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这绝不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

是从共产主义发生的東西。它的存在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中，引用并且驳斥了这段言论。说“艾奇逊的这段言论是这样的荒谬透顶”。”乍一听来，我们还怀疑它的可靠性，以为必定是报纸把国务卿艾奇逊错认为某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了。然而，加以审查之后，原来国务卿艾奇逊竟然的确作了这样虚妄的粗制滥造的诽谤言论。”

维辛斯基在《声明》中，专门批驳了“所谓‘外蒙古’”问题。他说：“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中，对此事只字未提。既未批驳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并无丝毫真实性”，也没有说“所有这些荒谬言论都是由艾奇逊堆砌起来，在竞赛失败了的时候保持面子的，企图用来诽谤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从而把他们自己政策失败的责任推诿给苏联”。

这些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疏忽或遗忘，而是严峻的历史。客观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使他不肯完全按照斯大林和苏联的调子说话。毛泽东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思想，而绝不屈从于某种权势或政策。现在，经过一段深入、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更加明白了，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之所以抓住胡乔木《谈话》大作文章，其实质仍然是要中共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办事，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按照苏联的调子发声明，那将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不行！绝不能这样干！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这种主张和建议，并且用严峻的态度、无声的抗争，顶住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批评、规劝、宴会、舞会，表现了对这种作法的强烈不满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正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的魄力。

毛泽东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不喜欢那种安于奴隶地位的奴颜媚骨，不喜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提倡人们作鲁迅那种“硬骨头汉子”，作“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要学那“左右摇摆的小草”。斯大林当时是世界人民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威望很高，才华出众，性格坚强，有点骄傲，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大多有些看不起，而对毛泽东则很尊敬。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并不想惹毛泽东，尽管他十分谨慎地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向毛泽东委婉地谈了些意见，然而，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还是被激怒了，发火了，以至他斯大林急忙亲自请他上车、让座，急忙设宴请客，急忙组织舞会，缓和气氛，毛泽东还是怒气难消，不给面子，不露笑容。

其实，毛泽东的发火、抗争，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对《谈话》的指责，也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责牵涉到中国党和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而且是因为这种指责触发了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憎恶和深思。

毛泽东深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

侵略、凌辱、剥削、压迫。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入侵……多少英雄的中国人民，死在了帝国主义者屠刀之下！多少祖国美丽的山河，被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幸喜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宣布废除了帝俄侵略中国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啊！“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然而十分遗憾！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在苏联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同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对艰苦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居然搞起了大国沙文主义，软硬兼施，利用多种手段，强迫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与国民党代表团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在谈判中，斯大林拿出了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一份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份有关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一份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还有一份关于所谓“外蒙独立”的宣言。这些文件，经过一段讨价还价、修改、补充，终于公布了。这些条约的性质是什么呢？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怎么看待它？

毛泽东记得很清楚：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时，曾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斯大林当时态度很明朗，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那么现在，怎么能要求中共和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条约是平等的、公正的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当然，中国党和政府是通情达理的，是尊重事实而顾全大局的。例如关于所谓“外蒙古”问题，的确，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睦相处，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作法，还要加以肯定和赞扬吗？

不，毛泽东绝不干这样的事。于是，他硬着头皮顶着，在《谈话》中没有谈这些事。

斯大林见毛泽东如此认真，态度严肃，毫不含糊，只好不了了之，不再重提。

革命的友谊，需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从这件事情上，斯大林不仅意识到自己对毛泽东不够了解，而且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那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够了解。有一次，在闲谈中，斯大林细心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具、阴阳五行、自然现象的称谓、含意等等。他仔细地品味着中文中的桌、椅、板凳，日、月、星辰，阴历、阳历，和一些科学、哲学的概念、判断，感到深刻、准确、形象、有趣。他说：汉语、中文，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风格，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美语言相同的语音。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谈到

这里，他对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吧，要尊重中国文化，尊重毛泽东！”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晤谈了几次之后，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魄力、作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和毛泽东交谈，特别喜欢倾听毛泽东用那生动、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在双方商谈中苏条约期间，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很紧张。然而，在那紧张的会谈期间，有一次，会谈正在进行，斯大林却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亲切地请毛泽东说说心里话。

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谈起了自己在中国土地革命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他们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不许我工作……”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了同情而又愧疚的神色。

毛泽东越讲越生气，突然，他站起身来，指着王稼祥，说：

“他，他们，就是他们打击我，排挤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周恩来和王稼祥顿时紧张起来，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斯大林接着毛泽东的话茬，惊讶地说：

“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

王稼祥坦然地点头说：“对，是的。”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火，立即接着说：

“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既往不咎。我自己也是犯过错误的，只是知错就改，偷偷地改嘛！”

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

斯大林没有笑。他点起他那特制的烟斗，边抽烟边陷入严肃的深思。通过和毛泽东的会面晤谈，通过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同志的介绍，他真正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把许多事情办错了。而这些错误的实质，就是“揠苗助长”、“越俎代庖”。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化和二亿里大陆的古老大国，博大精深，变幻无穷。而自己对中国的事理，中国的社会，以至中国的文化、阶级状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没有调查，就凭着革命热情出主意，想办法，指导革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失！

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啊！

斯大林想到这里，又和毛泽东进入了更深的交谈。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1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1 页。

18 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显出 斯大林在知错改错

签字仪式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所以在照片上他和毛泽东一样高。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

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他们两人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仪式开始。

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长维辛斯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都发表了讲话。

这天签订的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斯大林原打算在这天同时签订中苏贸易协定。但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直到签字仪式开始时，苏方仍然未能将贸易协定拿出来。斯大林严肃地查问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文没有准备好。”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反讥地说：

“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

敏感多疑的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再三追问师哲：

“毛主席说了什么？”

师哲不便直译，只好搪塞：

“是我们私下的话。”

斯大林不懂中文，但仍质疑地摇摇头，不便再问了。

毛泽东的个头比斯大林稍高些。但在签字仪式上照相时，斯大林轻轻向前移动了一下，所以在照片上，他就显得和毛泽东一样高了。至于斯大林当时为什么要向前移动，谁也说不清楚。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热情地宴请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宴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杯盏交替，气氛热烈，关系融洽。斯大林热情地举起酒杯，向毛泽东祝酒：

“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干过杯，又热情地举杯祝酒，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热情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在给毛泽东敬酒后，特别去给周恩来敬酒。他们曾受斯大林的委托，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一起谈判中苏条约和协定。在谈判中，他们对周恩来深刻的政治见解、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严密的工作作风十分钦佩。所以，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十分幽默他说：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风趣他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商定的原则进行的。起先，苏方根据周恩来讲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

草案给中国代表团看。周恩来看后，说：

“不对，我讲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

周恩来把王稼祥、李富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看了苏方起草的文稿，摇摇头说：“这不行，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恩来整整花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师哲很快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联方面看了表示满意，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提出内容这么好、表述这么精确的条约，没有改动多少，就表示同意。

中苏条约的名称，原先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45年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名称相同。后来，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说：“加‘互助’两个字好，平等互利，互相帮助嘛！”这样，条约的名称就变成了后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毛泽东和中方的积极争取下签订的，有效期为30年。应该说，它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维护新中国的独立都起过积极作用。条约签订后，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客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应邀参加。席间，胡志明主席很羡慕中苏签订的条约，他向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您请示。”

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他说：“你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他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再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化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不好回答，用他那特制的烟斗抽了一口烟，笑了笑。幽默而风趣他说：

“哈，你们东方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宗旨，是显示中国和苏联牢不可破的团结，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条约的第一条写道：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毛泽东回国后，4月11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这个条约。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5、6页。404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12页。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1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册第75页。

“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的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泽东指出：

“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当然，事物都是矛盾统一的。在西方，这一条约被视为中国和苏联把日本及其保护者美国当作假想敌的证据。1950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对此条约进行评论，对北京终于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表示遗憾和不满。西方以此为口实，1951年，日本与西方同盟国缔结和约，不久，又缔结了《美日安全条约》。

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和他所坚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他对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新中国表现得十分尊重，不仅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在中苏之间的某些问题上作出了明显的让步。俄国人同意在1952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不迟于1952年底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中国（条件是在战争情况下这些设施应由两国共同使用），并无偿地移交苏联在北京的经济机构所获的财产。苏联同意在5年之内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旧两个中苏条约一对照。斯大林的问题便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194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部次长胡世锋及沈鸿烈、蒋经国等人乘飞机赴莫斯科。商订中苏条约问题。根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关于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国民党政府和苏联先后举行了十次会谈。从1945年6月30日至8月14日历时45天。

斯大林与宋子文的首次会谈于6月30日举行。当时，尽管抗日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苏联是不是真正支持蒋介石。他到莫斯科后，多方探听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收集苏联在战后是否会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秘密情报。在探听中，宋子文发现，斯大林的实际意思是：“只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

《苦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2页。

《苦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2页。

梁敬鎔：《194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必须以取得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报酬。关于大连的主权问题，斯大林要求苏联和中国共同占有，要在双方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管理。由一名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一名苏联人为行政负责人。关于旅顺的主权问题，苏联要求由苏联海军和中国人一起使用港口设备。关于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苏联再次提出中苏共管，苏联管理的年限为 40 或 50 年。

7 月 2 日晚，斯大林同宋子文讨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次会谈表明：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这次讨论中，宋子文说：去年三月，我们想与中共妥协，那时我们计划组织一个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战时内阁，同时，我还从美国大使赫尔利处了解到，阁下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

斯大林回答道：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

宋子文见有机可乘，进一步说：作为行政院长，我曾计划去延安讨论中国统一问题，但中共不欢迎我。我们的希望是中国只有一个军队和一个中央政府。我们不同意另有军队的政党存在而使中国分裂。

斯大林说：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

宋子文高兴他说：你说得真对，我们也希望国民党保持领导地位。所以我们不希望组成联合政府，因为如果成立这样的政府，只要一个党退出，这个政府就站不住了。

斯大林表示赞同，说这是国民党的正当要求。

上述事实说明，在 1945 年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曾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去讨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但是，使谈判几乎濒于破裂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外蒙古问题。在那次会谈中，苏联坚持外蒙古“独立”，实际上是要把外蒙古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说：由于一些国家利用外蒙古作为基地，试图破坏苏联在远东的地位，苏联如果不把外蒙古作为“缓冲地带”，它将会丧失整个远东部分。因而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他还说关于外蒙古的协议可以秘密签订，待日本投降后再公开。

国民党代表认为：当时雅尔塔秘密协定提出的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并没有提到要使外蒙古脱离中国。7 月 4 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给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通告中也重申：“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当时，由于外蒙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属于中国，所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可是在谈判中，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却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斯大林强调：要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中国就必须放弃一部分领土主权作为报酬。在会谈期间；斯大林在同蒋经国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们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229 页。

《蒋经国传》第 112 页。

在7月7日的第三次会谈中，宋子文指出：雅尔塔协定只规定“必须维持外蒙的现状”，并没有提出要使它“独立”。斯大林竟然回答道：今日的外蒙“实际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维持现状，意思就是“独立”。斯大林说：《雅尔塔协定》原文中所说的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六个字是摆在括弧里面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名词的后面的，它的意义是说明：外蒙古的现状，就是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的“现状”，就是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谈到这里，斯大林更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加重语气地向宋子文指出：雅尔塔协定“是苏联的方案，也就是由莫洛托夫起草的，他们（指罗斯福和丘吉尔）仅仅是形式签字而已，这句话我可以在丘吉尔面前重行声明（因为这时罗斯福已死）”。

关于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作了让步。宋子文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在保留对外蒙拥有主权的前提下，给外蒙以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允许它处理自己的军事和外交事务，甚至与苏联签订条约，允许苏联军队驻在它的领土上以保卫西伯利亚。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的这样一种保留也不允许。最后，斯大林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准备好了的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外蒙独立”的宣言》。宋子文表示：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就不能讨论外蒙独立问题。斯大林

却坚持说：不宣布外蒙独立，那就不能讨论中苏同盟条约。双方争执不下，讨论陷于僵局。这样，会谈一度停顿。

宋子文知道，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是“深深嵌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原则问题”，他曾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

“假若某个政府永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那么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为了逃避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谴责，宋子文不久就辞去了他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在同年八月中苏条约上签字的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

蒋介石对外蒙主权问题的份量也是清楚的。他在同从莫斯科回国的来子文商讨后，于7月20日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虽没有代表参加，但您，总统先生。

应当体会到我们已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个限度，我们作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我们的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

但是，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更害怕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只要苏联切实保证只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那么，国民党政府即使放弃了外蒙古的领土主权，也是台算的。蒋介石满心要独霸中国，他以为只要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那么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凭自己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消灭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使除了外蒙古之外的全国广大地区，仍然能够在他和国民党的掌握之中。因此，蒋介石在接到宋子文关于中苏第二次会议（7月3日）报告之后。当天晚上就把新的指示电告宋子文。新指示基本上接受了苏联的要求，但蒋介石要求苏联政府对如下一条做出承诺：“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圭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27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31—232页。

归统一，深盼苏俄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俄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但是，当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将这些要点通知苏联后，竟然发现即使中国让出领土主权，还是不能满足苏联的要求。如：（1）关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又加了“陆地和临近海区”这样一些字样。（2）虽然旅顺港将由中国和苏联共同使用，但苏联还想进一步获得行政管辖权。（3）虽然大连港口名义上由国际共管，但苏联坚持要使它成为只由中国和苏联专用的海军基地。（4）大连的城市虽然将由中苏共管，但大连的港口必须只归苏联。（5）旅顺、大连周围的地区，虽有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政府批准。（6）虽然恢复了中国对东满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但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来管理所有企业。委员会的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人都必须是苏联人。国民党代表团对这种越来越苛刻的条件感到为难，没有当即接受。苏联一些领导人立刻对国民党代表团采取了威胁和利诱的种种手段。他们对国民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在非正式接触中强调：“苏联”坚持的外蒙独立的要求绝不让步。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成功的话，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

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得到了苏联的这种承诺，如获至宝，当即要求斯大林举行第四次会议。7月9日在会谈中，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旅顺的海军基地将作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港口，大连将成为国际自由港。这些措施有效期为二十年。同意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干线由中苏共管。关于外蒙问题，国民党代表建议通过蒙古人民的投票表决，承认外蒙独立。

当时，蒋介石给国民党代表团的指示是：“外蒙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须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在这里，蒋介石公然运用“民主”欺世。他已答应允许外蒙古“独立”，但还要玩弄“公民投票”的“民主”把戏，推卸责任；并且把“三民主义的原则”拉来作为自己丧权辱国行为的遮羞布。

斯大林立即同意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建议，同意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并且约定，只有在打败日本以后才能进行。

上述问题解决后，国民党代表还着重指出：“只要中共保留独立的军事和政府组织，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只支援中国的中央政府。”

斯大林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说，他“从未向中共支援过武器，并保证，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只给中央政府。而且，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他说把共产党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是必要的”。在谈判过程中，斯大林对国民党代表团一再表示：“一切问题解决后，中国可以派一个代表团随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便接收一切。”

这样，由于双方对一些重要问题在原则上已经达成了协议，所以第五次、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9页。

梁敬鐔：《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蒋经国传》第113页。

梁敬鐔：《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83页。

第六次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会谈中，为了使国民党代表团放心，斯大林还答应：在结束了议事日程上所有问题的讨论后，苏联将写出一个关于只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书面保证，而苏联则拥有对中东铁路运输武器装备的权利。在7月12日的第六次会议上，双方都同意关于外蒙宣告“独立”的草案，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这时，由于苏联领导人要去参加苏英美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暂停。

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去了。据《离奇的美苏同盟》一书记载：“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军事会议于7月26日举行时，李海上将被选为主席，首请俄方说明对日作战与企图。俄人简单说：预备八月下旬开始进攻，不过确实日期要等与中国的谈判结束后再行决定，意思中间似乎很露骨地要美国敦促蒋主席赶快答应斯大林的建议。”但是，7月下旬以后，远东战争的形势急剧变化。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联名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事先并未同斯大林商量。8月6日上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斯大林同莫洛托夫于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莫斯科，决定提前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宣布了对日宣战书。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这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苏中条约尚未签订、苏联领导人感到焦急。因为在前边的中苏条约谈判中，苏联之所以要取得中国一部分领土主权，是因为中国有求于苏联，是因为中国需要苏联参战抗日，否则，中国就不能战胜日本。可是现在日本已经正式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行将结束，苏联的说法站不住了，中国可以不承担由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引起的必须向苏联让出自己的领土主权的义务。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最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得到发展，更害怕折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再三乞求苏联，只要苏联同意限制共产党，支持国民党，他们就宁愿让出中国的一些领土主权。这就使苏联领导人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仍然掌握着主动权。通过前一段谈判，苏联领导人明白：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来说，领土主权是次要的，首要的关键是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同国民党迅速达成协议，就必须向国民党指明：签订中苏条约应该越快越好，因为赶快签订条约对国民党有利，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大发展了。根据这种判断，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8月7日），就立即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谈判。“在8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作了让步。”于是，双方在8月8日、10日、13日、14日短短几天中，连续举行了四次会议；很快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条约。

条约刚签字，莫洛托夫就迫不及待地提议让条约立即生效，苏联并以附于条约之后的“照会”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书面保证。该照会宣布：“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

这里应该指出：中苏条约签字的8月14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帝国停战诏书》已经向全世界广播，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苏联保证给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留作何用？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89—490页。

《1942—1946年的远东》（上）第272页。

蒋介石对这个条约表示满意。因为“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的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上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8月16日，蒋介石高兴地将条约内容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并说他“总的说来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在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也高兴地表示：“由于俄国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

上述事实 and 1945年中苏条约的谈判经过，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当时的对华政策，有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是根据苏联本身利益的需要，是从苏联的战略要求出发，而不惜牺牲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采取了只援助国民党蒋介石而拒绝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1944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27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阐明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他说：

“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

在战后，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1945年以后，斯大林先后提出向美国借款60亿美元，来恢复自己的经济，因而需要在政治上同美国合作，以保持苏美各自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巩固与发展各自的利益。为此；尽管看到蒋介石国民党在准备发动内战，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刀，斯大林还保证“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甚至诬蔑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为了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轨道，尽管蒋介石正在发动内战，斯大林还于1945年11月和1946年5月两次邀请蒋介石访问苏联，蒋介石害怕引起美国不满，两次都没有接受邀请。同时，他还建议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服从蒋介石的统一领导。因此、毛泽东说：“中国是违反斯大林的意志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

第二，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艰苦的年代，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却违反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甚至发展到伙同帝国主义——先是同德国和日本，尔后是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活动。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俄方使用中东铁路问题、外蒙古“之现状应予维持”等等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在1945年6月30日至8月14日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斯大林更是处心积虑地运用种种手段，软硬兼施，要把中国新疆和东北这一广大地区的领土主权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果然，在懦弱无能的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面前，斯大林的意图实现了。斯大林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9月3日，斯大林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讲：

“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国的奇耻大辱。我国人民相信并期待着有朝一日粉碎日本，洗刷掉这一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

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第990页。

《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152页。

《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152页。

了。”

斯大林的上述言行，是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列宁认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一场“罪恶而可耻的战争”。列宁曾经严厉地谴责过俄国沙皇的帝国主义掠夺与并吞中国领土——其中包括“侵占了旅顺口”、“侵占满洲”的罪恶行径。同时也违反了他自己1937年前后指导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对1904年日俄战争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该书写道：

“1900年，沙皇军队伙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远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修筑了中东铁路，并调兵守卫该路。北满被沙俄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的势力已伸展到朝鲜。俄国资产阶级拟定了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日本当时已迅速地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侵略亚洲大陆，首先是从中国下手。日本也如沙俄一样力图把朝鲜和满洲据为己有。……日俄战争逼近了。……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战先开始了战争。”

“人民群众不要这场战争，并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俄国的害处。”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沙皇政府在这场掠夺战争中失败有好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加强革命力量。”

同时还应指出：斯大林1945年夏秋的对华言行，也违反了苏联政府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宣布的对华声明的原则精神。1919年7月25日，《苏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中宣布：

“劳农政府且已向中国政府建议开始谈判，进行废止1896年之条约，1901年之北京条约及1905年至1916年间与日本所订之一切和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夺或与日本及联盟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

1920年9月27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又重申：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地永久归还中国。

列宁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列宁说：没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挠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他明确指出，……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立场。列宁特别指出：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悟的时候，由于苏联对各民族关系的问题“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平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

毛译东据理力争，斯大林知错改错，并作了自我批评。

德迪邦尔：《苏甫冲突经历》第99页。

《列宁全集》第8卷第9页。41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61页。

斯大林当时的对华政策，有问题，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虽然只援助国民党，但总归是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援助国民党抗日，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意志。其次，它虽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要求，但出兵中国东北，迅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势力，促使日本很快投降，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快取得了胜利。还有，它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有过怀疑、限制，但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给予了一些援助。更重要的是，过了四年多之后，当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面对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不得不步步退让，知错改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前边已经作了具体地介绍，这里不再详叙，概括地说：

第一，毛泽东和斯大林主持签订的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之间平等的、友好的、互助的条约。斯大林考虑到过去同美国及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及条约，起先下大愿意签订这个新的“同盟互助条约”，但因毛泽东坚持谈判，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签订了条约。这是斯大林的重大让步，也是重大进步，从法律上改变了过去的错误。

第二，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明确规定：“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并且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4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上述条约、协定和公告，体现了中苏两国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精神；改变了斯大林四年前那种以强凌弱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第三，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十分尊重毛泽东，而且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我们（苏联）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还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斯大林原先不想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对毛泽东的建议作了让步，同意签订；原先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再作让步，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出面谈判；在中苏条约、协定的内容上，十分尊重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共同协商，平等办事，这与四年前斯大林同宋子文、蒋经国谈判中的粗暴蛮横、以强凌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长足的进步。

不仅如此，在其他场合，斯大林也公开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

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自己没有估计到的，说“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违反他的意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说明斯大林还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19 毛泽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高度评估斯大林历史作用

毛泽东呕心沥血著华章，斯大林派尤主帮助编辑，并推荐给苏联杂志发表。

毛泽东在延安住了十年多。

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位于延河中游。群山环抱，地势雄伟，风光独特。延河从西北流过来，贴城而过，蜿蜒向东，像一条银色的飘带，把延安打扮得美丽媚人；巍巍的宝塔，矗立在嘉岭山上，直刺云天，使延安更加雄伟、壮观。隋唐以来，延安一直设郡置府，成为陕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到达延安，毛泽东到了延安。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落脚点，成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驻地。

环境稍一安定，毛泽东就挤时间读书。他还是按他那“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坐在延安的窑洞里，认真读书，精心批注。他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还批阅了许多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历史、文学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其中批阅较多的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有些书，他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圈点，画上长杠，在旁边写上批注。后来再读时，他又根据当时的认识，对自己前边的批语，作新的批判和补充。

毛泽东喜欢研究哲学，喜欢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喜欢读哲学著作。他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就有十多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批注的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教程》的两种版本反复推敲，用毛笔和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一万三千多字的批语。在书中的许多地方，毛泽东用毛笔或铅笔分别划了曲线、直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点、双圈、三圈等等符号。从符号的颜色上看，显然是多次阅读时划上的。其中1935年6月的版本，从头到尾都作了勾划、圈点和批注。该书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批注文字最多，其中最长的一段批注有近千字。他的批注，多是读书心得，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也有对原著的引伸和批判。也有不少地方是联系中外历史事件和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等等。

唯物辩证法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937年夏天，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经验，从哲学上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

当时，在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硬搬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片言只语，

吓唬人们，要人们照他们主观主义的言论去行动，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不自觉。还有一部分拘守于自身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实践论》，回答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因为重点是批判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所以题为《实践论》，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在这部哲学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上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一切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是实践性，他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明确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认识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就从哲学上把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从认识论上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1937年8月，毛泽东又发表了《矛盾论》，为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文章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各个方面，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泽东的这两部哲学著作写出来后，先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出版发行，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为中共干部的重要思想武器。1950年2月8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中，斯大林认真地建议毛泽东把他所有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由怀疑转变为信服后的郑重建议，也是斯大林第一次建议出版外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

斯大林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看作“一件大事情”，是在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之后，是在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做了多次了解之后，也是在他强调革命中心东移问题之后提出的。1949年7月斯大林曾经说过，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又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那杯酒。现在，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情”提出来，是否和他的革命中心东移思想有关呢？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深深感到用马列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因而，他点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并希望斯大林派人帮助编辑。

斯大林推荐苏联哲学博士尤金，毛泽东表示感谢。回国后。1950年4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他作这项工作。5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认为：斯大林的建议很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

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责成师哲和苏联翻译费德林组织中文译俄文的工作。

7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开始看毛泽东著作稿，进行编辑。9月，中文稿件整理速度减慢妨碍了俄文的翻译进度。毛泽东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月21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刘少奇主持讲演大会，尤金作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月底，尤金访华时届将至，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毛泽东写道：

“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力盼。”

1950年10月9日，斯大林回电：

“……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随后，尤金便按毛泽东的安排，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他的讲演稿于当年12月上旬，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尤金回京后，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译稿，赞不绝口，连连称好。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很好，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有许多独到之处。同时指出：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有些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是否可以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尤金谈的意见不多，并一再声明，这是从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修改时参考。

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特别推崇，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将《实践论》译稿转送给斯大林。

斯大林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很好，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

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篇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斯大林看过这篇题解，并推荐其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转登，说明他此时不仅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正视了自己在30年代，指导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向苏联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

的《实践论》。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1951年1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

毛泽东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本来，《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要译成俄文提前发表的。但毛泽东多次修改不肯定稿。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函陈伯达、田家英，还讲到“《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所以，直到1952年4月1日，《矛盾论》才公开发表，并收入同年4月10日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后来再版时，才将《矛盾论》由第二卷转入第一卷。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应很好，引起轰动，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普遍重视。1953年翻译出版了第三卷。

尤金待人诚恳，勤奋好学，学识渊博。1947年至1950年初，曾经担任过欧洲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的主编，发表过许多文章。后又担任过苏联在德国的政治顾问。在华工作期间，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治学，一丝不苟，多次和毛泽东深夜长谈，探讨哲学问题，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受到毛泽东的好评。但他书生气十足，缺乏政治经验，斯大林一直没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苏共20大后，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路线，逐渐发展成为中苏论战。尤金坚持马列主义原则，不以国界论是非，批评赫鲁晓夫，要他对“苏中争吵负责”！使赫鲁晓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气得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不小的篇幅攻击尤金。这从反面说明，尤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专家”。

毛泽东带领抗日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江青哗众取宠，给斯大林祝酒，言过其实。毛泽东严加管束。

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为——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为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

浩，副主任宋任穷。同时，从各师抽调部分兵力，在延安设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分驻陕甘宁边区各地，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肖劲光指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路健儿，很快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战场。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日寇饭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74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10月中旬，120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在雁门关附近截击敌军运输车辆900余辆；接着，129师奇袭阳明堡飞机场，击毁敌机20多架，歼敌一个大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到武汉失守时，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1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40余万，形成了重要的抗日实力。

毛泽东不仅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而且抓延安和边区的基本建设，使延安很快地变成了中国的革命圣地、革命摇篮。它像一颗璀璨夺目的红星，光芒四射，吸引来大批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毛泽东是个博学多问、见多识广而又兴趣广泛的人。他喜欢同各种有知识的人交往，在交往中识人议事，研究社会，增长知识，获得后迪，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工人、农民和各种知识分子的交往增加了，而与妻子贺子珍的思想感情交流却渐渐地减少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贺子珍为了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锻炼，辞去了毛泽东的秘书工作，被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发行科长，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党中央到保安后，贺子珍生下了娇娇（李敏）。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非常喜爱，一有空闲就逗她玩。贺子珍却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的学习进步和工作。因此，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去学习。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每天清早出操，集体食宿。学员们要学政治，学军事，并且要联系实际，要求很严，晚上还有政治活动。贺子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政治、军事都要争先，为了挤时间，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

夫妻生活的分开，加深了感情的隔膜，又加上一些误会，使贺子珍十分苦恼。她想学习进步，苦于文化太低；想要多做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她埋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脑子不好使，特别是那些该死的弹片，隐隐作痛，使她经常处于疲劳和痛苦之中，不能保持过去那种旺盛的精力。想来想去，她想作个手术。把那些弹片取出来，根除病痛，以便使身体早日康复。可是，延安当时医疗条件差，动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贺子珍决定到西安去，然后转赴上海找医院做手术。谁料，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行动将更困难。

毛泽东见贺子珍坚决要走，极力挽留。他拉着贺子珍的手、深情他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贺子珍是个性格坚强、意志坚定的人，认准了的事，轻易不回头。尽管毛泽东深情地挽留，她还是坚持要走。

毛泽东又请她坐下，诚挚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留下吧，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贺子珍虽然温存地笑着，但还是不肯留下。她记得过去在中央苏区时，她曾与毛泽东大吵过一顿，毛泽东并不计较，事后还诙谐他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现在，毛泽东虽然挽留，可自己身上的弹片、不做手术取出来不行，与其长期受痛、不如尽快手术。于是，1937年底，贺子珍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无法去作手术。只好留在西安。毛泽东托人捎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并且给她捎来一箱日用品，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感谢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床新被，送给毛泽东，但自己却继续留在西安。后来、贺子珍听说苏联条件好，不但可以作手术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学习深造，于是，她就从西安乘汽车到兰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938年10月，又乘飞机到苏联莫斯科。她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就匆匆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

苏联医生作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深嵌在贺子珍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注，长在一起了。取出弹片有困难，也有危险；不取比取掉还要好些。贺子珍没有作取弹片的手术，生了一个小男孩。满月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就进了东方大学去学习。

贺子珍的任性出走，给江青以可乘之机，也给毛泽东的爱情、生活、家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14年生。1938年她与毛泽东认识时，年方24岁，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再加上她长得眉清目秀，身材窈窕、颇有一点魅力。但是，当年的江青尽管年轻质弱，却经历复杂，心计颇多。她15岁离开诸城老家。只身跑到济南，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演戏。在学习演戏中间，她得到了该院院长赵太侅的青睐，又通过赵太侅的夫人俞珊，结识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且和俞启威情投意合，结成情侣，正式同居了。

俞启威当时是青岛大学学生，思想进步，热心革命，后来当过天津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长。1933年他介绍李云鹤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入了党，李云鹤仍然迷恋着名利和物质享受。他们二人住进了中共党的地下机关。不久，俞启威被捕，关进了牢房；李云鹤撇开了俞启威，把她那一副迷人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又打扮起来，擅自离开了青岛党组织，一个人跑到上海，进入了无名剧社，演戏赚钱。顾而已和赵丹见李云鹤年轻聪明，着力培养，但是国民党警察却逮捕了她。赵丹和顾而已多方营救，两个月后，由上海女青年会负责人出面保释，李云鹤出狱，改名蓝苹。

1935年4月，蓝苹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的演出。在《都市风光》里，蓝苹扮演一位知识青年的女友，唐纳扮演那位知识青年，二人卿卿我我，萌发爱情。入冬后，蓝苹担任了话剧《娜拉》的主角，不久，又在《大雷雨》中担任了主角。演出的成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蓝苹的头像和芳名出现在大报和小报上。其中捧场最卖力气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5页。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5页。

的就是她的情侣唐纳。

1936年蓝苹又与唐纳结了婚。婚后，蓝苹利用导演兼演员的唐纳为她强争《赛金花》一剧的主角，由于多数演员和剧院领导的反对而未逞。蓝苹大哭大闹，逼得唐纳几度自杀，一时成为30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两人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蓝苹一人到了西安。

当时，初步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驻地延安，成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民主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爱国人士，一批又一批地经过西安，奔向延安。1937年8月下旬，蓝苹由西安改名江青，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到延安。

江青爱拉关系。到延安没几天，她就找熟人带她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留意这位着意打扮过的女青年，而是专心考虑建立新四军的问题。10月2日，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团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宣布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下辖四个支队，共约1万零300人。5月4日，毛泽东发出《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一带发展游击战争，在茅山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敌后，连战连捷，很快地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并且打出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到武汉失守时，新四军已发展到25000多人。

1938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已在延安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二姨太，是个二流角色。当时在延安看话剧十分新鲜，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都来观看，盛况空前。演完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也和演员们亲切握手。江青热情洋溢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问长问短，毛泽东并没有多注意她，在宴席间，提议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在康生的帮助下，江青进了“鲁艺”，既当教师，又当演员。“鲁艺”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里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和许多平房、土窑。有一天，江青听说毛泽东要来鲁艺作报告，便提前进了大礼堂，在后排显眼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讲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江青不但站起来鼓掌，而且向台上招手，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当毛泽东看她时，她又嫣然一笑，显出了少女的妩媚。听报告时，她时而像在凝神静听，时而又在疾速笔记，时而又随着毛泽东讲演的起伏，作出各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博取毛泽东的好感。

这天晚上，开完小组讨论会，大家都睡觉了。江青却坐在灯下，心潮起伏，想着如何抓紧讨得毛泽东的喜欢。她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今天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又说她出身贫苦，后来参加左联、入党，向往延安；特别说她要求敬爱的毛主席在百忙中抽空接见她一次。她写道：“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居处。”

星期日下午，江青不等回音就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说她是主席约好让她来的。警卫员去向毛泽东报告，没等回音，她又跟着进了窑门，亲热地喊道：

“毛主席，你好啊！我又来看望你了！”

说着，她迎上前去，与毛泽东握手，说她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深受教育，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当面请教。

毛泽东笑着，回答了她的的问题，又坐在桌旁看文件，处理公文。秘书又来通知开会。

江青只好告辞出来，但当她打听到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已离开延安，准备去苏联的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地去见毛泽东，谈学习，谈工作，谈文艺，联络感情，有时碰到吃饭，就混着一起吃；有时看见毛泽东的办公室、卧室需要收拾，又主动地献殷勤，打扫，整理，暗送秋波。

毛泽东爱上了江青，就请示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结婚。书记处以多数通过，同意他们结婚，但不许江青参与政治。

1938年11月底，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江青被调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很少公开露面。

1949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在斯大林第四次会见中共代表团时，也请江青参加会见。

那是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及江青。

斯大林见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能干，十分高兴，相互问好之后，招呼大家入席就座，并触景生情他说了一些谐趣的话，使宴会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但是，江青表现反常，态度拘谨，一言不发。师哲心里嘀咕：江青今天怎么啦？她过去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今天怎么一反常态。后来他才知道：刘少奇事先给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其实，江青对斯大林也十分敬佩，为了准备向斯大林祝酒的动作和祝酒词，她考虑再三，并和林莉等同志讨论了一整天。

演员出身的江青，准备好了动作和祝酒词，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见斯大林转了一圈，刚刚坐下，便胸有成竹，态度从容，潇洒大方地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热情而恭敬他说：

“同志们！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江青那潇洒而大方的举止，简短明快而又颇具韵律的祝酒词，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大家都抬起头来，望着毛泽东这位年轻漂亮的夫人。这时，江青又接着说：

“请大家举起杯来，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同志干杯！”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禁不住开怀大笑。他和江青碰杯之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众人都高兴地碰杯，饮酒。

斯大林端着酒杯，走到中国同志的身边，笑着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这恐怕太高抬了！”

刚才还为自己的表演沾沾自喜的江青，听到斯大林的后一句话，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红晕。

斯大林说罢，转过身去，走到宴会厅的另一角。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回来，若有所思地带着一种沉思、伤感和含有隐情的口气说：

“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时候，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会健在！愿斯大林永远健康！

良好的祝愿，并没有使斯大林高兴起来。他举起酒杯，对中国同志说：

“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高兴！但事实上，人总是要死的，人总有一死！没有人能长生不老！”

“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将移到中国和东亚。”

说着，斯大林放下酒杯、严肃地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他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正像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

江青对于能给斯大林祝酒十分高兴。但毛泽东后来闻讯，却不高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苏联养病的江青专程回国，要上天安门，毛泽东不让；接着，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江青又要去，毛泽东仍不允许，不仅如此，就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江青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刘少奇为此事向毛泽东发电报请示。毛泽东给刘少奇复电并让转江青，表示同意江青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不仅如此，毛泽东的电报还说，如果少奇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要江青去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同时，还特别叮咛江青：“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从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妻子江青，要求是多么严格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侵华政策，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把侵略军的主力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毛泽东始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进一步向平原地区发展，开展平原、水上和水网地带的游击战，开辟新的根据地。于是，抗日军民英勇奋战，捷报频传，晋察冀，冀热辽、晋西北、晋冀鲁豫、冀鲁豫、山东等各路健儿，在党的领导下，痛歼侵略军，扩大根据地，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到1940年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东北抗日游击队，由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到近50万人，共产党员由4万发

展到 80 万，解放区人口达到一亿，收复县城 150 座。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抗击日军百分之六十以上，抗击伪军百分之百。

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拉蒋反共政策的影响下，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投敌卖国，于 1938 年 12 月底，撕下假面具，公开投降了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在英美“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唆使下，于 1939 年 1 月，根据日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并先后秘密地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接着，蒋介石命令他的部属，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政府，屠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并且调集大量兵力，包围、封锁各个抗日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接连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政策，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方面告诫党内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并为之作必要的斗争；同时公开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指挥部队，巧妙地打败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

但是，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残酷扫荡；蒋介石调大军包围封锁，狼狈为奸，要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在 1940 年到 1942 年间，经济十分困难。粮食匮乏；人要饿饭，工作人员和部队战士几乎没有衣裳和鞋袜穿，没有食油，没有蔬菜，写字没有纸笔，冬天没有被子盖。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一亿下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由 40 万人减少到 30 万人，新四军由 13 万 5 千人减少到 11 万人，干部也损失很多。

困难重重，该怎么办？许多干部没有办法，只好向老百姓摊派。老百姓受不了，嫌负担太重，就跺脚骂娘。安塞县有个农民指名道姓地责骂毛泽东，说要老天爷把毛泽东天打五雷轰！

这还了得！辱骂领袖，肯定是阶级敌人！不少干部义愤填膺，要求严惩那个无法无天的反革命。

毛泽东听说骂他没发脾气，也没有生气！他平心静气地算了算每户百姓的账，大吃一惊，觉得边区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了，生活太苦了。他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农民骂我，说明我们的服务工作没做好！他决心要千方百计教育干部，减轻农民负担。首先要减少公粮三分之一。

然而，人是要吃饭的。当兵吃粮，吃公粮，历来如此。革命的干部、战士、工人、学生，谁也不能不吃粮呀！许多人叫苦叫难，说边区这么多的干部、战士、学生，都吃不饱，减了公粮，靠什么吃饭？毛泽东下了决心：减！一定要减！

毛泽东的决心，十八条大犍牛也拉不转！

中央警卫团节衣缩食，自己种了些地，解决缺菜问题。附近群众反映说，那些地块是属于他们的。于是毛泽东下令将地还给老百姓。警卫团有的同志不服，说那地原本荒着，是战士们开出来的。毛泽东说，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帮人民开点荒地也应该。不能与民争利，近地给群众，我们再去远处开荒。警卫团只好将开好的地让给了老百姓。毛泽东也自己开荒种菜。

看见毛泽东穿着补丁连补丁的军衣，身体越来越瘦，师哲心情沉重地问：减这么多公粮，边区的军队、干部怎么生活？毛泽东笑着说：好办！我们的干部战士多是青壮年！一个农民青壮年靠自己劳动，要养活五口之家，还要

交公粮。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呢？他决心自力更生。

有一次，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面临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办？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毛泽东大力发动和领导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地，延安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工人、农民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也挥舞镢头，开荒、种地、修渠引水。警卫班的战士进行生产动员，毛泽东一再叮咛：“订生产计划，可不能忘了我呀！我不能远走，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地，我保证种好！”

大家见毛泽东太忙，日夜操劳，劝他不一定参加种地。

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不行！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是党员，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

果然，毛泽东在分给他的那块地里，深耕细作，及时播种、浇水、施肥、锄草，使蔬菜长得很好。

毛泽东参加生产劳动的消息传开了。边区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给毛泽东代耕。毛泽东笑着说：“还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坚持完成生产任务。

在大生产的日子，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重要著作，为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等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和朱德、彭德怀、王震等一起，研究军队的作战、训练、生产等问题。1941年春，王震率领359旅，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屯垦南泥湾。在那一大片荒芜的沃土上，镢头挥舞，战歌嘹亮，英雄的三五九旅谱写出新的篇章。1942年开荒26800亩，实现了自给自足，1943年开荒10万亩，实现了耕一余一。

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他看见那满山遍野的高粱、谷子，丰收在望；南瓜、土豆，个个肥美；川道里稻谷飘香，山坡上牛肥羊壮，一派塞上江南的好风光，高兴地说：

“丰收啰！丰收啰！看起来，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老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党群关系密切了，军民亲如一家人，到处赞扬“毛主席的好领导”！到处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自己却坚持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经常强调群众路线。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在延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结交了不少的朋友。杨步浩、吴满有、赵占奎、李鼎铭等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莫逆之交。他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

要求，和他们商量办事。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了，他要儿子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背上一斗半小米和铺盖卷到艰苦的山区去拜农民为师，向农民学习。

春节期间，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人拜年，毛泽东和群众一起联欢。有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摆了凳子，请他们坐在前边。毛泽东坚持坐在群众中间。他说，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要尊重主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但斯大林要给他几个师的装备，他坚决不同意。

毛泽东对斯大林十分尊重。1939年12月2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人活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他说：“现在世界上分为两条斗争的阵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这是压迫人民的阵线；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反抗压迫的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阵线，有些人觉得好像是站在中间，但是它的对头是帝国主义，它就不能不引社会主义为朋友，不能不属于反抗压迫者的革命阵线的一面。革命与反革命阵线都要有一个做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反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张伯伦。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个斯大林，这是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革命指挥官于些什么事？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而要这样，就要领导十几万万向压迫者作斗争，而使之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办的事。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妄图灭亡中国；蒋介石调集大军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国革命处在十分困难的关头。然而，毛泽东临危不惧，遇难不乱，高瞻远瞩，统观全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高度，从世界人民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角度，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和评价了斯大林。这是对的。因为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苛求于外国人。

1943年春，苏德战争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要从东方进苏联。浴血奋战的苏军，面临被德日两个凶恶的帝国主义东西夹击、腹背受敌的境地。斯大林发电报给毛泽东，说愿给中共几个师的装备，希望中共组织兵力到蒙古接运装备，抗击东线日军。

毛泽东笑着说，给装备当然好，但火中取栗，无济于事呀！蒙古地方那

么大，日本飞机多，连延安城都炸成了瓦砾滩，装备怎么拿得来？日本侵略军正强大，我们力量小，只有广泛发动游击战，使侵略军陷入火海泥潭，拔不出来，才能配合苏军的反法西斯战争。接着他指示吕正操、肖华、李运昌、程子华等尽快地将部队摆上山海关、长城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籍制日军兵力，但却不同意派人到蒙古去取武器装备。

斯大林不了解中国人用小米加步枪连连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情况，又来电报催促。

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仍坚持不同意派人去取武器装备。

王明闻讯，极力鼓吹“建立几十个师团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有人对此表示赞赏，来劝毛泽东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却下一定要照搬他的片言只语。我们明知派人去蒙古取武器装备，几乎等于白白送死，为什么还要派人去作无谓的牺牲？他坚持不同意去。

斯大林第三次电报催促，毛泽东仍不同意。

党内有些同志，劝毛泽东按斯大林说的办，派人去取武器，毛泽东摇摇头。可巧这个时候，机关流行感冒，卫士中也有几个人患了感冒，咳嗽发烧。医生劝毛泽东吃药预防，师哲也劝毛泽东吃点药。毛泽东说乱弹琴，没病吃什么药？要相信自己的抵抗力。他注意锻炼身体，果然没有患感冒；可是，过了不久，他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开始化脓了。

医生劝他吃药，吃抗菌素。

毛泽东不肯吃。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医生耐心地解释说，“这是龋齿引起的牙床发炎，开始化脓，淋巴也肿大了，得快吃药！”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头，却仍然笑着说：

“你们这些医生呀，就爱用药！”

医生趁机宣传卫生知识：

“主席，治病用药，就像你指挥打仗用弹药是一个道理：治病时用药杀细菌，打仗时用弹药消灭敌人。不用弹药怎么消灭敌人呀？”

“我不用药！”毛泽东固执起来，有时像个倔强而又顽皮的孩子，一边牙疼得直吸凉气，一边又连连地摇头。

师哲想起了斯大林叫取武器弹药的事，也过来劝说：“治病，用药，杀菌，消炎，这是规律呀！”

“那不一定！”毛泽东争辩说，“中国过去几千年，没用抗菌素，靠一把草药，病也照样好。你说那里边没规律吗？”

毛泽东注重理论，但他往往凭直觉、靠经验办事。由于有理论根底，他的直觉经验往往非常深刻，入木三分，见解独特。他说：“我不用药，你们吃药好了，你的抵抗力就没有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增强。我们应该调动自身的抵抗力对付外来的侵略，消灭害人的病菌。否则，小病大养，常用药物，身体的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锻炼，肌体的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师哲没有再吭声。他在帮毛泽东看病中，不知不觉地医治了自己的心病，提高了认识。

医生却不服，继续争辩说：

“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药有用处。”毛泽东笑着说，“当肌体抵抗力弱时，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可反败为胜。这一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入侵者？”

果然，没用几天，毛泽东没用抗菌素，病好了。毛泽东见了师哲得意地笑道：

“你看看，怎么样？好了，全好了！我的抵抗力战胜了细菌，病好了。要说规律嘛，这就叫自力更生，不能光依靠外援。古今中外，万事万物，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师哲望着毛泽东那恢复了健康的身体，豪爽的性格，乐观的情绪，从心灵深处涌出了诚挚的高兴和敬意。他深深感到：自力更生，百折不挠，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已经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中坚，虎气的表现。不断地向困难、对手挑战，勇敢而巧妙地应战，尽量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克敌制胜，是毛泽东性格的基础和核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此，对个人的生活、治病——乃至吃药的小事也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胜利，就隐藏在最后的坚持中。

中国革命的航船，超过激流险滩，按毛泽东指引的航向飞速向前。到1945年春，中共党员发展到121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120多万。毙、俘日、伪军计171万多人，创建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达9550万，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些铁的事实，中国人民有目共睹。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已经为全党公认，并且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毛泽东思想是胜利的灯塔。他的威力，逼得那些当年和王明一起反对过他的人，不得不伪装起来，改换门庭，装扮成他的积极拥护者。康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中共七大时，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正在开会，康生走进会场，给高岗打了个招呼，就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说他当年在莫斯科和王明没有什么关系，说他一贯反对王明、拥护毛泽东；说毛泽东是革命的天才，一贯正确等等。康生讲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不时流下激动的泪水。师哲知道，康生这是利用边区党员代表不了解他的底细，欺骗干部，争取选票的。后来，他问康生：“你能不能把你的话在中央直属代表团再讲讲？了解你的同志再说说？”康生摇摇头，又去到不知他底细的代表中游说。这一手很厉害。伪装、奉承加狡辩，不仅使康生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而且使他蒙骗了毛泽东，后来身居要职，搞阴谋诡计，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斯大林的又一个伟大功绩在于：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坚定不移而又机智勇敢地进行了举世无双的反法西斯战争。战争初期虽然被动，损失惨重，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面对严酷的考验，临危不惧，力挽狂澜，带领苏联人民，激战列宁格勒，保卫莫斯科，又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宏伟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役，歼敌150万人，使纳粹德国的闪电攻势彻底完蛋。

为了合纵抗敌，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还积极争取英美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底，英美被迫对日、对德宣战，接着，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日、对德宣战，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

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命运。他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及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八月间，苏联红军一入东北，吕正操、肖华、程子华等指挥部队，迅速出关，配合苏联红军，很快地在东北打开了局面。苏联和美国的许多记者都惊呼：

“共产党、八路军真如自天而降！”

“八路军腿上没有毛，但比国民党、蒋介石用美国的飞机、汽车、军舰还来得快，捷足先登！”

其实，这是毛泽东早就部署好了的“神兵天将”！

20 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 斯大林忍痛甩掉王明

延安整风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解放运动。

1942 年至 1944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互相比较、互相交锋的重要阶段。遵义会议后，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正确地处理了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面。延安的整风运动，是系统地反对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思想斗争；是消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坚持和发扬中共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行高度的集权领导。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成了指挥一切的“老子党”，对各国的共产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给国际共运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抵制了苏联共产党的干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坚决依靠中国人民的革命，必须依靠自己”斗争策略的正确坚决”。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

毛泽东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反对把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教条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他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为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撰写了许多著作。就拿他制定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来说吧！抗战伊始，亲日派汪精卫等人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以后，幻想依靠外援速胜。鼓吹“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毛泽东分析了世界形势和中日两国的特点、力量对比，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并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写成了《论持久战》。

为了写成《论持久战》，毛泽东反复研究，集中概括，日夜奋战，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一点小米饭和土豆菜。窑洞里的书桌边，放着一块小石头，手臂酸疼时，他紧握几下石头，活动活动，使筋骨得到松弛。五天以后，他累得脸色苍白，双眼充血。但他越写越兴奋，接连苦干。天气寒冷，他手在写作，脚在烤火，第七天的黎明，他正写的得意，突然，感到脚上烧痛，越来越厉害，无法忍受。但他有几句激情的话，不写不行；当他写完那几句话后，拉出脚来，低头一看，糟糕！右脚上穿的布鞋，已被火盆中的木炭火，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8 卷第 778 页。

烧开了一个洞。

毛泽东端来茶缸，浇了点水，扑灭了火，喘了喘气，感到有点乏困。但他在窑洞里活动了一阵身肢，喝了一杯烧酒，又继续伏案写作。奋战八天后，他过度劳累，头痛眼花，有时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治。他吃了点药，休息了一阵，又继续写作。直到第九天，毛泽东才完成了这份印成八十页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抗战胜利的前途。他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在中国能够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但是，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遭到最后失败。中国决不会灭亡，必然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有了无产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科学地顶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他特别指出：其中的第二阶段即是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的重要转机。

毛泽东特别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持久战，才能赢得最后胜利。他批评“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说他们都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片面地夸大武器的作用，都是唯武器论者。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量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正因为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所以，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毫不慌乱，既要高举联合全国爱国同胞的抗日旗帜，抵制外侮；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投降国民党，不依附蒋介石。这在斯大林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毛泽东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做得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肯相信，不敢承认，闹得非常被动。

1940年3月，王明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让他长期坚持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流毒继续作怪。毛泽东对此作了批评。王明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真正接受，只是见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硬碰不行，便玩起两面派的手法来，表面上极力赞扬、吹捧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进行攻击和污蔑。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讲演，他讲题目就是《学习毛泽东》。他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学习毛泽东的什么呢？

王明在演说中讲了五个方面：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他说，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虽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他“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作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在这篇讲演中，把许多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好像王明对毛泽东十分敬重，对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赞成的。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王明为了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而作的姿态。正如1948年4月1日王明向任弼时所说的：“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是想搞好的，故……青干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但在背后他却对毛泽东思想肆意污蔑。例如1939年底他在延安作的一首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说：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
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其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

1940年5月7日《新中华报》。

《任弼时同志日记》转引自《党史通讯》1954年第7期。

《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72页。

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了，它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将来它必然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说得这样清楚，哪里是什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呢？实践已经证明，这部光辉著作，不但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且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正确运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真正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前途。

希特勒的闪击战，使斯大林一时慌乱。延安的电报，令斯大林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点半，希特勒以190多个师的兵力，背信弃义，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的海陆空军一齐出动，像狂风暴雨似的袭向苏联。德国的盟友和仆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跟着希特勒袭击苏联。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巨大的大决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斯大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凌晨4时许，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站在桌子旁边，半天没有说话。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里，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目光。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面对这数百万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的突然袭击，该怎么办呢？敌人这么强大的攻势，我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为什么不事先指挥部队作好防御呢？难道我们的情报部门、兄弟党和友好人士都没有提醒吗？！

斯大林沉思着，突然，像被什么狠刺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拉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叠电报，迅速翻阅起来。

人在慌忙的时候，特别是在危急关头，要寻找一件急需的东西，往往很难。越慌越乱，越乱越急，越急越找不到急需的东西。斯大林将那些重要的文电翻了一遍，沮丧地摇了摇头。

马林科夫问：“斯大林同志，你在找什么？”

“电报！一份从延安拍来的电报！”斯大林焦急地说着，仍在那一叠电文中翻阅。

“是中共关于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的电报吗？”

“是的，是的，我记得放在这里，却怎么找不见了？”斯大林说着，仍在寻找。

马林科夫立刻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取出一份电报，递给斯大林，说：

“不，电报在这里。你当时看后说：这是谣言，全无根据，让我保管着。”

斯大林接过那份简短明确的电报，看了又看，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那电报上只有一句话：

“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希立即采取对策。”

然而，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却认为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会突然袭击，甚至怀疑那是英美方面的

挑拨离间。现在，事实证明中共的情报是准确的，毛泽东关心苏联的命运。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而自己由于判断失误，坐失良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斯大林当即对站在一边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请您以您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伏罗希洛夫表示愿尽快照办。

斯大林那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在这数百万法西斯匪军闪电袭击的面前，在这苏联国家民族的命运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以有中共这样一个兄弟党而感到欣慰，他以有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邻国而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根据总参谋长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报告和中共的电报信息，当即发出命令，要前线各部队作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军可能发动的一切袭击，但为时已晚，希特勒德国的“闪电战”，使苏军猝不及防，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气得斯大林拿着电话听筒，沉沉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粗声地骂道：

“希特勒这个大流氓！”

现在，斯大林知道自己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他曾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决定，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其实，这些人皆为斯大林所左右，对他迷信而失去独立见解，过分地相信他的过人智力和无上权威，很少提出不同意见，致使斯大林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领导集体也被希特勒这个混世魔王欺骗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正面临一场空前浩劫的威胁！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它！斯大林经过一番沉思，和政治局委员们商讨之后，发出了第二号命令，号召各军区、各部队向入侵者进攻，消灭敌人！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命令也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希特勒的、“闪电式”进攻，使红军正在混乱地退却，通讯联系中断，莫斯科和各部队、各军区一时无法联系，反攻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在战争初期，苏联受到了惨重的损失。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给予坚决的支持和实际的援助。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组织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援苏联抵抗法西斯的神圣战争，并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实际行动来援助苏联。

毛泽东指出：苏德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社会主义反侵略力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两个敌对社会体系不可调和的斗争，苏联的参战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使全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迅速形成，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顽强斗争！毛泽东的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毛泽东说：“……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政治上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钦差大臣”，因而，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进行系统地批判。

王明不服。9月12日，王明在会上发言，不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且推卸责任，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人”。

王明的狡辩和反攻，说明要真正端正党风，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主张。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彻底抛弃，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此就开始了。2月16日，王明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一首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曰：

雍容傲骨岂凡流，
荷菊梅兰未可侔。
自是凛然争气节，
独逢乱谗不低头。

普遍整风阶段刚刚开始，王明便感到很不舒服，住在医院，借物言志，通过歌颂牡丹的“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谗不低头”的气节，来抒发他对整风运动的对抗情绪。

整风运动如春风化雨，煦和感人。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在整风中，学马列，谈体会，忆历史，论现实，有理论，有实际；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王明感到，自己那一套教条主义的货色全完了，于是，在2月下旬，在中央医院又作了一首口语体的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
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
其他都不管。

在诗后，王明还特地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这两首诗和后边的注释表明，王明不仅讳疾忌医，而且对医生恶意诽谤，对延安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肆意污蔑，所谓“行四反”，完全是恶意地诬蔑、诽谤，不值一驳。至于“一切为个人”、“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等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前面已经说过，当王明把他写的那篇《学习毛泽东》交毛泽东看过以后，毛泽东就说自己“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何凯丰的信中又说：

“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直到1948年8月，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应“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不赞成。他在8月15日致吴玉章的信中还坚持说：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而且是一再反对这样做，反对这样的提法。王明的造谣诬蔑，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42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表面接受批评，背后又在捣鬼。1943年春，刘少奇回延安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帮他认识错误，王明仍阳奉阴违。张闻天做王明的工作，王明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又一次碰了钉子。

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打破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国际路线”、“国际指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树立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关系全党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去从马列主义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因此，马列主义的学风，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又具

《王明评传》第405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页。

体分析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综合的研究，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制定党的路线政策，做好各项工作，这才是党的好作风。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主要目的之一。为此，他作了多年的努力，写了许多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观点。早在 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并且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这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得多么鲜明，多么深刻，多么迫切呀！然而，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所以，1941 年 5 月 5 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报告时，又强调了论点。他说：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下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提，的确没有反苏和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只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斯大林的宗派主义和惩办

主义，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注重思想教育，只着重组织处分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国际指示”、“不执行国际路线”等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毛泽东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多次被他们批判斗争，给予处分。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是正确的，有功的，却被解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1931年11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1932年10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领导南昌起义有功，也受到了党纪处分。1930年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对瞿秋白的无情打击，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教训时说：

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做法后，创造出来的方针。

但是，当年在莫斯科和工明一唱一合的康生，这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了。他既掌握着整风运动的部分领导权，又直接控制着反奸肃特的中央社会部。在整风前后，他利用逼、供、信，把一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边区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员，打成“特务”、“汉奸”、“红旗党”；又利用这些“炮弹”打开缺口、制造舆论，“扩大战果”，企图把整风运动变成“整人运动”、“抓特务运动”。

有一次，康生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控诉、规劝大会，先让被他屈打成招的一名干部“现身说法”、“坦白交待”，接着又点了许多单位和许多人的名，“敲山震虎”，闹得人人自危。

没几天，康生指挥边区保安处就逮捕了二百多人。

1943年7月15日，康生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的“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要求普遍开展“抢救运动”。没有几个月，闹得陕甘宁边区“特务”如麻，人心惶惶。一封封告状信和“坦白书”飞到了党中央。

一天，师哲又把一厚叠“特务”的“坦白书”和“交待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看了一份，就看不下去了。他问师哲：

“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这都是当事人自己写的，自己坦白自己是特务，还能有假？”

“不，事物是复杂的！人们都在一定的条件下说话、办事、写字。你说说，他们写的这每一句话都真实？！”

师哲轻轻地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起了本机关有两位从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为人老实，工作勤奋，平时表现很好。突然，有人说他们是派进来的特务。他们先不承认，后来，经过批判、斗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且写出了书面交待材料。师哲觉得这样硬逼出来的“特务”，可能有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真实看法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沉思良久，站立起来，在窑洞里踱着步子，像自言自语，又像是

“是啊！事物很复杂。看人看事，不能光看材料，看现象，看口供，一定要看实际。当年在中央苏区，有人抓 AB 团，靠口供、逼供信，当时说的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结果呢，把许多好同志冤枉了。”

康生继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1943 年 10 月 8 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说：绥德县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 2600 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 280 人，被揭发者 190 余人。毛泽东看了材料，沉思良久，提笔批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又下令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平反，并且主动承担责任，当众向受冤屈的人鞠躬，赔礼道歉。成千上万的干部党员解脱了，整风运动的航船绕过了暗礁，驶出了险滩，扬起了胜利的风帆。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应该看到，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斗争是正确的，但没有斯大林的支持、默许与认可也是办不到的。应该承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有个发展过程；而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前期已有初步认识，并有积极行动，是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斯大林的认识虽然有错误，有反复，但也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共产国际威信很高，组织性强，纪律很严。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1937 年王明回国时，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是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所以回国后，他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的宗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甚至造成了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一致，让人们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就在这严重混乱的关头，1938 年秋的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指责王明的错误言行，对于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有许多是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对此虽然不满，但还是容忍了，默认了，并没有强烈的反击。斯大林虽然曾经怀疑中共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但他始终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对待南共联盟和铁托那样的粗暴、蛮横态度。尽管王明一伙在不断煽动，毛泽东又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的方针，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支持、帮助为主的立场，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的统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斯大林甩开王明而支持毛泽东是尊重事实、尊重中共、“忍痛割爱”的正义之举。自信而固执的斯大林长期信任王明，而对毛泽东“一无所知”。毛泽东所坚持的又是和苏联模式大不相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怀疑到支持、赞扬是可以理解的。难能可贵的是：当斯大林发现王明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惨败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转机的时候，他尊重事实和真理，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不仅需要用高度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需要扭转苏共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的习惯势力。斯大林这样做了，并且默认了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实际上包括斯大林）的错误，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毛泽东对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有一个总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季米特洛夫等人签名，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宣布“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由执委会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分部加以批准。”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

革命圣地延安，很快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电文。

这是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运动的大事，也是关系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败的大事，必然受到多方关注。党内党外、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毛泽东拿起那份翻译出来的电文，看了一遍，放下电文，若有所思地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又背起手来，在窑洞里踱起了步子。

师哲问毛泽东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听而不闻，没有回答，只是又大口大口的吸了两口烟，皱皱眉头，进入了更深的沉思。

的确，这件事情关系重大。

毛泽东在重大的事情上，从来不信口开河，随便表态。

等了许久，毛泽东只让师哲给他找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历史材料。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它是由列宁倡议并领导创建的。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政党的52名代表。中国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列席了大会。列宁主持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国际的领导机构，由每个党派派一名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并由执委会推选列宁等五人组成执行局，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国际的直接领导。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并且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有一个总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主张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他认为犯不犯错误，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

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关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3）第299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材料》（3）第3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

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巨大的功劳。毛泽东特别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功劳。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

毛泽东指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以及各国都有很大的功劳，为什么又要宣布取消呢？他回答说：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各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领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合适的，现在就不合适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与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说明。他说中国人民苦难深重；斗争也很英勇。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之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拥护，统一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思想，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摘要）《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摘要）《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摘要）1943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鼓舞了抗战救国的情绪。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逆流，但很快地就被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击退了。

21 斯大林重视中国经验 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

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的文章尽快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斯大林了解了真实情况，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并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观点。

1950年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商定了中苏条约、协定的原则、内容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米高扬带领的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具体研究，拟订条文。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师哲作翻译。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非常热情。由于中苏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的会谈显得十分投机，气氛融洽。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多次劝毛泽东吃格鲁吉亚式的烤羊肉串、羊肉汤、红菜汤，询问毛泽东的著作情况。

菜虽然不算太多，但烹调精美，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

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

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听了周恩来的话，斯大林认真地说：

“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深深感到用正确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他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办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斯大林转了转手上的烟斗，认真地问：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毛泽东坦率地说：“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编辑，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思一刹，决然地说，“我想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有理论修养，你看合适吗？”

“那太谢谢你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也高兴地笑了。他对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准备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高兴；更对自己能派人协助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得意。这是他近日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落实了，他感到欣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谈到这里，他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意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再问问。”

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毛泽东明确地说：“地址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而是在另外的

地方，比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

斯大林有点不理解地问：

“为什么不放在克里姆林宫呢？这里一切都很方便。”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语气虽很平和，但把“我们这个主权国家”讲得很明确很清晰，毫不含糊，态度也相应的有些强硬。

斯大林脸色一沉，显得有点不悦。他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强笑着说：“是的，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从来没有过”。这也是事实，表示若在外边饭店举行招待会，虽盛情难却，但他是无法去出席的。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变化，坚持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话也加了力度，显得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进一步说：“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突然停顿下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声响。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在冷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再向政治局请示一下……”斯大林终于做出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是准备打破自己数十年来恪守的信条，准备破例地参加中国同志在外边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了，但话未说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盟友。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他领导的新中国，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他都有无限的魅力和无比的吸引力。他再次叮咛毛泽东尽快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应诺。

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地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

目送着毛泽东一行远去的背影，斯大林陷入了回忆的沉思。回忆认识这位中国巨人的经过。

是的，斯大林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认识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推行苏联模式，限制压抑毛泽东思想发展。斯大林过去不知道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约在1927年7月间，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他们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追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责任。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指责，斯大林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和资料。其中有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是毛泽东。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名字。那篇文章写得观点鲜明，气势磅礴，生动感人。当时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有俄文版也有英文版。这是《共产国际》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也是斯大林第一次读到中国共产党人发表的重要论文。然而，由于相距遥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只相信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斯大林当时只采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具体事实，作为回击反对派的论据。如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论述“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时，斯大林回答说：“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

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在论述“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时，斯大林特别指出：“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然而，斯大林当时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观点，没有采纳毛泽东那种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导致他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了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深入农村，坚持武装割据，艰苦奋斗，逐渐领导党和军队创造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斯大林长期不理解、不支持这条中国人创造的独特道路；而信任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经验、苏联模式，批判毛泽东等人的“梢山路线”、“游击主义”，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直到1935年春的遵义会议，中共在失去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第一阶段，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形成的阶段。

第二阶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当了中共的主要领导，王明一伙并不服气。1937年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国后，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钦差大臣满天飞”。从极“左”跳到极右，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党的领导，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关系中共领导权和中国革命路线的一场重大斗争。在那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历史，审时度势，忍痛割爱，甩掉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及时地派王稼祥同志回国，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领袖地位，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后来，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进一步批判了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一点，连王明也供认不讳。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给中央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及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同时，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7页。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8页。

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我在此就下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我不仅以一个党员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在这封长信中，王明不仅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而且“郑重声明”。

“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重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职责，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的重大损失于万一！”

王明的悔过检讨后来又有反复。但是王明曾经认错的表现。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使斯大林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思想了不起！

第三阶段，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压制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国内形成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斯大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虽然有支持帮助，但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需要出发，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实行用武器、物资援助国民党，用马列书籍援助共产党的政策，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一、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1945年7月2日晚，斯大林和宋子文会谈时，承认他说过，“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斯大林又说：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会谈的结果表明：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毛泽东主张自卫反击。斯大林威胁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不惧险，不信邪，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迎难而上，艰苦奋斗，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因此，斯大林承认错误，表示“内疚”，说“胜利分清了是非”。

第四阶段，承认毛泽东思想，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7月，刘少奇受委托秘密访苏，对于斯大林了解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具体结识、还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这64天和不久后发生的抗美援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围绕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当面会谈、互相切磋，订立条约协定，结成友好同盟。由于过去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一见面，斯大林特别热情、谦逊，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具有虎气豪情而又长期受压的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热情赞颂，不仅不感谢、激动，反而委屈他说：“我

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给斯大林碰了个软钉子。

高傲固执的斯大林当时不好发作，机智地用“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语言，扭转局面，使会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但他对毛泽东的疑云很重，猜忌颇深。据当时接触过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中记述，说“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现在，经过十个星期的接触、了解、会谈，斯大林不仅消除了怀疑、误会，而且看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因而建议毛泽东尽快把他的文章编辑出来，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情”。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怀疑，刚正不阿；赫鲁晓夫挑拨离间，枉费心机。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误解、怀疑，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意见差异，暂时矛盾，成为赫鲁晓夫诋毁马列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口实。赫鲁晓夫在《回忆录》和《续集》中，多次写到这些怀疑和矛盾，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晤前和会晤中，虽然表现得热情友好，但他对毛泽东是有怀疑的，有看法的。斯大林的怀疑和看法，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从未来过苏联”，“我对他一无所知”，所以怀疑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否真正友好？联系到斯大林和苏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上，长期以“领导党”、“老子党”自居，在对待毛泽东和中共的态度上，也流露出了这样的情绪，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在这一点上，具有虎气豪情的毛泽东，也是不轻易买人帐的。所以，他和斯大林一见面，尽管斯大林在夸奖他，称赞他。说他“很年轻”、“很健康”，并且说他“伟大，真伟大！”说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但是，毛泽东却用低沉的声调说：“不，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

赫鲁晓夫的上述回忆、就是“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的有力佐证。

斯大林巧妙地绕开了毛泽东提出的“是非不明”问题，笼统地回答说：“既往不咎嘛！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是的，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胜利了。这个胜利，分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是非，分清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是非。但是，胜利并没有使斯大林完全分清是非。赫鲁晓夫的回忆是个证明。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的，“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660页。

《最后的遗言》第373—374页。

详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660页，《最后的遗言》第373—374页。因本书前已引用。这里从略。

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又一个证明。这两个证明，都说明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是怀疑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怀疑的，“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第二，“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

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种怀疑和指责，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依据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模式来要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因而是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到1919年，工人阶级才接近二百万人。这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革命性很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长期斗争，觉悟程度较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人数虽不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近代企业里，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有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方式，怎么能够照搬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模式呢？事实上，在三十年代初，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的经验，使党在白区多年积聚起来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的革命胜利，恰恰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批判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怎么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狭隘的农民立场”呢？

第三，“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实质上，是怀疑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依靠工人阶级，不存在任何“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的问题。这是数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的，毋庸置疑。引起斯大林怀疑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分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是忽视广大农民，孤立地去搞“城市暴动”，谁必然要遭到失败。

然而，固执的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虽然承认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有错误，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但他总怀疑毛泽东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去办事，而是过多地依靠了农民，因此，在他和毛泽东会晤时，就直接了当地问：

“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工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守不住上海了，斯大林以为，只有立即组织部队攻占上海，争取上海工人的支持，才算依靠城市工人，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赫鲁晓夫言而无信，他的回忆录很不准确。因为一、当时毛泽东不是“不拿下上海”，而是不能孤立地去先拿下上海。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就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统率45万人马，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修筑工事，层

层设防，并有海空军配合。美英帝国主义还在上海至青岛一线，部署兵力和军舰，蠢蠢欲动。英明的统帅，不可能不看实际，令部队先拿下上海，去符合某种教条。二、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早在 1949 年 3 月 17 日就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 4 月 10 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 60 个师举行攻击。”5 月 23 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4 月 3 日，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没有毛泽东不愿拿下上海的史实。事实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只用了 34 天（1949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27 日）就解放了上海。其间，4 月 27 日至 29 日于郎溪、广德山区歼敌 8 万余人；5 月 3 日解放杭州；5 月 16、17 日解放武汉三镇等地，都为解放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三、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而攻上海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对英美侨民及各国侨民和外交人员，应教育部队予以保护；“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并抽调 5000 名干部组成各系统接管机构，学习政策。上海地下党组织团结上海工人、市民护厂护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是斯大林怀疑的“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毛泽东是注重实际的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必须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就会把事情办坏，使革命失败。他坚持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胜利。

“胜利分清了是非。”

胜利，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斯大林公开认了错，表现了他的光明磊落；背地里有些怀疑，但也承认“胜利分清了是非”。这些情况，证明了周恩来对斯大林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

在赫鲁晓夫这集《回忆录》发表的 14 年之前，即 1960 年 7 月 14 日、15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明确指出：

“研究国际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些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

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经过莫斯科近十个星期的会谈，消除了疑云，

消除了隔阂，加深了友谊，结成了盟友，并且主持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回忆录续集》，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不仅多处失实，自相矛盾，而且对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只讲怀疑、分歧，矛盾、冲突，不讲经过会谈、协商，消除怀疑，消除分歧，解决矛盾，加深友谊，互相帮助，结成盟友，以及签订中苏条约协定等主流和本质方面的东西。这不可能用一时疏忽，片面、偏激来解释，是不是卖主求荣，怀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个谜。

斯大林破例地参加宴会；毛泽东严厉查处“里通外国”。

1950年2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下午6时许，来宾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党政要员、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都蜂拥而来，先后达500多人。按照惯例，斯大林从来不出席这样的招待会。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今天会来。

6时30分正，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旅社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汽车，前来赴宴了。前厅大门敞开，当斯大林那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在这么近处看过斯大林呀！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门口迎接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

场上欢呼雷动。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么贴近的看过斯大林、今天贴身照面，心情激动，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客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王稼祥告诉师哲，斯大林今天来参加宴会，在苏联是破例的，是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

斯大林笑着对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有个愿望，希望我能来参加这个宴会。这在苏联是破例的，我们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同意我破例，所以我也高兴地来参加宴会。”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年龄大了，如果身体支持不了，出出面就行了，不一定要参加到底。”

斯大林说：“你们来一次不容易。政治局同意了，我也乐意奉陪。”

宴会厅是玻璃板壁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厅。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在小厅，其他来宾均在大厅。到祝酒讲话时，因玻璃板壁隔音，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眼看玻璃快要挤碎了，周恩来忙叫人将活动板壁拆去，两厅合成一厅，才使激动的人群安定下来。

宴会祝酒重新开始。费德林给周恩来翻译，师哲给斯大林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里。周恩来当场讲话，未拿文稿，可是宣布开会和祝酒词共两千字，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十分惊讶。周总理讲的内容主要是：中苏友好要世代传下去；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贡献；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

周恩来的祝词言简意赅，激动人心。

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简短地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

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并送上火车。莫洛托夫告诉毛泽东说，要爱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这是斯大林再三要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

在莫斯科车站，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谈到了他这次访苏的成果和意义。他说：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仁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无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毛泽东接着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不但肯定了中苏友好与团结牢不可破，而且肯定了“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的调子。毛泽东特别预言：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莫洛托夫等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列车开动了。沿途欢迎欢送，气氛热烈。2月26日，列车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直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物品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辆小轿车。

1950年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受到了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人们都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其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领导人，握着毛泽东的手问寒问暖，十分谦恭。他，就是共和国副主席兼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政委高岗。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对高岗的印象不错，并几次表扬过他；但

随着革命的发展，权势的扩大，毛泽东越来越感到高岗骄傲了，权欲更大了，有点变了。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刘少奇同志。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主席：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不是攻击薄一波，而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在莫斯科时斯大林送给他的那份文件找出来，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1953年12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

当时，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压制别人，抬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利用一切机会，私下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消息灵通，很快地了解到高岗的活动，更加戒备了。当时，他正在杭州休养，捷沃西安到北京后，毛泽东就邀请他和尤金一起到杭州去会谈，并指定师哲陪同前往。

1954年1月2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识，关系颇好，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

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

师哲心里嘀咕：毛主席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把上海的公安局长调来保卫？有什么情况吗？

果然，事出有因。第二天，毛泽东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会客厅里，不像往常那样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毛泽东也不似往常那样态度和霭，谈笑风生。客人就座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简单地问了问他们访问、工作的情况，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只是老实地作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想打倒谁。毛泽东虽然指着他说话抒情，但意在言外，并非指他。

所以他态度自然，笑得真切。译得准确，毫不慌乱，翻译得连一个拌子也不打。

捷沃西安和尤金听着毛泽东的湖南话和师哲那流利准确的翻译，禁不住抬起头来，用那质疑的、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态度从容、心底坦然、毫不慌乱的俄文翻译。

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26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但高岗是高岗，怎么把他他说成“陕西”，并且指着师哲呢？

回忆此情此景，师哲心里难受起来。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跟着毛泽东也奔波了十多年，不怕艰苦，不惧牺牲，老老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毛主席了解自己。可是，今天当着苏联客人的面，他指着我说陕西人要打倒他。我虽知他指的是高岗，但客人不知道，对我也疏远了！

这怎么办呢？事关党的机密，不能明说。既不能给毛主席去提意见，也下好去给客人作解释。聪明过人而又刚正不阿的师哲略一沉思，又轻松愉快地给客人讲起了秦灭楚的故事。

师哲说：秦灭楚时，秦人意见并不一致，不是铁板一块。据我们韩城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当时，秦人的内部矛盾也很大。秦始皇要灭楚，问他的大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答：六十万。

秦始皇想，我秦国共有六七十万人马，都交给你王翦带走。岂不国内空虚？万一你王翦中途叛乱，反戈一击，社稷江山岂不成了你的？另一位将军王陵，说他带二十万人灭楚，足够了。好！秦始皇当即拍板，给了王陵二十万兵马。

谁料，王陵本事不嘉。二十万兵马很快被楚国吃掉了，还引来楚兵压境，威胁秦国。

没办法，秦始皇只得硬着头皮再去请王翦。那王翦见秦始皇疑心太大，不肯出山。秦始皇又坐着车子亲自到频阳去请。王翦说，要臣灭楚，非六十万兵马不可！秦始皇咬咬牙，行！给你六十万！

王翦带着六十万兵马出发了，秦始皇亲自送行，并问王将军还有什么要求。王翦见皇上对自己不放心，就说灭楚之后，要良日子顷，告老还乡。秦始皇见王翦没有野心，便满口答应。这样，后方巩固了，王翦很快地灭了楚国，并且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

有趣的历史故事，听得客人笑了。后来，师哲才知道，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已经在修改决议草案，准备召开四中全会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党

内外的一切职务。会上，毛泽东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谈话记录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但是，很显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此举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赫鲁晓夫显然是同情高岗反对斯大林的。他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

“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斯大林处理高岗情报的问题上，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观点，要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赫鲁晓夫则十分同情高岗，埋怨“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惋惜使他“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对苏联“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远隔千山，言传其人。是非曲直，一看便知。

过了一年半，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没有具体叙述斯大林给他传递材料的经过，接着说：“1953年12月24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

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对里通外国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提出了警告，明确他说“这是不好的”；接着，又解释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情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要给适当的处分。”

在这里，毛泽东把不许里通外国的理由，纠正的方法，都讲得十分透彻。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只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从谋取“领导党”、“老子党”的霸权主义出发，从控制、操纵兄弟党的阴谋出发。

偶然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意在从高岗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其实，他不仅对斯大林的行为作了必要的说明，也对赫鲁晓夫的观点作了必要的批判。

22 毛泽东迎险而上连连胜蒋 斯大林不同意打解放战争

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毛泽东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革命该怎么搞？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他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善于观察社会。毛泽东认为看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再分析一下他处的环境，就可以预见他的将来。

当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各种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是蒋、宋、孔、陈等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大财阀。

蒋介石是美国、英国等极力扶持的“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领袖”。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多次许诺的未来中国的“领袖”。

蒋介石，这位大独裁者、大军阀、大财阀、“大国领袖”将把中国引向何处？他将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不能不成为毛泽东认真深思的问题。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并且几次企图与日本侵略者谋和。对于蒋介石在抗战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拙劣表演，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也十分反感。这位先后在华十年，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说蒋介石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的平衡术而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史迪威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蒋介石与日本有勾结的迹象”，“国民政府囤积租借物资，以备内战”，“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史迪威估计，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认为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史迪威把蒋介石比作“响尾蛇”、“狐狸”，说“这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以便利用这股力量去抗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他估计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

为了在战后能防止苏俄和中共的“赤化”、建立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霸权，

《蒋介石主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28、429、447页。

《蒋介石主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28、429、447页。

《蒋介石主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28、429、447页。

《蒋介石主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28、429、447页。

《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48、458页。

《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48、458页。

《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48、458页。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不遗余力地扶植蒋介石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领袖”。但是，在经过长期观察和分析大量材料之后，罗斯福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于1944年7月6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信中写道：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他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粗暴侵权一再拖延。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写道：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蒋介石恼羞成怒，冒着丢掉美国支持的危险，于10月10日，在双十节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演说之际，断然宣称他决不在史迪威问题上让步。

毛泽东闻讯，立即以“延安观察家”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1944年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写道：

一个“四大强国的领袖”，在国庆这样的节日，对于外国人的严肃批评（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指为听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实在有失中华民国的体统。十分有趣的是，蒋氏在此次演说中，提出了“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一项要求。（蒋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他们就要这样做）……这是蒋氏排外情绪的表现。事情是战争到了今天，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如此腐败无能，某些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有设置同盟国联合统帅部的必要。为了拒绝此项要求，平素以专靠外国援助为法宝的人们，也谈起“自立自强”了，并要“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了。

众所周知，围绕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斗争，最后以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全部胜利而告终。罗斯福派魏德迈接替了史迪威，并且不再要求魏德迈对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赫尔利接替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建议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召回史迪威的消息，并写道：蒋介石对“中国崩溃的速度感到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我们堪称好盛的中国人民。”

然而，就是这个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无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在日本投降后，又妄图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第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733页。

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三，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

很明显，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不仅要摘桃子，抢果实，而且磨刀霍霍，准备向人民开刀了。

怎么办？党和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非常繁忙，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方面处理各种事务，一方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党政领导和军队将领。由于抗战的胜利，革命的发展。许多新的地区、部队、事业需要接管。毛泽东一面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往往忙得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为了解渴充饥，在工作时顺手抓来工作人员送来的瓜果、馅饼或面包，填进嘴里，边吃边干。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都在分工合作，紧张地工作着。

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日本投降后，争取东北，成了国共两党注意的焦点。毛泽东十分关心东北局势。1945年8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谈了关于东北局势的设想。他说：我们党在东北苦战了多年，有坚实的基础和胜利的可能。因为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不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在我们背后开枪。西面的蒙古和东面的朝鲜都是友邻。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积极发展，就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设想，最后提到林彪。他给林彪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高兴，欣然领命而去。

为了选派更多的优秀干部奔赴前线，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有一天，毛泽东带了两个卫士到大砭沟的组织部去了解情况，研究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谈着谈着，天下雨了。

毛泽东不惧风雨。开完了会，他就带着刘海宽等两个卫士。骑上马，往回走。

大砭沟到王家坪，只隔一河，纵马即到。但此时雨虽小了。天空仍然黑云滚滚，电闪雷鸣；路上积水泥泞，行走不便。卫士看看天色，有点犹豫；毛泽东见雨下大，纵身上马，两腿一夹，冲入雨幕，飞快地来到延河岸边。

延河，住日秀美的延河，如今发了洪水，浊浪滚滚，涛声如雷，像是千万头狮虎奔驰，又像是一条条巨龙飞腾。刘海宽看了看，说：

“不行，水太大，不能过！”

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脱鞋拉袜子，准备下水过河，还乐呵呵地开玩笑，说：

“怎么不能过？你看，天公都在鼓掌欢迎，闪电照亮呢！走吧！把马让他牵回去，我们俩一起游过河！”

刘海宽急忙向后退。他知道毛泽东喜欢风浪、喜欢冒险，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可是面对这汹涌的延河，翻腾的巨波，滚动的石块，和那不时袭来的漂浮在水面上的游木枯树，他急忙拦住毛泽东，说：

“不行！主席，这不行，这样过河太危险！我必须对党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你……”

毛泽东打断了卫士的话：

“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可你……这样吧，我背你过河！”刘海宽关心地走过来，要

搀扶主席。

毛泽东边解衣服边摇头：“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这人呐，有胳膊，有腿，可不喜欢让别人搀着，背着，我要自己过河！”

“可水这么大，浪这么高，多危险呀！”刘海宽望着那汹涌奔腾的洪水，浪涛翻卷的延河，又看看解衣脱鞋笑迎狂风巨浪的毛泽东，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钧重！他知道，毛泽东坚持要马上过河，很可能是有要紧事，不能拖延；要不，组织部的同志再三挽留，他为什么坚持要冒雨回机关呢？！如果延河不发洪水，他们一扬鞭就冲过河了！可如今，延河像发了疯的巨龙，水大浪急。波涛滚滚，万一渡河中间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待呀？！他拦住毛泽东，哀求地说：

“主席，你先等等吧！让我先去试试水，探探路！”

毛泽东点点头，把那件补钉缀补钉的灰军衣又拾起来，披在了身上。

刘海宽奋勇地向洪水扑去。混杂着泥沙的洪水，浊浪翻卷，惊涛拍岸，只裂开个小小的纹口，就把小伙子吞没了。一道电闪划破云天，一声惊雷震得山响。一个巨浪翻了过来。刘海宽穿过巨浪，浮上水面，抹去了脸上的泥水，逐浪向前。浪脊上的泡沫、草屑、碎柴形成的柴禾浮团，被浪涛撕裂得粉碎四散。刘海宽刚拨开草屑浮柴。突然，一条黑色的十数米长的怪物，张牙舞爪，摇头摆尾，向他扑来了。

勇敢机智的小伙子，迅速地闪向一边，避开了怪物的爪牙，从旁边扑了上去，抓住一看，才知道是一株带根的枯树。小伙子抓住树根，想把这冒充巨龙吓人的木头家伙拖上岸，可是，树乘水势、冲力太大、小伙子拖不动，反被树枝划破了皮。他扔开枯树，游回岸边，说：

“主席，不行啊！水急浪大，下边有滚动的石头，上面有漂浮的枯树，太危险！”

毛泽东却高兴地说：“我看见了，你游得不错！走，马上过！”说着，他取下破军衣，向河里走！

刘海宽急拦着说：“不行呀，浪太大！”

“浪大正好赶，游起来省力！”毛泽东拨开卫士，径自向洪水走去。那脸色，那神气，显示出一种万夫难挡的魄力和藐视一切困难的气概，逼得任何阻拦者也不敢再拦，动手动脚。

刘海宽只好让开正面，接过毛泽东手中的衣物，跟随在他的左右劝说：

“主席，水下边滚着石块！”

“我们在上面游，不用怕！”

“上面有木屑、杂草，还有枯树，残木！”

“杂草能拨开，树木能浮人！”

“你看看！我这儿都划破了！”

“你怕了？”毛泽东回过头来，目光像两把利剑，似乎能劈碎云天，粉碎一切障碍盯着小卫士，不允许有任何争辩，“你可以回去，我一个人过河！”

刘海宽没有敢再说什么。他知道毛泽东决心要办的事，谁也拦不住，就急忙捆好两个人的衣裳，跟在毛泽东的后边，走进水里，游向河中。

水越来越急，浪越来越大。发洪水的延河里，像有无数条凶猛的黄龙奔腾，波涌浪翻，呼啸而下，直向毛泽东他们扑来。刘海宽害怕出事，急向毛泽东身边游来，随时准备救护。毛泽东越过一个浪头，却像俏皮的小孩子一样，拍水击浪，乐呵呵地说：

“你看看，浪里多好玩！”

刘海宽没吭声。情势这么危险，人家急得心如火烧，他竟把破浪当作闹玩，真叫人没办法！不过，他仔细看看，毛泽东不是故意耍乐观，故意说大话，看他那熟练的动作，自如的神态，得意开心的样子，使刘海宽心里也镇定了，乐观了。他游到主席身边，关切地问：

“主席，要不要换你一把？”

“用不着！”毛泽东说着，摇摇头，又挥臂向前游去。

刘海宽受到毛泽东精神的感染，浑身来了劲，跟着毛泽东向前游。突然，他发现一只黑乎乎的东西，摇头晃脑，乘着水势。向毛泽东的头部扑来了。

刘海宽急忙大喊：

“主席，看左面！”

说时迟，那时快，话刚落点，那只黑乎乎的东西已经扑到了毛泽东的头边。毛泽东不慌不忙，脑袋轻轻一偏，让过了那东西的黑头，然后伸臂一搂，将那东西搂了过来。这时他才看清，那是一根顺水漂来的木头。毛泽东搂着木头，游起来更轻松了。

刘海宽推着木头，很快地渡过了河。

毛泽东揩擦着身上的泥水，开心地说：“哈！过了多少次延河，今天最有意思！最不一般！”他用得意的口气，把这事告诉了师哲。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预测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强调坚持自力更生。他明确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国民党蒋介石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专家。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磨刀挥枪，调动几百万军队准备大举进攻，扬言不出六个月就能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另一方面又装作和平天使，手摇橄榄枝，唱起了“和平建国”的调子。不过，他的和平调子，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就是说，你们要和平吗？首先必须承认我蒋家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都必须承认我蒋介石这一个“王”的领导。因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是孟夫子说的真理。

根据这个“理论”，蒋介石提出了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在延安对一位访问者说：

“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斯大林不一定知道孟夫子的这两句话，但他总认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才有可能成为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领袖人物，并且在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保证，“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后来，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人的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也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

《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49—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540页。

梁敬鎔：《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政府统一中国。”因此，斯大林不但支持蒋介石的“民无二王的理论”，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乃至和斯大林的矛盾冲突，就成为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来电：“……要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摇头说：“我就不信……”

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必然要给毛泽东和中共施加压力。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就在那个《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像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腰杆硬了，气也粗了，立刻给毛泽东发出了邀请和谈的电报。电文写道：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盼望之至。

蒋中正 八月十四日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铄八月十六日

在这份电文中，毛泽东将朱德的电报提在前面，要蒋介石表态后，他再考虑会见问题。因为8月16日，朱德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毛泽东在这里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苦战了八年，功勋卓著；日军投降时，你蒋介石为什么不许我们解除日军武装？这难道不是情愿和敌人合作而不愿和抗日有功的同胞合作吗？！至于和平，中共已经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六项主张，只要你不认敌为友，助纣为虐，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等于“将”了蒋介石一“军”。

8月20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

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

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予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

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陀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

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八月二十日

在这里，蒋介石文过饰非，掩耳盗铃，把自己在八月十一日连下的三道错误命令的责任推给了盟军总部；并且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子，埋怨朱总司令对他的命令往往未能贯彻。蒋介石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盟军”。“盟军总部”，借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且以救国救民的口气，坚持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以嫁祸于人，借此宣传中共没有和平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此，蒋介石每次给毛泽东的电报，都在利用广播、报刊大肆宣传，造舆论，造声势，公开地“将”中共一“军”。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券八月二十二日延安

8月23日，蒋介石又第三次致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券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 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亲自到重庆来，看见他这“和谈”攻势，步步凌厉，于是连连紧逼，以“时机迫切”、“问题重要”、“国家前途”为由，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并且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的飞机。这是

在公开宣传：他蒋介石把一切“和谈”、“和平”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你毛泽东快来；若还不来，你就必须承担破坏和谈，破坏和平的一切责任。蒋介石自以这种公开的凌厉的和平攻势，必将使毛泽东陷于前后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谁料，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师哲将电文翻译出来，交给毛泽东。

一向愉快乐观的毛泽东，看着斯大林的电报，脸色阴沉，严肃起来。当时，他还不知道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会谈的详细情况，但他对斯大林电报的立场、观点和措词感到不悦。他愤愤地把电报向桌子上一甩，生气他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不久，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当时，美国也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斯大林的电报，又表示了苏联促成国共两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对斯大林是信任的，尊重的。于是，8月24日，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虽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未定具体日期。因为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面蒋非常担心。大家知道：蒋介石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利用狡猾的诡计，残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多次悬赏捉拿、暗杀毛泽东、朱德等中共的领导人，如今电邀毛泽东，孰知不是“鸿门宴”？！因此，中共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了解情况，然后再让毛泽东赴重庆。

斯大林闻讯，当即又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护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在这里，有必要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解，作一些具体分析。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主张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都主张通过谈判寻求维护和平、防止内战的协议。但是，仔细分析，在此时此事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解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原则的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第一，见解的依据不同：毛泽东根据大量事实指出：蒋介石不但在挑动内战，而且决心要发动全面内战。早在1945年5月18日，在重庆召开的国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大会决议明确规定，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消灭共产党”，准备内战。为此，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权利，并借口受降调动大军向解放区逼进，积极准备内战。毛泽东认为：只有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使其阴谋未逞，才能防止内战，争取和平。斯大林则根据他和美国、英国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不顾中国实际，坚持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是唯一能够团结中国各种力量的“领袖人物”，只有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才可能恢复和平。

第二，目的不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要摘桃子，夺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内战，力争和平，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革命计划采取正确的方针，作好准备，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目的在后者，在建立新中国；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的统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自然只能是前者，或者说不自觉地维护了前者。

第三，方式方法不同：毛泽东主张坚持原则，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不是乞求和平。毛泽东说。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我们的党员和军队要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公开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接着，他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两个电报，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且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正是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这种坚定而果断的立场，才使解放区和解放军迅速扩大，才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和谈。斯大林主张的方式方法则不同：在蒋介石拿起刀来，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关头，怕，怕蒋介石，怕打内战，怕“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乞求和平，难道就能避免内战吗？未必。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害怕的结果，乞求的结果，不但不能避免内战，还有可能使中国人民陷入长期的灾难。而斯大林主张的方式，很可能导入这种境地。

第四，前途不同。斯大林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也很极端：只有和平才是

出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则不然。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在这里，毛泽东无意批评斯大林；然而，斯大林的言行，正好碰着了毛泽东批评的锋芒，成了毛泽东“有的放矢”之“的”。

当时，毛泽东去不去重庆和谈？成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注目的重大问题。延安广大军民对此尤为关切。

为了处理好这个重大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枣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和谈的方针政策，并且讨论了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的问题。会上，有些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主张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有的说蒋介石两面三刀，杀人眨眼；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他向张学良信誓旦旦，但张学良到南京即遭软禁；李济深、胡汉民还被扣押在汤山。他如今接二连三的电邀毛主席和谈，谁知是不是“鸿门宴”？！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说蒋介石此番和谈的目的，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调兵遣将，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他特别指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团结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不去，恰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重庆据理力争，谈笑风生。蒋介石哀叹：“脑筋深受刺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深入虎穴的风险是很大的。

毛泽东亲赴重庆，和那位多年来一直高价悬赏要自己脑袋的蒋介石面谈，自知风险大，便作了充分的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了彻夜长谈，详细而全面地安排了工作，部署了后事。

刘少奇对毛泽东亲赴重庆，也很担心，叮咛毛泽东提高警惕，多多保重。

毛泽东笑笑，强调指出：第一，我走之后，八路军要按原定的方针，坚决行动，不要顾及我的安危。他说：敌人如果敢侵犯、我们就坚决地打。蒋介石的脾气，我摸底，吃硬不吃软。他气势汹汹，往往先试探，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只有我们的部队群威虎胆，敢打敢拼，毫不示弱，我在重庆才更安全。第二，要大造和平舆论，抓好宣传，造成声势。我们去重庆和谈，就表示了我们谋求和平的诚意：剩下的，就要看蒋介石的诚意了，要造成舆论。逼他说话算数，真正走和平的路。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十分乐观；我就不相信，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说着、毛泽东态度严肃，语气沉重、表现了对斯大林威胁的强烈反感。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阐明了谈判的方针和策略。

8月28日，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在重庆机场，毛泽东发表了来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谈话，受到了各界人民的欢迎。

当晚，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会面。事隔十八年，双方感触颇深。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4时许，蒋介石亲自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毛泽东委派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此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没料到毛泽东能去重庆，所以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

9月3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单独进行了会谈，对于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去见蒋介石，将中共的《谈话要点》交给蒋。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回忆起他昨天与毛泽东的会谈，蒋介石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的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而毛泽东那镇静自若、坦率有理的论证，使人毫无疑问地相信，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在毛泽东那镇静、坦诚、以理服人的谈论面前，蒋介石不得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代表。他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他只允许把中共领导的部队整编为十二个师，“乃中央所能允许最高限度”。而他的军队则整编为一百一十四师。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毫无道理地加以拒绝，这样，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领导中共代表，对国民党方面的顽固态度，逐步地展开了巧妙地反攻。这种反攻，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利用美国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急欲带上国共和谈的“成果”回国述职。毛泽东利用赫尔利急欲求“功”的心理，表示要回延安。9月18日，周恩来通知美国使馆，毛泽东拟在赫尔利回华盛顿之前返回延安。赫尔利闻讯慌了，立即复函毛泽东，说他愿意推迟行期，等待国共谈判的结果，并且极力挽留毛泽东在重庆继续谈判。这样，赫尔利就不得不给蒋介石施加某种压力，使谈判达成一些协议。

二、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坚决斗争，据理驳斥。如当国民党代表说，中共军队退至黄河以北地区是欲“分疆而治，三分天下有其一”时，王若飞当即严厉指出：“现在我方官兵都极愤慨，汉奸部队都已获得中央委任，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能生存发展！”义正词严，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驳得国民党代表无言相对。又如9月21日，在谈判具体方案时，国民党代表诬称中共的方案“何异乎割据地盘”，并按照蒋介石统一政令、军令的调子，

要中共“服从政府法律规章”。周恩来当即严厉指出：“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如谓‘我的是我的，你的亦应交给我’此即非民主”，国民党“以被统治者视我党”，“必引起我党之愤怒”。然后，又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地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是中共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而且，国共两党拥有武装是历史形成的，必须正视现实。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我党愿支出军队与政权；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周恩来讲得事事真实，入情合理，头头是道，连国民党代表也不好反驳了。就在这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中共交出解放区，并且威胁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轻蔑地瞥了美国大使一眼，说，急什么？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气得那美国大使干急没办法。

三、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三党等民主党派，沈钧儒、张澜、章伯钧、沙千里、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朱蕴山等民主人士都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联系，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给国民党蒋介石施加压力，为打破谈判僵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军警横行，特务如麻，社会秩序不好。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耽心。毛泽东却广交朋友，谈笑自若。他住在红岩区半山上一栋舒适的房子里，蒋介石指派一辆美国小轿车供他使用。拜访他的人很多，有老朋友，有新朋友，有同志，也有从过去的敌人转变过来的朋友。自从1927年他以合法身份在武汉出现以后，18年间，他没有进过大城市。他的名字常被蒋介石国民党以“共匪”头目的名义，在各种报纸、布告、文件中诬蔑。现在，他第一次不是以“土匪”的身份，而是以中共领袖、救国英雄的身份进入陪都重庆。这在社会上不能不引起很大的震动，使人们不能不感到好奇和尊敬。

毛泽东接待来客表现得潇洒大方，热情洋溢，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把他在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赠给朋友，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这是他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首诗词：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短短的56个字。把祖国的北国风光，描写得美丽如画，生动感人，令人

神往，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然而，毛泽东的诗情不止于此，笔锋一转，引向了更高的境界：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里，毛泽东从祖国山河的自然壮丽，转向抒发自己理想英雄的壮美，他一连提到了中国古代四位著名的皇帝，还有征服欧亚大陆的蒙古英雄，都点到了他们的不足之处，点到了他们不够理想的所在，然后，以“俱往矣”这三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文字，举重若轻，雷霆万钧地唱出新诗：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诗篇，是一首革向英雄主义的颂歌，也是一首憎景交融、气势宏伟、才华横溢的好词！

诗的发表，在重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使许多人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仍是要压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蒋介石是玩弄两面派阴谋的专家，一方面脸带微笑，与毛泽东握手和谈，碰杯联欢，另一方面又调动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向正在谈判的毛泽东施加压力。八月下旬，他命令阎锡山集中一万七千余人，在日、伪军的配合下，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毛泽东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反击，于9月10日发起了上党战役，先后收复了长于、壶关等四城，接着围攻长治城。阎锡山急调两万余人增援。刘、邓决定围城打援，将主力预伏在屯留、虎亭之间的地区，布成口袋阵。10月2日，将进口袋阵的敌军大部歼灭。长治之敌闻风丧胆，弃城逃窜。人民军队跟踪追击，将敌歼灭。这次战役歼敌三万五千人，俘敌军、师长以下将官27人，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经过边谈边打43天的较量，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迫使蒋介石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避免内战，给人民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各党派，提高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协定规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承认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编为 20 个师 ;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其他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飞机返回延安。

延安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四千多人，聚集在延安飞机场，欢迎毛泽东。当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下机梯时，人们禁不住掌声雷动，热情欢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师哲走到毛主席身边，低声他说，主席，大家都想听你讲讲重庆谈判的情况。

毛泽东向大家招招手，爽朗地笑着说：同志们，这次谈判很好。但是，还有些事没达成协议，还有更多的事没有谈到。今后，我们的任务很大，还要做更大的努力。

毛泽东请张治中讲话。张治中讲得很巧妙。他说：“兄弟有幸请毛主席到重庆去，兄弟更有幸送毛主席回到延安。现在，兄弟的任务完成了。”

23 毛泽东巧运筹决胜东北 斯大林因失算调整决策

斯大林说：“我们准备在八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杜鲁门和丘吉尔左右为难……

1945年，毛泽东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认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已经达成了协议的。他指出：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没有达成协议。

今后怎么办？毛泽东明确他讲：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论，两手准备，并且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提斯大林的名，但实际上批评了斯大林那种要中共放弃斗争、向蒋介石乞求和平的观点。

作报告后，毛泽东突然病倒，全身发烧，满头大汗：但他仍带病工作，不肯休息，让勤务员用冷水蘸湿毛巾，敷在额头，降温减痛，以便工作。

师哲看见了，忙上前取掉毛巾，说：

“啊呀，这怎么行？这会闹出大病来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没关系，取出一支烟来，吸了几口，又继续伏案工作。

师哲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去找任弼时商量，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毛泽东同志病了，希望速派两个医生来延安。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重视。他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更关心中国革命。早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就明确地告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

斯大林说话声音不大，但却严肃认真，毫不含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挥师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略蓝图，已经初绘于胸了。杜鲁门在日记中特别写到了对斯大林的印象：“他的眼睛，他的脸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

然而，斯大林的这句话，却使美国总统感到为难。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猖狂进攻的时候，美国曾急切地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由于形势发展，法西斯大势已去，德国和意大利均已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因此，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从争夺世界霸权考虑，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但又怕斯大林说美国人出尔反尔，因此，左右为难，沉默不语。

斯大林见此情景，转了话题，淡淡一笑，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

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杜鲁门听了情绪昂然。谈话后，杜鲁门请斯大林留下共进午餐。

在波茨坦会议上，最使杜鲁门棘手的是如何拒绝苏联对日作战的问题。为此，他设法鼓励丘吉尔的反苏情绪，私下给丘吉尔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小组研制的一枚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里爆炸了。丘吉尔高兴得站立起来。他为西方列强的威力压倒苏联而十分高兴，他认为有了原子弹就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以保证远东将来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不使苏联插手。

为了用核讹诈镇住斯大林，杜鲁门向丘吉尔询问关于把原子弹新闻透露给斯大林的最好方式。丘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他们决定，由杜鲁门在一次特别会议之后非正式的提一下这件事。一周之后，在一次全体会议后，杜鲁门带着他的翻译走到斯大林面前，把具有非凡威力的新式炸弹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斯大林。他没有用“原子弹”这个词，而是说研制了“超级炸弹”。丘吉尔站在距他们五米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大林，只见他淡淡一笑，漠然置之，没有任何惊慌的表示。

实际上，足智多谋的斯大林早已看穿了杜鲁门的用心。美英态度的变化，不仅使他感到不安，而且很为恼火。他认为，是苏联把西方国家从纳粹的法西斯蹂躏下拯救了出来。如果没有苏联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希特勒就会征服英国，并把战火烧到北美洲。如今，战争还没完全结束，美英就开始背信弃义，用新式炸弹作讹诈，拒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怎么行呢？他清楚地记得，美国人曾多次催促他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当他答应在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时，他们都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条件，其中包括把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现在，他们要背信弃义，绝不能让，他仍然强调，苏联人说话算数，将按时对日作战。

经过反复协商和斗争，苏美英三国首脑通过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1945年7月26日，形成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所以没有签字。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讨论，但中国是对日作战的重要国家，公报发表前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在公告上正式签了字，所以又成了苏美英中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说，“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并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现，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最后，又义正辞严地警告日本说：“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这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

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1945年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谈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

为了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8月，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协定，

对日宣战。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斯大林和多数苏联人立刻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是杀鸡给猴看，打的是日本，威胁的是苏联。后来，贝尔纳斯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

斯大林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威胁。他很快召集了五个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令他们不借一切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一枚苏联原子弹！斯大林又紧急召见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要他迅速率部开进满洲，对日作战。

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东北三省作为建立军事侵略的前沿基地。1932年，日本又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军事经济资源，残酷地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把整个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6月，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达70多万人，还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军队19万人，拥有坦克1000多辆，大炮5000多门，飞机达1800架，气焰十分嚣张。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同时用三个方面军的兵力，157万人的军队，29000多门大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发起了对日军的进攻。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土崩瓦解。这敲响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天皇下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同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就在日本受降仪式签字的当天——9月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告人民书》的广播讲话。斯大林说：

“今天，9月2日，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在海陆两方面都已被联合国武装力量彻底击败和四面包围，它终于承认自己已战败而缴械投降了。”

斯大林在广播讲话中强调指出：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在西方是德国，在东方是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被消灭，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斯大林告诉苏联人民说：

“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斯大林接到中共关于毛泽东生病的电报后，十分重视，很快派苏联著名的外科医师阿洛夫和内科医师米力尼科夫乘飞机到了延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同机到达。

毛泽东的病，经过医治，很快好转了。

治病期间，毛泽东和苏联医生阿洛夫、米力尼科夫及师哲等同志，多次谈到过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他说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断地侵略中国，没有一个诚心帮助中国人民。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援助

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这件事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毛泽东强调：“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的确，苏联出动百万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很快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善于分析形势，抓住机遇，组织力量，打开局面。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次日，8月9日，毛泽东就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它盟国作战。他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弹药、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他特别命令冀热辽人民军队和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率部分别进入东北，开辟新的解放区。接着，又令冀察部队在郭天民、刘道生指挥下，向张家口、多伦等地进军，配合苏军南下作战；又令冀热辽部队在李运昌的指挥下，一部分向辽宁、吉林开进，一部分向唐山、秦皇岛进攻。很快的，人民军队先后解放了张家口等城市40座。控制了战略要地察哈尔、热河两省及河北、山西地区，使晋察冀、晋绥、晋冀热辽、东北等地连接起来，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十分清楚东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上，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既可以成为人民军队的粮食基地，又可以为发展大批人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在政治和军事上，东北的北面、东面与苏联、朝鲜接壤、西面、南面与华北解放区接连，互相照应。东北根据地，既可以成为人民军队的可靠后方，又可以改变解放区长期被分割包围的局面，甚至可以彻底改变蒋介石对人民武装南北夹攻的被动地位。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迅速消灭日本精锐部队60多万，日伪残余势力散落城乡，国民党员派遣“接收大员”、“军统”、“中统”特务。但一时还调不进多少军队。人民武装力量只要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可以很快在东北打开局面的。

果然不久，随着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活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为正副书记的东北局，并乘飞机去东北。为了便于和苏军谈判，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东北局向党中央汇报了与苏军中将军杜曼宁谈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又令黄克诚、罗荣桓、林彪等著名将领率部，从华北、山东、冀豫平原等处迅速开往东北。9月后，中共中央将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两万多名干部派往东北。他们到东北后，与抗日力量和当地群众相结合，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府，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欢迎。到11月底，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已达26万人，从关内开往东北的人民部队也有20多万人，形成了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

毛泽东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斯大林不得不改变决策。

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复杂。

蒋介石坚持要独占东北。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蒋介石用军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军。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虽然同情东北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但斯大林根据他给美国、英国的保证：“尽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准备把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更加骄横无理，恣意横行。他们不但横征暴敛，任意抢掠，而且依强凌弱，无端地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地方组织，发动猖狂的进攻，先后攻占了早已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

于是，东北的斗争，不仅关系着国共两党。而且牵动着苏美两国；不仅关系着毛泽东和蒋介石，而且关系着斯大林和杜鲁门。它像一颗拉响了引信的巨型炸弹，全国关注，举世瞩目。过场严重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于全中国局势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反攻。

毛泽东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毛泽东在电报中强调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且有遭到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高瞻远瞩，切合实际，对于夺取东北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依照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斯大林向美国提出的保证，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是支持蒋介石的，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

1945年10月12日，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赴长春就职。斯大林邀请蒋经国赴苏。12月20日，斯大林在莫

斯科对蒋经国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很显然，斯大林的话，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出发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要使美国扶持起来的蒋介石反美亲苏，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蒋介石在美苏角逐中保持中立，因此，他的“最大的一个要求”，而且是“再三声明”的要求，就是“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为了达到此目的，斯大林曾多次声明他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他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得政权，更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能够迅速地控制东北、扭转危局。所以一开始，苏军就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但是，革命的发展，人民的力量，现实的发展，使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重新认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重新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

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的认识。过去，斯大林以为，毛泽东和中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只不过是一些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游击队”，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干不成大事业。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寄予多大的期望，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但是，苏联人进入中国东北以后，发现东北三省，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以不抵抗政策送给日本侵略者的。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逃之夭夭，无影无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万里之外的川滇边陲，只有中共中央积极配合，先后派遣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两万多名干部，率领十万大军迅速进入东北，与原来在东北的抗日力量相结合，英勇战斗，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收复失地，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权。苏联人亲眼看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不是什么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游击队”，而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有觉悟、能战斗、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人民军队。上百万苏联红军战士，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认识、意见反映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这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调整政策的第一个要素。

第二，蒋介石并不按斯大林的意图办事，不肯在美苏之间中立，而是一头扎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坚持反苏反共。尽管斯大林多次向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单单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希望蒋介石在美苏之间中立；但是，蒋介石很清楚：通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已经成了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他和他的“国民政府”很快就要被中共

吃掉。这里没有什么犹疑、徘徊的余地。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认为苏联是中共的后台，都是搞“赤化运动”的，对苏联不能抱幻想。他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只是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打击目前的敌人，而并没有改变他反苏反共的宗旨。

在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上，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认识上，斯大林都比较迟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都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甚至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蒙蔽。据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记叙来看，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斯大林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态度，对蒋介石是，派负责对外事务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去会谈，“让他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而对毛泽东的态度却是怀疑他的人格，怀疑他的立场，怀疑他“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建立和领导的军队。这就是说，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信任、友好、支持、援助；而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怀疑、冷淡、猜忌、旁观。在这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在这国共两党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的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态度，以及准备把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的决策，无疑会使毛泽东感到很大的压力，而使蒋介石气焰嚣张，飞扬拔扈。

但是，蒋介石并不买斯大林的帐，也不吃斯大林的这一套。他认为在美苏两强中间，他只有毫不犹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取得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他才可能在和毛泽东及中共角逐中，取得胜利；否则，就可能满盘皆输，彻底完蛋。因此，对于斯大林的各种友好表示，甚至连准备把东北的民政主权拱手送他的重要决策，也都是虚与应付，佯装欢笑，并不真正的知恩当报，也不真诚地对苏友好。1946年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5月6日，斯大林命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请蒋经国转达其父，斯大林大元帅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某地会晤也可。蒋介石得知此请后，说：“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蒋介石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一直依靠美国的援助准备打内战。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亲人，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許多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斯大林“再三声明”的“最大的一个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然而，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他不仅让大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在中国的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城市和铁路、要塞；而且还让大批美军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军打内战。到1946年2月，仅在华北和东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有6万多人。斯大林宠信蒋介石，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恩将仇报，越来越亲美反苏，使斯大林不得不考虑用他说给蒋经国的后半句话：“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这是二。

第三，东北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军队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群众不仅帮助人民军队

歼灭日伪残余势力，而且迅速地掀起了参军热潮。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到 1945 年 11 月底，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发展到 26 万人，歼灭了日寇和伪满大批有生力量，收复了失地，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建立并巩固了东北根据地。

上述情况，决定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得不改变决策，由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逐渐地改变为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在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撤完”。这就是说，1945 年 12 月 3 日，应该是苏军完成撤退的日期。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调整政策，并且以运送“战利品”为借口。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所以一再推迟撤军日期。苏军先将撤军日期，改迟为 1946 年 2 月 1 日。蒋介石信以为真，于 1 月 22 日派宋美龄代表他率领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慰问苏军。

宋美龄到长春后，身穿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偕蒋经国等人到苏军营地慰问，站在冰天雪地里发表演说。苏方军营里出来了仪仗队、军乐队，献花、讲话，表示“友好”，场面倒真热闹。可是过了七天，仍不见苏军拔宫撤兵。宜到 1946 年 5 月 3 日，苏联军队才撤出了东北。

这时候，美国已经帮助蒋介石将正规军 160 多万人调集到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蒋介石得意志形，指挥这些美国武装起来的军队，于 5 月 19 日攻克四平，21 日攻克公主岭，23 日又攻占了吉林省会长春。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沈阳，亲自部署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高兴地说：“自从 1914 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 32 年之后旧地重游。”6 月 3 日，蒋介石又飞抵长春。在机场大厅中召集长春市豪绅巨富和新六军中将军长廖耀湘等将领，表示慰问，命令部队尽快抢占各地战略要地，然后飞回南京。

中共中央采取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到处歼灭蒋介石的“国军”。6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又调整和充实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的领导，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统一领导东北的党政军民，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大量地歼灭蒋介石军队的有生力量，大大地遏制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蒋介石气急败坏，慌忙电告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要他颠倒黑白，说“这是共军破坏停战，破坏和平”。又让国民党代表向中共和谈代表提出：“东北停战半个月。”经中共同意，东北的战事暂时停止了。

东北局利用停战之机，组织 12000 名干部由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野战军抽派三分之一的兵力分片剿匪，创建根据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烧掉了反动统治的根基，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部队经过整编训练，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战斗力大大提高。

1946 年 10 月 19 日，国民党军集中 8 个师 10 万多人，分三路向南满进攻。东北野战军采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放弃一些地方，集中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本溪东南的新开岭地区，将敌自诩为“千里驹”的全美械装备的第 25 师 8 千多人全部歼灭，首创东北战场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范例。1947 年 3 月又在郭家屯歼敌两个主力师的大部。

1947 年夏季，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凌厉的夏季攻势，在五十天内，歼敌八

万三千人，收复城市 42 座，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 16 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使我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面对此情，蒋介石十分苦恼，万般无奈，曾派国民党中委莫德惠于 1947 年 5 月赴台湾张学良的囚地作试探，准备起用张学良。莫德惠是东北政界元老，与张学良交情较深，这次渡海来访，带来了东北同胞的深情厚谊和蒋介石的信息。

张学良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被蒋介石无理囚禁，失去自由，听故人说来意深有感触，遂以诗相赠：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读过，连称好诗。

张学良说：“柳老要否知道这四句诗从何而来？”

“当然，当然，”莫德惠连连点头说，“请世兄与我一说。”

张学良解释说，这首诗的前两句，有感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十年无多病”，表明自己幽禁十年，没有遇到大灾大难，总算活过来了。”故人亦未疏”，表示来忘旧交之意。后两句则表明张学良对获得自由已经绝望。当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国共两党和平统一，一致对外，抗战救国。如今抗战才刚结束，内战再起，他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只有用读书来作精神上的安慰了。

张学良和莫德惠谈到明末的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煤山自杀；又谈到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时，有人曾请张学良出山遭拒绝的事。莫德惠说：“如果有人要你出山，一不是叛国，二不是卖国，乃是爱国，你又怎样表示态度呢？”

“不可能，不可能。”张学良强笑着说：“柳老不必说明，我就知道。你说我如果下山，便是爱国，这个国怎么爱法呢？还是自己人打得头破血流吗？还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那个局面吗？”

莫德惠小声说：“你别太多心了，有人请你出山，其中一定有道理。譬如说：想请你到东北收拾残局……”

“我？”张学良惊讶他说：“人家把我送到深山，我肚里是什么滋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谢谢人家一番好意，他要我‘清’，我何乐不为？犯不着十年之后，教我还俗，你以为如何？”

莫德惠见张学良坚决拒绝，只好回去向蒋介石报告。后来，蒋介石对他的心腹陈诚说：“汉卿恐怕不会答应出山。”

陈诚淡淡地一笑说：“他出来也无济于事！”

蒋介石见东北战局节节失利，形势不妙，于 1947 年 5 月 30 日，在 12 架战斗机的保护下，由南京直飞沈阳。在康宁街行辕，他对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训话：

“今天，正好是去年我到东北的一周年。可是局势大不相同，实在叫人着急。现在共军正广泛开展进攻，以切断东北和关内交通，阻碍我方援军的到达……”

东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集中更大兵力，发动秋季攻势，到 11 月 5 日，歼敌 69800 人，解放人口 260 万，土地 3,8 万平方公里，收复

城市 17 座，将敌人压缩在沈阳、长春、四平、锦州等 24 座城市内，为尔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部署辽沈战役。蒋介石多次“御驾亲征”；难挽危局，仰天长叹：“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

1947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特别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接着，毛泽东高瞻远瞩，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度，分析了这个转折的意义。他指出：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口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战略决战开始了。毛泽东运筹的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首先在东北拉开了序幕。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就明确了东北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他指出：

“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泽东制定的首先控制北宁路山海关、锦州段，关闭东北大门，切断东北敌人与关内联系的“关门打狗”方案，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对于中间突破、深入要害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锦州有顾虑，再三提议先打长春。

林彪的错误意见，曾受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也耐心地多次指出：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要塞，先攻下锦州，就可以关门打狗，所以打下锦州是关键。但是林彪认为锦州兵多将广，工事坚强，不是急切可下的，仍然犹豫徘徊，让部队去打山海关附近的几个小点和承德的十三军。直到 9 月初，东北野战军领导才明确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决心，发布了政治动员令，争取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给全国战场以配合，但在兵力部署上却使北宁路成了偏师。

毛泽东闻讯，又于 9 月 7 日致电林、罗、刘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经过毛泽东多次电报催促，分析敌情，陈述利弊，林彪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方案，决定辽沈战役首先从北宁路打起。部队很快地攻克昌黎、北戴河、高桥等地，将锦州的敌人团团包围。

9 月 26 日，林彪又电报中央军委，说打了义县、高桥、锦西之后，如果

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次日，毛泽东即回电说，如能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林彪觉得有理、有利，才下决心打锦州。但是，10月1日，解放军攻克义县后，获悉国民党军将以62军和独95师由海路增援东北。本来，敌情变化不大，林彪又以“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为由，又于10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考虑放弃北宁路作战，仍回师打长春。

毛泽东于10月3日即回电批评林彪，指出：“四五月间长春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结，锦西、滦县之敌第8军、第9军已经调走，你们又因62军和独95师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下决心先攻取锦州，并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毛泽东看了，回电表示：“甚好，甚慰。这才算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了，纠正了长时间内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于是，25万人围攻锦州，国民党东北军的咽喉被扼住了。

蒋介石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1948年10月2日飞临沈阳，“御驾亲征”。当晚，他召集师长以上将领训话，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在叙述了他的如意算盘后。他又说：“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有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毛泽东坐在西柏坡的中共统帅部，却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电示林彪，无论蒋介石耍什么鬼花招，你们都不理，集中兵力，求得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攻城的无坚不摧、打援的寸步不让，至10月15日下午6时，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锦州攻城战胜利结束了。歼敌上将范汉杰等近9万人。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于10月18日飞抵沈阳、召集卫立煌、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开会，令他们重整旗鼓，收复锦州。将领们都说力不从心，无法实现，气得蒋介石头昏眼花，双眼发红，从沙发上站起来，拍着桌子，将卫立煌大骂了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仰天长叹：“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不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受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他命令廖耀湘等人卒部从营口、葫芦岛等地出发，全力攻取锦州。

毛泽东于10月19日复电东北解放军：

“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大打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东北野战军根据毛主席电报的精神，立即走下了乘胜歼敌西进兵团的方案，经过连续激战，至 10 月 28 日拂晓、歼敌西进兵团一个兵团部、五个军部、十二个师的十万多人；11 月 2 日又攻克沈阳，歼敌一个“剿匪”总司令部、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七个师、三个骑兵旅等，合计 13 万 4500 人。次日，解放军又攻占营口，歼敌 14900 人。

至此，历时 52 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 47 万 2 千人，解放了东北全境。1948 年 11 月 2 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热烈祝贺东北全境解放。贺电说：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 1945 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蒋介石气急败坏，两次吐血。美国《纽约时报》写道：“东北的沦陷，不仅关系远东这场内战的胜败问题，重要的是世界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毛泽东主席于 1948 年 11 月 14 日，发表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 1946 年 7 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338 页。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个省。

24 毛泽东坚持人民解放战争 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华

毛泽东不理睬斯大林的警告，毅然率部反击蒋介石的进攻，并笑着说：“我们一定得胜利，我就叫李德胜。”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完成了全面内战的准备，6月17日，向中共提出无理要求，要中共让出几乎整个东北地区、华中解放区、热河、察哈尔两省、陇海和津浦西路、威海卫及烟台丙港等地。

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

6月26日，蒋介石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命令国民党军向各个解放区全面进攻。当时，蒋介石拥有430万人的军事力量，其中正规军248个旅（师）约2百万人，控制着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掌握着国家政权并在国际上有合法地位。日本投降后，它接受了109万人的武器装备。美国又用新式装备为它武装了陆军45个师，还把271艘军舰和大批的飞机大炮送给了它，同时，又将8亿多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低价售给了它。蒋介石发了国难财，又有美国的全力扶植，肠肥体壮，腰大气粗，扬言可以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明白：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只有120万人的军队，装备极差，多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的面积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后方还不巩固，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也得不到任何外援，总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但是；毛泽东毫不畏惧，毫不气馁，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制定了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方针、政策。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正式发出。他明确指出：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则。政治方针是，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军事上一般地是运动战，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必须精打细算，减轻人民负担，艰苦奋斗，军民兼顾。“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

为了从思想上武装中国人民，提高广大人民取得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石桌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以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被打倒的历史事实，说明从长远的观点上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强调指出：我们虽然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则

代表进步。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些光辉的思想，如星照长空，电劈云天，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伟大的思想，一旦掌握了人民群众，就会产生伟大的力量。经过8个月的艰苦努力，人民解放军歼敌67个旅，约70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一计不成，又施诡计，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破产之后，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共提出要恢复“和平谈判”，实现“现地停人”。

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谈判必须实行两个最低条件：一是废除伪宪法；二是国民党军队退出其侵占解放区的一切土地。

蒋介石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当要求。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向令胡宗南指挥的34个旅约23万人，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进犯。

大敌当前，如何应战？3月8日下午，延安工农兵学商各界一万多人，在延安南市场沟商会会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群众大会，群情激愤，誓死保卫延安。许多解放军指战员主张坚守延安，决一死战。

3月14日，延安南线的保卫战打得十分激烈。新四旅的部分旅团干部从陇东回到延安，要求参加延安保卫战。毛泽东召集他们开会，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吃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都知道有个延安，但是延安不能保。寸土必争，这是对的，可是要看怎么争。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谈到这里，毛泽东取出一根烟，慢慢地抽着，沉思他说，蒋介石的手段是狠毒的。现在，我们几个解放区刚刚争得主动，情况好转了。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的部队投入到别的战场，那就会增加他们的困难。所以，我们宁可自己负担重些，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还要消灭他。我们撤出延安以后，就要换他几个旅，让他背上沉重的包袱在山沟里团团转。

谈到作战方针时，毛泽东形象他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事打什么仗。我们部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目前都处于劣势，所以，我们就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分散孤立的，后打集中强大的。我们把他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我们把他分散的打了，集中的还要分散。

谈到这里，毛泽东掰着指头，边比划边说，比如有三个人，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打倒了，剩下他一个就前后失去了照应，就孤立了，就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倒。我们的战术是“蘑菇战术”，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沟里团团转。陕北山高林密路窄，你们牵着敌人去爬山，把敌人磨得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他。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拖住敌人，让他们陷在这里拔不出来。

有的同志害怕撤出延安后敌人破坏。

毛泽东笑着说，延安不就是几座山头和一些土窑洞吗？大不了打烂一些坛坛罐罐。只要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但可以有延安，还可以有西安、北平、上海、南京。散会时，毛泽东边送客人边笑着说，好啊！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3月18日，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撤离延安。当天黄昏，夜幕降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见延安群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都已安全转移，才离开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莫斯科闻听到延安被占的消息，十分震惊。斯大林一直不赞成中共领导人民打人民解放战争。早在 1945 年 8 月，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斯大林就断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打不过美国援助的蒋介石军队。他断定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必然要卷进来，那样，天翻地覆，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当然，说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是吓唬人的、言过其实，斯大林自己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但是，害怕在中国出现苏美两国武装力量直接对峙的局面，可能是斯大林主要的顾虑。

现在，毛泽东不理睬斯大林的警告，毅然决然地率部武装反抗蒋介石的进攻，刀对刀、枪对枪地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起来了，而且果不出斯大林所料，经营了十多年的红都延安被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斯大林会怎么想呢？很快地，中共中央得到了苏共和斯大林的反应：撤出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

对于这个关系中华民族前途的大问题，毛泽东的答案和斯大林的答案完全相反。

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他多次指出，只有打败蒋介石，我们才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才能够维护住中华民族的独立，才能够将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否则，我们民族的前途将被断送。至于撤离延安，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看法也完全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共主动撤出延安，只是打败蒋介石的打法问题，“欲擒故纵”，“欲夺先给”，暂时撤离延安，是为了长久占住延安，并且要占西安、北平、上海、南京，解放全中国。

历史是无情的裁判员。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斯大林的看法错了。据杰吉耶夫写的《铁托传》中引用卡德尔的话说，斯大林在 1948 年 2 月对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承认在上述问题上是他自己错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947 年 3 月 13 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小小的延安，硝烟弥漫，弹片飞扬。

有一颗炸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边，把土地炸了一个大坑。卫士拣了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轻轻地敲了敲说：“这玩艺儿，吓不倒人；废物利用，还可以打两把刀！”

19 日晨，胡宗南率部进占延安，当即向蒋介石电报报捷。

蒋介石看到胡宗南的电报，得意忘形，欣喜若狂。3 月 20 日晨，蒋介石即回电嘉奖：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胡宗南大军攻占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但他却谎报“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蒋介石一嘉奖，许多记者要求参观。胡宗南急中生智，从附近抓来五百多村民，又从国军中挑选出一千五百“伶俐士兵”，加以排练，在延安周围的十座战俘营中巡回流动，应付参观，演出一幕幕滑稽丑剧。

毛泽东不理睬斯大林的反对与压力，毅然决然地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一起，主动撤出延安。3月1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和王震乘汽车从延安出发东进，夜行70公里，于20日黎明到达清涧县徐家沟休息。山路崎岖，他们弃车步行。25日，毛泽东等到达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任家山。任弼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山西姑娘刘胡兰壮烈牺牲的经过：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驻山西文水县的部队，包围了云周西村。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和村上的6名干部、群众被捕。敌人抬出明晃晃的铡刀威胁他们。刘胡兰毫不畏惧，坚定他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阎军凶残无比，当即将其他6名干部铡死，威胁刘胡兰，要她说出藏布匹的地方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说：“布匹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共产党员就我一个。说吧，我咋个死法！”敌人恼羞成怒，大吼：“一个样！”刘胡兰从容上前，躺在铡刀下，说：“死有什么可怕！”她望着那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铡刀，又对压铡刀的刽子手说。“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说罢，壮烈牺牲。

毛泽东听了汇报，心情十分沉痛。他认为刘胡兰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为了悼念刘胡兰为革命慷慨就义，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

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使刘胡兰的事迹不翼而飞，到处流传。一个学习刘胡兰，为党、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给在艰险环境中奋斗的广大军民，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毛泽东运用刘胡兰这个英雄的典范，带动了人民千百万，为革命的胜利去拼搏！

就在3月25日这天，中共中央得到了彭德怀的报告：青化砭战役胜利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到瓦窑堡中间的公路上，两边高山，夹住川道，像个张开的口袋。早在撤离延安前夕，毛泽东就命令彭德怀：在防御战斗中先疲劳与消耗敌人，然后集中五个旅以上的部队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先率部在南泥湾一带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转移。然后，以独一旅牵着胡宗南五旅主力的鼻子，诱向西北安塞方向；而将自己的主力三五九旅、新四旅、教导旅、三五八旅等，埋伏于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3月25日将进入口袋阵的敌人2900余人全部歼灭，活捉敌旅长李纪云。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首战告捷。

胡宗南发现中共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慌忙令董钊、刘戡率两个军向瓦窑堡方向扑来，情势非常紧张。

毛泽东在任家山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等问题。情势危急，事关重大。会议从26日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会议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简称前委；刘少奇、朱德等会合在山西临县的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简称工委。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令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织起

来，成立了一个司令部，下属四个大队和中央警卫团。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说：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该有个代号。毛泽东表示赞成，笑着说：“我们一定得胜利，我就叫李德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自己取个什么名字好，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这样，毛泽东准备了两套班子，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胜，带领部队，沿着陕北那蜿蜒崎岖的山路，又向前走去。他身边能战斗的部队，实际上不到一个团。

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尾追堵截，四面围剿，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捉毛泽东。

毛泽东却毫不紧张，每到一地，都和村民拉家常，和那些天真的孩子闹着玩。他在崎岖的山村小路上行走，向一位未见过收音机的老农讲解电磁波传音的道理，还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闲暇时学习英语，忙中有闲，举重若轻，显得愉快、乐观，并不慌乱。

然而，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外国报纸电台的报导，特别是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接见军官，庆功颁奖，大肆宣传，使斯大林十分不安。一天，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来电，说他们已得到消息，延安的八路军总部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又听说贺龙、江青被俘了，押到了西安，他们的心情非常着急，要派飞机来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苏联去。

当时的陕北形势十分严峻，数十万敌军南北夹击，四面“围剿”，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强敌的缝隙中往来穿梭，安全没有保障。但是，为了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为了减轻其他各个解放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坚持要留在陕北。他说，陕北群众基础好，安全有保障，并且发电报向斯大林说明情况，表示不用派飞机接人。斯大林知道自己从英美各国和国民党政府电台得到的消息，大部分是“客里空”，不合实际，便取消了派飞机接人的决定。

在陕北转战的人民解放军里，有一些旅长、团长也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担心。他们认为党中央毛泽东周围的武装太少，要求带部队来保卫毛主席。毛泽东却笑着说：

“我才不分散他们的力量呢！让他们集中力量去消灭敌人，我在群众中十分安全！”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率部转战到安塞县的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有十多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领导人，都住在薛家的一进两开的两孔半窑洞里。一盘土炕、一张破桌、一个树墩，便是他们住宿、办公的用具。

敌人千军万马，离王家湾很近；敌探多如村狗，四处活动。打听毛泽东的去向。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却笑着说：

“怕什么呢？我们有老百姓嘛！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

当时，王家湾的群众正在春耕。毛泽东让任弼时组织工作组去到附近村庄，了解群众生活、生产情况，抽调人员、马匹去帮助农民耕地、播种，解决各种困难。

农民十分热爱这支队伍。全副武装的敌人，从王家湾侧面走过，但没发现中央机关。敌人的密探多次向当地农民打听毛泽东的去向，农民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王家湾住了近两个月，敌人均未发现。毛泽东有人民群众的拥护，耳聪目明，知己知彼，战无不胜。4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羊马河战役中，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活捉敌代旅长麦宗禹。5月3日至4日，又攻克敌军战略补给要地蟠龙镇，全歼守敌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装4万多套。面粉12000多袋，子弹百万余发，骡马千余匹，药品无数，解决了解放军衣、食、弹药缺乏的问题。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胜利，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但是，胡宗南部刘勘趁西北野战军全力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作战之机，率4个半旅占领青阳岔，向中共中央的驻地王家湾方向扑来了，情势异常危急。当时，毛泽东身边只有四个半连，能战斗的不足二百人；而敌人扑来的是4个半旅，比自己的兵力多几十倍。真是十分危险！

面对险情，毛泽东毫不慌乱。他首先惦念群众的安全。由于敌人到处围剿，强迫群众并村合寨，许多群众无处安身，只好跟着中共中央机关走。现在，大批敌人杀来了。毛泽东再三指示：要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跟随中央机关转移，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让群众朝别的方向走去！

毛泽东严肃他说：“不行！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一定要让老乡们跟我们干部一起撤退。这样，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经凝成一体，我们要对群众负责到底！”

有些群众已经朝别的方向走了。

毛泽东立刻派人把那些迷失方向的群众追了回来！

群众安全了。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危险性却更大了。

1947年的6月7日夜，黑云滚滚，天昏地暗。

蒋介石的特务发现中共中央就在王家湾一带活动。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消灭中共首脑，把毛泽东赶过黄河！”

敌整编29军军长刘戡，带领全副武装的4个半旅，不顾一切地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驻地王家湾一带扑来。

这时候，毛泽东正坐在王家湾的土窑洞里和农民谈话。侦察员接二连三地前来报告：

“敌人离我们只有三十里路了！”

“大批敌人扑来，离这儿只有二十里路了！”

毛泽东走到土窑掌，看着一张地图，仍在开玩笑：“刘戡追来吧，你追不上，我就叫胡宗南来追；胡宗南追不上，我就叫蒋介石来追！反正我们不过黄河，就要同你泡蘑菇！磨得你精疲力尽，我再好一个一个地吃掉你们！”

坐在一边的周恩来在沉思。

任弼时主张快向东撤。因为他这个司令员手下只有四个半连，能战斗的不足二百人。如果向西，就会和迎面扑来的敌人的四个半旅相遇，十分危险。

毛泽东则坚持要西进。他说：“胡宗南就是要把我们往东赶，赶过黄河就是胜利。我们要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偏偏不往东，而往西走！”

任弼时坚持不让，说向西危险太大，闹不好会全军覆没！警卫团长进来催促，说各大队等候命令。

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已到西沟，离这儿只有7里路，不用一个小时就可能到达！

任弼时哀求他说：“主席，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向东走好！”

毛泽东不满地问：“弼时同志，你为什么老是考虑我的安全？”

任弼时说：“这是我的任务！”

周恩来急得去到外边看了看，又进窑洞说：

“不能再争了！你们看，敌人已经到了家门口！”

毛泽东和任弼时走出窑洞，望见西边一片火光。远处，不时传来枪声。

毛泽东说：“立即向西出发！”

任弼时说：“我不能再让你冒险！”

毛泽东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

“我要求你立即下令！”

“这个命令我很难下！”任弼时寸步不让。

毛泽东转过身来，说：

“恩来同志，从现在起，由你担任昆仑纵队司令兼政委！”

一道电闪，一声炸雷。瓢泼大雨下了起来。各大队的战士站在雨中，整装待命。

“我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任弼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是，主席的安全，中央的安全，关系着革命的成败。万一出了事，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呀！？”说着，两行热泪从眼里流了下来。

周恩来受到任弼时的精神感动，眼圈也红了。

毛泽东转身出来，走进隔壁窑里。几个卫士和老炊事员都劝他赶快任东走。毛泽东解释说：“敌人没有群众，耳聋眼睛，看来气势汹汹，其实是在胡扑！我们要指挥他，叫他往东，我们向西。反其道而行之，看似危险，实际上才安全。”

周恩来去到外边看了看山势地形，又走进隔壁的窑洞里，对毛泽东说：“这样吧！按主席说的，我们向西。不过，我看了山势地形，具体走法，可以先向北走，然后再向西拐！请主席决定。”

毛泽东的火气也消了，笑着问：“弼时的意见呢？”

周恩来说已和任弼时商量过了，他同意。

毛泽东同意了，但他还坚持要带上群众一起走，不能让群众吃苦头。

旁边有人说：“群众已经向东走了！”

毛泽东立刻严肃他说：“立即派人去把群众追回来，和中央一道走。”

任弼时当即派人去追走失的群众。

无黑了。夜幕笼罩着大地。

雨，越下越大。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夜幕中指挥部队，带领群众，冒着滂沱大雨，出了王家湾，向北山上行进。

北山虽不太高，天黑夜暗，坡陡路滑，行军十分艰难。毛泽东拄着一根木棒，迎着夜幕，跟着队伍，在泥泞的山路上攀登。有的同志跌倒了，他还亲切地上去搀扶。

黎明时分，毛泽东带的队伍，来到了小河村。

这时候，胡宗南、刘戡的队伍已经占了王家湾。他们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先是吼叫着向东扑去，扑了个空；接着又杀气腾腾地扑向西边，又碰了壁。刘戡气急败坏，率部驻在王家湾，逼问农民群众：毛泽东在哪里？中共中央

在哪里？农民群众都守口如瓶，摇着脑袋说不知道。其实，刘戡的司令部就设在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窑洞里。刘戡虽然气势汹汹地到处逼问毛泽东的去向，可至死仍不知自己当夜住的窑洞，就是毛泽东昨夜住过的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铜墙铁壁！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安全。却使敌人透不过气！

6月8日，毛泽东住在小河村曹九林家里。

艰苦险恶的环境，使有的同志产生了怨言：美国支持蒋介石胡宗南，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朋友斯大林和苏联，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些好武器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对于这种问题，我们多次说过，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群众，战胜敌人，而不是依靠外援，这是我和蒋介石国民党的重要区别之一。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取决于内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而已！所以，在人民解放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现在，如果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更不能埋怨斯大林，或者埋怨别的朋友支援不够，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没有本事。

一席话，说得同志们心明眼亮，浑身是劲。

9日下午，天又下起了大雨。大批敌人前来偷袭小河村。

中共中央决定转移。为了隐蔽脱险，任弼时命令：不许打手电，不许抽烟。因为天黑雨大，部队行军中迷失方向，只好在月亮山上停留，就地休息。

毛泽东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

警卫班长李文奎等人用手支起一件棉大衣，顶在毛泽东头上，为他遮雨。

毛泽东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

这时，山下面的敌人，汽车鸣，战马叫，人流汹涌如潮，顺川向前奔驰，随时都有可能冲上山来。所以，战士们心情都很紧张，一颗颗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毛泽东却谈笑自如。他伸手接了一捧雨，轻轻洗了洗手，笑着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

两句镇定的话，又使大家安定了下来。

这时候，侦察参谋找到附近的群众，辨明了方向，又带着部队继续前进。

毛泽东诱敌深入，带部队到靖边县天赐湾等地转了一大圈，于6月17日又返回小河村，一直住到8月1日。在这里，他指挥部队干部战士帮助农民翻地锄草，播种养麦。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调集彭德怀、贺龙、陈庚等将领出席，研究部署了全国性的大反攻和各个战区协同作战等问题。一天，师哲问毛泽东，斯大林的来电怎么回答。毛泽东笑着说，别急嘛！斯大林老对咱们不放心，再过几天，等找到了定心丸，一块告诉他。

当时，胡宗南正调集六个旅杀气腾腾地北犯，到处寻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毛泽东住的小河村，正在敌人进攻的矛头上。敌人的“快速部队”正向小河村猛扑。中央机关决定转移。

8月1日清晨，毛泽东带领队伍沿着大理河川向东进发。河道蜿蜒曲折，不时地要过河。有的地方河上架个小桥；有的地方水里只有几块列石。战士

们不时地要脱鞋涉水，毛泽东也下马步行，和战士们边走边谈。他的话题广泛，语言幽默，天文地理、民情风俗、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随便谈来，妙趣横生，逗得战士们不时哈哈大笑。谈到这次战役，他说：“这一仗打好了。对整个西北战局都会发生很大影响。”

他们经过六十里的急行军，到了绥德黄家沟。这时已是半夜三更，人困马乏，需要休息。毛泽东刚坐下，忽然来了报告，说刘勘带领几个旅迎面扑来，若不转移，就有互相碰面的危险。任弼时请示毛泽东是否换个方向？毛泽东说：

“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要赶过敌人。立刻出发！”

于是，他们又继续赶路。当刘勘的部队进入绥德时，毛泽东带领昆仑支队已经越过绥德，向北转移了。但是，北面也有蒋军从榆林南下，这样，南北两面的敌人把毛泽东和昆仑支队夹在中间。然而，毛泽东毫不畏惧，笑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咱们向西拐一下再走嘛！”

走着，走着，浓云密布，雷鸣电闪，天下起了暴雨，路上泥泞不堪。上山时脚踩不往，下山时人顺坡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战士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挪，就这样，他们两渡五女河，经过将近二十天的长途行军，于8月19日到达米脂县梁家岔住下。

梁家岔，是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山村。几百人挤在这里。吃饭住宿都很困难。部队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借了两孔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孔小窑，其余人员全部露宿。

一会儿，中共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架通了。毛泽东立刻和彭德怀通电话：“你是彭老总吗？是呀，我是毛泽东！”

周围的工作人员，听到“我是毛泽东”那沉着、坚定而饱含信念的声音，高兴得笑了起来。自从敌人侵占延安以后，毛泽东一直使用代号，今天，在一次重大战役之前，毛泽东第一次使用这个伟大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大变了，这多么令人兴奋呀！当彭德怀报告敌36师被围的情况时，毛泽东又大声说：

“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当时，蒋介石、胡宗南正令其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沿咸榆公路北上，令钟松率三十六师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夹击，把共军主力压缩到米脂、葭县之间、一举歼灭。钟松也得意忘形，对他的部下动员说：“这是结束陕北之战的一仗，望上下同心，殊力作战，在围歼共军中争立头等功！”

次日，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天激战，在沙家店地区全歼敌整编第36师。只有钟松乘夜换了便服，化装逃脱。

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同彭德怀等开会，部署下一段的行动，又去看望干部战士。毛泽东说。

“你们打得好啊！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它将使西北形势发生变化。陕北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的确，沙家店战役改变了整个西北的战局，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外线进攻。党中央到了神泉堡，

《解放战争实录》第168页。

《解放战争实录》第168页。

毛泽东才挤出时间，给斯大林发了一封校长的电报，说明了陕北战场上三战三捷和沙家店战役的情况，说明了全国各战场不断胜利的形势。

1947年党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12月会议，分析形势，明确任务，重点解决敢不敢进攻大城市、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赞同。会议期间，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一份长电，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中国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起了根本的变化。电报开宗明义，头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考虑到解放战争已经接近胜利，考虑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关切；考虑到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当面商讨，毛泽东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组，准备乘吉普车到中苏边境，然后去到莫斯科。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提出了异议。

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关头，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五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准备让苏方来人。但是，战局动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苏方不能来人，此事只好暂缓。

1948年12月间，苏方又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并引用了“兄弟阅于墙，犹上御其侮”的古语，说服中共别打仗了。这一次，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玩和平的把戏，是因为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区；辽沈战役已经歼敌47万多人，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积极筹划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斯大林没有上当。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中共，未表示任何态度。师哲将那信译成中文后，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淡淡一笑，不予理睬。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战局稳定了，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H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穿着圆领皮大衣，戴顶圆筒皮帽子，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的。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路上，米高扬几次让停车，到群众家里去参观，到村镇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并且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师哲劝阻无效，便问：“你既然想保密，为什么又要到处乱跑，暴露自己呢？”

米高扬傲然地笑着，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

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师哲解释他又不听。但两年后，米高扬见到师哲时，却抱歉他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导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星期，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是个别交谈、休息、游览。

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米高扬，并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皇上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米高扬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毛泽东说：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上不让。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他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

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式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千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走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高兴他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队问题。

接着，他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譬喻后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

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会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后来，在和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25 刘少奇受委托赴苏谈判 斯大林主动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不怕压力，不畏风险，1948年春天，就准备去和斯大林会谈，后因离不开，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

斯大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毛泽东不怕压力，不怕风险。他认为一个人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没有压力不行。他多次引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也曾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足，兵法乃列……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皆发奋图强工作也。因此，压力有两重性，既是“压”，又有“力”；既有不利的一面。又有有利的一面；只要引导得好，还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变成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毛泽东仔细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情况，认为斯大林虽然对于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不甚了解；虽然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虽然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本质认识不足；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只要我们说明情况，摆出事实，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斯大林是会理解的，是会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基于上述认识，早在1948年春天，毛泽东就曾经准备秘密地访问苏联，准备去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很尊重毛泽东，考虑到毛泽东正在指挥全国规模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为统帅，不便离开，决定派米高扬秘密访华，听取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说明情况和意见。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歼敌47万人，使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敌军。接着，从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又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万人，使南京、上海、武汉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12月初至翌年1月31日，又进行了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见自己的统治土崩瓦解，日暮途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的名义，维持他的反动统治，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喘息之机，安定惊魂，然后卷土重来。苏共中央原想继续观望，采取一定的弹性政策，以便求得回旋余地，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明确，相机促动，还是在1月17日表示了拒绝参加调停的态度。1月14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

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1日，蒋介石万般无奈，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宣布同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这时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必胜、国民党政府必败的大局已经基本确定，然而，苏联仍然采取“走钢丝”的暧昧政策，暗中支持国民党政权，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刚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

4月1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于蒋介石从中作祟，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协定。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摧毁长江防线，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此期间，毛泽东诗兴大发，挥笔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气势磅礴，意味深长：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显然，在这首诗里，毛泽东触景抒情，谈古论今，无意批评斯大林。但是，在毛泽东逆流而上，顶着压力干事业的时候，斯大林的某些言行，却落入了毛泽东批评的范围之内。1964年郭沫若发表的对上述诗评论中说：

“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郭沫若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过目的，文中点到的“好心肠的朋友”自然包括斯大林。

毛泽东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还回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斯大林的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中。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渡江南征的时候，当国民党南京政府摇摇欲坠、行将垮台的最后关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继续用行动表明：他们不想全心全意地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而要或明或暗地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这种倾向，表现在几件事实中：

一个是1949年1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宗仁

详见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原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5页。

《红旗》杂志1964年第1期。

起草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表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要“真正合作”，条件是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这项协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而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关头，仍在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真正合作”，却是事实。

另一件事实是，在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的前夕，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人员纷纷撤离，而苏联大使罗申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外交代表；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也没有留在南京。紧跟国民党政府走，实际上表明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

三个月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解释此事，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之所以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抵抗不住，“和谈”失败，从南京向广州逃窜，其“动态”国人皆知，用得着派个代表国家的驻华大使去看吗？

令人更奇怪的，还有一件事。直至 1949 年 5 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苏联还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谈判新疆的经商权。

这些事实，清楚的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因此，毛泽东说，斯大林和苏联“1949 年、1950 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怎么办？毛泽东准备和斯大林面谈。

1949 年 5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委托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回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毛泽东出国访问的有关事宜，还调来邓力群、戈宝权等同志帮助工作。

后来，毛泽东看到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内百废待兴。自己实难离开，便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好准备。代表团的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戈宝权和师哲。另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磋商和决定重大问题，是经过认真地挑选和考虑的。在这里，有必要对刘少奇的简况及其与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1898 年 11 月 24 日生，1969 年逝世。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仅隔一道山。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1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夏回国后，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3 年任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1925 年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 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领导了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天津、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白区工作，1927 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 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

见《美国与中国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版第 238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1 页。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和毛泽东一起，共同反对过“留苏学生集团”控制党的领导。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

1936年春，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刘少奇。他说：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从此以后，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领导着敌占区华北的党组织。1939年4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早在1940年，他在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1945年，刘少奇在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正式的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用和意义。刘少奇参与起草、修改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了，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认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延安代理毛泽东职务的就是刘少奇。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仍留在陕甘宁与敌周旋；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撤至晋察冀边区，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刘少奇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有时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现在，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他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会谈，非常重要，意义深远。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外交活动。它虽然还不能不是秘密的访问，但它是一次最高级的访问，是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它不仅将决定中苏两党和未来两国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将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发生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9月28日，毛泽东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

转引自（美）洛厄尔·迪特默著、萧耀先等译：《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6页。

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薄一波注）。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苏联的态度，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关键，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决定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刘少奇和斯大林亲切会谈。斯大林说：“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7月1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稔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宫楼塔顶尖的红垦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也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三天下午，即7月10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以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

在这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出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容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间。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跑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不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应酬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与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出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的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月11日晚10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着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

“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啰，不得了啰！”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词。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截止1949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政区的人口已有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他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的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子。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的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文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赞赏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政策、策略；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他说：

“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说：

“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

如此。”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在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的需要，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来华工作。

斯大林主动地作自我批评，他说：“我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一次，在会谈中，刘少奇特别谈到了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他手里拿着那支特制的烟斗，装上烟，慢慢地吸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个别听不清的词句，还请复述。

刘少奇说：我们和国民党是又斗争，又联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要打内战，我们有了准备，就针锋相对，自卫反击，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把国民党蒋介石打倒了。

斯大林听着，心情沉重，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国民党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挥起屠刀，屠杀共产党和人民。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要自卫反击，武装抗争，中国的内战一触即发。就在那个时候，他曾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是中国如果打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现在，历史的发展和自己的预见相反，历史已经证明自己错了，而今天，中共代表团就在自己面前，谈起了这一段历史，使他感到内疚和不安。他深思地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啊！”突然，他又问：

“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刘少奇客气地说：

“没有。”

斯大林摇摇头说：

“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讲到这里，态度非常严肃、诚挚，表现出深沉的内疚！

会谈厅里，静悄悄的。

人们都陷入宁静的沉思。

斯大林又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

刘少奇解释说：“毛泽东到重庆去的后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又关切地问：

“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了损失？我们是否干扰了你们？”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苦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

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笑了。他说：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你们胜利了。”

聪明的斯大林，也感到了刘少奇的客气和礼让。停了一会儿，他又内疚地说：

“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当时都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代表团按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问题主要由中国同志负责的主张，并没有向斯大林提什么批评意见，更没有要求斯大林作自我批评。

斯大林主动地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不但没有使他的荣誉遭受损失，反而赢得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尊敬，认为它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联系，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政策等。

斯大林还具体地分析了劳资间的矛盾与处理方法。他说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地继续。

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张与分析，表示赞成。

斯大林问中共代表团还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提了几个事先准备提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

斯大林回答说：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的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至少要有二十年的准备。人民不愿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努力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没有战争狂人。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的

一位军官风闻“苏军从阿拉加斯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斯大林说：

“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

刘少奇告诉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在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当年在瑞主曾经成立过中央苏维埃政府，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起多大作用。

斯大林摇摇头说：此一时，彼一时，时过境迁。我们的经验是，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党不能代替政府。否则，无政府的时间长了，帝国主义就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进行干涉。夜长梦多，帝国主义一干涉，那样就被动了。

刘少奇接着提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斯大林态度很明朗：坚决支持。在这之前，东欧有些国家认为毛泽东性情高傲，民族意识很强，闹不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成为第二个铁托，说要警惕。因此，我们感到新中国的国际承认问题没有把握。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肯定不会很快承认，而苏联的真正态度又不摸底。现在，斯大林的态度这么明确，代表团很受鼓舞。刘少奇将此情电告中央，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根据各种条件和人民的愿望，将时间移到了1949年10月1日。

斯大林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了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举杯祝酒……

斯大林很重视各国人民的团结和互助。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当然，这代替不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但这的确是朋友交往的一项准则。

交谈了一阵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看电影。影片就在会议室里放映。斯大林的话刚落，灯光一暗，电影就开始了。第一部影片是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纪录片。试验的地点可能是在苏联东北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白雪皑皑。飞机来了，投掷了一颗炸弹，命中了目标，蘑菇云腾空升起，冲击波威力无比，冲击得地动山摇，楼倒舍塌……影片具体地表现了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威力和破坏范围。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种纪录片。

当时，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苏争霸，美国进行核讹诈。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是在用纪录片的事实说明：原子弹我们也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敌人真的要用原子弹袭击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武器的保护。

看完电影后，人们都在低声议论原子弹的威力。

斯大林高兴地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发展，其速度之快，有时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不过，像试验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大家都不公开说，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因而也有人叫它“秘密武器”。言下之意，苏联也正在研究发展更新新式的武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

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给斯大林敬酒后，斯大林高兴地和大家碰过杯，一饮而尽。江青的祝酒词：“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使斯大林触景生情，谈起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他说：“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

斯大林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说：

“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

说到这里，斯大林态度诚恳，情绪激动，举起酒杯，为此祝酒！

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

斯大林解释说：

“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在场的苏联同志都劝说：

“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

刘少奇还是不肯接受，他一着急，脸都红了。

就这样，斯大林要祝酒，要祝贺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刘少奇坚决不接受，推让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

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他们知道，按照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宴会、婚礼等场合的祝酒，是人们表示的一种盛情和祝愿，如祝愿对方进步、胜利、幸福、健康、长寿等等，以加强相互间的友谊，增加欢乐的气氛。但是中国的刘少奇为什么不敢接受这种良好的祝愿呢？

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往往不了解被压迫、被奴役的东方民族的性格。刘少奇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之一。长期的革命斗争，无数的战火硝烟，把他锤炼得沉着而机智，坚强而勇敢。然而，在那性格深处，灵魂深处，仍然不能不留些彼压迫、被奴役的烙印。勤劳、纯朴、憨厚、老实、忍让、谦逊等等，是这些烙印的美称。而在“大人物”面前直不起腰，又往往是这种烙印的精神渗透。

刘少奇访苏，是受毛泽东委托并代表毛泽东会见斯大林的。任务可以委托完成，事情可以代人去办，而性格，人物的个性是无法代人体现的。有人猜想，如果毛泽东遇到这种场面，会怎么样？难道还会这样谦虚——过分地谦虚，甚至有点卑躬吗？不一定。因为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倡过放下包袱，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做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

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过被压迫者中的奴才性格。他曾举古典戏曲《法门寺》中的贾桂为例，批评那种在“九千岁”——公公刘瑾面前，躬着腰，低着头，不敢坐，说“奴才是站惯了的”奴才性格，提倡人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然而，刘少奇很谨慎。斯大林的祝酒，他到底都没有喝。这种由于领袖人物性格的差异，导致重大事态的不同发展，在数月后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

会见的情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两位历史巨人相遇时的性格闪光、奇特场面、曲折经历，和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在人物性格上成为鲜明的对比。本书在前边虽作了简要的叙述，但挂一漏万，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

26 毛泽东反侵略援朝抗美 斯大林赞英杰释疑省身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抗美援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的友谊”阶段。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到了相互尊重、及时协商、亲密合作的地步。那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斯大林常常先提出他的看法，发来电报，征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很尊重斯大林，经常及时复电表示自己的看法。两位领导人的及时协商，更加强了两党、两国间的合作与交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并且以联合国名义纠集十几个国家出兵侵朝。

风云突变，成立不到一年的人民共和国面临严峻的考验，毛泽东面临着困难的抉择。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讲话，严斥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并明确指出：

“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

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毛泽东讲话后，随即和中央军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调13兵团紧急开赴东北，加强东北防务力量。

毛泽东对美国的侵略行径十分气愤。他断言美国总统已经证明他自己以前有关不干涉台湾的声明是“假的”，美国这样干是公开“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重申了他的关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观点，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明确支持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但是，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公然派4万名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边境。美国的空军在中国的领空盘旋；美国的炸弹在中国的边境爆炸；美国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在我国的领海上耀武扬威；美国官方公开把台湾和朝鲜联在一起，派兵入侵；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公然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气焰嚣张，猖狂至极。

怎么办？出兵迎战还是空喊观战？

若出兵，刚成立的新中国，能不能顶住美帝国主义——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金元帝国，连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也多次避免和它应战的庞然大物——的凌厉攻势？

若出兵，会对新中国造成什么后果？

若出兵，会给经过长期苦战才赢得了战争胜利的中国人民又将带来什

么？

北京的最高统帅部面临严峻的选择。

中国朝鲜，唇齿相依。毛泽东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说：

“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然而，出兵抗美谈何容易？新区的上改刚刚开始，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去较量，风险太大，胜负难卜。美国手中的原子弹可以在刹那间把北京、上海变成广岛第二……。经历了22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闭门谢客，瞻前顾后，整整思考了三天三夜。其中，令谁为将，领兵出战，才能打败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而又从来没有真正较量过的敌人？毛泽东绞了不少脑汁。

熟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他在考虑决定出兵之后，便把注意力很快集中到选将上来。

一想到选将，突然，有两句诗，横空飞来：

谁敢横枪勒马。

惟我彭大将军。

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名叫彭德怀，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1月，他率领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坚持井冈山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大“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他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军团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指挥过著名的平型关百团大战，消灭日伪军三万多人。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高兴地跳了起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

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行了延安保卫战，接着，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指挥了沙家店战役和宜瓦战役，解放了大西北。在陕北，毛泽东曾挥笔写过一首诗：

山高路险沟深，

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

惟我彭大将军。

建国后，彭德怀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尽快派飞机把彭德怀接到北京，同时和斯大林联系。10月2日，即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次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

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先调至满洲的 12 个师于 10 月 15 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10 月 4 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彭德怀闻讯，一夜都没睡着觉。北京饭店的设备虽好；红地毯，沙发床，很舒适，可是彭德怀心里想着出兵援救朝鲜的事，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以为是沙发床太软，此福受不了，兀自搬在地毯上去睡，还是睡不着。他老是在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着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要吃人，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我们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第二天，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但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抗美援朝时，还有另一种意见，主张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要慎重，因为事关全局：首先，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和美军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将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另外，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掌握着制空权，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

斯大林答应由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但后来，他动摇了。

事情紧急而机密。周恩来只带了师哲和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10 月 8 日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林彪当时正在莫斯科养病，次日即同周恩来一起乘机飞抵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又到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都等候在那里。

午后开始会谈。中方是周恩来、林彪，师哲任翻译；苏方是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首先介绍了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目前朝鲜已受到极大的挫伤，朝鲜战场的严峻形势，对我们都是很不利。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但主要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

师哲：《在战争的背后》，《军事史林》1992 年第 3 期。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8 页。

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为好。

斯大林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斯大林见周恩来不讲话，笑了笑又说：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都可来。

再者，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这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回答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它消灭掉的。既然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

斯大林随后又提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设想，他说：鉴于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曾经设想装备中国的陆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等）、空军，并设法帮助建立海军（这是要花费很多的钱和时间的）。讲到这里，斯大林又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苏联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言外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剩余的军火很多。

斯大林说：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但我们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同时，部队因为处在战争中，也可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以臻进一步完善。中方提出的改装部队的意见，交布尔加宁负责同军部和中方同志共同研究处理。现在还是应该把我们商讨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同志，请他们不失时机地早日作好撤退准备。

会谈后，周恩来一行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到达住处不久，就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电文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

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战术的计划。看后，周恩来一言未发，深深地陷入沉思。

晚上，周恩来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商谈了苏联供给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

在此之前，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早在10月8日就签发了一道电令：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于北京 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是和斯大林商量过的。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和中共的决策，并答应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0月8日正式做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调兵遣将，准备出征的时候，斯大林又犹豫了，动摇了。他突然通知毛泽东和中共，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刚过周岁的新中国能不能战胜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有怀疑，害怕把苏联卷入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地步，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强调《金日成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广播演说》的合理性，强调南朝鲜人首先发动进攻，而北朝鲜的军队则是在

“彭高贺、邓洪解”，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13兵团司令员邓华，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沛然。

奉命反击。9月15日，美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接着向北推进，斯大林沮丧地通知北京、金日成将不得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流亡政府。然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不肯示弱，准备抗美援朝。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怀疑中国革命的军队。现在，他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现代技术少，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心里没有底。而战争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如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一旦中国军队被打败了，就把苏联给卷进去了，就会有苏联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紧要关头，斯大林退下来了，托词说没准备好。

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都感到很突然。友好的国与国之间哪有这样的事情，已经达成的协议，怎么能临时改变？然而，事已至此，现实如此，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10月12日20时，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

（一）10月9日命令暂停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20时毛泽东毅然作出了历史性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抗美援朝。

美军侵朝，气焰嚣张。就在毛泽东电令暂不出动的同一天，金日成派朴一禹从朝鲜到安东，请求中国尽快出兵援朝。朴一禹说：目前美第1师、第2师、第24师、英第27旅及伪军第1师已集合在汉城以北三八线上的开城、金化地区作进攻平壤的准备：金日成首相指挥的朝鲜尚能战斗的部队仍在三八线坚持抗敌，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的有5万亲人，其余大部分还滞留在南朝鲜，情况十分危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彭德怀将金日成首相的意思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一面致电在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去与斯大林进一步协商，争取他们执行诺言，一面召集彭德怀、高岗等人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

再说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来电转给了斯大林。14日，得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后，又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提出：

“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知道，出动空军就等于国家的宣战。而要苏联这个经过多年苦战，作出了巨大牺牲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要去和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交战，这不意味着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吗？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危险的。斯大林考虑再三，仍不答应按原来的协议，出动苏联空军支持、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话不好讲，他只能推说苏联空军还没准备好，不能出动。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希望、计划、设想，从来是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主要是

依靠自己的力量办事，叫做自力更生。他希望外援，但绝不主要地依赖外援，而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他是顶天立地的大树，不是左右摇摆的小草。他是滚滚中流的砥柱，不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他高瞻远瞩，权衡利弊，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与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商量后，毅然地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抗美援朝。

决策作出后，毛泽东很快地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发去了如下指示：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周恩来总理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再次约见斯大林。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抽着他那特制的烟斗，慢慢地踱着步子，陷入困难的沉思。在不长的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约见，要他实践诺言，派出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抗美。这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抉择。不答应吧？说不过去。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曾明确地给毛泽东许下诺言：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现在，毛泽东不怕风险，说干就干，调兵遣将，马上就要出征援朝抗美了，自己怎么好说话不算数，临阵失信呢？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墨迹未干，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自己怎么能眼看着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被美帝国主义侵略、蹂躏而不去援助呢？但是，派苏联空军去掩护吗？太危险！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先进，军队装备精良，而且有原子弹；它侵略朝鲜，不仅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且有英国等十来个国家参加，气势汹汹，连连北上，锐不可挡。自己如果派苏联空军掩护，实际上等于参战。中国那装备极差、缺乏现代技术的军队，万一抵挡不住美军的进攻，败下阵来，岂不把苏联全亮出来了吗？那时候，欲退无路，只好由苏联和美军直接开战了，这就是不自觉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想到这里，斯大林禁不住不寒而栗。不，不，他绝不肯走这条路，绝不肯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下定决心，这次周恩来无论讲多少理由，提什么条件，他绝不再同意派苏联空军去掩护中国军队入朝抗美。

周恩来审时度势，没有坚持同斯大林再次会谈的要求，而是用电报向斯大林通报了毛泽东已经作出的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掩护，中国都照样出兵援朝抗美。

简直是晴天响霹雳，出乎意料！

斯大林看着周恩来转来的毛泽东的电报，几乎眼花了！他怎么也没有料

到，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从来也没有到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位长期被自己怀疑的中共领袖，竟会有这样的魄力、勇气和胆识，在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掩护下，派兵入朝抗美！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民族意识很强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直在怀疑其要走南斯拉夫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际共运面临严峻挑战、兄弟友邦遭受侵略蹂躏，连他这位国际共运和被压迫民族公认的领袖也不敢公开支持的时候，他们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怕流血牺牲，毅然决定出兵援朝抗美，和那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开战！这是多么高尚、多么可敬而又多么危险的决策呀！想到这里，斯大林禁不住站立起来，激动地说：

“好！好！”

周恩来将此情况很快地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同志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战略方针和具体部署，并向志愿军领导机关发出指示：

“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

10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

“（一）先头两军请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彭德怀和高岗当即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最新情况及部队部署。18日晚，毛泽东即正式发布了命令：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

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况，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这时候，朝鲜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17日，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4号作战命令”，改变了原定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在平壤——元山峰腰部汇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向北疾进，直到鸭绿江边。18日，美伪军根据这个命令，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强攻，到19日，已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的两道防线，并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以坦克为先导，向平壤发起了总攻……据当时金日成派来的朴一禹说：“平壤的陷落，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当时，美伪军狂妄地叫嚣说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

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问题，美国当局也作过分析。据外电报导，10月15日，即在中国出兵的4天之前，美国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会晤时，曾明确断言：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

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可能性很小。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可能不超过10万到12万5千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5万到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杜鲁门问起胜利的把握时，麦克阿瑟洋洋得意地保证：到感恩节，正饥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

麦克阿瑟不了解新中国，更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掌舵的中共永远不是怕风险的屠弱者，他不但敢于逆流而上，顶风破浪，勇敢地出兵和美国侵略军打，而且气魄宏伟，善出奇兵，一次出兵就是20多万！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悄悄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向美国侵略军作战。义军天助。当时鸭绿江上浓云密布，细雨如丝，像在给人民志愿军作屏幕。直到美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时，才知道中国人民铁拳的厉害！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举行了第一次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歼敌15000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善于变压力为动力，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不但顶着美国侵略军的疯狂北进和斯大林临阵退缩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地出兵朝鲜，援朝抗美；而且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把战争变成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巨大动力。10月26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彭真、陈淑通。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并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引起了美国政界、军界的不安和猜测。但是坐镇日本东京、遥控指挥的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主力已过鸭绿江。亲临战场指挥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曾几次向麦克阿瑟报告：中共的主力部队已经参战。但麦克阿瑟听不进去。他因为资格老、战功大、地位高而变得主观、傲慢，目空一切。他当上将时，前任欧洲盟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的文森豪威尔当时当过他的参谋长。二次大战中的太平洋群岛作战。这次美军的仁川登陆，都是他军事艺术的得意之作。现在，他认为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不敢冒险、也没有能力与美国作军事较量。以布莱德雷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麦克阿瑟的盲目崇拜，也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出兵也只是为了边境的安全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他们主张“轰炸满洲”中国军队的基地和鸭绿江上的一切桥梁，阻止中国军队继续投入朝鲜战场。以英、法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轰炸满洲”有挑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主张在鸭绿江两岸设置“缓冲地带”，然后再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为了实现其既定方针，一方面向其盟国重申“无意扩大冲突”、不放弃其“在欧洲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扩大战争准备，支持麦克阿瑟发动更大规模的所谓“最后攻势”——圣诞节攻势。

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于11月9日回电批准了志愿军提出的作战计划。在回电中，毛泽东说：“（一）8日15时电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二）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当时，斯大林答应支援中国军队的汽车、武器等物资快要运到了。所以，毛泽东在电报中，针对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物资特别是汽车损失严重的情况写道：

“苏联汽车不久可到达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30辆计，一个月损车九百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达德川宁边孟山区域，这是极重要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

另外，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提出：“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应。”

毛泽东的电报给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的鼓舞。从11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000余人，并于12月5日收复平壤，把敌人基本上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就在这次战役中，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壮烈牺牲。毛岸英聪明能干，很有才华，牺牲时年仅28岁。他的成长和入朝参战，凝聚着毛泽东的无限深情；他的牺牲使毛泽东非常悲痛。本书随后将专门叙述，这里暂且不提。

且说麦克阿瑟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急令美军全线撤退。中朝部队乘胜追击。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麦克阿瑟鼓吹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了防御。美国报纸把这次失败说成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6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美国军队从当时的250万人增至350万人，并要求将其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在一年之内分别提高4—5倍。

然而，毛泽东不怕压，不信邪。他不但有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毅力决心，而且有多种多样的克敌制胜的雄才大略。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敌人。然后看情况，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以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而以几个师逼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再继续战斗。

彭德怀和中国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领导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拟出了第三次战役的作战计划，于12月28日晚电报毛泽东。

12月29日，毛泽东即给彭德怀复电，再次强调了打过三八线的重要性。毛泽东说：

“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在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攻势下，美伪军丢枪弃炮，狼狈逃窜，汉城也不要了，一直退到了水原一线。中朝人民军于1月4日晚解放了汉城，8日又攻占仁川，将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歼敌19000余人。

在胜利面前，有些人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

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有害的，毅然下令停止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反对彭德怀的看法，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道：“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坚持要志愿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

彭德怀不听苏联大使的意见。

苏联大使把意见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

彭德怀闻讯，便给毛泽东发电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

具有雄才大略的斯大林，完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他给毛泽东回了一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又把拉佐瓦耶夫调回苏联去了。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报表扬彭德怀，实际上也是在赞扬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朝鲜战争是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具体指挥的；而且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坚持用那样劣势装备去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当代天才的军事家”，首先是毛泽东。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最能教育人。毛泽东力挽狂澜，派中国志愿军（包括自己最亲爱的长子毛岸英）抗美援朝的具体事实；毛泽东和新中国在斯大林也不敢出动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通过三次战役，就把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军打得狼狈逃窜，丢平壤，弃汉城，直逃到三七线以南的生动事实，使斯大林不得不反躬自问：当初怀疑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当初怀疑毛泽东离开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对吗？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工人阶级的军队能有这样高的觉悟和战略战术吗？新中国成立后，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可自己又怀疑他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现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用铁的事实，用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的盖世奇迹，不证明自己错了吗？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当事实证明他的认识错了的时候，他能够面对事实，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时，他

不仅下令调回了反对彭德怀正确指挥的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而且指示加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的实际步骤。

1951年1月16日，中苏联合委员会发布公告指出：1950年内，苏联方面已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市苏联方面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移交中国。

1月19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中说：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力战胜利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毛泽东指示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斯大林拍手叫好：“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

美国侵略军为了挽回面子和颓势，于1月25日，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施积极的防御作战，有计划地节节阻击，歼灭敌人。3月14日，主动撤出汉城。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在这第4次战役中，共歼敌78000余人，给了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毛泽东高瞻远瞩，统观全局，看到了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遂提出了新的方针。3月1日，毛泽东对志愿军发出指示：

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与我进行消耗战。

为了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在指示中，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我军必须“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中央军委执行毛泽东轮番作战锻炼部队的方针，遂令3兵团（12、15、60军）、20兵团（67、68军）和47军自3月起陆续入朝参战。入朝后，同即将入朝的19兵团（63、64、65军）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部队。

从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了第5次战役，歼敌8万余人，将敌人阻止于三八线附近。从此，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伪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先后两次向苏方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

斯大林闻讯，立即向中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他指出：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它对侵朝战争前途的一种焦急和忧虑。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和平壤。6月初，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商定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便于进行和谈。

于是，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师哲同行。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后，中国同志住在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八号公寓。朝鲜同志住在另外的地方。

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研究朝鲜前线的实际情况，并想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前线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战斗行动是否还在继续？二、南北军队所占据的阵地位置（战略据点）的优劣比较，朝中能否坚

守住阵地而不动摇？三、敌方反扑能力与可能性如何？如反扑，能否抵御住？一句话，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待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

这时，朝中两方人员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和解）、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

斯大林说：我们现在商谈的是属于哪一范畴的问题，对此应该用一个清楚的、准确概念的名词，否则，像你们在谈话中同时混同地使用几个不同概念的名词，使人越听越糊涂。你们用明确的概念表明你们的意图，才好与对方办交涉嘛。

朝中方面回答：我们的愿望是停战。

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作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作的调整）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

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清楚，而朝中两方提供的地图标志是过时的。

斯大林立即找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情况。

最后，又商讨了停战日期。

当会谈基本结束，大家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又关心地提出了“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等问题。

在交谈中，斯大林对毛泽东、中共和国志愿军以劣势装备能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十分赞赏，并说，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我们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这时，有人对彭德怀有意见，说彭德怀叫中国志愿军轮换入朝作战，几个师打一段，一调换，换上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打一段、又调换，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

斯大林听着听着，高兴得拍手叫好。他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期坚持，妙！真妙！”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他说“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7月3日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但美国并无诚意，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连续发动了夏、秋季攻势。在朝中部队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季攻势之后，美国被迫在开城以南的板门店重新恢复谈判，并于11月27日接受了我方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谁料此时，一向号称“文明”、“民主”的美国竟然进行细菌战。1952年1月28日，朝鲜江原道平康、伊川等地发现美国飞机撒布带菌昆虫。据后来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上校参谋长许威布尔供称：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早在1951年冬就已开始进行。不久，美国投掷细菌的范围即扩大到朝鲜全境和中国境内。

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细菌战。世界人民和各种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很快地彻底破产了。

毛泽东重视实践经验，并努力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指导未来的斗争。在朝鲜战争的指挥上，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强调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采用此种战法，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仅从1952年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进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內，就歼灭和击伤敌军3万人以上，获得了重大的胜利。10月24日，毛泽东给志愿军的电报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进行了五圣山附近的作战，歼敌2万5千余人；后又发起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名，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7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损失惨重，不能再打了，不得不坐下来和谈。傲慢的美帝国主义者，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只有在被逼得不得已的时候，才坐下来讲一点理。只有在中朝两国人民用劣势的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不但把他们打回到三八线，而且守住了三八线的时候，他们才坐下来和谈。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中朝人民一起，把美帝国主义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证明了我们是铜墙铁壁。战争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常常是被我们吃掉。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都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打了三十三个月，把美国军队的底摸熟了，明白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不好办。

毛泽东的总结言简意赅，深刻全面，但没有提到斯大林。实际上，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转折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斯大林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有怀疑，毛泽东不解释，不埋怨，用自己的行动，用英勇无比的反侵略战争，用挥师抗美援朝的漫天炮火，把那一团团厚重的疑云打散了、打消了。这正如周恩来在1960年7月14日、15日讲话中说的：

“斯大林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

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

27 毛泽东送儿上前线 斯大林赠枪想儿男

毛岸英在苏联学习，和斯大林有过接触。于是，他成了透视毛泽东和斯大林心灵的一个窗口。

上文说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是毛泽东担着极大的风险，带领中国人民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军的一场大决战；也是毛泽东力挽狂澜，在斯大林先答应出动苏联空军掩护，后又借故推脱，终于没有实践诺言的情况下，带领刚从战争废墟中爬起来的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挥师抗美，英勇地捍卫人类正义、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一次伟大实践。

毛泽东的英雄气概是平凡而伟大的，贯穿在他学习、工作、理论创造、诗词创作等各个方面，也体现在他待人接物、家庭生活、父子情感等生活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不仅自己出生入死，不怕艰险，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而且教育亲人为革命勇于献身！

毛岸英的成长、锻炼和入朝抗美，凝聚着毛泽东爱国、爱民、爱事业和爱儿子的无限深情，体现了他那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先士卒、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一贯作风，也使毛泽东经受了一系列抉择的困苦、感情的风波和内心的悲痛。因而，他从一个新的角度——父子情方面，显示出毛泽东那英雄气概的深刻内涵，无限魅力和来之不易。

毛岸英和斯大林有过一些接触，和苏联人民有过一些接触，因而他自然成了透视毛泽东和斯大林心灵的一个窗口。

事情还得从毛岸英入朝抗美说起。

1950年秋天，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当时，新中国刚诞生，百废待兴，要搞建设，机器制造非常重要。毛岸英一方面做基层党的工作，一方面刻苦钻研工厂管理和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想在厂里苦干十来年，干出一番事业来。

谁料，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毛泽东怒火中烧。毛岸英磨拳擦掌。他立即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向组织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

党组织考虑，毛泽东虽曾有三个儿子，但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三儿岸龙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二儿岸青身患疾病，只有长子毛岸英身体好，人聪明、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上也照应。可是毛岸英不同意，又直接去向毛泽东请求，希望父亲同意他去抗美援朝。

毛泽东见儿子英姿勃发，要上前线，非常高兴。恰在这时。彭德怀在东北组建志愿军总部，到北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当面交给了彭老总，要他带毛岸英到朝鲜去经受一番战火的锻炼与考验。

彭德怀带着毛岸英，投入了紧张的组建志愿军的工作。出国前夕，毛岸英又随彭总从东北口到北京，再度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情况。汇报结束，已到下午六时，毛岸英抓过一辆自行车。急匆匆地赶回工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然后又赶往医院，看望因手术住院的爱人刘思齐。

小两口结婚才一年，相亲相爱，十分亲密。但毛岸英日夜在厂里忙活，又曾去湖南等地出差，难得和爱人团聚。相见时难别更难。现在，思齐一现就问：“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毛岸英很爱刘恩齐。盼相逢，喜相逢，刚刚相逢又分别在即，毛岸英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当时，出国作战还是个军事秘密，不能随便透露。毛岸英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来，擦着脸上的汗水，说：

“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讯不方便，你如果一时接不到来信，可别着急呀！”

妻子更急了，问：“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刘恩齐一下子急出了眼泪。她希望自己的爱人给自己推心置腹他说明真情。

然而，毛岸英不能直说。他连忙摇摇头，岔开话题，“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时事，并没有什么大事！”他的脸上流露出了稚气的微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说着，看看表，该走了，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刘恩齐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

毛岸英叮嘱说：“江青她只顾自个，根本不照料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经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说罢，挥泪别爱妻，赶回部队。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任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就作机要秘书工作。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头一天。美国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数十架飞机，低空飞来，连转圈都没转，就直奔彭总住的那幢房子扔炸弹。近百枚凝固汽油弹在房子上爆炸了，房子很快燃烧起来，火光冲天。

幸好彭德怀事先搬走，才幸免遇难。

毛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能跑出来，结果牺牲了。

彭德怀一个人坐在防空洞里，沉默不语，伤心异常，喃喃地说：“唉，为什么偏偏把毛岸英给炸死了呢？”毛泽东把唯一健壮的儿子交给了他，他怎么向毛主席交待呢？

当天下午，彭德怀趴在一张小木桌上，起草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彭德怀站起身来，沉重地将那电报递给值班参谋，说：“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说罢，连帽子也没戴，一个人走出掩体，走下山坡。

几个警卫人员见了，急忙跟在后边。

朝鲜初冬的夜晚，朔风呼啸，寒气袭人。彭德怀不觉得冷。他感到火在升腾，恨在奔流，浑身燥热，就把风纪扣解开，任呼啸的山风吹刮自己的面颊、脖梗和心胸。他走着走着，停住脚步，仰起头来，望着天上的寒星，许久许久，才发出了一声长叹：

“唉！毛主席把他的儿子托给我，我怎么向他交待哟！”

两颗晶莹的泪花，在老将军的眼里滚动。

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又顺便汇报了毛岸英的牺牲经过。他心情沉重地说：

“主席！毛岸英是个好青年，他是和高瑞欣同志一起牺牲的。”

毛泽东突然一怔，像是受到了什么巨浪的撞击，使他几乎无法控制。他急忙拿起香烟，抽出一根，放进嘴里，划火柴，要点烟。可是，连划了两根，都没划着。原来，他那因激动而颤抖的手，不由得用力过猛，把火柴棒划断了。

彭德怀见此情景，心情更加沉重，站起来说：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他，使毛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闭上眼睛，强压住巨大的悲痛。他又示意让老将军坐下，自己又默默地抽着烟，用那呛人的烟味，压住那份痛的心潮，然后，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他那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彭德怀走出毛泽东的房间时，一方面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些恼火：因为他看出了毛泽东对这个消息有些震惊，像是第一次听到了他儿子牺牲的消息。原来，秘书叶子龙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和周恩来商量，压住了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彭德怀不知道，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直言相告，使毛泽东的情感受到了强烈的震荡。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闭上眼睛，就想起毛岸英，想起杨开慧，想起他和毛岸英母子分别的情景，想起毛岸英出生时的情景。

1922年10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当时，杨开慧身怀有孕，已经足月，却不分娩。毛泽东正忙于领导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把六千多名泥木工人组织起来，同县府、省府的反动统治者进行说理斗争，每天回家很晚。一天，他见杨开慧愁眉苦脸，就建议她别成天坐在屋里，出去到岳麓山一带转转，活动活动，或许可以生得快些。第二天，杨开慧到岳麓山去走了一遭，第三天，10月24日，孩子就出生了。

毛泽东抱着这个又白又胖的头生子，高兴极了。正巧，那天又是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结束的日子，双喜临门，毛泽东就给孩子取了个响亮英雄的名字“岸英”。

毛岸英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上海、长沙、广州、武汉。他都到过，毛泽东曾感慨地说：

“为了革命事业，这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毛泽东记得很清楚，1927年的夏天，武汉热得像个蒸笼。人们闷得喘不过气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他开完了“八七”会议，便将夫人杨开慧及三个儿子一起送到岳父杨昌济先生的老家——湖南板仓杨宅。次日清晨，他和夫人杨开慧及五岁的毛岸英匆匆告别，便登程发动秋收起义去了。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党组织设法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转移到上海。当时，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把三个孩子安排到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大同幼稚园。1931年4月，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岸英兄弟生活没有着落，只得流浪街头。老三岸龙在几次迁移中失踪了，岸英带着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他们逃出店铺，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人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他们，后通过统战关系，乘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之机，带岸英、岸青一同出国，几经转折，于1937年初到莫斯科学习。

1938年，毛泽东看到了有人从苏联带回的岸英、岸青的照片，十分高兴。他站在延安的窑洞前，拿着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他赶紧书写一信：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

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过了一个月，不见回音，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带了自己的照片。信的开头就询问：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若收到，快写点回信给我……一种盼儿心切、急不可耐之情跃然纸上。此后不久，得到回信。父子之间，书信往来。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能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十分关心儿子的进步、发展、向上，耐心地写信指导儿子的学习。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又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均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在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烦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_写完信，毛泽东又亲自动手，挑选了给儿子阅读的书，其中有哲学、史学方面的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共 60 册。

斯大林听说毛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英勇，十分高兴，特地接见了，并送给他一支精制的手枪。

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育，使孩子们迅速地成长起来，积极向上。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闪电战。毛岸英身在莫斯科，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他每天一清早，先去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世界大地图上作红白标记。

毛岸英的标记红白分明，阵线清楚。从 1938 年以来，他在地图上已经贴了许多小白旗、小红旗，在德国侵占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代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他都痛心地将小白旗插在上面。白旗越来越多，红旗越来越少。猖狂的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大片苏联领土，逼近莫斯科，毛岸英痛苦极了。他给莫斯科贴了一面大红旗，在城郊插的旗是红白相间，表示敌我正在激烈争夺。这一时期，毛岸英不仅抓紧学习，刻苦读书，还担任国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组织团员、青年，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1941 年冬末，战事更加紧张。联共（布）中央有个建议，希望 16 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那时，毛岸英已经 19 岁了，学校老师向他建议，加入苏联国籍无比光荣。毛岸英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为祖国人民服务。如果加入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接着，他又补充说，尽管我是中国人，但我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献身。

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毛岸英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上战场。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瓦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斯大林当时很忙。他既要指挥苏联红军对围攻莫斯科的德军进行大会战，又要部署苏军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还要运筹苏英、苏美关于互助合作的协定，以及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就在毛岸英写信前后的5月26日，苏、英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斯大林是否看到了毛岸英的信，没有材料，不能乱说。但毛岸英却求战心切。信发出十天后，见无回音，他又发了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也都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在毛岸英万般焦急的时候，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了。毛岸英同他曾有过一面之交，互相认识。这次一见面，毛岸英就拉着他的手，说起他给斯大林写信和他急切要求上战场去打法西斯的想法。曼努意尔斯基是个热心肠人，又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同意他进学校去学军事。

于是，毛岸英很快地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后来，又转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尤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于1943年1月加入了联共（布）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获得了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的大反攻。这位机智勇敢的中国青年，带领着苏军坦克连，头戴坦克手的帽子，身穿坦克兵服，胸前挂着报话机，半身探出坦克外，千里长驱，穿越了波兰、捷克等好几个东欧国家，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

斯大林听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英勇，十分高兴。1946年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特地接见了，并且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奖赏。

斯大林所以这样做，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不仅因为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他愿意通过嘉奖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加深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也加深他和毛泽东之间的革命情谊。这是理智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还在感情方面，毛泽东儿子的英勇杀敌，胜利回归，使他想起了自己的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想起了自己的妻子——美丽而温存的娜佳。一股强烈的感情，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斯大林那长期冷静、深邃的脑海里，掀起了漫天风暴，以致使这位自尊、自强而自专的伟大人物，一时几乎无法自我控制，几乎昏倒。

斯大林急忙走到办公桌前，双手拄着桌子边，咬紧牙关，调动他那强大的理智控制感情，运用他那力大无边的自制之索，束住那脱缰的感情之马，才使他稳住身子，没有跌倒。

斯大林的妻子娜佳出生于巴库，在高加索长大。革命的家庭把她培养成

了一位温柔、漂亮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姑娘。她勤奋好学，工作认真，是同伴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发工作的典型。她把斯大林理想化了，认为同他结婚是为革命服务的最高形式，1918年，她和斯大林结婚，住进了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整天忙于工作，很少照管妻子和孩子，很少给人以温存。娜佳生了一儿一女。儿子瓦西里，生于1920年。女儿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娜佳对斯大林只知道工作而不关心家庭和孩子很有意见，对斯大林的专横残暴十分反感。就在斯大林发动肃反运动，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时候，1932年11月18日，他的妻子娜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之后，当天夜里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

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在卫国战争中被俘、英勇不屈。德国法西斯要用雅科夫换取德军元帅保卢斯，斯大林断然拒绝。

妻子的自杀，使斯大林十分震惊不安。他不能理解，曾经热爱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因小小的口角就会自杀。他怕人们说他是冷若冰霜的男人，曾竭力表白自己总是热爱和尊重妻子的。他曾把娜佳在1929年春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放大后挂在他克里姆林宫住宅的墙上和孔策沃别墅的墙上。

现在，斯大林走到爱妻娜佳的遗像前，抬起头来，默默地端详着，像是在欣赏妻子那美丽、慈祥的笑容，又像是在回忆过去那甜蜜的生活，又像是在深恩妻子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又像是在琢磨娜佳为什么对她的前房妻子所生的儿子雅科夫是那样的关心和爱抚。突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你在哪里？！”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生下的儿子。母亲早逝。他是由他那慈爱的祖母和外祖母抚养成人的。到莫斯科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在炮兵学院毕业，成为苏军上尉，并加入了苏共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对儿子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不但要求他各门功课成绩优秀，而且要求他身体健壮，性格坚强，不许向困难低头。1941年6月22日，经斯大林同意，雅科夫随苏军奔赴苏德战争前线作战。当时，德军第三坦克群向雅科夫所在的苏军防线猛烈进攻。7月15日，当雅科夫端起冲锋枪呐喊着向敌冲击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炸倒，失去知觉，后被德军俘获。由于叛徒出卖，德寇知道他是斯大林的长子，多次审讯，严刑逼供。雅科夫坚强不屈，坚信苏联人民一定会赢得战争胜利。德军审讯官由少校直换到陆军元帅贡特尔，都没有能使雅科夫屈服。最后，希特勒亲自下令将雅科夫送入死亡集中营，说他只要写一封信或发表一个声明，就可以逃脱死神的魔爪。雅科夫宁死不屈，始终不从。

这时候，苏军俘获了德军元帅保卢斯。德国法西斯要用雅科夫换取德军元帅保卢斯。当时年已62岁的斯大林非常疼爱长子、惦念长子，关切长子的性命，但他为了战胜德国法西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断然拒绝了德国的建议。有人问他落入魔掌的儿子怎么办？斯大林说：

“我相信我的儿子决不会给苏维埃祖国丢脸！”

法西斯党徒暴跳如雷，要严刑处死雅科夫，并要把处死的残酷经过拍摄下来，然后转给斯大林，想让斯大林亲眼目睹亲生儿子的惨死状况，使良心受到永久地惩罚。1943年4月14日行刑那天，德国党卫军的几个头目在电网附近布置了桌子、刑具和摄影机。机智的雅科夫一看情景，识破了敌人的

阴谋，迅速扑向带电的铁丝网。惊慌的法西斯匪徒又向他开了一枪。就这样，年仅 36 岁的雅科夫壮烈地牺牲了。斯大林生前一直也未能听到他长子的确切下落。

现在，斯大林看到了党组织给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报功的材料，想起了自己的长子雅科夫至今下落不明的情景，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敬重，对毛岸英重奖的决心。奖什么呢？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武装斗争，手枪是既能自卫又能击敌的常用武器，所以，斯大林在接见毛岸英时，就赠给他一支蓝闪闪的小手枪。

毛岸英向斯大林举手敬礼，接过那闪光发亮的手枪，心情激动，决心要回到祖国，在革命斗争中立新功。

1946 年初，毛岸英和苏联医生阿洛夫、米力尼科夫等人一起，乘飞机从莫斯科起飞，经新疆、西安，秘密回到延安，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日夜思念的父亲身边。1927 年 8 月，岸英离开父亲时只有 5 岁，记忆朦胧。现在，19 年过去了，父亲是什么样子呢？他恨不得一下子飞到父亲身边。

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太好，但他见斯大林给他派来了苏联著名的外科医师阿洛夫和内科医师米力尼科夫，又见 19 年没见面的大儿子毛岸英，由当年瘦小的五岁小娃娃，长成了一个身高体壮、意气风发的青年小伙子，心里十分高兴。他的病经过医治，也很快好转了。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毛泽东走出窑洞，在王家坪前的桃园里漫步。毛岸英笑眯眯地过来了。毛泽东抬起头来，仔细地打量着已经长大成人的长子。儿子比老子个头还高，脚踩牛皮大靴，身穿军呢大衣，肩宽胸挺，精神抖擞；英俊秀气的脸盘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炯炯有神；开阔的眉宇间，既显出开慧妈妈的情影，又露出爸爸的特征：天庭饱满。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让儿子坐在身边，仔细地询问岸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又问：

“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经常读，能找到的我都找来读。”

“读过什么小说？”

“读过《红楼梦》、《水浒》、《三国》，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毛泽东把读《红楼梦》的要领告诉了儿子，然后又站起身来，慈祥地说：

“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毛岸英觉得父亲讲得很对，也点点头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了，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虽然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但时间短；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接着给儿子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然后，拍着儿子的肩头说：“孩子，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这很好；可是你还没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劳动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

毛岸英表示愿意补上这一课。

毛泽东笑着说：“补这一课也不容易。你到农村去，炕上摊张芦席子，

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也不要怕，用手捉一捉就对了……”说着，毛泽东也忍不住笑了。他认真地说：“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儿子安排显赫的职位，更没有给儿子优厚的待遇，而是要求毛岸英自己背上一斗半小米和铺盖卷，到艰苦的山村吴家枣园去向农民学习、劳动，拜农民为师，当农民的小学生。还嘱咐他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特殊化。

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在农村吃苦耐劳，干得很好，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1946年下半年，学会了各种农活后，回到延安。

毛泽东看见儿子结满老茧的双手，高兴地说：“哈，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时间短，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撤离延安时，按照中央的安排，毛泽东留在陕北，毛岸英随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改。在转战陕北的百忙中，毛泽东还给岸英写了几封信，指导他的学习、工作。1947年9月12日的信中说：

“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我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毛泽东对毛岸英爱得深，要求严，一点也不马虎，更不允许他特殊。1948年冬天，党中央住在西柏坡。毛岸英当时正在和刘思齐谈恋爱。两个年轻人情意绵绵，准备结婚，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刘思齐的印象很好，听了两个年轻人的叙述，高兴地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

毛岸英撅起了嘴巴，急问为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这你知道，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红了脸，当即争辩：

“可我都二十七岁了！”

毛泽东取出一支烟，点着火，抽了一口，笑着解释：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十八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可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将桌子拍了一下，站立起来，严厉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岸英见父亲发脾气了，不敢再顶撞，悄悄退出门来，委屈得差点儿要哭。院子里，一只红公鸡正在追逐母鸡，唧唧呱呱地边跑边叫，很得意。毛岸英正在气头上，边走边嘟哝：“公鸡还能追母鸡，我是你的儿子可还是个人呀！”他回到房里，难受得直哭，第二天没起床，连哭带闹，谁也劝不住。警卫排长劝不住，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火了，大步流星地赶到儿子住处的门口，厉声大吼：

“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正在床上哭闹的毛岸英，听见父亲的声音，屏声静息，立刻老实了。

“哭什么？没出息！”

毛泽东只训斥了一句，转身走了。过了几个星期，毛泽东在村边的小路上散步。毛岸英下乡回来，见了父亲，打过招呼就想走。毛泽东叫住了他，问：

“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毛岸英低头回答：“爸爸，我想来想去，是我不对。我今后一定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这就对了嘛！以后哪，党定的规矩，咱们都得遵守，谁也别闹特殊！”

毛岸英懂事地点了点头。真的，从此以后，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对亲朋好友也不含糊。

1949年10月初，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刚刚开过，毛泽东主席的名字，随着电波，响彻中外。毛岸英的一位表舅觉得自己的表兄弟当了国家主席，便向李立三写信，谈到他的另一个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

“朝里有腿好坐官”，这句俗话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习惯。但是，毛岸英闻信不以为然，他在给李立三的回信中，专门就此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反动派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指的是这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常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毛岸英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位年青共产党人的心曲，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教子之道。他写这信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回答一位近亲的请求，同时也是为了律己。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久，他就主动要求上前线，援朝抗美，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后来，终于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他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当然知道援朝抗美的风险，更清楚地知道奔向抗美前线，面对面地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作战，必然会有牺牲的危险。但是，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要上前线，要冒着漫天炮火，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军去作战，他不仅高兴地同意了，并且说：“去吧，孩子、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儿子，祖国的儿子，人民的儿子！”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送上了炮火连天的前线，让他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爱民之情，日月可鉴；爱子之情，自爱之义，溶铸于爱国爱民的实践中、战斗中。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力大无边、战无不胜的秘密之当然，牺牲是痛苦的，亲生爱子的血染沙场，常常使人更悲伤。毛泽东在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好几天，他沉默不语，神情黯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一次，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已经萧煞的柳枝，轻轻地念叨起《枯树赋》：

“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954年的12月间，一场大雪，把北京装点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这时，抗美援朝战争早已胜利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又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毛泽东踏雪归来，心旷神怡，走进颐年堂的办公室里，准备办公，忽见桌子上放着一叠关于安置毛岸英烈士遗骨问题的材料。他急忙拿了起来，仔细翻阅，见里边有志愿军总部发给军委总干部部的一份询问电报，有军委干部部起草的、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审批的复电文稿，还有彭德怀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军委干部部起草的复电文稿，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彭德怀认为这样做不够妥当，但又觉得事关国家主席的儿子，不敢自专，特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示。信中写道：

“……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高瑞欣合理一处（两个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以此教育意义为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毛泽东看罢，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心想：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给儿子搞特殊啊！

周恩来进来了。他是专为此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他简要地叙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表个态。

提起毛岸英的牺牲，父亲的心情总很沉重。毛泽东强忍失子之痛，挥泪表态：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于是，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增修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着七个大字：

毛岸英烈士之墓

每当旭日东升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烈士的墓碑上，字字闪着金光。群山巍巍，松柏常青，风过山林，呼呼有声。那墓碑，那金光，那群山，那青松，还有那时时从山林中传出来的松涛声，似乎在传颂着人世间最伟大、最真挚的父子情。

28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 顶住了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曾写道：“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战。”“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和毛泽东的国际声誉。不仅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而且许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把毛泽东看成国际主义的英雄。许多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则把毛泽东看成了他们的导师和代言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长了新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风，保卫了世界和平。

第二，毛泽东一直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民族平等、反对扩张的政策。他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同时又主张向外国学习，争取外援，取长补短，平等互利，互助友好。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强大的民族还是弱小的民族，无论是对富裕的民族还是对贫穷的民族，他都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取长补短，尊重主权；绝不以强凌弱，依大压小，搞大国沙文主义。他真诚地关心和支持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和人民，而绝不从那几捞什么“油水”，取什么好处。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得特别鲜明。

早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就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好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又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写的一个报告稿上批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战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

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所以与朝鲜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而且涌现了许多罗盛教式的英雄模范，谱写下了一曲曲国际主义的凯歌。

第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人们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列宁对此作过坚决的斗争。1922年下半年，列宁虽然因脑病发作离职休养，但他却发现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10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组成苏维埃联盟问题时，列宁由于牙痛不能出席会议，就借题发挥，以牙痛为题写了一份“备忘录”，送给政治局：

“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同年12月，列宁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揭发了斯大林借口“统一”社会主义各共和国，压迫苏联境内异民族的作法。列宁认为：要坚决尊重各民族的权利，他断言，在社会主义各共和国的“统一”方面，即使发生了“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情形，这种损害比起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放任不管，结果，“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而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列宁的这封信后来被隐匿了三十多年。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在他的故乡——高加索爆发出来的。高加索地区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的干涉军相继侵入，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势力勾结侵略军，不断反对苏维埃政权。奥尔忠尼启泽率领苏联红军和该三个共和国的革命力量打退了侵略军和反革命势力，在三个共和国分别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战后，奥尔忠尼启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留在那里领导政治军事，组成了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但是，奥尔忠尼启泽领导的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在三个共和国统一到南高加索联邦的问题上，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斯大林拟定了要把各共和国吸收合并于俄罗斯联邦的统一计划，支持奥尔忠尼启泽要求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合并之后，作为南高加索联邦再加入苏联。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反对这个计划，主张各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矛盾激化了，双方争执不下。奥尔忠尼启泽给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扣上了“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令他们离开格鲁吉亚迁到莫斯科。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1名，有9名以辞职表示抗议。高加索边疆区工作委员会将持不同意见的人免职，任命了顺从莫斯科方针的新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立即同意了这种强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页。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

《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7—18页。

制措施。持不同意见者强烈反对。奥尔忠尼启泽大怒，殴打了持反对意见的党员。

列宁闻讯，十分气愤，在他口授记录中对斯大林支持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严厉批评，因为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一样，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革命家，而他的这些行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典型，所以列宁说：“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同时，又赋予他们“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的特征。“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一名警察。列宁常把这个人的名字作为野蛮的“警察统治”的代名词来用。

重病在身的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信中指出：列宁死后，党中央委员会存在分裂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特别来自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过了十天，列宁越想越对斯大林不放心，就又以“补充”的形式，给信中加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手保管。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她将信转交给党中央，在5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作了宣读。这时，俄国共产党党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托洛茨基等人提出了自己的政纲，用宗派手段攻击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成为当时重大的问题。于是党代表大会审议了列宁的信件之后，考虑到当时的党内形势和斯大林的作用，以及他可能从列宁的批评中汲取教训，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

斯大林从列宁的严厉批评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在后来的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改进。行动上，1924年至1927年初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是明显的佐证。在理论上，他也旗帜鲜明地批判过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问题和答复》中，把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当作在资本主义稳定长久保持条件下，使“党蜕化的危险”之一来批判，相当深刻。斯大林说：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接着问道：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页。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斯大林明确指出：“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并强调指出：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此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斯大林创造性地执行了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国际威望日益提高。1929—1930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使两个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攫取了政权，法西斯乌云开始笼罩地球。为了对付法西斯主义，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倡议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斯大林领导苏联也奉行了争取建立民主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威信。

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进展，斯大林的“粗暴”和大国沙文主义也有了恶性的发展。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错误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愈大，敌人也愈加凶恶，阶级斗争也愈尖锐。根据这种错误理论，在斯大林的指使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进行残酷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希特勒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补签了规定苏联和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的《秘密附属议定书》。议定书中写道：

值此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之际，在下面签字的全权代表在严守机密的会谈中讨论在东欧划分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的问题。

1. 在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

2. 在一旦波兰国家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规定。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1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1页。

《斯大林文选》上第112页。

据美国国务院编：《大战秘录》日本读卖新闻社1948年版。

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苏联开始采取大国之间分割“势力范围”的转折点，也是斯大林陷入大国主义泥潭的重要步骤。

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用闪电战占领了波兰的西半部；苏联于9月17日也进军波兰，同时宣布：“波兰国家及其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接着，就占领了波兰的东半部。11月底，苏联又进军芬兰，侵占了芬兰卡累利阿地区。1940年8月，苏联又不顾它在1932年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签订的《拉苏互不侵犯条约》、《爱苏互不侵犯条约》，决定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个独立国家并入苏联。

在东方，苏联和德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主权也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1940年11月13日在苏德会谈中，德国外长李宾特罗甫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再三强调：在达成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日本当可愿意承认外蒙古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对于外蒙古，斯大林完全把它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早在1936年3月，苏联事先并不通知中国，就同外蒙古签订了所谓互助协定。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1941年4月苏联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合法化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外蒙古脱离中国合法化的承认，在与这个条约同时公布的联合宣言中公开“申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这个条约，实际上否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否认了中国对东北三省拥有主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第一次伙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

苏联还对我国新疆长期进行侵略活动。1940年11月，苏联威胁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背着中国政府，非法签订了所谓《租借新疆锡矿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有效期为50年。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

第三条：苏联政府有权将其由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而得之制成品，或半制品，由新疆无阻碍地运出，并免缴关税及其他项捐税。

第四条：为实际施行本租借条约起见，苏联政府设置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产地之托拉司，简称为“新锡”。

“新锡”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

第五条，新疆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应保证“新锡”获取为举办本条约所载各项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采伐、煤炭开采，及获取建筑材料之区域，同时新疆政府应将居住于划拨“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

土地区域，由新疆政府按照“新锡”之请划拨之，划拨土地区域时，不应迟延，并须与所提申请完全相符。

第十一条：“新锡”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等等，以

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须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

很明显，这是一项侵略性的“不平等条约”，它和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出一辙。在经济掠夺的同时，苏联在新疆还进行政治颠覆活动。在1940—1945年期间，苏联策动和支持新疆的维吾尔、塔塔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首领，发动武装起义，在苏联陆军、空军的直接参加和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占巩哈、伊宁、精河、吉木乃、富蕴、福海、额敏、裕民、和丰等广大地区，控制了塔城全区，并把矿产丰富、畜牧业兴盛而又有战略价值的伊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威胁迪化。在发动起义过程中，大量散发印制精良的俄文传单和标语。提出“杀回灭汉”等口号，声言要将汉族赶回嘉峪关，建立一个脱离中国，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完全由苏联控制的国家。

1941年6月，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12月，日本发动了对英美进攻的太平洋战争。德意日联盟的轴心国集团妄图称霸世界。英美则同苏联站在一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因此，苏联原来同德国和日本达成的划分欧亚势力范围的协议，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特别是从1943年下半年起，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为转折点，苏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成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同年9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欧洲的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在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对手方面，不得不由德日帝国主义转向英美帝国主义。于是，经过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同年11月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苏、美、英就划分在欧亚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了秘密协议。据战后英美官方公布的材料，（后来苏联政府并未否认这些材料），关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在雅尔塔会议上，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把波兰东部领土划归苏联；同时要分割战败的德国，把德国的一部分领土划给波兰。丘吉尔和斯大林还约定：苏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拥有75%到80%的优势，英国的份额是20%到25%。苏联同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势力是一半对一半。斯大林为了履行它同英国达成的协议，曾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铁托允许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回国进行统治，遭到铁托的严厉拒绝。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抵制和不满。他们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大体上分三个阶段。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大体上约15年，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算起，到1949年7月初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会谈。在此之前，王明一伙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旨，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心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艰苦奋斗，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他也强调争取外援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他特别指出：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绝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卑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因此，无论斯大林以几个师的精良装备作诱惑，要中共派人取来搞武装；无论“钦差大臣”王明 1937 年回国后如何内外活动，软硬兼施；也无论斯大林打电报威胁：“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因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党虽然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尚未执政；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活动多是通过外交途径，与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谈判或与地方军阀政府（如新疆的盛世才）谈判达成协议的。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虽作过批评和抵制，但当时不可能制止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

1949 年 1 月 31 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听取毛泽东和中共的意见。2 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

第二阶段是面对面地和沙文主义倾向作斗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这个阶段的时间不太长，大约从 1949 年 7 月初到 1950 年 2 月 17 日。主要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和斯大林会谈，毛泽东和斯大林直接会谈。这些会谈的情况，本书在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大的方面，在原则上，对沙文主义倾向顶得很硬，而且往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生活上，有时也抓住时机，对沙文主义的行为

和轻视穷国、弱国的傲气进行必要的顶碰。1949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死鲤鱼不吃”，严令“扔回去”，便是个生动的事例。

毛泽东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摆阔气、兜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圆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并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摆阔气、兜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菜蔬：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

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端起玻璃杯子来把酒“咕咚咕咚”直往肚子里灌的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夹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世界对中国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12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人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问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嘱：“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这一阶段的效果看，其明显者：

一、斯大林公开地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这样公开地承认错误，在斯大林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

二、公开发表《公告》，宣布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效力，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这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要成果。

三、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巧妙的斗争化敌为友，把当初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的“对手”，很快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帮手”。面对此情，人们不能不佩服、赞美毛泽东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后来，在谈到和沙文主义作斗争时，毛泽东说：

“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后来，中苏论战，兵戎相见，实际上也是对沙文主义的一种批判。

第三阶段，“一边倒”、“不称霸”、真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写道：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苏联没有橡胶园，不生产橡胶，每年需要大量的资金向西方国家购买生胶。斯大林对此很忧虑。有一天，他把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几位领导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就解决苏联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西方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斯大林说：“橡胶是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它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尤其是对军事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我们，对我们搞封锁和禁运，你们记得吗？我在同毛泽东会晤时，曾经谈到过这件事。

可他好停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正面答复。”

众人心须神会，知道苏联的统帅又在打中国人的主意了。

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

“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

斯大林采纳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口授了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要毛划出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42 页。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1 页。

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我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革命领袖。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憎恨那些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剥削的帝国主义列强。他曾多次高喊过“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曾为救国救民而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数十年如一日。直到1949年9月21日，他才在北京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又领导着一个获得解放的伟大民族正在建设新中国的毛泽东，怎么会允许别人在自己头上指手划脚？又怎么会允许外国人到自己的国家里，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橡胶种植园？

然而，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拒绝斯大林的建议，而是巧妙地给斯大林提了个反建议：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既不损中国的主权，尊严与权利，又不伤朋友的情面与和气；既同意在海南岛为对方建立一个橡胶园、帮助对方生产橡胶；又强调要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由对方提供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实际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利变为有利，将妄图侵权的剥削、变成了互相帮助的奉献。

短短的一份电报，不显水、不露山，却显示出毛泽东的政治手段不凡。

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读完了毛泽东的复电，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在场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许多人都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斯大林嘴里噙着他那只早已熄了火的短烟斗，沉思良久，又抬起头来，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看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感到吃紧。他知道，这位性好猜疑、喜怒无常、大权独握、冷酷无情的最高统帅，说杀就杀，说押就押，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面的。现在，他这样望着自己，显然是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提出来要给毛泽东提这种建议。斯大林当场采纳他的建议，给毛泽东发了电报，酿成了这个苦果。毛泽东的答复是绝对正确的，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只好由我们自己来吞咽了。赫鲁晓夫委婉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反建议，向中国提供了建立橡胶园所需要的帮助。

中国人利用这些援助，积极发展橡胶生产。1951年8月制订了一个计划，随后又在广州召开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建立国营橡胶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76—377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76页。

园、发展橡胶生产的问题。苏联山派来专家参加这一工作。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之一，就是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

斯大林十分高兴地说：“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

9月16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此后，中国帮助苏联从斯里兰卡等国购买橡胶，以解决苏联用胶的燃眉之急。后来，中国积极发展橡胶生产，按期偿还了苏联提供的贷款，并支援了苏联的橡胶工业。

据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说：赫鲁晓夫关于橡胶问题的叙述，多处失实。五十年代初，苏联是急需橡胶。斯大林也曾经说过，橡胶是黑色的金子，我们的飞机、汽车、拖拉机等等都急需橡胶，西方的帝国主义利用橡胶卡我们的脖子，而我们苏联的气候条件不能生产橡胶，只能用人造橡胶，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想点办法。

中国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可以。后来，毛泽东让周恩来从斯里兰卡，通过班达拉奈克夫人等买了大批橡胶，转让给苏联。斯里兰卡运载橡胶的轮船到广州后，立即将货转装到苏联船上，经海参崴运往苏联，从而帮助了苏联的建设。赫鲁晓夫说：苏联从中国“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不是事实。

其次，赫鲁晓夫自己说得前后矛盾，莫衷一是。例如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而同一个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又说：他不但没有这种提议，而且是坚决反对斯大林这样干的，并因此而受到了斯大林的“厉声斥责”。读完复电后，赫鲁晓夫“设法避开斯大林的眼光，因为我知道，他还没忘记是我首先提醒他不要提出这种建议的”。同一时间、地点，又在同一问题上，赫鲁晓夫大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置信。

从斯大林来看，当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反感。所以，过了不久，有一天，斯大林在用餐中，吃了一只菠萝罐头。那甜中带酸的味道，使他觉得十分可口，食欲增加了，他边吃边说：

“好极了！好极了！这种菠萝罐头是哪儿产的？味道真不错！”

说着吃着，斯大林又拿起罐头筒子来仔细地看。

站在旁边的马林科夫，边上前来为斯大林收拾餐具，边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这是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汁多味美，营养丰富，对身体极有好处！”

斯大林站立起来，又看了看菠萝罐头筒上的汉字，转过身来，点燃了手上的特制烟斗，吸了两口烟，才向马林科夫说：

“马林科夫同志，请代我向中国领导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661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76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662页。

这种居高临下、桀骜不逊的态度，连给斯大林当了多年秘书的马林科夫也感到有点吃惊。马林科夫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一边的赫鲁晓夫等人，一时不知所措。

赫鲁晓夫鼓足勇气，站出来说：“斯大林同志，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不久，从前那儿已经有不少外国人建立的工厂了。如果我们苏联，一个社会主义的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转过身来，瞪了赫鲁晓夫一眼，径直向屋外走去。

马林科夫犹豫再三，还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向中国发出了要求建立菠萝罐头厂的电报。

过了几天，收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复电。在复电中，毛泽东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斯大林的无理要求。复电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话说得很委婉，但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态度却十分严肃。

斯大林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吓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作声。

然而，毛泽东不管这些。

在发复电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估计到了这份复电可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和不满，因此，复电的措辞十分讲究：尊重对方，礼貌待人，有理有节，分寸得当，既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又避免与苏联老大哥发生争执和冲突，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对大国沙文主义决不妥协。在这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想冒犯别人，不想去侵占别国或别的民族的利益，而只想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如果有人来侵犯，就要给予坚决回击——而不管来者是谁。

《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写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赫鲁晓夫是以预言家的姿态说这番话的。然而，正如中国的古语说的那样：“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曾捍卫和发展过马克思主义，为本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赫鲁晓夫只会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自己的嘴脸，而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改造自己的灵魂，因而他虽然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赫鲁晓夫没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理论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严重的错误。行动上的错误，来自于理论上的错误。而理论上错误的症结在于：斯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2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2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59 页。

大林强用“劳动者自决”这一干涉主义的口号代替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早在1918年1月，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提出了按“劳动者自决”的精神来修改民族自决的原则。斯大林说：

“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斯大林的这种主张，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布哈林抛了出来。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对这种主张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指出：在各民族中，劳动者是否具有决定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力量，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的发展；而每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和特征。但是，布哈林等人的主张就是不承认劳动者阶级尚未掌握权力的民族有自决权，这只能理解为是要通过暴力把革命政权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

斯大林并未从列宁的这次批评中汲取教训，大国沙文主义内外兼施，愈演愈烈。因而3年后，气得列宁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30年后，毛泽东也不得不和他和他的继承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持久的斗争。

29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斯大林逝世时情景悲惨，毛泽东发唁电沉痛悼念。

1953年3月初，虽说春回大地，但仍寒气袭人。

3月4日，苏联政府发布公告，通报了斯大林生病的情况，中国的报纸、电台，很快转发了苏联政府的公告。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关注。

此时，斯大林已经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晚年的斯大林、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斯大林是在2月发病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斯大林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看过电影后，乘车来到了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里。斯大林当时精神状态良好，边高声说笑，边步入走廊送大家出来。从这次“晚餐会议”看，斯大林的身体还没有明显的息病症状。

第二天是星期日。斯大林经常在星期日晚间要召开会议。但这天晚上不见通知开会，赫鲁晓夫一等再等，见很晚了，使上床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

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契卡人员从斯大林别墅里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出了什么事。他要赫鲁晓夫最好去一下，并说他已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不敢怠慢，当即驱车来到孔策沃别墅。

当时，斯大林患了严重的中风症，昏昏沉沉地躺在地板上已达4个小时之久，未得到及时的医治。因为斯大林平时严肃，他的卫兵和侍从得不到他的允许、不敢擅自走进他的房间。那天，斯大林在就寝前洗了一个蒸气浴。洗之前，有人曾劝他不要一个人去，说血压高的人洗蒸气浴不安全。斯大林没有听劝告。据苏联报纸报道：“他当时一个人呆在屋内，人们已在屋内的沙发上为他铺好了床。他是不会在次日12点或下午1点以前起床的。不经他的召唤任何人不得进屋。”

往日，斯大林常在深夜11点唤人送些茶和吃的东西给他。但这天晚上他一直没有唤人。因此，契卡人员便派斯大林的女佣人马特霄奥娜·彼得罗夫娜进去看。她见斯大林躺在他平常睡的那间大房间的地板上，像是从床上起来，跌倒了。当人们来到这个房间后，斯大林早已全身麻痹，不能讲话了。人们把斯大林的衣裳解开，将他搬上平时睡觉的沙发上去，那里的空气好些。医生们来了，检查、诊断，询问病情。斯大林急得直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接到紧急电话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领导人，先后赶到别墅，探望病情，但没有立即决定抢救方案。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都掩饰不住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各人考虑着自己的主意、策略，而对抢救斯大林并不热心。

医护人员做了些抢救工作。但三天过去了，斯大林的脑溢血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危及到呼吸系统，严重的缺氧导致窒息。3月5日晚，斯大林脸色灰暗，嘴唇青紫，呼吸十分微弱；突然，他睁开双眼，用炯炯的目光扫过身边的每一个人；接着，又抬起左手，指向天空，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人们；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像熟睡一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

呼吸。

3月6日，苏联各报头版都镶上了表示哀悼的花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出公告：3月5日晚9时5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去世。

同一天，毛泽东即致电吊唁斯大林逝世。电文写道：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仅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接着，电文缅怀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怀、指导和支持。电文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地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的唁电，完全是真情实感，是发自肺腑的真话，绝不是“外交辞令”。就在他发唁电前的不到一个月，即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指示》中，就特别强调了“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为了缅怀斯大林的业绩和友谊，号召人民学习斯大林的理论 and 革命精神，1953年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文章对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整个的一个新时代。”

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捐弃前嫌，宽以待人，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新华月报》1953年第3期。

《新华月报》1953年第3期。

《新华月报》1953年第3期。

《新华月报》1953年第3期。

《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给予他本人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给予他本人高度的评价。到这时，斯大林的事情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个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万众瞩目，举世震惊，毛泽东也感到十分突然。

那是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述职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作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当大会公布的日程临近结束时，会议突然宣布：大会将要延长，大会代表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将要推迟，赫鲁晓夫要作第二次报告。

代表们惊奇地等待着。

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赫鲁晓夫决心要在大会上宣读他早已准备好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但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等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事情闹僵了。

赫鲁晓夫有个怪脾气：他的主意不能反对。他的主意越是遭到多数人起劲地反对，他的主意越固执，信念越坚定，他为他的主意辩护的理由就越充足，态度越粗暴、越蛮横，有时甚至不惜捶胸跺脚拍桌子。他认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如果对于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不深究“大清洗”运动的细节，那就意味着欺骗全党。赫鲁晓夫反复阐述了这种观点，并建议由莫洛托夫宣读《秘密报告》。

莫洛托夫摇摇头，坚决拒绝干这种事。

马林科夫心平气和地劝赫鲁晓夫不要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说这可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赫鲁晓夫不听劝告，在一次大会休息时，趁主席团委员们聚集在一个专门的休息室里边喝饮料边讨论会务事宜，赫鲁晓夫说：

“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知道，在镇压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辜的。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

话一落地，立刻遭到暴风雨般的激烈反对。

特别是伏罗希洛夫立刻大声吼道：

“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能在代表大会上把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这些人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将能说些什么呢？”

卡岗诺维奇立刻附和，用高昂的调子，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张。

赫鲁晓夫硬着头皮，沉着应战。他说：“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

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主席团委员们的“反应再一次像暴风雨般的激烈”。

莫洛托夫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质问赫鲁晓夫：“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赫鲁晓夫是不管党的后果的。他说必要时“我自己准备作这样一个发言，说明我对那些逮捕和处决的看法”。后来，赫鲁晓夫果然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作了“秘密报告”。

此时，代表大会已经选举出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并已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即将提名主席团的短暂间隙，赫鲁晓夫抓住对他的权力尚无限制的有利时机，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本材料，全部是由波斯别洛夫起草的。波斯别洛夫原名菲格尔逊，生于1898年，曾在党中央的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工作过。1940年至1949年期间曾任《真理报》编辑，参加《斯大林传略》一书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代表作，此时他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有关斯大林在审订该书中亲笔自我颂扬的鲜为人知的材料。1949—1952年间，他曾任联共（布）中央附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上台后，他追随其后，调查收集材料，炮制了这颗政治原子弹。

看到这里，人们必然要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不顾联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激烈反对，不顾此学会给苏联党和国家及国际共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而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非要在已经宣布闭幕的“二十大”上宣读《秘密报告》不可？他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千方百计地全盘否定斯大林？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及其和斯大林的关系。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生于乌克兰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卡村。他15岁起先后进入煤矿、焦化厂和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参加工人罢工。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赫鲁晓夫参加了顿涅茨流域赤卫队第一团。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共（布）党员；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中任营政治委员。战争结束后转业回家，到顿巴斯的一个区任区委书记。1923年被保送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因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积极，被任命为党委书记。1925年参加联共（布）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次见到斯大林。1927年，出席联共（布）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追随和热情宣传卡冈诺维奇，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的“新反对派”。斗争取得胜利，确立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1928年，卡冈诺维奇调入联共（布）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乌克兰党中央新任的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到任，赫鲁晓夫拍马逢迎。科西奥尔挑选赫鲁晓夫任基辅州党委组织部长。次年，在卡冈诺维奇的关照下，赫鲁晓夫进入苏联“高于摇篮”——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在此结识了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从而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你她娜佳。”“直到我成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开始

经常到斯大林家里去吃饭时，我才意识到，娜佳把我在工业学院里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告诉斯大林所达到的详细程度。有时斯大林会提醒我一些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事件。”

历史经验证明：阴谋家和投机家是最善于投机钻营、拍马逢迎的。先投其所好，取得信任，然后背后一刀，把你置于死地；再踩着你的脑袋向上爬——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斯大林的警惕性很高，甚至因多疑而错杀了许多人；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防住通过亲属这个“后门”，进入身边，长期伪装，骗取信任的阴谋家。因此，后来，赫鲁晓夫得意忘形地回忆道：

“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租鲁的评语；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是喜欢我的。”

“起初我以为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提升，是应该感谢卡冈诺维奇的，但我很快就发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本人的成分比卡冈诺维奇更多。显然，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诗，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我的忙。”

1930年，赫鲁晓夫当选为莫斯科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次年被选为莫斯科市鲍曼区党委书记，后又提升为莫斯科最大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因在工业领域首倡“斯大林接力赛”，受到斯大林的特别注目和党中央的格外重视。

1932年斯大林妻子娜佳开枪自杀，引起诸多猜测。赫鲁晓夫被提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成为该市党委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得力助手。次年，他与卡冈诺维奇一起带头称斯大林为“我们的导师和领导人”，并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1934年，联共（布）第17大召开，他是大会发言中唯一的一个称颂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之人，被选为中央委员，时年40岁。所以追根溯源，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发明权，还属于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尝到了歌颂斯大林和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甜头”，于是，把这当作升官发财的“法宝”和向上爬的“阶梯”，“歌颂”的调门越来越高，“崇拜”的程度愈来愈强，以致使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禁不住堕入“迷魂阵”，时不时昏昏然起来。后来，赫鲁晓夫竟然称颂斯大林为“人民的慈父”，“生身的父亲”。1935年2月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修改1924年苏联宪法，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拉狄克等人也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1936年11月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部宪法的最后文本。赫鲁晓夫也趁此歌颂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在大会讨论期间，赫鲁晓夫坚决主张把行将通过的新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他说：“这部宪法从头到尾都是斯大林同志起草的。”据历史档案记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文件有力地说明，苏联宪法草案是由一批（党和政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3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4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5页。

《真理报》1936年11月30日。

府)领导人员集体草拟的。”

在大清洗的日子里，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浪高一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颂扬风就高过一丈。1936年8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处死刑的前两天，赫鲁晓夫一方面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声讨“人民的敌人”的大型集会；另一方面，又组织党的积极分子上书斯大林，坚决支持处决“人民的敌人”。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道：

“是您，斯大林同志，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前挺进，我们向您保证：更紧密地把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

请注意，在这里，他又提出了“斯大林主义”！这表明，是赫鲁晓夫第一次把斯大林提到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同的高度上。据美国专家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考证，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是空前的，早于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1934年1月的一篇社论中，只是把“天才的领袖”、“列宁主义”这样的字眼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斯大林只是说，“无产阶级已经为他们找到一位最称职的继承人——伟大的斯大林，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巨人。”该文还称斯大林为“党的领袖、国际革命坚韧不拔的指导者，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设计师”。但是《真理报》并没有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更没有提出“斯大林主义”。

过了不久，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主义”吹得更响了。他说：

“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终将征服全球……我们通过我们的宪法，我们庆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胜利。”

显然，这种过分“冒调”的吹捧，导出了严重的错误，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驳斥帝国主义宣传机关的臆造时，曾严肃地指出：

“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

读史至此，禁不住令人拍案惊叹：历史居然如此相似！四十年后，在中国，大阴谋家林彪对毛泽东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闻讯，引起警觉，批判了林彪的“顶峰论”，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的话他根本不听”，“一句连一句也不顶”！暂时刹住了林彪的“吹捧风”。在苏联那“大清洗”加“大吹捧”的日子里，赫鲁晓夫的“冒调吹捧”，若没有斯大林的授意反对和驳斥，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或驳斥的，更没有人敢把赫鲁晓夫——时任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的红人创造的“斯大林主义”，斥之为“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或支持，即使有人敢出面反对，也必然会成

《真理报》1936年8月23日。

《真理报》1934年1月26日。

《真理报》1936年11月30日。

《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第163页。

为当时“大清洗”和“大屠杀”的对象。然而没有。这使人不能不对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从来不止颂扬他，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产生质疑。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莫斯科公开审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件，以“背叛祖国”等罪名，将皮达可夫等13人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处以十年监禁，推动了第二次肃反扩大化的恶浪。对此，赫鲁晓夫呼风唤雨，推波助澜，起了非常重要的宣传、组织作用。1月30日，他亲自组织了20万人在红场举行大会，支持对皮达可夫等托洛茨基分子的判决，声讨被告的“罪行”。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重要演说，并通过广播、报纸，传往全国。赫鲁晓夫说：

“这些凶手瞄准了我们党的心脏和大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

“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也就是攻击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人民进步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

这时候，赫鲁晓夫已经把歌颂斯大林和声讨“受到迫害的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忠实的男女同志”的头颅，铺垫他向上爬的阶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成了赫鲁晓夫之流晋升、腾飞、飞黄腾达的翅膀。

1938年3月2日至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进行审理。这是肃反运动中的第三次公开审讯。主要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21名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是党的杰出理论家，是“斯大林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时任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主编。列宁曾称他为“党的宠儿”，但也说他形同软蜡，政治上不稳定。布哈林对于罗织的罪名大声怒斥，但无济于事。他和李可夫等19人被处以死刑。

赫鲁晓夫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比较了解，也曾作过不少的赞颂，然而此时，他却翻脸不认人，在一系列的会议上，从十多人的领导人员会议到十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上，都反复强调：肃清“人民的敌人”——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李可夫分子——这些法西斯走狗、祖国的叛徒，都是“人民的慈父”——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洞察力和无穷无尽精力的伟大胜利。一次，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8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敌人还没有被彻底粉碎，他们还隐在黑暗的角落和巢穴里。因此，他号召要坚定地、无情地粉碎工人阶级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垃圾，其他坏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莫斯科人对列宁——斯大林的党，对伟大的斯大林衷心的热爱。

赫鲁晓夫的阴谋得逞了。1938年初，斯大林提议由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都曾是赫鲁晓夫的老领导。他们对赫鲁晓夫成长、晋升都曾有过贡献，也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敬重。但到此时，赫鲁晓夫一朝权在手，翻脸不认人，指责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有“温情主义”，对敌斗争不力。1939年2月，科西奥尔和丘巴尔先后被处死。对此，斯大林当然负有

《真理报》1937年1月31日。

《真理报》1938年7月25日。

领导责任；然而，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并给斯大林提供重要情况的赫鲁晓夫，不能说与己无关。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到乌克兰后的半年内，还把科西奥尔和丘巴尔留下的并经大清洗幸存下来的 83 人，推进了大恐怖浪潮的深渊，其中有不少人都是赫鲁晓夫过去的同事、朋友。1938 年 5 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

“许多坏蛋、变节者和叛徒钻进了基辅的党组织。他们是外国的间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动员起来，更加团结一致；以便我们有力地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我们必须铲除一切垃圾，好让社会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繁荣昌盛起来。”

赫鲁晓夫的两面手法着实厉害：一方面，对斯大林和上司吹捧、歌颂，搞个人崇拜，为他的向上爬找“提携人”；另一方面，利用肃反扩大化，大搞清洗、镇压和恐怖活动，把一切可能妨碍他“晋升”的人，包括他过去的领导、同事、朋友，都戴上“外国间谍”、“法西斯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帽子，“统统抓起来，加以消灭”，使一般人不敢对他冒犯。所以，他向上爬的速度特别快。1938 年，他经斯大林提议，任乌克兰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兼任基辅州和基辅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苏联党政 10 位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 年 12 月，赫鲁晓夫被调回莫斯科，任莫斯科市和州的第一书记，兼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 年在联共（布）19 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被选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为苏共 5 位主要领导人之一。

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马林科夫虽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但他在政治上相当软弱。缺乏战略决策能力。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窥测方向，伺机夺权。贝利亚企图通过内务部、克格勃来驾驭马林科夫，经过军事政变的方式统掌苏联大权；赫鲁晓夫则用软办法，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影响，通过重新恢复党的权威来掌权。他上下串连，多方活动，取得了马林科夫等人的支持，又征得了朱可夫等将帅的鼎力相助，苏共中央主席团一举粉碎了贝利亚集团，当场逮捕并处决了贝利亚。1953 年 9 月，赫鲁晓夫取得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盆否定斯大林；毛泽东读此文心潮翻滚……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揭露了斯大林在 30 年代搞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内幕，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以及在卫国战争初期由于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有关材料。这份“秘密报告”，犹如一颗巨型的原子弹在克里姆林宫爆炸，它造成的“冲击波”，迅速地辐射到苏联全国，辐射到全世界，令国内外公众震惊。

赫鲁晓夫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就是代表。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一批州委书记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推开了主席团房间的门，找到基洛夫，要求基洛夫向斯大林转达意见，说大家对他的粗暴、急躁和傲慢都有

意见，希望斯大林能够注意。基洛夫摇摇头，不想转达，要他们自己对斯大林当面去说。州委书记们说基洛夫和斯大林是朋友，说话容易接受。

正在这时，斯大林来了。基洛夫顺便把州委书记们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回答说：“谢谢你，谢尔盖。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不会忘记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很高兴。但在代表大会选举时，有数百名代表从无记名投票的名单上，勾掉了斯大林的名字。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并且把猜疑心化作了报复行动。时代表们采取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措施。他列举的事实是：代表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名不久就被处决了。138 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 98 名在被处决的名单之列。

赫鲁晓夫指出：30 年代初期和中期，斯大林利用谢尔盖·基洛夫被人暗杀的事件，搞了一次“大清洗”，狠狠地打击了一大批实际上或者臆想中可能与他形成敌对势力的人，打击了一大批曾经加入过党内派别而早已改正了错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曾经与列宁接近的人，他总把这些人作为潜在的对手、“敌对分子”。斯大林觉得：他消灭的“敌对分子”越多，跳出来挡他道的人就越多，而这些人都是有胆有识、能说会写、具有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人；不除掉这些人，他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受威胁，因此，他献运用权力机构大批地清洗、处决这种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又逼出了千千万万的对他歌功颂德的个人崇拜者，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根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通过了关于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的决议，宣布为成千上万的无辜的牺牲者昭雪，为大批幸存者平反正名。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直摇头。他自己太激动了，放下报告，站起身来，在古老的颐年堂里，踱了踱步，想让心情平静下来。可是，他在屋里转了许久，回到桌前，赫鲁晓夫的报告，又映入他的眼帘。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

毛泽东又站了起来，看不下去了！是啊！他一贯地反对主观，片面，而这些人却在故意地搞片面性，不知为什么？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全盘否定，这怎么行？毛泽东想着，喃喃地说：“哼！斯大林不是一般的人物！重要的会议，重大的问题，重要的人物，怎么能不搞全面的评价？你说‘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可事实上就成了全盘否定。”天快亮了。毛泽东已经有二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眼球上隐现红丝，可他仍心情激动，毫无睡意。卫士进来，劝他休息，并帮

他服了安眠药，扶他躺在那张里边堆了许多书籍的硬木板床上。

毛泽东躺在床上，取来一些文件翻阅，想把思想的注意力引开，慢慢入睡。按常规这样经过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药力发挥作用，便能入睡了。但是今夜不同，眼药一个小时过了，他的思想还老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上思考，心猿意马，肆意驰骋，无论怎么地收拢也收不住。

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

“无疑，用行政的、镇压的甚至恐怖的手段代替思想教育。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想着，又反思地问，可是恐怖全错了吗？叫敌人恐怖、害怕也错了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帝国主义都在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颠覆、包围、渗透，周围都是白色恐怖，一时人妖颠倒，鱼龙混杂，敌我难分！斗争复杂嘛！当年，我党也有过类似的教训。有人在中央苏区抓 AB 团，风声鹤唳，搞扩大化，冤枉了不少好同志！好在我们发现得早，纠正得快。要不，人人自危，革命岂不完蛋？！让自己人恐怖是错误的。可是，苏联的人民都恐怖吗？如果按赫鲁晓夫说的都那样恐怖不安，社会主义的苏联怎么能建成？那么凶恶的法西斯德国怎么能打败？毛泽东想着，又不由自主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桌前，拿来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翻看：

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看到这里，无数往事，无数痛苦的回忆镜头和画面，像潮水般地涌向毛泽东的眼前，使他无法摆脱。是的，斯大林确实这样干过，他派的李德、王明就不止一次地剥夺了我毛泽东的发言权。他的“小指头”确实厉害，有人想要我的命，就看斯大林是不是“动小指头”。但是，斯大林的小指头毕竟没动、我还是夺回了发言权。如今，斯大林死了，不能说话了，过去称斯大林为“父亲”、“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的赫鲁晓夫，现在说他是“暴君”、“凶手”、“混蛋”、“白痴”和“罪犯”，我毛泽东不能落井下石，不能忘记他说过的正确的话，不能忘记他办过的正确的事，更不能忘记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

毛泽东心似平原定马，驰骋难收。

卫士进来了，帮他第二次服了安眠药。但是，他躺了好久，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眼看阳光已经照到窗上，他干脆起床，接着工作。

不久，米高扬来到北京。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前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是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毛泽东考虑的不仅是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因为斯大林是当时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领袖，对他的褒贬，不仅关系着苏共和苏联国家的威信，而且直接关系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因此，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他不得不进一步考虑今后世界共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论十大关系》。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重要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了中国和外国关系，讲到了苏共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向外国学习。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这样。对于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

时间过了四个月，到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总结中共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讲话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提出了中共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在这里，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批评斯大林显然不同。

首先是立场不同。毛泽东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斯大林采取同志式的客观分析的态度，甚至把自己也摆进去，共同总结经验教训，

多次讲到，“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企图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其次，观点不同。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认识论的高度上，用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的错误，指出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同时，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说明主观主义危害大，面积宽、范围广、时间长，要全党认真克服。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把斯大林的错误完全说成是个人品质的问题，离开当时苏联处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缺乏经验等客观条件，将个人错误无限夸大，从而起到否定马列主义、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

第三，方法不同。毛泽东采用的实事求是、科学分析、总结经验的方法，具体地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主观因素、社会效果等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从中引出规律、经验来，指导党和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对斯大林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否定全盘的方法。

就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他说，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客观的、具体的分析。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帝国主义又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包围、封锁、颠覆、渗透；斗争十分复杂激烈，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又特别指出：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接着，毛泽东列举了三件大事，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的主流和主要方面。三件大事是：第一，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经过十月革命，变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第二，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使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第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和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毛泽东说：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9页。

30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 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任何人都有两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像一枚超级政治原子弹，在苏联的心脏——克里姆林宫爆炸了！它的冲击波将冲击苏联，冲击世界。”

西方人士的这种评论，不无道理。

的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传出，在世界各地，很快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政界人士认为这颗“超级政治原子弹”。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炸开了裂缝。于是，他们接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的旗号，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不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又缺乏应有的警惕。由于当时的苏共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很高的威信，而赫鲁晓夫又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所以许多人都盲目地、简单地跟着他批判“斯大林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面对此情，心情沉重，认为这种思想混乱若不及时扭转，澄清是非，势必影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于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不到40天，毛泽东就提议并主持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草稿写出后，毛泽东于1956年4月2日凌晨4时前，对文章作了认真的修改，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请邓小平立即印成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以及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请看过清样的同志参加讨论，提出意见，进行修改。4日下午，又第二次打成清样，请书记处再讨论斟酌。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过多次修改，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

首先，要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李捷：《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转引自《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0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绩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写道：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其次，毛泽东还分析了斯大林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他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之后；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反应强烈。而赫鲁晓夫看后，不以为然。后来，他到中国来说斯大林的坏话。

毛泽东摇摇头，冷静他说：

“世界上没有完人，斯大林也一样。你看看吧，任何人都有两点：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按你们这种办法。任何人都可以否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来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

赫鲁晓夫急了，又讲了斯大林的许多坏话。

毛泽东淡淡一笑，幽默地说：“这样吧。赫鲁晓夫同志，你说了半天，挺辛苦的，就三七开。斯大林是国际人物，有世界影响，为世人瞩目，不能全盘否定。你这样全盘否定，不符合实际，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你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怎么很快传到美国、英国、法国去了？”

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

毛泽东接着责问：“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吗？人家利用你这炮弹，攻击社会主义呀！”

“这不要紧！”赫鲁晓夫强词夺理：“我可以发个声明，说那是他们造谣，我根本没有作过那个报告！”

“那是掩耳盗铃！”毛泽东说罢，望着赫鲁晓夫那光溜溜的脑袋和不负责任的神态，忍不住气得笑了。他说：“你的秘密报告，我手里也有一份，怎么能不承认？这是你给人家提供的炮弹嘛！”

赫鲁晓夫气急败坏，把手一挥，脑袋一摇——意思是说：管他呢……

1956年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抵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一股右倾思潮，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呼声遥相呼应，不久，又陆续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很快地形成了几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风潮。

各种报刊、报告、情况汇报乃至紧急呼吁，通过多种渠道，像雪片似地

飞向北京，飞向毛泽东的身边。

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坐在他那间古老的办公室里，翻阅这些从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告、材料，心里不是滋味。其中大部分是各级党组织的报告、请求、请示，还有一些呼吁，甚至有告急求援的。有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汇编，其中有正常的批评，也有恶意的诽谤，甚至有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的言论。同时，又有大量的工农兵群众和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来电，表示对攻击者的不满、愤慨，要求党中央采取措施……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混在一起，热情的帮助和诬蔑的语言同时袭来。毛泽东看了半天，站起身来，离开窗口，在屋子里踱了一阵步，摇摇头，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尤金讲不清。”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并经他多次修改的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该文写道：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意。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文章明确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然而，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并未引起苏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1957年11月，毛泽东乘坐“图104”客机飞抵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

毛泽东淡淡一笑，沉稳地说：

“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您说的很对。”赫鲁晓夫满脸堆笑，频频点头，但他后几下的点头却不大自然。因为他已经觉察到，毛泽东的后一句话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而这个基调是他不大爱听的。然而，他又无可奈何，世界上的领袖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你瞧，现

在，在迎宾谈笑之中，他又定下了这个严肃、重大而又不容反驳的主题，逼得赫鲁晓夫心里不悦，嘴上还得连连说：“很对，很对！”

接下来，毛泽东同苏联党、政、军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并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然后到克里姆林宫下榻处休息。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赫鲁晓夫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无殷勤地说：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你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

“什么意思？”毛泽东立刻抽回了被握的手，面色严肃起来。

机灵的赫鲁晓夫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精心安排未必能得好报，急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片深情……”

毛泽东无心细听赫鲁晓夫的解释，告别主人，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来到翻译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的房间里。他的身后，卫士长李银桥和苏联派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也随后跟来。

李越然忙问：“主席，有什么事吗？”

毛泽东只摆了一下手，没有说话。他走进屋门，见这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使转回身，上楼去了。

“主席像有心事。”李越然心里正在嘀咕，李银桥来了，把他叫到毛泽东的寝室里。

毛泽东独自一人，静坐床边。见李越然来了，轻轻招了招手。

李越然忙轻步走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用很轻的声音对李越然说：

“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一听，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这可不行，这不行！”

“你看你，”毛泽东急了，批评翻译：“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just 说不行，主观主义。”

“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

李越然出来，没有去找苏联同志说，先去报告随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的寝室……

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但他躺在沙皇住过的寝室里，一直失眠、难受。他觉得一个共产党人住进俄国沙皇的寝室里，不是一种特殊的照顾，特别的荣誉；而是一种软化的折磨，变相的侮辱。然而，有一些号称共产党人的领袖，却在极力追求沙皇、贵族的享受，这不是被人家演变过去了吗？毛泽东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着。

后来，他在这里会见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等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明白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国际共运中是大有市场，大有支持者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两个新理论——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不仅可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和平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个新理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却支持它。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44 页。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45 页。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46 页。

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的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演讲中,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他有意避开了斯大林问题,避开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盛赞了列宁,盛赞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所作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废寝忘食,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是政治家,是诗人,又是哲学家,他看待事物,往往运用哲学的武器,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本质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考虑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现在,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斯大林一棒子打死,打入地下九千丈的地狱。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了,苏联不行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都不行了,就极力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实质。毛泽东想着,又走到写字台前,拿起几份材料细看。这几份材料,都是有关党组织报告那些发表攻击性言论的人的情况的。按逻辑推论,这些人一定是仇恨共产党的地主、资本家,或者是和国民党有瓜葛的反革命。然而不,不是。他翻遍了所有的材料,惊奇地发现、发表那些攻击性言论的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地主、资本家,也不是国民党右派,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其中有些人,他知道,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是和共产党风雨同舟、赤诚合作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的。有些人是共产党员,甚至是一贯表现很好的共产党员,但是对党有意见,对领导有意见。有些意见虽然尖锐、激烈,具有攻击性,但不能说他们是“敌人”,是“敌我矛盾”。斯大林不就是把有意见的人,反对自己的人当敌人,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犯了错误的吗?

看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执政党,成了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核心,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出来了,民主和集中统一、自由和组织纪律、正确和错误,香花和毒草的矛盾都出来了。各部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观点、意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摆在了共产党的面前,看你怎么处理?闹不好,矛盾激化,群众闹事,游行示威,事情更不好办了,这恐怕是一些单位,地方党组织告急的原因。

想到这里,毛泽东笑了。他轻轻地取来一支烟,点燃,吸着,又回味似地陷入沉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几十年了,我们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真似如鱼得水,和人民水乳交融;可如今我们的党执了政,领导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突出了,大大地突出了,以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成了我们不能不想到的问题。

毛泽东激情满怀,浮想联翩,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处理。但他不是一般地去说,去处理,而是要从一个新的角度,从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从未用过的角度去看、去讲、去处理。于是,他略一沉思,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醒目的标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接着,他便挥毫如飞,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一直写到夜半三更,写到

旭日东升……”

不久，传来了波兰事件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使他关于斯大林教训的思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又大大地深入了一步。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使他十分震惊。布达佩斯20万群众涌上街头，要民主，要自由，砸碎了门窗玻璃，烧毁了汽车、用具，党的组织和契卡组织遭到破坏，大街小巷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具具革命者的尸体被吊在街旁的路柱上。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逃注国外的匈牙利反动分子纷纷潜回布达佩斯，鼓吹独立、民主、自由，煽动群众造反，到处发生流血事件。拉科西和格罗都无法控制局势，要求苏联出兵。

苏联共产党首先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事态是严重的，派刘少奇、邓小平秘密地访问了苏联苏共又征求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共铁托的意见，得到赞同，派兵占领了布达佩斯，平息了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对于苏联出兵并不是完全同意的。他在前不久的波兰事件中，就坚决地反对苏联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波兰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现在，毛泽东也不同意把匈牙利事件简单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捣乱”。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毛泽东多次强调：参加匈牙利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人民”的范畴，不同意对大多数“人民”进行镇压。

谈到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索。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他提出的论据是：列宁主义就是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丢弃斯大林这把“刀子”，又认真地总结研究斯大林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少数人闹事的经验教训，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于正确地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所以、他更加抓紧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间，尽管他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睡觉，可是精神仍然亢奋，伏案写作，毫无倦意。

卫士封耀松蹑手蹑脚地走到毛泽东的桌前，说他很长时间没吃饭了，要给他搞点吃的。

毛泽东放下疾书的笔，转过身来，用那双网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卫士，摇摇头，像不想吃；可是停了一刹，又勉强地说：

“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了。”

光吃几个芋头怎么行？封耀松建议给搞点好吃的，毛泽东轻轻地挥挥手，不让打断他的思路，低下头去，又挥笔疾书。封耀松退出毛泽东的办公室，烤了六块小芋头，盛在小碟里，刚轻轻地端进门，却听见呼噜呼噜的鼾睡声。小封惊奇地一怔，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看见毛泽东左手抓着材料，右手抓着笔，伏在桌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卫士怕领袖这样睡觉着凉，低声地叫：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醒来了，矇眬着双眼，看了看小封，又搓了搓脸，说：“噢，又困又饿，先吃点吧！”说着，拿起一块芋头，站立起来，走到窗前，看见东方欲晓，天边露出鱼肚白色，满天的星星还在闪烁，便轻轻地活动了一下身肢，低声吟诵道：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见毛泽东又熬了一个不眠之夜，还自得其乐地吟诗、活动，准备吃芋头，便退出屋，在门外等候主席吃完芋头再去看他还要什么。可是，他等了十几分钟，不见呼叫，也听不到响动，封耀松轻轻地推门进去，只见碟子里只剩下了一个芋头，毛泽东坐在椅子上，脑袋歪在右肩上，已经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小封转到右边去端碟子，忽见毛泽东嘴里噙着半个芋头，没来得及咽；手里握着另一半芋头，没来得及放，就困倦得睡着了。

封耀松放下碟子，转过身来，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想让他睡得舒服些。谁料，他刚把芋头抠出嘴，毛泽东就被惊醒了。

毛泽东突然一震，睁开那一对熬得网着红丝而又迷糊惺松的双眼，把封耀松打量了一遍，问：“干什么？”

“主席！你……”封耀松望着领袖那疲惫不堪而又艰苦奋斗的身子，忍不住哭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把刚才从毛泽东嘴里抠出来的那半块芋头，捧在手上。

毛泽东不知怎么回事，叹了一口气说：“唉，别难受，我刚才态度不好，请你原谅！”

卫士哭得更厉害了，哽咽着，走上前，双手搀着毛泽东，抽噎地说：“不，主席，不是的，不是你态度不好，是你太累了，你……把自己搞得太苦了。你看看，这芋头是……是刚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太累了、太困了，必须马上睡觉、休息！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笑了，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像哄乖孩子似的，接过那半块芋头，放进自己嘴里，吃了下去，又拍着小封的肩头说：

“你看看，这不是吃下去了吗？吃饭，睡觉，都好办！你不知道，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

封耀松还是擦着眼泪，说：

“可不管怎么说，你总得休息呀！”

“好！好！我听你的！”毛泽东顺从地整理着桌子上的文稿，笑着说：

“你看，马上收拾，马上休息！”

封耀松也过来帮毛泽东整理文稿，发现那一厚叠文稿的上边，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根据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博得了阵阵的掌声。后来，他又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于同年6月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在这部创造性的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回答了斯大林逝世后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新经验，指出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上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直到这时候，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当作基本矛盾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该继续考察和探索。”“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他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好评、响应和争鸣。李济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陈嘉庚、马叙伦……纷纷放开喉咙，发言争鸣。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总结斯大林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部分人是批评本地区、本单位或最高当局的某些弊病，也有人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发起了进攻，武汉等地有人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喊出了反对共产党的口号！

毛泽东火了，坐不住了！

可是，一想到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的报告，匈牙利事件，他还是强

压怒火，硬着头皮听着，听着……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乘坐着“图 104”客机到北京来了。

毛泽东热烈欢迎，请这位德高望重的苏联老人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会谈中，伏罗希洛夫首先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引用清朝诗人的一句诗答道：

“万马齐暗究可哀么！”

伏罗希洛夫紧追不放：“可是，难道你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刊登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毛泽东还是笑着答：

“先放么。”

“社会主义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

“放出来我们才好驳么。”

“可是会出乱子的。”

“百家争鸣不是秘密报告。”毛泽东以守为攻，顺便刺了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下。

气势逼人的伏罗希洛夫，顿时脸红了，势收了，显得有点尴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虽曾激烈反对，然而，毕竟是出笼了，传开了，在世界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潮，作为苏共的代表，自己怎么好光怨别人呢？伏罗希洛夫沉吟一刹，才略带歉意地说：

“匈牙利事件是有教训的。秘密报告还引出那么多的大乱子，你们还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

“对，我们不搞秘密，我们是公开。”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和匈牙利不同，有错误也包不住，“不要做阿Q，头上有癞疮，又不许人说，反而更被动。”

伏罗希洛夫不以为然，说是敌人抓住一条缺点，大造舆论，就会煽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

毛泽东觉得伏老虽是好心，但他的思想观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还是停留在当年斯大林那种一捂二压的水平上。情况起了变化，教训如此之大，怎么还能用老观点、老办法，要相信群众嘛！他说：

“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话是这么说，伏罗希洛夫走后，过了不到十天，毛泽东看到有人确实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之机，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5月15日，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示党内“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毛泽东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斯大林的教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有发展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为了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除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外，在其他许多的讲话、文章中，都有重要的论述。

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斯大林的教训，防止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他注意度量，把握分寸，不说大部，不笼统地说“斯大林是主观主义”，而只说“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并且严格地限制说“是在一部分问题上”。实际上，大量史料表明，斯大林的主观性是很强的。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很少注意修改他的主观认识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部分，并且往往采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甚至惩办、镇压的手段，贯彻他那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的意见、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和粗暴作风，体会颇深，也作过多方面的斗争。但斯大林死后，他捐弃前嫌，不抓“辫子”，而是从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上指出：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批评斯大林搞形而上学。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了很多人搞形而上学。论据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讲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普遍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面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不谈对立的两个侧面，联系就没有条件。他第四条讲的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指出：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完全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完全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接着，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同一性和相互转化问题。他指出：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平时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是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平时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可见，它们还是有同一性和相互转化的，生与死也一样。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和转化问题，毛泽东讲得更生动、更具体。他指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经过革命后，为什么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完全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

经过具体深入的分析之后，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

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益。”但是，苏联的领导人就是不赞成。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只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一致”、“高度统一”，而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头，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毛泽东明确指出：直到这时，斯大林“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基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毛泽东勇敢地指出：“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二不知其二。”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的神学一样？”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是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激化。斯大林过分强调过社会主义的“和谐一致”，又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也犯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错误。可见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不易：既要防止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分寸、火候、方式、方法，都不易掌握。我们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重演，但也不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造成全国性的动乱。因此，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某些国家还有民族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制定反对和平演变的有效措施。

三、关于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是比较矛盾的。1958年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矛盾心情。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我们发展马列主义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将来在我们党内出现，重演‘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闹剧。”

毛泽东分析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

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很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和马克思关于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教导是不相符合的。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坚决地、完全地反对；而是有保留的，有同情的，甚至认为有些是“正确的”。这种保留、同情和辩解，为后来中国的个人崇拜，留下了余地，创造了条件，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是应该引以为鉴戒的。

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分析个人崇拜时，把“个人崇拜”和“个人服从”。“服从真理”等概念混同起来了。按《汉语词典》的解释，“崇拜”是尊敬钦佩之意，“服从”，则是遵照听从的意思。“个人崇拜”是将某个人加以“神化”，让人民尊敬钦佩；它和个人服从组织、战士服从班长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及时地提出了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发生。他明确指出：

“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和发挥。

四、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有没有腐化变质的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有没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曾把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称为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敌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曾力主“清党”，努力将旧制度的渣滓和各种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他说：

“我们的党又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就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和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进执政的党内来。”

斯大林也重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坚持列宁的事业，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他写道：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9页。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3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7页。

斯大林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他忽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过分“粗暴”，往往以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犯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苏联社会留下更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缺乏警觉和防范，以致使赫鲁晓夫这样的阴谋家得宠得逞，篡夺了领导权。

毛泽东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始终殚思竭虑，毫不松懈。他提出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等措施，对于防止和平演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3年，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五、坚定不移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及时地引导苏联人民展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他管得过死，卡得大严，没有及时汲取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经验，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简单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西方视为“铁幕后面”，年轻一代则不能经风雨、见世面，缺少“免疫力”；遇到“和平演变”、“糖弹进攻”，往往吃败仗，甚至难免“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方针、政策。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的导语中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过去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因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

可惜的是，党的八大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很快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指导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册第4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

思想上犯了“左”的急性病，致使先后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此长彼消，互相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以及能否使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人民中间的形象，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同政治，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革命同为一体，密不可分。正如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不认清这个实质，是非常危险的。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正反两方面的无数经验证明：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也不易。而只要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又坚决执行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蓬勃发展。

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都经常地大量地存在与发展，而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以至于有人把它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消商品生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但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相当影响，对商品生产多方限制，害怕产生资本主义。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也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毛泽东也想尽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过早地提倡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后，毛泽东读了好多遍。经他批注的这本书就有四本。由此可见，斯大林提出和论证的问题，对毛泽东是有启发的。他还亲自写信给党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

“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在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他写道：

“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于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版第 372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2 页。

“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
__该书中，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写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批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__这些批注，这些明显地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正确观点，而又突破了和纠正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从而形成了当时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作过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谆谆教育干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运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

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大计。

由于历史的局限，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个根本大计，没有注意选拔和培养接班人，在他逝世之前，也没有选拔接班人，致使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凭着斯大林夫人娜佳的“一张彩票”和多种钻营的手段，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并把这看成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大计，看作“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应当指出：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例如，他先选拔刘少奇作接班人，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使阴谋家林彪趁机取宠，当上了“副统帅”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他又选拔野心家王洪文作“接班人”，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试玉要待十日满，辨材仍须七年期。”人是会变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还会伪装，所以，选择和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很不容易。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重视群众路线，革命实践，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

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奋斗了一生。他喜欢豪放的诗词，更喜欢那首充满战斗激情的《义勇军进行曲》，亲自主持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确，每当他打开收音机，听到那高昂如进军号的音乐时，他总是心潮激荡，豪情满怀；每当他吟起那情深似海、奔走呼号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他总是恩绪万于，浑身是劲，感到有用不完的力量。

历史已经宣告，毛泽东是带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发图强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在那风雨如盘、长夜难明的日子里，他和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探新路，练长缨，“缚苍龙”，开天辟地，缔造了新中国；在那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岁月里，他又带领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边学边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了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不畏强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侵略军。他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都得到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斗争中，他和斯大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尽管其中也有过分歧和矛盾，但那是同志间前进中的矛盾，并且最后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此，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叛卖列宁斯大林的事业的时候，当看到西方的和平演变使苏联面临危机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并且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唱起了战斗的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毛泽东不畏艰险，不惧强暴，曾经在庄严的讲台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后 记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举世瞩目的两位伟大人物，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他们的思想、理论、事业、

工作、生活、作风，牵连的方面很多，范围很广。要塑造他们的形象，写出他们的业绩，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精神，很不容易，需要长期地调查，反复地研究，不断地探讨，逐步地深入。这本书，虽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也只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种探讨。1948年至1963年的15年间，作者在陕北工作时，就开始收集、整理有关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史料、故事，先后走访了毛泽东生活工作过的延安、保安、瓦窑堡、直罗镇、洛川、小河、南泥湾等数十处地方，访问过数百名接触过毛泽东的干部、群众和警卫人员。后来又以专搞文艺创作和主编《革命英烈》刊物之便，先后走访了湖南、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搜集有关史料，阅读毛泽东、斯大林的著作及各种有关材料、书籍、业余进行编写，数易其稿，才成此书。

本书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为线索，以中国革命力主题，以毛泽东和斯大林为主要人物，运用真实的史料，朴实的笔法，描写、叙述了毛泽东的成长道路、革命实践、理论创造、思想作风、性格特点，描写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意见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等等；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读物。

内容决定形式。本书的结构曾经多次探索，数易其稿、最后，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思想交流长达30年而晤面交谈不足3个月的特点，采取了双向集中法。书从高潮写起，从两伟人亲切会面，留下了层层悬念写起，描写两位伟人的会面由近及远，而历史的叙述则由远而近；双向集中，融会贯通，成为一体，相互比较，远近比较，便于鉴别。这样，把人物的言行，历史的叙述和哲学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文、史、哲融为一体，既避免了编年史式的历史叙述，平铺直叙，缺乏跌宕起伏的艺术魅力，缺乏对比研究的哲学思考；又防止了单纯地写人物会面、记叙礼仪。议论过多，缺乏人物行为、故事情节、思想深度的毛病，力争达到写史、明理、资治、育人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意图和初步的尝试，缺点必然不少。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历史见证人和专家、教授的指导帮助。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毛泽东和斯大林交往的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何静修同志，全国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编温济泽同志。国防大学历史学教授马玉卿同志，原《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同志，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党佩中同志，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杨进诚同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同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叶佐英同志，总编室主任王杰同志，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主任孙平同志，副主任薛文华、孙启蒙同志，西北大学教授李振民同志，西北政治学院副教授赵建学同志，都对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具体地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年逾八旬的师哲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而且为本书的写作做了多次热情而具体的指导。师老虽然高寿，但鹤发童颜，满面红光，思路清晰，谈吐自如，记忆力很强。几十年前的事，他谈起来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于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1938年调到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39年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师哲又奉命协助

周恩来工作。1940年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认识了毛泽东，先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局长等职。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文电都经他翻译。1949年春，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华会见毛泽东，师哲任翻译。1949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师哲又任翻译。1949年冬至次年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会见斯大林，师哲仍任翻译。所以，师哲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交往的历史见证人，是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师哲同志不辞辛劳，曾两次审阅书稿，并写了《序言》，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有关资料，参阅了周恩来、师哲、伍修权、胡绳、洪学智、马玉卿、逢先知、高菊村、胡华、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高光厚、曹军、权延赤、李银桥、宋平、解力夫、赵振军、温瑞茂、南新宙、解红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R·特里尔、斯图尔特·施拉姆、日本友人不破哲三等的有关著作；同时，还尽量吸收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和专著中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以上诸位作者、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题材重大，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刘杰诚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本书写作时参阅的著作目录

本书写作时曾参阅了大量的书籍、报纸、刊物、资料，其中主要的有：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4. 《斯大林全集》第1卷至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
7. 《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9.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11. 《毛泽东的成长道路》，马玉卿、张万禄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12.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13.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14. 《青年毛泽东》，高菊村、陈峰、唐振甫、田余粮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
15.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概要》，高光厚、曹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16. 《中共中央在陕北》，赵振军、温瑞茂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7. 《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18. 《陪同毛主席访苏》，师哲著，载《人物》1988年第5期。
19. 《斯诺文集》（11）新华出版社1991年8月版，（美）埃德加·斯诺著，又名《西行漫记》。
20. 《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1. 《毛泽东传》，（美）卜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22. 《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
23. 《周恩来选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24.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25. 《斯大林与大国主义》，（日）不破哲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26. 《蒋介石生平》，宋平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2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审定，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
28. 《周恩来传略》，方钜成、姜桂依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9. 《雅科夫之死真相》，解红著，《人民日报》1989年2月26日。
30.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逢先知著，1990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31. 《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权延赤著，昆仑出版社1989

年5月版。

32. 《周恩来一生》，南新宙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7月版。
33. 《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4. 《毛泽东和斯大林莫斯科会晤前后》，闽力、刘宁荣等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35.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权延赤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6. 梁敬鎔著：《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37. 《蒋总统秘录》第1册。
38.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
39. 《新华日报》1950年1月号、2月号、3月号。
40. 延安《解放日报》。
41. 《红色中华报》。
4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43.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
44.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出版，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1988年5月版。
45.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46.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
47. 《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办。
48. 莫洛托夫《忆旧》，载1992年7月《参考消息》。
49. 《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50. 叶永烈：《陈伯达其人》，转引自《南方周末》1991年4月。
51. 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
53. 《光明日报》1992年1月、2月、3月。
5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55. 师哲：《在战争的背后》，载《军事史林》1992年第3期。
56.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委会主办，1982年第1期。
57. 洪学智著：《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58. 《近现代名人对联辑注》，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59. 《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
60.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
61.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年第9期。
62. 《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63. 李银桥著：《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4.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
6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66. 《湘江评论》，毛泽东主编，第1号、第2号、第3号、第4号。
67. 李捷：《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载《党的文

- 献》1991年第六期。68.《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阅读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6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12月版。
- 70.《西班牙》费尔多男·克劳丁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 71.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 72.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 73.《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74.杨开慧：《六岁到二十八岁》，载《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第一期。
- 75.《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 7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 77.《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
- 78.《国父年谱》（增订本）1969年台北出版。
- 79.张国焘：《我的回忆》，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 80.《陕西日报》1990年5月1日：《列宁最先提出国共合作》。
- 8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 82.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
- 83.《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载《政治周报》第五期。
- 84.《孙中山致越飞的信》，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 85.《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66年第10期。
- 86.《国民日报》（上海）1922年5月13日。
- 87.刘少奇、朱少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年出版。
- 88.《毛泽东和安源工人》，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 89.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1963年8月4日《北京日报》。
- 90.黄爱：1920年10月27日《致陈独秀的信》，载《湖南工会史选编》第一册。
- 91.《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载《六大前后》。
- 92.湖南《大公报》1922年9月、12月。
- 93.《粤汉铁路大罢工纪实》，载湖南《大公报》1922年9月。
- 9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 95.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
- 96.《孙中山全集》第七卷。
- 97.《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 98.《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7月版。
- 99.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 100.《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1926年3月。
- 10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
- 102.《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1926年1月。
- 103.《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2次常务会议录》。
- 104.《国民党中央党部第22次常务会议录》。

105. 《新时代》创刊号 1923 年 4 月出版。
106.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1924 年 1 月 20 日、22 日、29 日。
107. 《农民运动》第 8 期 1926 年 9 月 21 日出版。
108. 《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1926 年 10 月。
109. 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版。
110.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3 — 1986》。
111. 《罗易回忆录）。
112. 《政治报告决议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1926 年 12 月。
113. 《李维汉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版。
114. 解力夫著：《纵横捭阖斯大林》。
115. 《土地委员会第一、二次扩大会议纪录》。
116. 《赫鲁晓夫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17. 汉口《国民日报》1927 年 4 月 22 日。
118. 《上海档案资料丛编》。
119. 解力夫著：《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
120.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
121. 诺恩、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
122.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123.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124. 《领袖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
125.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126. 陈铁健著：《瞿秋白》，《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
127. 王明：《中共五十年》。
128. 《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年 5 月版。
129. 《王明言论选辑》。
130. 费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
13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132.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六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
133.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134. 《国共关系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135. 波多野善大著：《国共合作》。
136. 《中共中央致杨虎城家属唁电》，原载《革命英烈》1983 年第 3 期。
137. 西安《解放日报》1937 年 1 月。
138. 崔可夫：《在华使命）。
139. 《救国时报》1936 年 6 月 5 日。
140. 王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词），载 1939 年 12 月 30 日《新中华报》。
141. 朱仲丽：《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一次重要指示的前前后后》。载《革命史资料》第 7 期。

142. 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143. 师哲：《我们党的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载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
144.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
145. 《蒋经国传》，丁依著。
146.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
147. 琼斯等著：《1942 - 1946 的远东》。
148. 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
149. 《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辑。
150. 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151.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 — 1950》（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52.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
153. 德迪邦尔：《苏南冲突经历》。
154. 杰吉耶尔：《铁托传》，三联书店 1977 年出版。
155. 《任弼时同志日记》，载《党史通讯》1954 年第 7 期。
156. 苏联《真理报》。
157. 苏联《消息报》。
158.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59. 《抉择与分歧》。
160. 《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版。
16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62. 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 年纽约出版。
163. 富勒著：《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 年伦敦出版。
164.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出版。
165.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66.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对上述作者、编者、出版者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刘杰诚

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 文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导师和领袖。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作过光辉的贡献，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作过宝贵的支持和援助，也有过错误的干扰。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也有矛盾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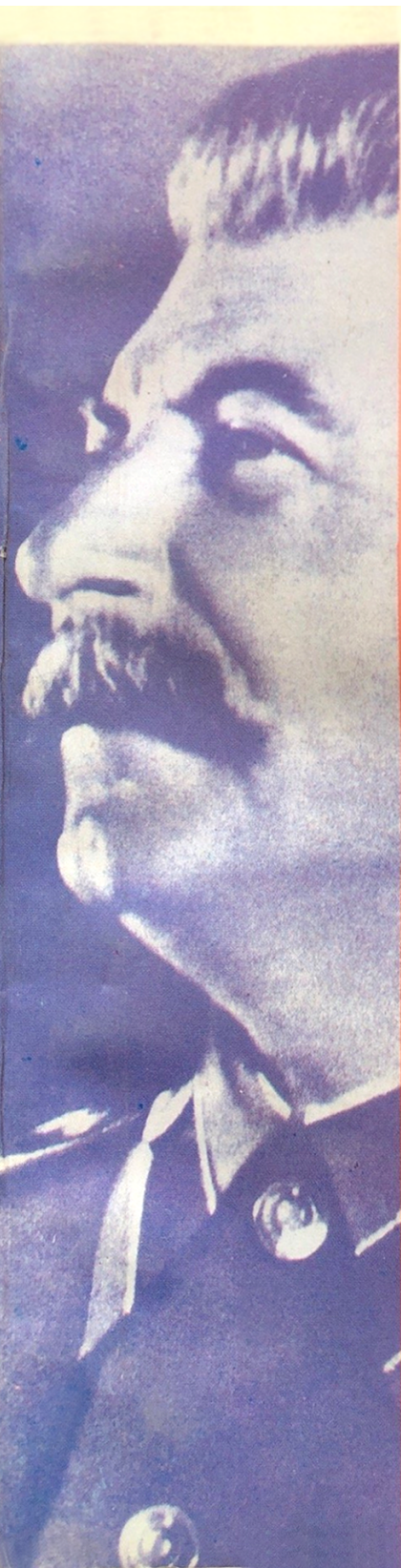
刘杰诚同志编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以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主题，叙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部书通过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共识与分歧，一致与矛盾，革命友谊与原则斗争，交织着中国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胜利与挫折，叙述了毛泽东如何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高压之下，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的错误思潮，带领党和革命人民，战胜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进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造，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光辉典范。这部书就是从这个崭新的角度，采用当代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比较法”，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比较中，生动而具体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而，它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国际共运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际共运事业处于低潮，许多共产党人都在沉思，在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历史经验。经验在何处？这部书以翔实的史料指出：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的倾向，必然将革命引向绝路；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列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则多次使革命和建设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蓬勃发展。这种通过伟大人物的行为比较，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写成的史、哲、文结合的著作，对于启迪人民。教育广大青少年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收到良好的效益。

马玉卿

1992年3月31日



毛泽东 斯大林 与

刘杰诚 著



作者：刘杰诚 著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04

ISBN：9787503506680

定价：25.80